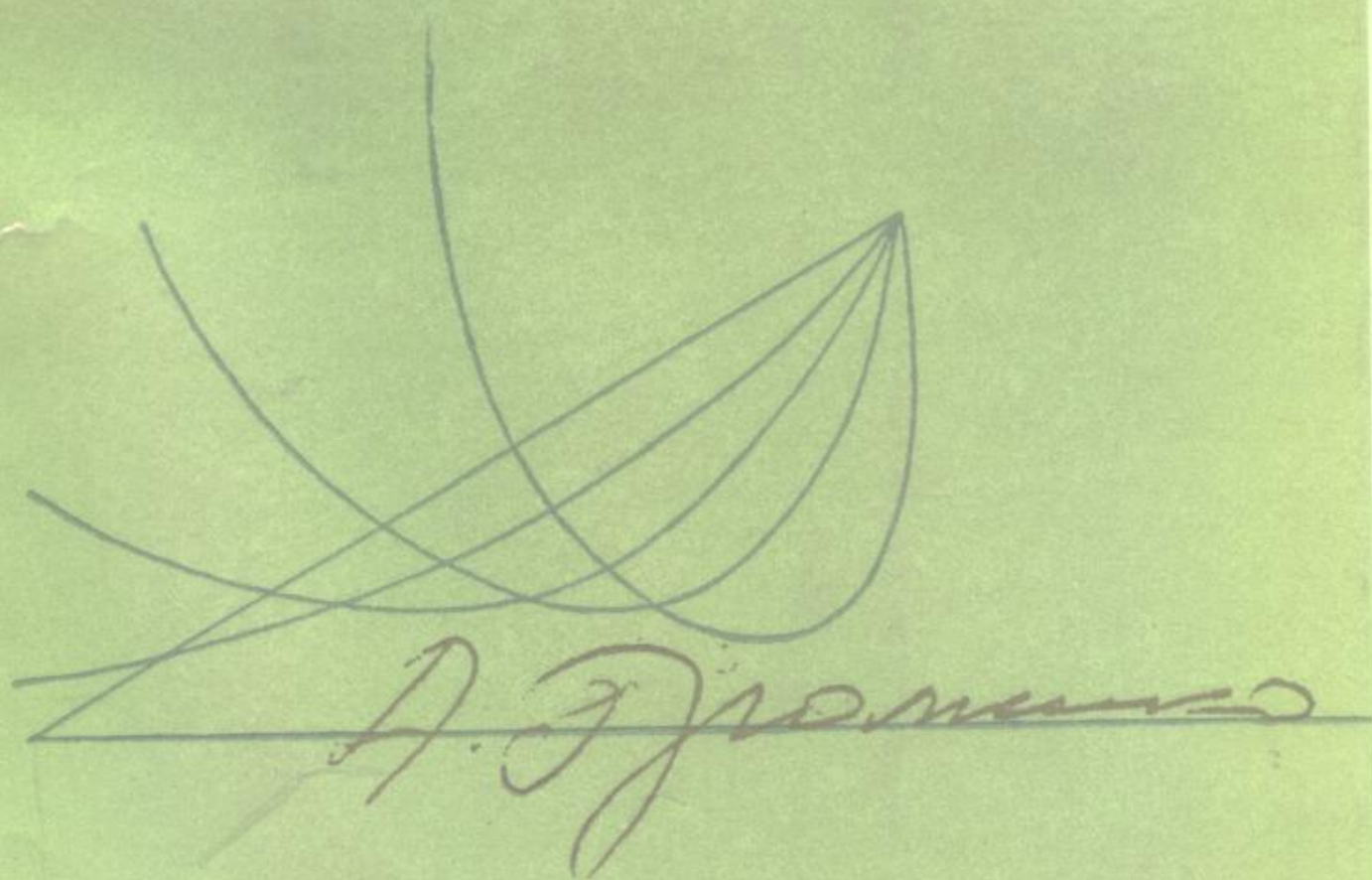


[苏]安·安·葛罗米柯 著

永志不忘

——葛罗米柯回忆录



目 录

第十章	再论欧洲事务	1
第十一章	朋友和邻邦	101
第十二章	再谈邻居和朋友	174
第十三章	近东的十字路口	220
第十四章	谈谈对美关系	250
第十五章	林肯的国家中的黑暗与光明	322
第十六章	不用大礼帽和燕尾服也能 办外交	370
第十七章	公理是否需要证明	423
第十八章	为熟悉的肖像再描几笔	438
第十九章	党高举列宁的火炬前进	488
	代结束语	498

再论欧洲事务

如果谈到意大利……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 路易
吉·隆哥的回忆 第一次在罗马提出的主张 国务
活动家的群像“永恒之爱的使者” 水中巨石 奎里
纳尔宫里的居民 汉尼拔击败罗马军团的地方 红
石竹花——古图索的象征 两个塔季扬娜 在梵蒂
冈的谈话 马德里的今昔 塞万提斯、戈雅、埃
尔·格列柯的国家 友好邻邦——芬兰 瑞典及其
奥洛夫·帕尔梅 在丹麦王子哈姆雷特的故乡 邻
居的重大责任 鲁本斯的名言 荷兰人民的感谢
中立不应发生动摇 奥地利的名片 我未能去过的
国家 只要越过北极便近在咫尺

欧洲和澳大利亚是地球上最小的两个洲。

欧洲的面积仅略大于澳大利亚，但人口却是澳大利亚的50倍。欧洲是古代文明的发源地和现代政治的巨大中心。同这个大陆所有国家保持和改善关系，过去和现在都是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主要任务之一。

如果谈到意大利……

意大利……一提起这个词便使人联想到永恒的罗马和威

尼斯、维苏威火山和阿尔卑斯山、大斗兽场和米兰的“拉·斯卡拉”歌剧院、米开朗琪罗的西斯廷教堂^①和彼特拉克^②的十四行诗、列奥纳多·达·芬奇和拉斐尔。尽管我几乎抑制不住想继续列数大城小镇、名胜古迹、各种杰作和文艺复兴时期天才们的名字，但看来可以到此止笔了。

每个踏上这个古老国家土地的人，也许都会产生同感。

如果历史的经验，特别是近代史的经验能说明什么重要问题的话，那么，它首先说明，苏联和意大利及两国人民必须保持良好的关系。两国的友好关系史包含数不胜数的有益例证，它们是两国在修筑它们现在的关系时也必须考虑的。今天可以说，双方所做的努力使双边关系在60年代以及后来的岁月里达到了崭新的水平。

我不止一次正式访问过意大利，不少意大利的国务活动家也访问过苏联。

但是，在谈我自己同几位意大利的著名活动家会见、谈话所得印象之前，我想简要地讲讲每当提到意大利时我内心所萌发的感受。

早在中学念书的时候，我就开始对这个国家、对它的历史产生兴趣了。记得在学校里我偶然得到一本名为《寻母》的小书^③。我怀着激动的心情，阅读着描写来自热那亚的小男孩的奇遇，和他在遇见最亲近的人之前在世上的流浪经历。

① 在罗马，原梵蒂冈教堂，现为博物馆，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古迹。——译者

② 意大利诗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化的先驱（1304—1374）。——译者

③ 1986年底，当我的书快脱稿时，应我的请求，列宁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找到了这本小书的旧版本并寄来让我看。这使我感到高兴和惊讶。书的封面上有作者的名字：德·亚米契斯，而标题下写着“译自意大利语”。——原作者

我甚至把这本带有感伤色彩的小书看成是意大利的缩影。

在上大学以至更晚些时候，罗马帝国发生的那些暴风骤雨般的事件、充满神话色彩的罗马帝国的庄严形象、远古时期的统帅和国务活动家的光辉业绩，仍然使我激动不已。自然，对罗马军团的征伐和对执政官与恺撒喋血争斗的浓厚兴趣来自于年轻人所特有的、对一切具有浪漫色彩事物的向往。

我不是总能找到所需要的书，这样有关意大利的书我往往是碰到什么就读什么。尽管如此，我还是积累了一定的知识。这使我后来对这个国家一直怀有兴趣。这不仅是由于工作的需要，而且也是为了研究它的现状和历史。

同所有苏联人一样，我对意大利的想象在很大程度上因这个国家曾一度被法西斯篡政而变得黯淡了。简直难以相信，伟大诗人、艺术家、雕塑家的祖国竟被文明的暴君所统治，黑衫党员^①会践踏作为恺撒和文艺复兴的遗产的罗马并在威尼斯和佛罗伦萨横行肆虐，意大利的古迹和文化珍品会落入黑暗反动势力手中。

恶贯满盈的法西斯被消灭了，它的魁首——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也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然而，意大利却生存着。在此，还应当对那些为反法西斯而斗争、积极参加抵抗运动的老战士们寄以缅怀之情。

每一个诚实的人都会承认，在意大利抵抗运动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共产党人。

① 意大利法西斯党徒们所穿的制服是黑色的，所以将他们称做“黑衫党员”。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

意大利共产党的历史同帕尔米罗·陶里亚蒂的名字紧密相连，即使在意大利实行法西斯专政、意大利共产党的活动处于非常时期时也是如此。几十年中，他一直是公认的党的领袖。作为领导者，作为争取实现劳动人民的理想、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说的胜利而顽强斗争的战士，他具有卓越的才能。不仅认识他并同他经常见面的人，甚至那些敌视社会主义的营垒里的人们，过去和现在，都对此给予了应有的评价。

我同帕尔米罗·陶里亚蒂见面不多，只有两次。最后一次会面是在他逝世前不久，那时他已生病。

我怀着忧伤的心情看着他。他象一支慢慢熄灭的蜡烛。他发达的智力仍能思索问题，但说话已很吃力。他死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了社会主义的胜利他奋斗了一辈子。

我们的第一次会面要早得多，是在一次他访问莫斯科的时候。那时我已经是苏联外交部长了。

在党中央委员会里，人们对我说：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希望同您谈谈。您最好能满足他的愿望。”

陶里亚蒂下榻在位于列宁格勒大街的“苏维埃”旅馆。我乘车前往那里并径直走进他的房间。我们热情地相互问好。陶里亚蒂同我交谈了起来并且立刻转入正题：

“我请求与您见面，是因为有一系列的国际问题使我不得安宁。”

当时的世界局势确实很复杂。那时正值50年代末期，“冷战”还在继续。

我说道：

“我很高兴同您谈谈这个题目，更何况我身在外长之位，每天都得研究国际问题。”

陶里亚蒂说：

“西方，首先是美国和英国，到底想干什么，我久思不得其解。如果听听这些国家领导人所做的声明，那么，其中除了对苏联，同时也对其他国家的兄弟共产党讲了带有敌意甚至侵略性的言论外，有时还说些想搞好关系的话。我们意大利共产党人不大相信那些声称主张局势正常化和改善东西方关系的西方人士。”

他的谈话好象是出声的思索。

陶里亚蒂问道：

“请告诉我，我们的疑虑是否正确，或许，我们有什么考虑不周之处？”

我答道：

“这种疑虑是完全有根据的。可以指出两个事实来证明这一怀疑是正确的。”

接着，我开始阐述自己的思想：

“第一，美国人在世界各个地区已经建立和正在建立大批军事基地。这些基地是针对谁的呢？当然是针对苏联的。苏联领导曾多次指出过这一点。并且说真的，所有不大容易被帝国主义宣传所迷惑的人都清楚这一点，虽然这种宣传在西方把许多人的思想搞糊涂了。”

陶里亚蒂专心地听着。我又接着说：

“第二，您当然清楚，1955年7月在日内瓦召开的四大国政府首脑会议期间，苏联发表声明说，如果西方大国的领导人认为北约集团是防御性的，而不是侵略性的，那么，苏联准备加入北大西洋联盟。美国、英国、法国的领导人对这个建议至今也想不出一个明确的回答。实际上，他们不同意这个建议。”

我问陶里亚蒂：

“您还记得果戈里的喜剧《钦差大臣》中的最后一幕吗？”

陶里亚蒂说：

“不，我记不得了，尽管我熟悉果戈里的作品。”

于是，我提醒他说：

“一个假冒钦差大臣的人，前去察访一个俄国小县城长官的行为。这使这位长官惊恐不安。后来他突然发现，他们把一个狡猾的骗子当成了钦差大臣，而真正的钦差大臣则刚刚到达他们的城市。事情就是这样。当参加日内瓦会晤的人士听到我刚才所讲的苏联代表团的声明后，他们就如同果戈里喜剧中的角色一样，露出一副惊恐的面孔。我当时是苏联代表团的成员，所以对这一切记忆犹新。最有意思的是观察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了。艾森豪威尔在听到布尔加宁^①宣读的声明后，简直不知所措。”

陶里亚蒂微笑着说：

“如果我能看到这种场面，也是莫大的享受。”

接着，他得出个政治结论：

“当然，由于苏联及其朋友们和北约各国所追求的目标

^① 当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译者

截然相反，因此，北约各国不可能同意与苏联组成一个集团。况且，阶级的障碍也是无法克服的。”

然后，陶里亚蒂又问道：

“您对德国问题的事态发展有什么看法？美国人、英国人，还有法国人都在极力向西德‘大献殷勤’。他们显然打算把联邦德国推上复活军国主义的道路。我们意大利共产党人要继续向人们解释，对西德采取这样的政策意味着什么。但是，意大利本身也正越来越深地卷入北约的军事计划里去。所以，西欧的形势是非常复杂的。”

我表示同意对方的想法并强调说：

“国际政治，特别是欧洲政治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不允许西德复活军国主义，就象在东方不允许日本复活军国主义一样。西方大国——我们昔日的战时盟国将西德越来越深地拖入自己的战争计划中。鉴于北约对西德的打算，看来，我们，苏联和我们的朋友们——各兄弟共产党将面临着长期的斗争。”

陶里亚蒂赞同这种观点并说道：

“是的，斗争将是长期和艰苦的。因此，特别是考虑到西德拥有相当大的工业潜力，各兄弟党应竭尽可能来防止把西德变成军事大国。”

我提醒陶里亚蒂注意国际政治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

“现在人们对研究裁军问题越来越重视。由于美国及其西方集团的盟国拒不接受苏联提出的有关削减军备的所有建议，这个问题的尖锐程度有增无已。至于核武器问题，他们拒绝了苏联向联大提出的关于签署禁止核武器和将核能只用于和平目的的国际公约的建议。”

对方非常迅速地对这些话作出了反应。他说：

“意大利共产党人把支持苏联在裁军、包括禁止核武器问题上的政策看作是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

我们的谈话基本上围绕国际问题进行的，但陶里亚蒂对意大利国内形势和意大利资产阶级的动向也发表了许多有意思的见解。

这位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说：

“意大利的资产阶级（他指的是本国的统治阶级——原作者）越来越倾向于不顾损害意大利的民族利益去同美利坚合众国合作。”

我注意到了，陶里亚蒂的情况不错，身体看上去正常，对有关问题反应迅速，对国际问题相当熟悉，表现出是一个有高度文化修养、知识渊博的人。他阐述的思想很有逻辑性，使人感到，他表达的想法并不是信口说出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在我的记忆中，帕尔米罗·陶里亚蒂是共产党员、意大利的儿子，是一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著名的活动家，苏联的朋友。他也就这样被载入了史册。

路易吉·隆哥的回忆

在同帕尔米罗·陶里亚蒂诀别的哀悼日过去之后，意大利共产党人于1964年8月选举了路易吉·隆哥为自己党的领导人。他也是一位十分闻名的活动家。例如，早在20年代初，他的名字就已广为人知，仅此就可说明许多问题。隆哥于1922年来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他聆

听了列宁在大会上做的报告。

我同隆哥有过数次会面并交谈过，但最难忘的是50年代中期同他在克里米亚的会见。那是在别墅里。当时隆哥和夫人到这里来疗养，我和利季娅·德米特里耶夫娜¹也在那儿休假。

隆哥去克里米亚是医生们极力建议的。医生们规定他要在暖和、干燥的气候条件下休息，洗海水澡。当然，意大利的气候也是暖和的，但隆哥公道地强调说：

“第一，只有在苏联的土地上、在列宁的国家里，我才能真正得到休息，似乎这里空气也是香甜的。第二，在意大利几乎找不到象克里米亚这样气候干燥宜人的地方。”

我们休养的期限几乎相同。我们经常见面，几乎每天都交谈。话题广泛，谈话时间有时长，有时短。

隆哥个人具有一种巨大的魅力，象他这样的人，这可说是天赋的。此外，他投身于工人阶级事业和反对剥削者的斗争，这样的生活锻炼了他，使他树立起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

他精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敬佩击溃希特勒庞大军事机器的苏联人民。

隆哥谈话自如，善于变换话题。我喜欢他侃侃而谈的风度和善于博引古今。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听他讲述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情况。自然，我表示希望隆哥更详细地谈谈他对大会的印象。

“那是1922年11月，”隆哥讲道，“11月13日，列宁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做了《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

¹ 即葛罗米柯的夫人——译者

命的前途》^①的报告。报告的题目听起来很响亮，但他本人在报告开头说，这个题目太广泛太庞大了，要一个人在一次演说里把它讲透彻，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他也只谈了这个题目中的一小部分，即关于新经济政策的问题。当时符拉迪沃斯托克^②被收复了。这意味着红军已将日本占领者的最后一批部队赶到海上，所有侵略者被全部赶走，苏联领土得到了彻底解放。”

他讲得很生动，我听得也津津有味。

他继续说：“列宁在贺词中宣布，国内战争已经结束了，这句话激起雷鸣般的掌声，似乎大厅的拱顶都颤动了。”

隆哥回忆说：

“会议的所有参加者都入迷似地听着列宁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讲述了苏维埃共和国经济建设的计划。在分析了国家的财政制度之后，他指出，俄国卢布的数量已经超过一千万亿，我看，单凭这一点，俄国卢布就够著名的了。^③这句话引起了大厅一阵笑声。他说，零是可以划掉的，并暗示，苏维埃政权准备采取坚决措施为稳定卢布而奋斗，同经济崩溃做斗争。这又博得了大厅里的欢快笑声，会场气氛更加活跃。”

隆哥记得这个报告的所有细节。可以想象，他并不是向我第一个讲述这件事。自然，对伊里奇的回忆，更何况是亲身经历的回忆，对每一个列宁主义者来说，都是特别珍贵的。他继续讲道：

① 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658页。——译者

② 即海参崴。——译者

③ 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662页。——译者

“显然，针对那些对苏维埃政权不怀好意的人和苏维埃政权敌人的各种攻击，列宁直率地说，国内还常出现失误。我们刚刚开始学习。他说，但我们是在有步骤地学习，所以，我们深信一定会取得良好的成绩。那么，批评苏维埃政权的那些人难道不犯错误吗？但错误常是各种各样的，列宁说道，布尔什维克干蠢事，好比是布尔什维克说‘二二得五’，而布尔什维克的敌人，资本家和第二国际的英雄们干蠢事，就好比是他们说‘二二得蜡烛’了^①。”

我当然知道列宁这句形象的比喻。它出自伊·谢·屠格涅夫的小说《罗亭》。这部作品中的人物毕加索夫厌恶女人，否认女人具有严格逻辑思维的能力。他说：“一个男人，打个比方说，他也许会说二二不得四，而得五或三个半；可是一个女人却会说二二得蜡烛。”^②但我没有打断他兴致勃勃的讲述。他激动地讲述着列宁本人：

“列宁讲话富有激情，不时强调和重复重要的话和思想，使听众听得更明白些。因此，列宁并不象一些演说家那样，常常注重演讲本身的表面效果。对列宁来说，主要的是要有思想，要有思想的发展和趋势。他希望的是听众能明白，他维护什么，主张什么和坚持什么。正是这一点赢得了听众。”

隆哥似乎在引用某人的看法来证实自己的话，他补充说：

“那时我只不过通过亲身经历确信，过去多次从别人那儿听到的关于列宁、关于他谈话或在公众面前演讲的风格的话都千真万确。”

^① 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669页。——译者

^② 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254页注释17E。——译者

隆哥还回忆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意大利抵抗运动的情况。追述当年情况时，他尽力不去强调他个人的作用，尽管他的作用是众所周知的。

他力图表达这样一个基本思想：

“共产党人是抵抗运动的灵魂。他们知道许多人将会牺牲，但仍自觉地去自我牺牲。当然，在抵抗运动的行列中，与共产党人并肩战斗反对法西斯的还有其它党，其中包括社会党的成员。这扩大了抵抗运动参加者的阵线，增强了它的力量。”

隆哥讲述了意大利抵抗运动的领导人怎样追捕法西斯头号恶狼墨索里尼，最后将其捉拿归案并处死。

“就这样，”我的交谈者总结说，“意大利人民翻过了自己国家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隆哥还谈到了另外一点：

“在意大利抵抗运动中战斗的还有苏联人，他们的名字意大利人民永世难忘。”

在谈话中，隆哥多次赞扬苏联的对外政策。

“我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政策，它不仅符合苏联的利益，而且也符合各国的利益。”路易吉·隆哥强调，“因为各国人民要求和平与生存。”

第一次在罗马提出的主张

法西斯制度在意大利崩溃后，意大利退出了战争。1944年3月，苏联同它恢复了外交关系。既然有了这样的关系而且发展正常，那么，在最广泛的领域中进行人员的交往，包

括国务活动家之间进行会晤，便是顺理成章的。

每次来到罗马、从机场向市中心行驶时，你总会从思想深处的某个角落里冒出一个想法：“我这不是在古老的亚庇乌斯道路¹上急驰飞奔吗！这条路上还保留着古罗马奴隶整齐铺设的石块呢！一路上还会遇到多少废墟和部分保存下来的遗迹啊！”这种感觉看来与踏入我国神圣的地方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土地上的外国人的感受相似。

当你来到意大利首都，不论这是第一次或是第十次，你的眼睛都会不由自主地开始寻找半圆形的大斗兽场。没有大斗兽场的罗马就不成其为罗马。看到这个伟大的古迹时，任何人大概都不会不想到，在大斗兽场倒下了成千上万个角斗士，他们是由于奴隶主的怪癖而去送死的。在帝国时期，被鲜血染红的娱乐场似乎成为颂扬奴隶制社会、压迫与无权的标志。

在意大利，我曾会见了该国总统、总理和外长，并同他们进行了会谈。因此，不能不谈谈这个国家政治生活的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意大利没有出现什么突出的、就作用来说可与法国戴高乐、英国丘吉尔、西德阿登纳相媲美并得到公认的社会人物。这里形成了资产阶级活动家的固定圈子，他们从一个职位转到另一个职位，牢牢地把持着国家权力的最高职位。所以，我觉得按什么次序谈论他们并无实质意义。

1978年天主教民主党领袖阿尔多·莫罗惨遭恐怖分子杀害。这是值得第一个提起他名字的重要理由。

¹ 第一条石铺路，由罗马至卡普阿（全长350公里）——公元前312年亚庇乌斯、克劳狄乌斯任监察官时铺设。此路至今几乎完整保存下来。——译者

人们可能会问我：

“您最熟悉哪位意大利国务和政治活动家？”

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

“阿尔多·莫罗！”

是的，这并不是因为他已不在人世。也不是因为，由于莫罗惨遭杀害（这不仅仅震惊了意大利人），才在我心目中出现了这样一个人的形象！他不愧为向世界贡献伟大古代文明的国家代表，而这一伟大的古代文明在某种程度上在整个西方世界，甚至不仅仅在西方世界，播下了未来的种子。例如，著名的拿破仑法典就是根据罗马法的公设编纂而成的。后来，这个法典丰富了西欧拉丁语系国家，并通过它们又丰富了其他许多国家的法学和法律实践。

莫罗虽然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位代表人物，但他毕竟坚决主张国家之间的分歧应通过和平途径，而不是以武力来解决。他认为，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不管它们之间在争议的问题上分歧多么尖锐，也不要使用武力。

在一次谈话中，他对我说：

“当今世界积存了大量核武器，不应该允许使用核武器。再形象点说，连罗马军团的剑都不能依照其本身用途来使用，更不用说不能允许使用核导弹啦。”

听着他的讲话，我想，“他不就是持剑在那片土地上（那里后来出现了许多现代国家）南征北伐的那些人的后代吗？”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引用的阿尔多·莫罗的话，还是他在70年代初期说的。

他没有改变自己的信念。

我认为，他是一位智慧超群的政治家，深思熟虑和严肃认真的交谈者。起初，我刚认识他时，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位慢条斯理，甚至思维迟钝的人。但是，他表达思想准确、聚精会神，阐述立场系统完整。这些正是莫罗在会谈和交谈时与众不同的地方，所有这些特点很快改变了我对他的第一个印象。

我在联合国大会上多次见过莫罗。我们在赫尔辛基全欧会议最后阶段见过面。他坚持北约国家的共同立场，然而他知道，东西方应当和平共处。既然这样，那么他们就应该进行对话，并相互考虑对方的合法利益。

在苏联向有关国家建议召开全欧会议讨论欧洲大陆安全问题之前，苏联领导人决定先进行试探。那时，这一想法还未告诉北约任何国家。试探的第一家是意大利。1966年4月，我访问罗马并在同当时的总理莫罗会谈中阐述了我们计划的内容。

莫罗沉思起来，而我耐心地等待他的反应。为了搞清计划的实质，他提了几个问题。参加会谈的外长阿明托雷·范范尼说，他表示理解苏联建议的目的和意义。莫罗也表示对此持积极态度。

两位意大利谈话人对我的想法作出了十分积极的反应。莫罗说：

“确实，我们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和加拿大都已酝酿成熟，可以进行会晤和共同讨论欧洲安全问题，并设法做出某种一致的决定，既能为华沙条约组织国家，也能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所接受。”

有关这个问题的谈话当然是在建设性的气氛中结束。两

位谈话人——总理和外长，认为召开会议的主张值得认真注意。

莫罗又提了几个问题，我又做了解释。然后，他说：

“这一主张，意大利政府看来是可以接受的。”

后来我们在同许多国家磋商时，意大利政府所持的意见就是莫罗和范范尼在罗马会谈时所表示的观点。

确实，在整个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工作期间，意大利采取了建设性的态度。莫罗率领意大利代表团前往赫尔辛基参加最后会议，并代表本国签署了最后文件。

在研究某个问题时，莫罗从不显出匆忙着急。他认为讨论的最后结果是主要的，他总是平静地阐述自己的观点。我从未见过他急躁冲动。我想，谁想使他改变在阐述意大利立场时用的稳重语调，那是徒劳的。

有一次谈话结束后、从莫罗处走出来时，我对苏联驻意大利大使尼·谢·雷若夫说：

“是的，这位意大利谈话者具有青年盖伊·穆西乌斯·赛沃拉^①式的神经系统！而且一点儿也不逊色！”

大使会意地笑了。

莫罗很有知识修养，可以认为，他是意大利对外政策领域最有权威的活动家之一。他也很了解本国的经济状况，既了解其强的方面，也了解弱的方面。

我多次听人说莫罗为人谦虚。这与我自己的观察相同。比如，他从不关心在这次或哪次会见中他的讲话或照片是否见报。他的这一特点众所周知，人们对此也表示赞赏。

^① 古希腊传说中的一位罗马青年，被伊特鲁里亚人俘虏，他将右臂置入火中烧掉，以此显示他对疼痛和死亡的蔑视态度。——原编者

阿尔多·莫罗还有一点使人不能忘怀的是，在谈论意大利人时他总是满怀深情，同时，我认为，又很客观。能够这样谈论自己的人民，这是非同寻常的。

有一天晚上。罗马这座南方城市，象其他南方城市一样，夏天的黄昏来得很快。我们还在交谈，谈政治，谈意识形态，而后来就谈到一个非同一般的话题。

“您知道意大利人同俄罗斯人有什么不同吗？”莫罗突然问道。

我对他说：

“从前，我只是通过文学和著名画家的绘画来了解你们的国家。我似乎觉得，意大利人总是不停地唱歌、跳舞、欢笑和流泪，还沿着你们城市的运河坐船游玩。当然，他们也工作，但不知怎地我没有想过这些，因为世界各地的所有的人都在劳动，这一点是一样的。”

听完我说的这些话后，莫罗并没有表示惊讶。

“国外通常也是这样看意大利人，”他说，“如果一位意大利男子同意大利女子同行或坐在一起，那么他们一定得唱歌，或至少得亲吻，让周围的人都耳闻目睹。”

“那么事实又是怎样呢？”我的交谈者自问道，“意大利人同其他国家人民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当然，他们居住在南方，是很久以前被迁移到亚平宁半岛居住的各种部落和民族的复杂混合体。这一混合体的起源、它的特征和特点至今还未完全弄清。所以，完全不应该根据意大利年轻人在威尼斯河乘游船搞游船赛会时的行为来做判断”。

对此我说：

“您从事政治活动的战友范范尼先生多次对我说，我要

· 是没过过他的家乡威尼斯城，那么可以认为没有到过意大利。经他这么一说，我当然同意，应该去一下威尼斯。否则，范范尼是不会把我看作已经访问过贵国的。您瞧，我已经去过那座美丽的城市了。但当时运河上没有游船。接连下了两天雨，我们同陪同的意大利人开玩笑说：‘这种天气该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插手造成的吧？’”

这时莫罗想起他访问威尼斯那天发生的一件事情。

“事情正发生在游船赛会的时候。一艘游船上有一位姑娘落水。当然，所有的人，首先是游船上的人都惊慌起来。姑娘开始往下沉。但是，立刻有几个男子跳入水中去营救小姐上岸。结果，第一个跳入水中的人救了她。”

“我想，”莫罗补充说，“这可能是演的一场戏。那么就让纯理性主义者这么认为吧。实际上，从表面看来一切都发生得很自然。在意大利人身上有时真假难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天生的演员。当然，这与严肃的政治毫不相干。这就是我们与俄罗斯人略有不同的地方。”

或许，莫罗故意只强调他的同胞性格的一个方面，因为他知道，他这样描写威尼斯、罗马和意大利任何其他城市居民的心理状态，听者会完全理解他们的爱国主义感情和赞赏他们的美德。

我望着莫罗，对他说了十分真诚的恭维话：

“您自己就可以同救难人员争比高低。比如您身材匀称，神态端庄，看起来象一名优秀运动员，并且还是一位心理学家。”

……当我看到关于在永恒之城^① 中心的一条大街上停着

① 即罗马。——译者

的汽车行李箱中发现了莫罗尸体的消息时，回想起了这次谈话。在2500多年的罗马史上，一长串大小阴谋受害者的名单中又增添了一位……

杀害阿尔罗·莫罗事件对意大利社会各界来说，是极不寻常的，并且引起了全国的关注。电影工作者根据精心收集的文件——法院调查材料，拍摄了故事片《莫罗案件》。影片在意大利上演异常成功，甚至可以说引起了轰动。

国务活动家的群像

尽管国内政治风云变幻万千，一系列意大利国务活动家仍具有“政治生存”的特殊本领，其中佼佼者看来要数天主教民主党的领袖人物——阿明托雷·范范尼。他曾任总理、参议院议长、外长以及其他几个部的部长等职务。人们熟知，他始终是一个活跃的、行动敏捷的人。远不是任何一名活动家，即便是才能出众的活动家，都能象他那样在风雨飘摇的意大利政局中稳如泰山，从没有受过严重挫折，从不败坏自己的名声，因而官运亨通。

范范尼坚定地拥护意大利主要资产阶级政党的观点。他深知他本人始终一丝不苟地为之服务的统治阶级需要什么。但与其他许多活动家不同，他是一名干练的策略家，善于随机应变，知道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场合说些什么，而重要的是，做些什么。他是一名策略能手。对他的这种看法在国内外广为流传，因为他在对外政策领域不止一次地显露过类似的才华。

同范范尼会谈时不难看出，他对会谈的准备是认真的，

是一个严肃的谈判对手。范范尼在原则性问题上从不放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观点，顽强地坚持这些观点，他注意论据并按其重要程度依次列举。他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代表们经常采用的老一套做法。他从未用过诸如苏联及其武装力量是对“和平的威胁”这类套话。范范尼富有谈判经验，尽力深入领会苏联立场的含义和动机，弄清事情的实质。西方许多政客们惯于罗列一些耸人听闻的报纸标题，但他却没有染上那种毛病。

在接待苏联客人时，范范尼作为主人总是表现得殷勤好客，他早逝的第一个夫人也是如此。

我们曾多次有机会看到，他对本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有着渊博的知识，对意大利的历史和文化了如指掌。

与此同时，范范尼很少关心经济以及本国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状况，其实就连他本人都毫不掩饰这一点。他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至少没有超出他认为在政府和议会中讨论问题时所需要的范围。

观察问题直率、坦诚，力争找到使观点接近的途径——这些特点常常使谈判对手肃然起敬（即便他所代表的是另一个社会世界）。但是，这些特点远不是所有在谈判中遇到过的人都具备的。有时也遇到一些甚至身居要职的人，他们总想欺骗同行，巧施计谋来胜过对方，尔后有朝一日再借机吹嘘说：“有那么一次，在同俄国人谈判时，我是如何得心应手地……”制造谎言，这种人的本领总是绰绰有余，而要办正经事，往往就不那么灵验了。结果总是对他们不利。

可以说，在意大利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朱里奥·安德雷奥蒂绝不在这类活动家之列。1972年10月，他作为总理正

式访问过苏联。当时还签署了苏意磋商议定书。在这一文件中，表达了两国的共同愿望，即应把包括政治在内的两国之间各个领域的关系提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议定书签署之前，对发展双边关系的广泛问题进行了严肃的会谈和认真的讨论。

我同安德雷奥蒂在罗马、马德里和斯德哥尔摩、尔后又 在莫斯科进行过会谈，气氛也同样是认真和坦率的。引人注意的是，不管安德雷奥蒂担任什么职务——总理、外长还是议会的高级代表，他都不仅阐述意大利的立场，而且也尽力理解自己的谈判对手。而这个优点并非无关紧要。同他会谈，总是令我感到满意。甚至在双方立场不一致时，也还是在尽量寻求共同点的气氛中交换意见，并且常常是成功的。

对安德雷奥蒂的许多评价，我想也适用于象阿纳尔多·福拉尼这样的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活动家。我们一向认为他是一位训练有素的谈判对手，这一点在他作为外长于1977年1月正式访问苏联时，在莫斯科的谈判中，以及我于1979年1月回访时在罗马的谈判中，使我们更加深信不疑。但是，由于他看着不赞同意大利和苏联发展关系的人们的脸色行事，因而在施展策略和尽可能使双方立场接近方面，无法有太大的作为。

“永恒之爱的使者”

意大利人的语言中有一个漂亮的词儿——“16世纪”^①。这是一个响亮而娓娓动听的词儿！他们就是这样称呼16世

^① 意大利对16世纪文艺复兴时代文化繁荣和风格主义流行时期的称谓。——译者

纪——文艺复兴繁荣的高峰，世界文化和科学天才辈出的时代：拉斐尔^①和提香^②、委罗内塞^③和米开朗琪罗、列奥纳多·达·芬奇，还有因断言宇宙无限而被宗教裁判所掷于篝火之中烧死的焦尔达诺·布鲁诺。

意大利的代表不止一次地建议我游览威尼斯，这是一个与“16世纪”密切相关的地方。范范尼甚至自告奋勇要陪同我去旅行。只是在1970年11月正式访问意大利时，我才能够应邀。但范范尼当时已不是部长了。

从罗马到威尼斯之行给我留下很多印象。我们曾在意大利最大的工业和文化中心米兰做了短暂停留。在这个城市逗留的几小时内，我们浏览了该市的名胜古迹，参观了著名的米兰修道院。该院的斋堂里悬挂着列奥纳多·达·芬奇的著名壁画《最后晚餐》。

我和利季娅·德米特里耶夫娜站在这位意大利伟人的杰作面前如醉如痴，对这幅杰作赞叹不已。与此同时，当我们发觉飞逝的岁月已给壁画留下痕迹时，心里不免产生了忧伤之感。那幅壁画似乎在恳求说：“救救我吧！”对它的恳求，人们是不应该置之不理的。如果列奥纳多的这幅天才之作毁于一旦，不仅对意大利，而且对整个人类都是一个莫大的损失。

我们下一站停在加尔达湖畔。这是阿尔卑斯山麓秀丽美景的一角。我们乘着一艘大快艇，在这神话般湖泊中光亮如镜的水面上飞荡。为意大利驰名的城堡和宫殿制作稀有而珍

① 意大利画家、建筑师，文艺复兴鼎盛时期的代表。——译者

② 意大利画家，文艺复兴盛期威尼斯画派的首要人物。——译者

③ 原名卡利阿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威尼斯画派代表人物。——译者

贵家具的工匠们，就居住和劳动在湖畔。隐没在阿尔卑斯山脉中的小湖以其令人陶醉的秀丽风光和那些勤奋的细木工匠而遐迩闻名。

再往前行便到了维罗纳^①。何人不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写生画家保罗·委罗内塞？！他的名字取自出生地的地名。尽管委罗内塞大部分时间在威尼斯作画，但这丝毫不影响维罗纳居民们对自己伟大同乡杰作的自豪感。

我们在维罗纳参观了保存完好的古老的半圆形剧场。这次参观是地方当局安排的。导游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历史故事，一个比一个生动：既介绍了这座建筑物的历史，也讲述了古罗马贵族与庶民的命运。假如有人贸然想把这些历史故事中的真相同有经验的导游在讲解中加进的美妙的艺术虚构区分开来，那他大概难以如愿以偿。

游览这个古老的城市，使人情不自禁地回想起，1822年曾在此地召开了“神圣同盟”^②——以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一世为首的欧洲君主联盟——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外交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作为俄国专制君主随从人员在欧洲旅行的著名的俄国贵族、公爵夫人和歌唱家季娜伊达·沃尔孔斯卡娅，最后一次在露天舞台上演出了约瓦尼·帕伊谢洛^③的歌剧《女磨坊主》。

众所周知，季娜伊达·沃尔孔斯卡娅倾向于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最终与沙皇宫廷闹翻。她曾为著名的十二月

① 意大利北部城市，在威尼斯托区，维罗纳省行政中心。——译者

② 拿破仑一世帝国崩溃后，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于1815年9月26日在巴黎结成的反动同盟。——译者

③ 意大利作曲家（1740—1816），那不勒斯歌剧派代表人物。喜歌剧大师。作有《塞维勒的理发师》等。——译者

革命党人的妻子玛丽亚·沃尔孔斯卡娅（季娜伊达和玛丽亚嫁给了沃尔孔斯基兄弟俩）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玛丽亚前往西伯利亚，到其被流放的丈夫那里去。这一举动被认为是向尼古拉一世^①及其政权的挑战。亚·谢·普希金曾在莫斯科拜访过季娜伊达·沃尔孔斯卡娅，他俩的交谊甚深，难道这不突出表明这位对俄国文化有过贡献、而且才华横溢的妇女是多么与众不同吗？

1829年，季娜伊达·沃尔孔斯卡娅带着儿子来到意大利。在这里，她的家总是非常好客，欢迎来自俄国的画家、演员和作家，不仅对他们好言相待，而且也给予实际的帮助。比如说，尼·瓦·果戈里就喜欢到她家做客。

诗人德·弗·韦涅维季诺夫接受了公爵夫人的一个礼物——在发掘赫库兰尼姆^②时找到的一枚戒指，并在其作品中对此予以颂扬，从而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了季娜伊达·沃尔孔斯卡娅美好的形象。在他的《献给我镶宝石的戒指》一诗中有这样一些充满激情的段落：

我的宝石戒指，
你是永恒爱的使者，
在墓葬的尘埃中天光重见，
可你又将重归幽冥，
在那里将我的孤魂陪伴。
你并非受爱情的驱使，
去祝福那永恒的火焰；

① 俄国皇帝（1796—1855年）。——译者

② 古罗马城市，在今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大喷发时该城部分被毁，埋没于火山灰烬中。——译者

也并非向你海誓山盟，
哪怕情丝百结，愁肠寸断。
而是在那离情正苦的时刻，
友谊把你交给呜咽的爱情，
让你以身相许，共赴忧患。

热恋着季娜伊达·沃尔孔斯卡娅的20岁的青年诗人，宛如一个预言家，以他那激情的比喻，表达了自己的一片衷情：

人世沧桑，逝水涛涛，
也许有人把我的遗骸惊扰。
在我身上找到你，使你重见光明，
于是那怯生生的爱情又与你重逢，
如怨如慕地向你倾诉，
那生离死别的苦痛。
于是我忠诚的戒指，象当年对我一样，
再度成为她的挚友良朋。

炽烈的激情激励着这位天才的年轻人，一段段美妙的诗句在他的笔下生辉。

他是普希金的朋友，不幸过早地离开了人间。在俄国文学史的诗坛巨匠之中，他大概是最年轻的一位。他在诗的天宇中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总共才写作了两年。德米特里·弗拉基米罗维奇·韦涅维季诺夫死时还不满22岁。

在维罗纳，我们被安顿在一座古老的邸宅里休息近两个小时。初看到这座楼时，不免这样想：“赶快把它拆掉吧”，因为楼房已经破旧到了不堪设想的地步。然而，楼内却很舒适。凭窗远眺，可以看到小巷的那边就是著名的卡普莱蒂宫。

实际上，朱丽叶一家住过的房子没有保存下来。但是，意大利人却对我们说：

“在原地新建的漂亮的三层楼房同古老的宫殿没什么区别。”

不管那儿怎么样，任何一个来到此地的人无不被莎士比亚的天才所深深感动。是他塑造了罗密欧和朱丽叶这两个悲剧的、同时又是诗意般的形象。许多世纪以来，人们对这两个人物一直赞叹不已。

水中巨石

告别了维罗纳和朱丽叶的幽灵，我们前往威尼斯，几个小时之后，意大利的这块宝石便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每一个国家的人民大概都有自己的类似俗语：“如果你不到此地，那你就没看到我们的国家。”确实如此，说句公道话，意大利人在谈到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时，当然还有罗马时，都是说的这句话。但是，威尼斯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有其特殊地位的。

当靠近威尼斯的时候，该城的轮廓依稀可辨，好象在你面前一块巨石从水中渐渐升起。起先甚至觉得，它似乎是在向什么地方漂行。只有当你乘上小游艇或是快艇的时候，才能分辨出大街、小巷、建筑群和纪念碑。但是，在这里做客的官方代表们不能象旅游者那样马上改乘小游艇，迎着轻轻拂面的海风，去领略一下那座无与伦比的城市的人心醉神迷的风光。

我们乘车抵达亚得里亚海的威尼斯湾岸边，从那里改乘

“官方的”快艇沿着大运河继续旅行。威尼斯这条主要水道的美感，远比你在书本上读到的或是在约瓦尼·安东尼奥·卡纳列托^①杰出的油画上看到得要强烈得多，使人为之倾倒。

快艇开到离著名的圣马可教堂很近的一座旅馆。我们在此下榻并前往位于以圣马可命名的广场上的圣马可教堂，我们对威尼斯的游览就从这里开始。

我们来到广场时正赶上涨潮，广场上一片汪洋。涨潮已经成了城市生活的一部分。因为涨潮时水漫威尼斯，所以圣马可广场一昼夜有两次犹如淹在水中，每次一个半到两个小时。行人沿着许多用木板搭起的通道穿过广场。如果有人不走运踩空了，那么，看来他就得去晾干衣服。我们代表团中无人落水，所以，顺利地来到了大教堂。

仰视教堂，越往上瞧，看到的金子越多。至于它那圆顶上的包金量，按单位面积计算，大概在世界上可以名列前茅。我们的导游介绍说：

“威尼斯商人慷慨解囊，对圣马可教堂进行了外部装修，也不吝惜金钱，对教堂的内部进行了豪华的装饰。”

是的，如修建庙宇和纪念性建筑物，威尼斯的商人们不惜大肆挥霍金子。有什么舍不得呢？他们的金子得来不费吹灰之力——在那谋取暴利的世界里，自古以来经商靠的就是欺骗。世界各地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进了威尼斯。许多工匠也同时随之而来——正是他们的双手创造和点缀了这座古城富丽堂皇的宫殿。

在威尼斯，我们参观的另一个建筑古迹是督治宫，这座

^① 意大利威尼斯画派的画家，极巧妙而真实地描绘了威尼斯的风景。——译者

宫殿使多少代意大利人为之倾倒。看到它，外宾们总是欣喜若狂。这有其原由。首先令人赞叹的是宫殿的建筑本身有着无与伦比的外观。在督治宫内，我们象中了魔似地在丁托列托^①、提香、委罗内塞以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其他杰出代表人物的举世闻名的作品面前驻足良久。

丁托列托的画《天堂》尤其引人注目。画幅之大，可谓欧洲之最。

“画家动笔作此画时，”记得导游曾说，“他已年过七旬。”画家因年迈已不能长时间地在高高的画架上工作，画家的儿子多梅尼卡成了他的可靠助手。别的画家也前来相助，但画的主要部分出自丁托列托之笔。

“巨匠的作品妙极了。”我在评论中特别强调了这个“妙”字。

奉拿破仑之命，从督治宫搬走了委罗内塞的油画，但是没有动丁托列托的画。可能，只是没有来得及盗走而已。

70年代初，丁托列托的油画曾经修复过，而且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整个威尼斯只有一个地方——圣乔治教堂，能够在修复期间放置这幅画。油画修复之后，参观者赞叹如初。

“您还想在威尼斯参观些什么？”地方当局的代表问我。

“能否参观一个什么工厂？”我用问题来回答他。

我们前往位于威尼斯北郊穆拉诺岛上独一无二的一家玻璃厂参观。这里生产威尼斯著名的彩色玻璃艺术制品。几个世纪以来，这种玻璃被用来作为欧洲的哥特式教堂的装饰玻

^① 意大利画家。文艺复兴后期威尼斯画派代表人物，创作多以宗教历史神话为题材，宣传对宗教的虔诚。重要作品有《天堂》和《圣马可的奇迹》等。——译者

璃，其中包括巴黎圣母院大教堂，它也是用这种玻璃装饰的。

我们仍然是乘快艇抵达穆拉诺岛，兴致勃勃地参观了玻璃博物馆。该馆位于工厂的附属建筑物内，其规模之大，显然超过了工厂本身。馆内收集的产品样本，色彩斑斓绚丽，质量精致高超，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威尼斯的玻璃正是以此闻名。但是，我们未能参观生产过程：看来，意大利人认为，由于某种原因不便对外开放。

当厂主知道我是一名猎手时，便送给我一个玻璃小野猪留念。野猪的模样凶残之极，在大自然中实难找到。这个小野猪至今仍摆在我家中的写字台上。

在威尼斯，我向殷勤好客的主人询问了一些问题。

“鉴于学者们已发表了一些声明，甚至官方也有公告说威尼斯在逐渐下沉，而且该城的将来有被淹没的危险，您对这座城市的前景有何看法？”

地方官员的回答没有偏离对事态发展的总的估计，但从他的回答中也没感到有什么惊慌不安的情绪。

在该城逗留的两天时间里，我们就是没有看到著名的狂欢节或是有小游艇划手们和载歌载舞的威尼斯青年参加的其他庆典活动。为此我们曾开玩笑地问道：

“还会有游船赛会吗？他们是否都在躲着我们？”

主人的解释听起来是令人信服的，他们说：

“天气不好，没有阳光，几乎是阴雨连绵。在雨中，甚至意大利人都不会同意唱歌跳舞的。”

我们在热情洋溢的气氛中告别了威尼斯，它给我们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

应该承认，在威尼斯逗留期间，一些念头一直萦绕我的脑际，从这座名字悦耳动听的美丽城市到古老的埃拉多斯^①大地相距不远。在威严的罗马军团帝国出现的同时，古埃拉多斯已成为文明的第二个发祥地，而这些军团按罗马皇帝指令进军那些国家时留下的足迹至今尚未从道路上消失。

是的，苏美尔^②人的城邦、巴比伦王国^③和亚述国^④世人皆晓。还有举世闻名的埃及，它世代代都在揭示着远古时代的那些惊人的、带有许多神秘色彩的历史篇章。

然而，被大海割开的荷马大地，同神话般的罗慕洛^⑤和瑞穆斯^⑥的大地一样，是举世公认的文明的摇篮。正是它们在许多方面点缀了欧洲，甚至可以说是点缀了整个世界。我们所熟悉的多民族物质和精神文明以及艺术的那种形式，也是过去历史的产物。

罗马军团向古罗马贵族奉献的不仅仅是奴隶和战利品，随之也带来了当时还不被罗马人所知晓的精神财富。古希腊被认为是这些财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之一。罗马人的成就远不如希腊人，特别是在文化领域（包括哲学、文学和艺术）。

① 古希腊人对希腊的称呼。——译者

② 古代两河流域南部（今伊拉克南部）古国。——译者

③ 公元前2千年代初至前539年美索不达米亚南部（今伊拉克境内）的国家。
——译者

④ 两河流域北部（在今伊拉克境内）的古代国家。——译者

⑤ 传说中罗马国家的奠基者和开国皇帝（公元前8世纪）。——译者

⑥ 罗马神话称，瑞穆斯（又译列姆）是罗马城奠基人之一，罗慕洛的兄弟，其父母是马尔斯神和瑞亚·西列维亚。瑞在罗马城奠基时同罗慕洛吵翻，被罗杀死。

——译者

基辅公国^①难道不受拜占庭的影响吗？它的文化首先是以古埃拉多斯的遗产为基础的。

威尼斯本地人不仅不想贬低历史赋予威尼斯，特别是意大利东部地区财富的意义，而且一直承认这一点，并引以自豪。这并不令人奇怪。

总之，历史犹如一个能干而又善于精打细算的主妇，知道把古代丰富多彩的文化成果置于何处最为适宜。如果人类的理智认识到要保存好这些成果，如果这种理智并未为疯狂所代替的话，那么，就应该把这些成果安置好，使它们能造福于人类。

我们带着这些想法告别了这座著名的水城。

1986年秋天，我饶有兴趣地读到了关于威尼斯恢复历史上游船赛会的消息。一名铜制的摩尔人敲了15下钟，400多条由划手们驾驶的游艇从圣马可广场的码头出发了。这座古城数以万计的居民和来宾在沿岸街上、在码头和桥上、在大教堂前的阶梯上以及楼房的窗口里，观赏着五彩缤纷的船队。

“这是城市的节日，”威尼斯市长内雷奥·拉罗尼说，“它应该给人们带来幸福和欢乐。我们主张和平，反对核战争威胁。”

但令人遗憾的是，威尼斯的居民变得越来越少。据意方统计，到1987年初，几个世纪以来该市人口头一次减少到9万人以下。这意味着，再过几十年，威尼斯可能变得更象博物馆城。该城也存在就业机会不足、住房短缺和其他一系列全意大利固有的问题，这迫使威尼斯人不得不迁往内地。他们可能会在那里走运，而他们的故乡威尼斯——那些腰缠万

^① 古罗斯公国，12世纪30年代起建于基辅领地。——译者

贯的旅游者的天堂，则被抛在后面了。是的，威尼斯所存在的弊病现在比过去更加明显，而时光似乎在嘲笑这位高傲的美女，并对她说：

“等着瞧吧，看你是能保持住自己的魅力，还是经受不住时代的考验，使你香消玉殒。”

美女同时光的拼搏自古相沿。

奎里纳尔宫里的居民

在不同时期，我有幸在奎里纳尔宫会见了意大利共和国的几位总统：1966年和1979年会见过朱塞佩·萨拉盖特；1974年和1975年会见乔瓦尼·利昂纳，后来在1975年我又同他再次会面，不过那已经是在莫斯科了。同（亚历）山德罗·佩尔蒂尼总统的会见是1979年和1985年在罗马以及1983年在莫斯科。现在谈谈这些会见给我留下的一些印象。

萨拉盖特总统是意大利著名的国务活动家，社会民主党的奠基人之一，他的政治面貌是众所周知的，故无需在此展开谈论这个题目。我要说的只是，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具有坚定信念的人。至于他的信念是什么，那则是另一回事了。萨拉盖特从不掩饰他对美国的特殊好感，也不掩饰他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信任。与此同时，他主张扩大同苏联的接触，保持我们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

萨拉盖特是位意志坚强的人。这一点从他谈吐的风度中即可感觉到。他谈锋犀利，犹如斧砍刀劈。在探讨问题中，他是一个直来直去、不拐弯抹角的谈判对手，尽管有时拐弯抹角很可能是有益的。的确，萨拉盖特不愿意超越常规和理

智界限。我同他的会谈都是在善意的气氛中进行的，双方都强调了对发展苏意关系的关注。

对有利于扩大苏联和意大利在各个领域中合作的立场，利昂纳总统也表示支持。我两次在罗马拜访他时，他都表示了同样的想法。

他说：“任何人都不应该对发展我们两国关系的政策持不信任态度。因为这一政策同两国所属的有关国家集团所承担的义务是完全相符的。”

与此同时，还使人感到，对利昂纳来说，有关意大利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问题，并非是一个非常令人愉快的话题。但当我们的谈话涉及这一题目时，他也并不回避讨论。

1975年11月，利昂纳正式访问苏联，举行了高级会谈，结果签署了苏意联合宣言和1975年—1979年经济合作协定。这是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为了欧洲及国际安全的利益，在发展苏联和意大利关系中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

利昂纳认为扩大苏意文化关系具有特殊意义。他在俄罗斯和苏联的历史、艺术和文学方面的知识相当渊博。

记得有一次，在同利昂纳谈话时我高度评价了前一天我刚访问过的奥尔韦托市，我说：

“我参观了你们杰出的城市——古老的伊特鲁里亚文化古迹。”

“您在奥尔韦托市可曾见过一座绝妙无双的庙宇？您知道它是为了纪念什么事件而兴建的吗？”

“我当然见到了，”我答道，“但不知道它是为何而建的。”

这时，利昂纳总统讲述了这么一段故事：

“几个世纪以前，从波西米亚¹往奥尔韦托运送圣母塑像。当运到某一站时，人们发现塑像身上的伤口流出了血，因而得出结论说，这是苍天的某种预兆。后来血止了，塑像也运到了一个地方，于是有关当局就决定在那里兴建庙宇。”

这一切总统讲述得是那么津津乐道，使我忍不住问道：

“那么，您本人相信这个传说吗？”

“作为一个人，”利昂纳答道，“我是不相信的；但作为一个天主教徒，我是相信的。”

这个回答当然别具一格，而且可以说回答得非常巧妙。就此题目进行争辩显然是不适宜的。想法很简单，我们毕竟是客人。况且，我们的谈话是在奎里纳尔宫上层的一间半圆形的房内进行的，矗立着十字架的罗马教堂的圆顶直接对着这间房子。要知道，罗马是一座圣城……

1979年1月我正式访问意大利期间，同（亚历）山德罗·佩尔蒂尼总统的会谈也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佩尔蒂尼精力充沛，他强调指出了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我们两国利益的一致性，并且提出这样一个思想：意大利和苏联虽然有着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但这决不妨碍在上述斗争中两国利益的一致性。他热情洋溢地谈了关于扩大互利的经贸合作的必要性。

总统无意讨论任何有争议的问题。相反，一切迹象表明，他尽力使会谈能有一个好的契机。我方的发言显然也是本着同一精神进行的，尽管我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政策以及军备竞赛的祸首做了保留说明。

¹ 历史上形成捷克国家的地区的最早名称。——译者

汉尼拔¹ 击败罗马军团² 的地方

在意大利逗留期间，除了会见意大利国务活动家外，还进行了参观和游览。

对那不勒斯，不知别人的看法如何，我觉得它好似一个性格复杂的人。这样的人从不立即表露自己的性格特点，而是逐渐表露出来的。那不勒斯就是这样。每当见到它，总会发现一些前所未见的新特征。

1939年底我第一次访问那不勒斯时，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城市很大，社会差别的悬殊到处可见。那时，我还记得离那不勒斯不远的庞贝和赫库兰尼姆遗址。

1966年我第二次到那不勒斯时，才有机会饱览这个城市的风光。街道上人流如潮。小店铺、酒吧间和售货亭鳞次栉比。它们既是店主工作的地方，也是其谋生的来源。我还遇到了许多码头工人。他们看起来和任何其他欧洲沿海城市的码头工人一样。也许只能根据他们说得很快的意大利语，还有他们的满头黑发才能区分出来。在这里，金发男女极为罕见。

那不勒斯的博物馆以其藏品丰富而闻名。但是展地面积有限，所以只能展出巨匠们的部分杰作，其他作品收存在储藏室里。在参观市内最大的博物馆时，我们发现其外观与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³有许多相似之处。这并不奇怪。原来

1 迦太基统帅（公元前247—246—前183）——译者

2 古罗马军队的基本组织单位——译者

3 莫斯科最大的博物馆之一——译者

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的设计方案（不是工程设计，而是建筑设计）是由当时住在意大利的季娜伊达·沃尔孔斯卡娅¹绘制的。后来，即在本世纪，女诗人马林娜·茨韦塔耶娃²的父亲伊·弗·茨韦塔耶夫教授³才将建馆构想付诸实践：在他的倡议下，以私人募捐形式建造了博物馆和为博物馆购买藏品。

那不勒斯附近有一座小城叫索伦托。主人执意邀请我们到那里去。原来，意大利外交部礼宾司在那里已为我们安排了午宴。

“这就是《重归索伦托》这首歌中所唱的那个索伦托吗？”利季娅·德米特里耶夫娜问道。

这首歌曲在苏联也一度十分流行。

“是的，这就是那个索伦托。”意大利译员说。

在以歌唱节目为主的音乐会上，当第一个歌唱家唱起了：“重归索伦托……”时，我们都惊讶不止。

他唱得好极了，我们对音乐会的组织者给予了高度的赞扬。

佛罗伦萨是意大利最吸引人的城市之一，许多古代文学作品对它进行了恰如其分的歌颂。我们驱车几个小时，从罗马来到这座美丽的城市。我们有一天半的时间仿佛置身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我想，每一个对艺术稍有了解的人，看到收藏在佛罗伦萨博物馆里的伟大的意大利画家和雕塑家举世无双的作品，都会感受到一种特殊的享受。

① 俄国女作家（1792—1862）——译者

② 俄国女诗人（1892—1941）——译者

③ 俄国学者（1847—1931），古希腊罗马历史、铭文学和艺术方面的专家。

——译者

我特别想提一提乌菲齐美术馆。这是一座漂亮的收藏有最珍贵绘画的博物馆。1979年该博物馆与埃尔米塔什博物馆¹签订了合作议定书。

1966年11月，佛罗伦萨发生了洪水。我是在此前几个月访问该市的。这场洪水给城市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毁坏了许多举世无双的艺术作品。由于包括苏联专家在内的修复专家的辛勤工作，这座博物馆城市才得以恢复，继续吸引着千百不同年龄、渴望了解蜚声于世的意大利文化珍品的人。

在美术研究院（是博物馆，不是科研所或学校）迎接我们的是一座高大的大卫像²。在那里，我们还看到了米开朗琪罗³的其他雕塑作品。这些作品虽然尚未完成，但是有巨大的价值，因为它们能使人们理解这位歌颂人的形体美和精神美的天才艺术大师的思想，了解他的创作过程。

那天，我们还参观了著名的美第奇小教堂，这座教堂是一位伟大的雕塑家修建的，以纪念庇护过他的佛罗伦萨的统治者罗梭佐·美第奇⁴和他的弟弟朱利亚诺。人们向我们讲述了在中世纪的意大利曾起过重要作用的佛罗伦萨家族近似传奇式的故事。米开朗琪罗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度过，他的许多作品在这里问世，佛罗伦萨理所当然为此感到骄傲。

古建筑、宫殿、街道和广场——佛罗伦萨的这一切都散发着历史气息，充满迷人的古老风情。佛罗伦萨人十分珍惜

1 列宁格勒的美术、文化历史博物馆，世界最大的博物馆之一。——译者

2 米开朗琪罗的杰作。大卫是公元前11世纪—前约950年以色列犹太国国王。据圣经故事传说，大卫于少年时曾打败巨人歌利亚。——译者

3 意大利雕塑家、画家、建筑师和诗人（1475—1564）。——译者

4 意大利诗人，1496年起为佛罗伦萨的统治者（1449—1492）。——译者

歌颂他们城市昔日风威的一切。同古时候一样，他们准备手执长剑与任何胆敢怀疑那些甚至最不可信的传说的人进行战斗。

我们从佛罗伦萨返回罗马走的是另一条路。也走了几个小时。但是，这条路线不是随意选的。大约从中途起，我们开始沿着特拉西梅诺湖的岸边行驶。人们指给我们看了汉尼拔率领的迦太基军队设置埋伏并击溃罗马军团的地方。那里的地形特点是依山傍水。这与许多历史文学作品，其中也包括天才的格鲁吉亚作家格·古利阿的小说《汉尼拔》中所描绘的一样。

迦太基人越过了阿尔卑斯山脉，以排山倒海之势向罗马人发起猛攻，取得了节节胜利。罗马军队在特拉西梅诺湖畔被消灭的消息在罗马引起一阵惊慌。这场战役，汉尼拔是打赢了，但是布匿战争^①仍在继续。70年之后，罗马人仍没有忘记他们军队的那次惨败。他们向迦太基奋起复仇，将其彻底摧毁。

在剩下的那段路上，我们与主人谈论着意大利的历史。我们甚至没有发现是怎么到达夜色中的罗马的。第二天要继续进行正式的会晤。

红石竹花——古图索^②的象征

不能不回忆一下杰出的画家雷纳托·古图索。他的创作代表着意大利半个多世纪的绘画艺术，是对世界文化宝库的

① 古罗马与迦太基争夺地中海霸权的战争，最后以罗马得胜而告终。——译者

② 意大利画家、社会活动家（1912—1987）。——译者

贡献。世界上千百万人珍视和喜爱他的艺术。这是一个才华横溢、心地善良、慷慨大方的人。他是共产党员，任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达35年之久——这就是意大利所了解的古图索。

在他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文艺复兴运动曾轰动一时。人类至今还用这一时期巨匠们的艺术来衡量自己的精神财富。

30年代，古图索的绘画闯入意大利的造型艺术世界。他的绘画艺术充满活力，与生活密切相连。画家一开始就明确了自己的道德和政治立场——始终处于事变的中心。

那时他就开始为新现实主义¹学派打基础，后来创立了这一学派。

战后年代，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通常与电影艺术，与这个国家电影界中涌现出一大批有名望的导演和演员密不可分。维托里奥·德·西卡²、米塞佩·德·桑蒂斯³、费代里科·费利尼⁴以及其他许多人成为意大利电影界的骄傲。

而在绘画艺术中佼佼者只有雷纳托·古图索。他的绘画艺术有新意并带动了那些想在自己的创作中反映人民需要的艺术家。

人们问他：

“您的新现实主义的实质是什么？”

他平静地回答说：

“发展的现实是它的基础。”

1 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中期意大利电影与文学中的一个派别，在反法西斯主义和建立民族民主艺术的斗争中形成。——译者

2 3 新现实主义派电影艺术的主要代表人物。——译者

4 意大利电影剧作家和导演（1920— ）。——译者

他愉快地、拼命地工作。每天天一亮,他就来到画架旁。他象歌手一样讴歌生活的欢乐和为生活而斗争的激情。

“对我来说,绘画就是过节。”他坦诚地对朋友们说。

他就在这些节日般的日常工作里度过了自己的一生。他忘我地工作,硕果累累:有3000幅油画和1万幅素描画收藏在世界上最有名的博物馆里和私人收藏家手中。

“没有素描就没有绘画艺术。”画家肯定地说。

所以,他为作画,共画了数千张素描。其中许多素描本身就是已成形的作品。

一些作品的名称就反映出他艺术的社会倾向性,如,《矿工》、《石匠》、《卡拉布里亚岛的渔民》、《占领西西里岛的空间地》、《唱〈国际歌〉的姑娘》、《读报的工人》。

早在战前,他就画了一幅著名的画,题为《耶稣受难的十字架》。这乍听起来象宗教的题目,但创作者是一个反法西斯主义者。这幅画的一张素描前景上画的是各国人民的头号刽子手——希特勒,因而作者获得了爱国主义战士的声誉。那时年轻的古图索受巴勃罗·毕加索的影响很深,所以人们常常把这位意大利巨匠的《耶稣受难的十字架》与在巴黎工作的西班牙伟人的《格尔尼卡》¹相提并论不是偶然的。

古图索是人民思想的表达者,是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战士。他走的这条道路终于使他在1940年加入了共产党的行列。在战争年代,他积极参加抵抗运动。正是在法西斯主义的黑暗年代里,画家工作室的画稿和未完成的油画中间藏匿着罗马共产党组织的印刷机,用这部机器印刷了鼓舞人民起来同

¹ 毕加索的一幅名画,1937年作。——译者

万恶的政权做斗争的传单。

雷纳托·古图索作品的政治内容在战后时期表现得特别明显，此时这个喜气洋溢的画家已成为真正的人道主义者，并且已远远闻名于意大利国外。

他创作的油画都是现实主义的，与时代同呼吸，涉及当时最迫切的社会问题。他的一系列作品描绘了战后意大利多方面、多色彩的生活全景，反映出它的悲剧和社会矛盾。在资产阶级世界中人际关系疏远，人民群众贫困无权。这都使他感到不安。在他的画面上出现的常常是矿工、渔民、种葡萄的农民。大概是为了回顾走过的生活道路，他写了一本书，名为《画家的职业》。这本书集中了他在为社会服务的艺术天地里进行劳动而积累的丰富又复杂的经验。

如果把雷纳托·古图索在整个战后年代的活动总结一下，那么他的光辉形象便会出现在我们眼前——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平战士、真正的国际主义者、苏联的亲密朋友。

他是苏联美术研究院的名誉院士，是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平金质奖和“加强各国人民之间和平”的列宁国际奖金获得者。

我认识雷纳托·古图索。几年前在苏联驻罗马大使馆，我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古图索对国际事务十分关心。当然，他也想了解意大利和苏联关系的发展情况。作为一个人和一个公民，他表示对帝国主义强加的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深感不安。

他问道：

“一些国家担任要职的国务活动家怎么能推行把全世界

推向无底深渊的政策呢？”

他自我回答说：

“任何一个思维健全的人都会明白，核冲突会毁灭人类，把人类在其全部历史过程中、在今天称之为文明的条件下所创造的一切葬送殆尽。”

“例如，在意大利，”画家接着说，“保留着不少古代废墟和许许多多过去的艺术作品。但是，核灾难（关于其危险性，现在苏联、其他国家的兄弟党和所有思维健全的人都在大声疾呼）将使地球上一无所剩。”

在古图索的言词里包含着一种深刻的信念，那就是，文化活动的家，不管其世界观如何，都应站在要求结束军备竞赛和主张巩固和平的人民一边。

我说：

“我十分感激您所说的话。这是真理的呼声。在意大利，文化活动的家为数不少，他们的呼声是对争取和平斗争强有力的支持。画家古图索的名字在我国广为人知。不仅您的许多同行知道您，而且与艺术没有直接关系的人也了解您，因为苏联的报刊关于您的报道很多。而且在苏联还出版了一些介绍您作品的好书。”

他回答说：

“是的，我知道苏联人对我的艺术的态度。我想通过您对他们诚挚的热忱表示我深深的谢意。”

古图索接着又表示：

“作为画家，我当然有自己的特色，应该如此。今后，我仍想保留自己的风格。我从来不卷入绘画艺术中现代主义的漩涡，从不属于那些在西方国家的博物馆里参观者经常边

看边耸肩膀的流派。甚至还出现这种情况，有人还挥动手臂，作出某种手势表明他们对这种艺术的绘画持不赞成的态度。”

他把一幅不大的画有红石竹花的画送给我留作纪念。红石竹花是他绘画艺术的象征。这是众所周知的。

我和陪同参加这次谈话的苏联驻意大利大使尼·米·伦科夫，向古图索表示了感谢并祝愿他在创作上取得成就。

他对苏联艺术特别是绘画艺术所说的话，虽然简短，但却是完全赞扬的。他没有提到艺术家的名字，但在概括自己的谈话内容时，他指出：

“苏联的艺术,无论从整体上还是从某些种类（特别是绘画艺术）上来说，其发展方向是正确的。各阶层人民对艺术家的创作怀有浓厚的兴趣，就是一个证明。”

我们与古图索十分亲切地告别了。

1987年1月中旬，从罗马传来了雷纳托·古图索逝世的噩耗。

在罗马举行了追悼会。会上，讲话者用美好的言语缅怀了这位艺术大师、共产党人、和平战士。

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亚历山德罗·纳塔指出：“雷纳托·古图索同志的逝世，使意大利失去了一位杰出的画家和公民。”

“意大利将永远怀念这位为和平、为地球上所有人的幸福、为反对疯狂的军备竞赛而积极斗争的战士。”意大利议会众议院议长尼尔德·约蒂这样表达了画家的许多朋友的感情。

“古图索富有生气的创作将永存史册。”意大利著名作家阿尔贝托·莫拉维亚说。

米·谢·戈尔巴乔夫在致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的电报中写道：“他的去世使我们党、全体苏联人失去了一位亲密朋友。”

古图索把自己的画遗赠给意大利共和国。

他生在西西里岛。这个岛上经常发生社会冲突，它既受埃特纳火山爆发的震撼，也受黑手党暴行的冲击。但是，他热爱西西里岛的土地，所以人们把他安葬在那里了。给画家送葬的西西里岛居民中，有常为他作画当模特儿的农民。他们世代贫穷，遭受侮辱，然而永不屈服。

很难想象，这位当代杰出的画家已不在人世。我与他亲切友好的往来似乎就在不久之前。世界失去了一位20世纪最负盛名的绘画大师。

两个塔季扬娜

我想用美好的语言回忆我在罗马认识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外孙女。她现在大概是为数不多的、在托尔斯泰在世时见过他的人之一。她是1905年在作家本人及其孩子们出生的那张皮长沙发上出生的。当外祖父夏天在雅斯纳雅·波良纳¹与她一起交谈，给她讲故事，一起散步时，她已快5岁了。慈祥的外祖父和漂亮的外孙女一起拍的几张照片，仍然清晰可辨、保存完好，这足以证明这段历史。众所周知，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秋天从自己世袭的庄园出走，死在阿斯塔波沃车站。

塔季扬娜是作家的长女塔季扬娜·利沃夫娜·苏霍京

¹ 列夫·托尔斯泰出生和生活的地方，距莫斯科300公里左右。——译者

娜——托尔斯泰娅的独生女儿（而塔季扬娜·利沃夫娜本人在列夫·托尔斯泰的13个孩子中排行第二）。她的父亲是托尔斯泰一家老朋友。他与塔季扬娜结婚时是有6个成年孩子的鳏夫，而新婚之妻也已经36岁，比他小15岁。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去世1年后他也离开人世，那时小塔季扬娜只有9岁。

根据许多目睹者和为伟大作家写传记的作者所提供的材料得知，列夫·托尔斯泰的3个女儿塔季扬娜、玛丽娅和亚历山德拉在她们的父亲在世时长期住在雅斯纳雅·波良纳，尽力帮助他，起码比他的儿子们做的事要多得多。她们干的首先是誊清父亲的手稿，因为手稿中有大量的修改、增补、改写。作家拿走誊清的稿子，很快又把重新改写过的手稿交给女儿，与初稿相比，常常是改得面目全非。大女儿塔季扬娜最细心，是父亲最喜爱的助手。所以她的画像，也只有她的画像在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在世的最后数十年间挂在他卧室的床头墙上，这是有其原委的。

在自己的孩子中，托尔斯泰最宠爱的一直是塔季扬娜。甚至在1910年那个令人悲伤的秋天，他彻底离开雅斯纳雅·波良纳之前，他在给孩子们的最后一张便笺中写道：“……请原谅我，我给你们带来了痛苦。特别是你，最最亲爱的塔涅奇卡¹……”

塔季扬娜·利沃夫娜能绘画。在莫斯科绘画、雕刻和建筑学校里学习时，教她的是伊·列宾²本人。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在世时的最后一幅坐着工作的画像正是他的女儿画

1 塔季扬娜的爱称。——译者

2 俄国著名画家（1844—1930），作品有《伏尔加河上的纤夫》等。——译者

的。

大家知道，1919年9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伊·加里宁访问了雅斯纳雅·波良纳，会见了托尔斯泰一家，其中有已故作家的妻子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塔季扬娜·利沃夫娜和她的女儿小塔季扬娜。从1923年到1925年，塔季扬娜·利沃夫娜担任列·尼·托尔斯泰博物馆馆长。她的女儿一直同她住在一起。

1925年，经人民委员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许可，塔季扬娜·利沃夫娜携带女儿到国外去了。她们到过布拉格、维也纳、巴黎。

有一个相当重要的细节值得提请注意。事情是这样的：列·尼·托尔斯泰在世时就放弃了版权。他说，他不想拿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来换取金钱。这一做法意味着他的继承者也将得不到任何稿费。

所以，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女儿塔季扬娜在国外时开始自己挣钱。她给各种各样的听众讲课，讲述自己的父亲，并且很成功。而她的女儿已是个成年的姑娘了，她学过速记，起初当技术秘书。但是，她向往戏剧。当她的理想实现时，她万分高兴：一个剧团吸收了她。在意大利巡回演出时，她结识了未来的丈夫。

就这样，在1930年，当塔季扬娜·米哈伊洛夫娜结婚时，命运使她在意大利长期定居下来。不久，塔季扬娜·利沃夫娜也去那里了。虽然她们住在不同的寓所——妈妈不想妨碍“年轻人”——但是相互常来常往。她们一起经历了法西斯统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艰苦年代。战后她们也在一起，直到1950年塔季扬娜·利沃夫娜逝世。

但是，她们从来没有忘记自己伟大的父亲和外祖父。塔季扬娜·利沃夫娜在罗马有一间“托尔斯泰室”，那里收集了一切与他的名字和作品有关的东西：从世界各地寄来的译成多种语言的书籍，首先是从苏联寄来的俄文版；剪下来的报纸和杂志；照片；唱片；装有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一络胡须的小匣；他装手稿用的皮包以及许多其他东西。这里还保存着认识和不认识托尔斯泰的各国崇拜者寄来的信件。

虽然母女俩人长期住在异国他乡，但是她们同祖国的联系并未中断。塔季扬娜·米哈伊洛夫娜·阿尔贝蒂尼（这是她丈夫的姓）至今还保持着这些联系。近年来，她不止一次来莫斯科，当然，也去雅斯纳雅·波良纳了。1975年她携儿子路易吉一起来苏联。他的儿子自己也已有了3个儿子。1977年她带自己的女儿克里斯季娜来我国，克里斯季娜也有了一个女儿。1979年她同女儿玛尔塔一起来了，玛尔塔已是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的母亲。最后，在1982年她再度来到莫斯科和雅斯纳雅·波良纳。这次是带着已长大成人的孙子皮埃尔和安德烈。

前面我已经讲过，我同塔季扬娜是在意大利见面的。引人注意的是，伟大的俄罗斯古典作家的外孙女对待苏联人态度友好、直率。当我们访问意大利时，她每次都不错过机会来苏联大使馆同我们见面，这事实本身就不说自明了。

1985年2月，我同利季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到罗马访问时同她进行了一次特别亲切的谈话。塔季扬娜·米哈伊洛夫娜十分热情地谈起自己到苏联的旅行，感谢苏联人那么关心保持对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怀念。

“你们这样做使人类缅怀的不仅是托尔斯泰，而且也是

整个俄罗斯文化。”她说。

使她特别感动的是为修复“雅斯纳雅·波良纳”保护区和爱护作家故居周围的自然环境所做的一切。

我说：“是的，我们在保持整个保护区内充满的托尔斯泰精神，这样做既是为了养育这一天才的我们伟大国家的人民，也是为了所有心地坦荡地到我们这里来的俄罗斯文学的朋友。”

塔季扬娜·米哈伊洛夫娜讲述了自己参观莫斯科托尔斯泰博物馆的情况。在莫斯科有两个这样的博物馆，它们都深受人们的景仰。

作家的外孙女说：

“我有一件家传礼物。那是外祖父留下的珍贵的戒指。当我还很小时，他亲手把戒指送给我并说道：‘长大后再戴。’这枚戒指我戴了数十年。就在不久前，我把它作为宝贵的遗物赠送给莫斯科托尔斯泰博物馆。”

这位慷慨的妇女，除了金戒指以外，还向莫斯科博物馆赠送了她母亲的手镯，那是托尔斯泰给他女儿的纪念品。她还把她母亲极为珍贵的档案材料送给了博物馆。其中有伊凡·布宁^①、费奥多尔·夏里亚宾^②、马林娜·茨韦塔耶娃、罗曼·罗兰^③、安德烈·莫鲁瓦^④、萧伯纳^⑤以至参加过刺杀沙皇走卒拉斯普庭的费利克斯·尤苏波夫等人的信件。在

① 苏联俄罗斯作家（1870—1953）。——译者

② 俄罗斯男低音歌唱家，共和国人民艺术家（1918），室内乐歌唱家，导演，画家（1873—1938）。——译者

③ 法国作家，音乐理论家，社会活动家（1866—1944）。——译者

④ 法国作家（1885—1967）。——译者

⑤ 英国作家。费边社创始人之一（1856—1950）。——译者

此之前，塔季扬娜·米哈伊洛夫娜把自己母亲27本日记中的24本赠给了苏联。这些日记于1979年已在莫斯科发表。塔季扬娜·利沃夫娜在日记中叙述了自己从1878年至1932年的生活，当然也写了许多关于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本人的事迹。

我不愿与人争辩，但塔季扬娜·米哈伊洛夫娜·苏霍京娜—托尔斯泰娅（阿尔贝蒂尼）大概是世上唯一活着的、与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有过密切交往的人。她不仅记得他，而且难能可贵的是，她一生都铭记着他的基本思想并向至亲好友进行宣传。托尔斯泰去世时，她还在雅斯纳雅·波良纳。

有一次，在同塔季扬娜·米哈伊洛夫娜这位聪明可爱的妇女见面时，我想起了几十年前的往事。

我那时在美国工作。当时，在纽约区还住着列·尼·托尔斯泰的一个小女儿亚历山德拉。她为逃亡国外的白俄卖力效劳，而这些人在美国反动派中最怀敌意的势力的怂恿下，不断地对苏联人民进行造谣诬蔑。这发生在苏联人民的优秀儿女首先堵住了法西斯侵略者的去路，然后又使他们屈膝投降的时候。

亚历山德拉·利沃夫娜把供她享用的官邸搞成某种避难所，把她父亲不朽的名字当作诱饵，千方百计地引诱苏联人麋集那里。不言而喻，在这种“事业”上她没取得成功。

塔季扬娜和亚历山德拉两人都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亲人，甚至是非常亲近的人。但是，她们中间隔着多么巨大的鸿沟！她们在生活中走着两条不同的道路。

一个女儿及其孩子们确信，苏联人民铭记和珍视托尔斯泰的伟大及其人道主义；而另一个女儿却一直无视全人类有

目共睹的事实。这第二个女儿总是想把列夫·托尔斯泰与我们的国家、与他的祖国、与他的人民“分开”，夺去对他的怀念，只把他当成伯爵，看不到他是一个巨人、一个人道主义者。

弗·伊·列宁还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之后就对列夫·托尔斯泰做了恰如其分的评价，他写道：

“他作为艺术家的世界意义，他作为思想家和说教者的世界名声，这两者都各自反映了俄国革命的世界意义。”^①

难道还能比这说得更确切和更好吗？

关于塔季扬娜·米哈伊洛夫娜本人的情况，可以用她母亲塔季扬娜·利沃夫娜日记中的一句话来结束对她的介绍：

“这真令人惊奇，这个小生命向自己的周围传播着那么多的爱。”^②

“小生命”长大了，并已在世界上生活多年。她继续向自己的周围传播爱。只是现在已经不是简单的爱，而是有理性的、有明确方向的、具体的爱。这是对人们、对自己的人民和它的文化的爱，对列夫·托尔斯泰的爱。

在梵蒂冈的谈话

凡是去罗马进行正式访问或旅游观光的外国人，几乎没有人不去参观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那里荟萃着文化和艺术的稀世瑰宝。

① 见《列宁全集》1961年中文版，第16卷，第321页。——译者

② 见塔·利·苏霍京娜—托尔斯泰娅的日记，1979年莫斯科版，第446页。

——原编者

米开朗琪罗的作品在这座教堂占有十分特殊的地位。这座建筑物也与米开朗琪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设计的教堂中央穹顶尤为令人赞叹不已。站在穹顶下，你会饱览这座古代建筑雄伟磅礴的气势。在穹顶下专门设置的看台上俯瞰教堂内部装饰，真有鬼斧神工之妙。导游带我们登上教堂的屋顶。上面也很宽敞，可以一边自由地漫步，一边观赏这座永恒之城的全景。

西斯廷教堂的壁画是米开朗琪罗的杰作。这也是这位16世纪艺术大师留给后代的最伟大的艺术珍品之一。这位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使其作品达到如此炉火纯青的地步，不能不令人惊讶。我同利季娅·德米特里耶夫娜不止一次造访过这座教堂，但每次参观都在某种意义上向我们展示了这些壁画更深邃的意境。

因时间仓促，我们不能在梵蒂冈教皇宫的签字大厅里逗留很久。但该宫厅堂里拉斐尔创作的如此完美的壁画至今回想起来依然记忆犹新。难道象《雅典学派》这样复杂的群体构图一经看过之后能够忘怀吗？在这幅壁画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是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而左右簇拥着的是他们的学生和弟子。伟大的画家在描绘这两位古代杰出的圣哲时，竟然如此匠心独具，以至看上去不难辨别出这两人的世界观各具特色：柏拉图的手势指向天空，亚里士多德却指向大地，似乎在令人信服地说明，人同大地、大自然是不可分割的。古朴的艺术手法同有力的笔触和鲜明的色彩熔为一炉，令人叹为观止。

从1963年起，我曾多次同罗马天主教会和梵蒂冈国家领袖——教皇晤谈。算起来这样的接触一共8次。一次是同约翰二十三世（1963年），5次同保罗六世（分别在1965、

1966、1970、1974、1975年），两次同约翰·保罗二世（1979和1985年）。这些会见只有一次在纽约（1965年），其余均在梵蒂冈。

举行这些会晤都是梵蒂冈方面主动提出的。这种主动性的表现方式往往是独特的：既不明确称之为正式邀请，但其含义又十分清楚，即罗马天主教皇打算同苏联外长就某些问题交换意见。总之，这同我们的观点相吻合，因为众所周知，梵蒂冈不是同世界政治隔绝的。

例如，纽约会见就是这样进行的：我们彼此寒暄之后，我对保罗六世说：

“您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中谈到的国与国之间必须避免军事冲突的想法，同我们的意见近于吻合。苏联过去和现在一直认为，国与国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人们宗教信仰的差别，不应当成为人们挑起军事冲突的动因。持不同信仰和宗教的人们可以而且应当并肩携手为争取和平而斗争。”

保罗六世教皇完全理解这些想法，并做了如下的表态：

“神圣教会认为探索在这一斗争中的合作途径将使众生普遍受益。”

后来，当我在意大利逗留时，我又几次在梵蒂冈拜访了保罗六世，战争与和平问题成了我们的主要话题。我同他最后一次见面是1975年6月。教皇对苏联开展旨在发展人与人之间友谊、互谅与和谐关系的积极的外交活动给予高度的评价。我们双方对欧安会工作进程表示满意，并决心促使该会圆满成功。

在同保罗六世于梵蒂冈会晤前，罗马教廷的一位神父（天主教皇的一位近侍）事先提醒我们说：

“请你们注意圣父的年纪和身体，每场会见对他都不是轻松的考验。”

这一提醒看来完全适当。谈话时我们感到，教皇言语迟缓，谈吐困难，只有身体欠佳的人才这样同周围的人谈话。

考虑到这种情况，我几次暗示对方准备结束谈话。但每次教皇都心平气和、十分得体地说道：

“不，我看结束谈话为时尚早，让我们继续谈下去吧！”

同教皇约翰·保罗二世¹见面是1979年1月，在参观梵蒂冈之后。随行的有尼·谢·雷若夫，他当时是苏联驻意大利大使。我们穿过一道道漫长走廊和房间，才走进教皇接见外国客人的礼仪大厅。

这座壮严的大厅跨度大，穹顶高，人站在下面显得十分渺小。大厅深处的桌旁坐着教皇，他的身旁坐着翻译，离他们稍远一些的是一两位红衣大主教。每次我来到这里，出席作陪的总有卡扎罗利主教，他在梵蒂冈主管外事。

约翰·保罗二世同我们寒暄后，说道：

“我想强调指出，为巩固大地上的和平而进行接触是至关重要的。”

我这方面只谈了主要的：

“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消除新的战争威胁，尤其是核战争的威胁。”

之后，我阐述了苏联为达到此目的而提出的一些重要的外交倡议，尤其是国家之间不使用武力的建议。

“据我所知，”我说道，“天主教会过去和现在都十分重视巩固和平、裁军和消除大规模杀伤武器。对此我们给予

¹ 在授予教皇职位之前他是波兰红衣主教卡罗尔·沃依蒂瓦。——原编者

高度评价。苏联领导人认为，这种立场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拓展了人们为争取和平未来而进行斗争的可能性。至于意识形态、宗教信仰以及一般世界观问题，都不应该妨碍为此崇高目的而进行合作。”

当那次我们同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谈话时，梵蒂冈外事机构的负责人阿戈斯蒂诺·卡扎罗利还只有主教的头衔，只是后来才把他提为红衣主教。但此人的特点是始终聚精会神，似乎在捕捉着谈话中的每一个字句。

教皇声称：

“我同意这一观点，当今在世界政治中没有比消除战争威胁更为紧迫的任务。天主教会是把造福于人间的和平奉为宗旨的。”

在交谈中，教皇谈到人们的宗教信仰时说道：

“看来，并不是所有地方都消除了限制人们宗教信仰自由的障碍。”

然后，他小心翼翼地有所影射地说：

“从某些消息来源获悉，在这方面某些事情有时可能在苏联也有所见。”

这种影射对我们来说也并非意外，就是约翰·保罗二世的前任也曾说过类似的话。对此我这样答道：

“并非所有的谣传总是值得注意，更不能信以为真，这对人们的世界观及宗教信仰方面尤为适用。在西方常常就苏联国内教会的处境散布各种谎言，甚至企图把刑事罪犯说成是伟大的殉难者。所有这些当然全都是凭空捏造。苏维埃国家自成立之日起一直保障宗教信仰自由。”

接着，我回忆起伟大的卫国战争，说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艰难的日子里，俄罗斯东正教会一直站在苏维埃国家一边，并以其特殊方式同法西斯进行斗争。如果我国教会处于不正常的状态，难道这样做是可能的吗？我们那里有信教的人，这对他们本人，对我们的制度，对我们的社会生活都不会带来任何问题。”

教皇以及参加陪见的卡扎罗利饶有兴趣地听着。然后，约翰·保罗二世说：

“总的来说，我们也是这样理解这一问题的。”

双方没有就这个问题再继续深谈。

我们同约翰·保罗二世的晤谈是在众所周知的波兰事件发生之前举行的。梵蒂冈就波兰事件所采取的立场显然超过了将政治同人们的世界观问题区别对待的界限，并运用其影响，造成了于社会主义的波兰不利的后果。

从约翰·保罗二世谈话的风度可以看出，他已习惯于操某种腔调，惯于运用那些确切地说可称之为半教堂式的词汇和套话。的确，他总是极力想使自己的谈话带上通常的非宗教色彩，以至给人一种印象，仿佛这场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讨论不是在梵蒂冈，不是在圣父的塑像和肖像围绕的环境中进行，而是在联合国某一个小范围的普通会议上。我还发现，教皇身体强健，看来，他和体育锻炼不无缘分。

这一切还是发生在暗杀教皇未遂之前。

1985年3月27日，当我在罗马进行正式访问时，在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尼·谢·雷若夫和苏联驻意大利大使尼·米·伦科夫的陪同下按事先商定的日程来到梵蒂冈。这是我对天主教大本营的第7次访问。

对我们的接待十分周到。我发现，我们走的还是以前走

过的似乎永无尽头的长廊。只是以前我们对四周没有仔细观看，而现在则特别留意。在梵蒂冈宫的长廊上悬挂着很多昔日艺术大师绘画的杰作。在通往觐见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礼仪大厅的走廊两侧，梵蒂冈上层神职人员迎候我们，越接近正厅的大门，神职人员的服饰就越华丽，显然其级别就越高。在教皇禅房大门的两侧站着两位主教，在上几次访问梵蒂冈时也已认识了他们。

走进大厅，立即看到神采奕奕的约翰·保罗二世教皇迎了上来。我们象老相识似地彼此寒暄。我立即主动问起对方：

“您看如何交谈为好，您认为讨论哪些问题最为合适？”

看来出于礼貌的考虑，他说道：

“我愿意按照您能接受的任何程序进行交谈。”

我从回忆往事谈起：

“上次谈话时，我们主要谈的是战争与和平问题。”

他点头称是，然后说：

“我认为这一题目是最为紧迫和尖锐的。我对关系到消除战争危险和巩固和平的一切均十分关切。”

随后，约翰·保罗二世表示了如下的愿望：

“请谈谈贵国对国际局势的看法，以及为防止核灾难需要采取哪些措施。”

当然，我照办了，讲的简短而坦诚。

之后，我还提及这样一个情况：

“在我们看来，梵蒂冈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远未充分利用自己的可能性。我们知道，以前你们不断发表声明，动员教徒的力量进行这一斗争。但最近几年，这些言论愈为少见和贫乏。”

我接着说道：

“我想特别提请注意军备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的危险性。”

同时，我指出：

“信教的人们依据他们传播的宗教信条，期待上苍赐予的只有恩惠。而现在某些国家的某些集团却打算把上苍变成人类灾难的渊藪，甚至变成其毁灭之源。究竟哪些人要把军备竞赛扩展到宇宙，这是众所周知的。”

我仔细观察天主教皇以及出席作陪的卡扎罗利红衣主教和西利沃斯特里尼大主教的反应。对方对我所说的话没有表现出不满或者尴尬，相反，教皇说道：

“对您所说的话，我表示完全理解。”

他接着说：

“梵蒂冈想充分了解关于这一尖锐问题的情况，它会就此表明自己的态度的。”

他说话、阐述问题的用语都带有天主教会领袖的特色。他避免把话说绝。对方清楚地表达了这样的思想：

“谨对您清晰地阐明苏联的政策及其作出的努力表示感谢。”

我们方面在谈话中强调了这样的思想：

“宗教活动家不论信奉哪种宗教，都不应滥用自己的地位和从事并非份内的活动。换句话说，不应当干预别国的事务。我们就是这样理解苏联为数不多的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活动的。至于谈到我国对宗教的态度，我们居民中的天主教徒虽然为数不多，他们并未感到其信奉的权利受到损害。”

我之所以言及此事，是因为约翰·保禄二世教皇十分策略地表示了这样的担忧：

“是不是苏联的天主教徒还是感到他们的权利受到某种损害？”

教皇心平气和地听取了我们的解释，以后未再提起这一话题。

同以前访问梵蒂冈并和天主教会领袖谈话一样，这次我也想弄清楚，当他谈论战争与和平问题时，他真正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恐怕不能作出这种断然的结论，即梵蒂冈始终不渝地站在和平的立场上，反对战争威胁并谴责准备战争的人。

根据众所周知的梵蒂冈在国际事务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我个人同三位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保罗六世和现在会面的约翰·保罗二世）会见的体会来看，恐怕这样说是正确的：梵蒂冈对核战争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是心中有数。约翰·保罗二世同我谈话时曾直截了当地说：

“我完全同意不久前教廷科学院发起的有苏联学者参加的学术讨论会对核战争后果作出的估计。”

“这个学术讨论会评价是客观的，”我说道，“但同时不能不看到，梵蒂冈并没有为停止军备竞赛、谴责准备世界大战的某些集团的政策和理论作出所能做的一切。”

接着，我说道：

“总的看来，国与国之间，不管其社会制度如何，都应和平共处的原则赢得了天主教会和梵蒂冈方面的同情。但依此还不能作出明确的结论。梵蒂冈的实际活动有些倾向于增加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戒心。总的说来，一方面承认为争取和平、反对战争、造福于不论社会制度异同的所有国家而斗争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干涉别国内政，这二者

是矛盾的。”

这样，我几次造访了罗马天主教会领袖的宫殿并同圣父进行了谈话。每当我离开梵蒂冈时，我都暗自思忖：“对这一谈话如何归纳和评价？其中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

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观点基本吻合。其实，这是梵蒂冈主要的有力的资本，前提是它必须始终不渝地捍卫这一资本。但至于能否恪守，事情并非那么简单。这并不是因为在“永恒之城”中心的天主教徒的大本营在听到直接提到战争与和平这一根本问题时会惊慌失措。根本不是，这里另有缘由。

天主教会一向拓展其活动范围，使之远远超过今天与生活在地球上的所有人有着切身利害关系的“和平与生命是否能得到维护？”这一基本问题的界线。梵蒂冈通过多种渠道和影响手段使其信徒在日常生活中支持有利于有产阶级的一切现象。可以说，他们巧妙地、迂回曲折地、有时以“走后门”的方式鼓励同剥削阶级的思想合流。

梵蒂冈并非向每一个天主教徒都传播必须竭力防止新的世界大战、防止核浩劫的思想，并非想在这一基础上把所有不同思想和宗教观念的人联系起来，而是常常指使信徒们在实际上同情和怂恿那些对加剧世界局势和黩武负有责任的势力。它所做的这一切是通过在日常生活问题上同情统治阶级的政策来实现的。

天主教会的领袖们不止一次地声称，成千上万的天主教徒只是在诸如世界观（宗教、意识形态）的问题上同情当权的资产阶级，所有这些说法都是毫无意义的。

须知正是这个阶级在锻造战争的武器。

如果梵蒂冈敢于正视真理，那么，就应把这一套说法颠倒过来，也就是说，为了整个人类的最高利益，人们不分宗教和意识形态观点的差别，不分社会制度的异同，都应该团结起来，为反对战争、防止核浩劫的威胁，以及为保卫地球上的生灵而斗争。

鉴于天主教会及其宗教的大本营——梵蒂冈在世界上的作用，人们自然会得出这样客观的结论。

马德里的今昔

30年代末，来自西班牙的消息使我终身难忘。这是西班牙法西斯决定把人民政权淹没在血泊之中的时期。从形似黑盘子的扬声器里不断传来消息，开始时是令人振奋的，后来便越来越令人心寒。德国纳粹独裁及其亲信——墨索里尼政权支持佛朗哥制造了流血事件。苏联人民对佛朗哥刽子手镇压西班牙人民的行径义愤填膺，对西班牙爱国者更加热爱和崇敬。难怪苏联的国际主义者在西班牙土地上为保卫共和国英勇战斗。难怪在30年代末，不少光荣的共和国战士在苏维埃国家找到了避难所。

不能不单独谈谈30年代。对这段时期我记忆犹新。在西班牙人民反对佛朗哥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日子里，苏联人民表现了深厚的国际主义友情。我国对这一斗争给予了力所能及的支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年代，独裁者的西班牙实际上追随希特勒，当然，追随者不是人民，而是佛朗哥集团。它派往苏

联的所谓“蓝色师团”加入了法西斯的军队。

可怕的战争在人民的记忆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战争之苦，苏联人比任何人都有体验，西班牙人也了解这些灾难。巴勃罗·毕加索的不朽作品《格尔尼卡》成了全人类反对战争、反对法西斯兽性的象征。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这位杰出的画家、西班牙人民儿子的作品《和平鸽》成了另一个光明的象征。它至今仍使人们认识到和平是最宝贵的财富，必须竭尽全力为之奋斗。

随着希特勒帝国的崩溃，西班牙长时间处于某种政治动荡中，直至独裁者佛朗哥寿终正寝。在这个法西斯余孽死后，西班牙才得以更自由地呼吸。众所周知，1981年反动军人发动政变未遂。与佛朗哥统治时期相比，这个国家的总气氛发生了变化。

我记得，战后在需要对西班牙所发生的事作出评价、对佛朗哥集团的罪行作出公断时，联合国发生过许多争吵。苏联是问心无愧的。它对西班牙人表示了应有的尊敬，同时要求对那些给西班牙人民带上枷锁的人进行严厉的政治谴责。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持这样的立场，也有人对元首¹的政权表示同情。

若论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维埃国家成立后苏西两国的关系，那么，由于一系列众所周知的原因，发展是不平衡的。两国间曾有过不轻松的时期，也有过较长时间的紧张。

苏联和西班牙之间保持外交关系的时间加起来共有15年略多一点：1917—1918年；尔后，1933—1939年，最后是1977年2月至今。

1 西班牙国家元首佛朗哥的正式称号。——译者

当我们在同西班牙改善关系时，不能不看到，在许多其他国家的政策中，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但对我们国家及其代表来说，指导思想是历史的真理和正义。苏联人民从未失去对西班牙人民的深切敬意。

苏联和西班牙从两头开始架设发展关系的桥梁。我们知道，为此需要时间。这一点另一方也懂得。

今天可以说，我们的关系发展是正常的。

在第一次访问西班牙之前，我虽曾会见过这个国家的不少代表，然而，当我走下飞机舷梯时，却感到有些激动。是啊，在我踏上的那片土地上，有给世界文化史增添不少光辉篇章的活动家。

我知道，尽管只是幻想，但总还是希望能看到哪怕是象卡门那样调皮而漂亮的茨冈女人。可事与愿违，在这个国家逗留期间，我没能看到街道上有唱着小夜曲和跳着舞的人。但我意识到，这些街道是优秀的西班牙文学中的主人公行走和居住过的地方。这种想法本身就颇有意思。

还记得，著名的迦太基统帅汉尼拔当年曾率领军队假道该国进逼到永恒之城的城下。当时，罗马惊恐万状，不知所从。

1979年，我正式访问了西班牙。同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的会见给人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他给人的印象是，他深知自己在促使国家摆脱佛朗哥时代方面所起的作用。国王强调指出，西班牙和苏联必须按新的方式，并更充分地利用一切可能来发展两国关系。

我与国王的整个谈话可以说是友好的。在谈话结束时，胡安·卡洛斯一世说：

“对苏联领导人邀请我访问苏联，我谨表示感谢。我早就盼望访问你们伟大的国家。”

同国王谈话后，在马德里又与首相阿道夫·苏亚雷斯、西班牙外交大臣马塞利诺·奥雷哈在求实的气氛中进行了会晤。重要的是他们都强调了发展两国关系的必要性，表示西班牙渴望加强与苏联的贸易、文化和其他方面的联系。

1983年9月，在全欧会议与会国代表会晤的最后阶段，在马德里我又有机会同国王进行了晤谈。西班牙作为东道主，为了使这次会晤取得积极的成果做了不少工作。

西班牙领导人对苏联代表给予了应有的关注。特别是首相费利佩·冈萨雷斯竭力强调进一步加深苏西关系的意义。

外交大臣费尔南多·莫兰是西班牙最有风趣的政治活动家之一。他主张发展苏西关系，认为这种关系不应受到外界力量的干扰。

这是一些美好动听的话，而且远不是出于权宜考虑而说出的话。

塞万提斯^①、戈雅^②、埃尔·格列柯^③的国家

不能不说说我访问这个国家时所产生的印象。首先，我没有忘记我是在塞万提斯、戈雅、埃尔·格列柯的故乡。在这里，在我们这个世纪30年代后期，工人和所有进步人士奋起捍卫了人民阵线的政府。

① 西班牙作家，主要作品是《堂吉珂德》。——译者

② 西班牙画家、版画家。——译者

③ 西班牙画家。——译者

如果不细心观察，譬如说，观察城市街道上的西班牙人，那么，无论从外表或举止来看，他们大概没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的确，人们的脸上都有某种恬静和聚精会神的表情。

当你走进西班牙和世界绘画最丰富的宝库之一——普拉多博物馆的大厅时，你就会立刻被吸引住。

到了西班牙，不去看看托莱多城几乎不可想象。所以，我们也去了那里。

出了马德里城区后，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寻找着类似可悲的骑士——急公好义的堂吉诃德与之战斗的风车。唉，连一个风车的影子都没看见。西班牙人把它们藏到哪里去了呢？

从马德里到托莱多的路上，除了田野还是田野。偶尔也见到小橄榄树林，尽管这种树主要集中在西班牙其他地区。

前往托莱多参观的旅游者和酷爱艺术的人总是络绎不绝。我们参观了埃尔·格列柯故居，他与全家在这里住过多年。这座狭小的房子是该城主要名胜之一。它受到了精心的保护。看得出，一切都竭力保持天才画家生前的原样。这里还收藏着埃尔·格列柯的作品。

很久以来，我们两国的文化有着相互丰富的传统。我们知道，西班牙人对俄罗斯和苏联多民族的文化怀有很大兴趣。西班牙人很熟悉我们一些杰出作家的名字，如列·尼·托尔斯泰、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安·帕·契诃夫、阿·马·高尔基及许多其他人。同样，西班牙的题材也反映在亚·谢·普希金的诗歌、米·伊·格林卡和尼·安·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音乐作品中。现在，苏联作家、画家和其他

艺术家还经常研究西班牙的题材。例如，苏联大画家伊·谢·格拉祖诺夫在西班牙享有声誉，他是西班牙美术学院院士。

1985年3月，我第三次访问西班牙。再次同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会晤。与政府首脑冈萨雷斯和外交大臣莫兰进行了会谈。会晤和会谈是在建设性的气氛中进行的，是友好的。这有助于双方就苏西关系的现状和发展前景以及一些现代国际生活中的某些主要问题详细地交换意见。

双方对扩大苏西两国在经济、科技和文化领域的合作表示满意。

1986年5月，西班牙首相冈萨雷斯对苏联进行了国事访问。米·谢·戈尔巴乔夫接见了她，并同他就加强苏联和西班牙在国际问题上相互配合问题进行了详细交谈。冈萨雷斯与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举行了会谈。结果，双方签署了苏联和西班牙进一步发展经济和工业合作议定书以及两国关于国际公路交通协定。

我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身份也接见了冈萨雷斯。

冈萨雷斯试图提出这样的论点，即苏联和美国对世界上发生的事件几乎应负有同等的责任。苏联方面列举了一些事例证明，事实并非如此。

如果把战后同西班牙国务活动家们的会晤和谈话归纳一下，可以说，西班牙方面同苏联方面一样，承认两国关系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莫斯科和马德里学会了相互对话。而这至关重要。如果说佛朗哥主义对西班牙还有影响的话，那么，更多的是在国内生活方面。

在一些尖锐的政治问题上，特别是涉及核武器的问题上，同西班牙政府比同其他一些西欧国家政府更容易找到共同语言。

至于社会公众对苏联的态度，我在西班牙国内外没遇到一个对我国不友好的西班牙人。

在佛朗哥时期结束以后，西班牙历届政府在对外政策上的立场，毫无疑问，始终充斥着支持整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因素。但是，这种支持是阶级本性所决定的。西班牙终究是个资本主义国家。至于核战争的危险，西班牙国务活动家们深知，在这种战争的烈火中死去，即使是与自己的外国阶级兄弟拥抱着死去，对他们来说也划不来，所以也是不可取的。而这种立场给在国际舞台上进行合作留下了不小的余地。

友好邻邦——芬兰

苏联和芬兰的政治、社会活动家不论在边界的哪一边见面，他们的谈话通常都是从“睦邻”这个词开始的。在芬兰作为独立国家存在的年代里，生活本身就把这一思想注入到苏联人和芬兰人的意识中去了。亲自经历了芬兰从列宁手里获得独立的那一代人尚未离开人世。

历史可以提供大量材料证明，两国为发展友谊和信任而相互接近。

多年来，这个国家的总统乌尔霍·卡勒瓦·吉科宁在国际舞台上，更不用说在芬兰本国的政治生活中，一直是一位颇有影响的人物。担任外交部长之职使我有机会多次与他见面，其中既有小范围的，也有人数较多的会谈。我们的会见

或者在莫斯科，或者在赫尔辛基举行。我还曾和吉科宁在完全非正式的气氛中谈过话，那是在他到莫斯科郊区扎维多沃打猎的时候。

吉科宁的名字在我国家喻户晓。他担任总统长达25年之久，而在此之前，还当了6年总理，仅仅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但这只是就时间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在他担任芬兰国家元首期间，苏芬关系取得了长足进展。

战后初期，两国就为发展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既可以爱护这个基础，也可以使之动摇。吉科宁意识到，芬兰和苏联之间的友好关系符合两国利益。他不仅无愧地使刚刚开始的事业继续下去，而且还为发展苏芬多方面的关系做出了巨大的个人贡献。

1944年9月，有芬兰参加的希特勒对苏联的侵略冒险行动以失败而告终。以尤·库·巴锡基维^①为首的国家领导人从过去的教训中做出了正确的结论，从而形成了芬兰新的对苏政策。同伟大的东方邻居和睦相处是唯一正确的方针，这一认识占了上风。芬兰领导同意苏联政府关于缔结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建议是政治现实主义和远见卓识的行动。

吉科宁也作为芬兰代表团成员前来莫斯科参加就这个问题举行的谈判。还是在战争年代，他就主张根本改革苏芬关系，从昔日的敌对走向睦邻。他积极促进谈判的顺利进行和1948年条约的签订。

就在不久前，在莫斯科的列宁山上，行人每天清晨都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场面。3个穿运动服的人在慢步小跑。稍稍跑在前的是位上了年纪的人，两个健壮的年轻人紧随其后。谁也

^① 1946年—1956年任芬兰共和国总统。——译者

没有注意他们。莫斯科对清晨和傍晚跑步的人，甚至在夜里还跑步的人早就习以为常了，谁也不会对此感到大惊小怪。

跑一个多小时后，这3个形影不离的人拐进了一座建筑物的大门。站在门口的民警向他们举手敬礼……

吉科宁总统在访问苏联期间就是这样开始自己的一天。

其实，他只是在下雪前进行小跑。到了冬天，他就滑雪。这也许就是这位芬兰总统长期保持旺盛的工作能力的秘密所在。

后来，当我在赫尔辛基同吉科宁见面的时候，他热情地谈到了他作为本国使者出访我国的那段时间。

“我们做得对，签订了苏芬条约。”他用最坚定的语气强调了这一步走得对。

他说，不论是苏联，还是芬兰都确信，敌对有害无益。不能再敌对了，应该友好相处。

他成了巴锡基维的继承人，当上了国家元首。吉科宁总统出生在农民家庭，走过了从记者、律师到议员、议长、部长、总理，最后到共和国总统的漫长道路。他是个智慧超群、生活经验丰富的人。他极富幽默感，在交往中平易近人。他对本国的生活方式和传统忠贞不渝，同时又对苏联的成就极感兴趣。他在我国旅行过，到过高加索，去过中亚、西伯利亚，甚至还到过萨哈林岛。

吉科宁以自己的活动不仅在芬兰本国，而且在国外都赢得了威望和尊敬。正是由于他，芬兰奉行的对外政策方针才为世界所承认。

我还清楚地记得1975年在赫尔辛基召开的欧安会期间同吉科宁的那次会面。那时，他已是一个阅历广博、精明练达

的活动家了。作为东道主，他在芬兰首都理所当然地接待了欧洲32个国家和美国、加拿大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还记得1980年11月同吉科宁的另一次会见。当时，他正对苏联进行最后一次正式访问。在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大厅里，在庄严的气氛中，他被授予“加强各国人民和平”列宁国际奖金。在接受这一崇高的奖赏时，吉科宁说：

“芬兰人永怀感激之情的是，列宁领导的苏联政府承认芬兰的独立，从而为我们两国间相互友好与合作创造了前提。”

当时，他在讲坛上向苏联人呼吁：

“就让我们一起来精心爱护这份遗产吧！”

苏联领导为使两国间继续保持睦邻关系，过去和现在都费了不少心力。

关于乌尔霍·吉科宁，可以说，他坚定而又顽强地坚持必须奉行睦邻关系政策的观点，直到1986年8月31日与世长辞。

瑞典及其奥洛夫·帕尔梅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瑞典的一角是1948年在纽约港，这就是瑞典客轮“格里普斯霍尔姆”号。

从某种意义上讲，也许是这艘船救了我和我一家人的性命。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原打算乘坐开往敖德萨的苏联客轮“胜利”号返回苏联。但是，如果乘坐这艘船，将会大大延误我们回国的日期。

我的母亲奥莉加·叶夫根耶夫娜病得很重，正躺在莫斯科的医院里，我们要快一点儿回去。与妻子商量后，我们决

定乘坐瑞典船回国。结果，“胜利”号在黑海出了事：轮船起火，烧死了几十个人。我们家几位朋友去美国出差回国时也在这次事故中丧生了。

乘坐瑞典客轮的旅行，在某种程度上使我对瑞典和瑞典人有了一些概念。比如，我们注意到，在餐厅里，就象在瑞典一样，所有小菜都充分供应，并且免费，只有热菜才单独付钱。饮食是上等的。看来，善于理财的瑞典人明白，他们提供这种所谓的“瑞典式快餐”，可以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好处。这种“瑞典式快餐”目前在世界上，不仅在海上，而且在陆地上也颇负盛名。比如，在华盛顿也流行这种“瑞典式快餐”，而且颇受欢迎。

我们在哥德堡市下了船，在斯德哥尔摩小憩一昼夜，经芬兰回到了苏联。

第二次比较认真地了解瑞典是在1964年。访问期间举行的会见是在良好的气氛中进行的。瑞典人和瑞典政府珍视两国间的友好关系，特别是贸易关系。无论同谁见面，从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尔夫国王到外交部的代表都给予了这般评价。

与首相塔格·埃兰德的会见是在他离斯德哥尔摩几十公里的夏宫进行的。我们就是在那儿进行了认真的会谈。同外交大臣托尔斯坦·尼尔逊的会谈也是很有意思和颇有裨益的。

主人们愿意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瑞典首都。

瑞典人在和我们交谈中注意强调他们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他们国内的工资水平、以及总的生活水平高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平均水平。瑞典人确信不疑地

说：

“就这个指标来说，我们很快将居世界首位。”

他们的话不无道理。瑞典长期保持中立和不参加战争，这很能说明他们为什么能有这种状况。

拜访国王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尔夫（即现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的祖父）以及同他的谈话给我留下了鲜明的印象。在皇宫办公室里，一位高个子、上了年纪的男子接见了我。他是那些为数不多的稳据皇位的君主之一。瑞典国王的家谱起源于19世纪初。现王朝的奠基人是著名的法国元帅让·巴狄斯特·别尔纳多特，他也是蓬特—科尔沃亲王。当时，别尔纳多特曾在拿破仑的军队里指挥过一个军团。在欧洲当时错综复杂的政局中，这位拿破仑的元帅脱离了皇帝，于是，皇帝就将他削职为民。

瑞典王位吸引了这位前元帅。已到垂暮之年的瑞典国王查理十三世没有后嗣，于是他就立法国元帅为养子，瑞典议会甚至通过了特别决议，选举这位法国人为王位继承人。查理十三世驾崩，别尔纳多特成了瑞典国王，取名为查理十四世·约翰。

不，不能说别尔纳多特不赞成法国皇帝的侵略政策。拿破仑追求权力和财富的特性并没有激起他的元帅们的愤怒。因为是波拿巴自己把这些元帅从低级军官提拔上来的。在这些被提拔的人里有不少才智不凡、精明强干和有独特天赋的人。别尔纳多特便是其中之一。

前元帅很快就适应了远离欧洲政治舞台的瑞典，而且对瑞典人来说，他也成了自己人。在那个时代，当拿破仑的兄弟们一个接一个地变成欧洲各国的国王，而他的姊妹们都嫁给

国王、成为王后的时候，别尔纳多特的情况就没什么特别的了。

新的瑞典国王活到19世纪中叶。在瑞典，人们传说，当开始给死去的查理十四世·约翰净身的时候，发现他们所尊崇的君主的手上有一行没有完全消除掉的文身字：“死亡属于国王们！”这使宫廷感到非常难堪。

别尔纳多特对俄国奉行友好政策。1812年在图尔库城，他和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一世举行了会见。会晤期间，他们签署了关于采取联合行动反对拿破仑的协议。

后来，自1814年起，瑞典一直无战事。不论过去，还是现在，瑞典的国际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它的国内状况都是相对稳定的。瑞典及其王朝从未经受过欧洲动荡命运的打击。而这个大陆的许多王位和国家则深受其害。所有这一切在客观上为瑞典的传统中立奠定了基础。

在同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尔夫国王谈话时，我感到，他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考古学是他喜爱的学科。他说，他尽量争取了解这方面所有的新作品和新发现。

国王说：“我对考古文献书籍特别感兴趣，其中包括俄文版的。您能否给我寄些新出版的有关考古发掘工作的书？”

考虑到国王的愿望，我后来从莫斯科给他寄去了几本这方面的书籍。

望着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尔夫国王，我不由自主地无言自问：“难道这个和气的考古学爱好者就是那位曾为法国皇帝效力卖命、威武无比的元帅的后裔吗？”

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君主通常是不管理国家实际事务

的，他们似乎是超于其上。而在每一国家的具体条件下，这意味着什么，斯堪的纳维亚人自己最清楚，外国人对此如堕迷雾。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君主的职能之一是在维护国际联系方面履行一定的义务。

1978年莫斯科接待了年轻的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他对苏联的访问是瑞苏关系发展中具有一定意义的里程碑。访问表明，瑞典对同东方的邻居发展事务性联系很有兴趣。

从与这位国王的另一次谈话中，我也得到了相同的印象。这次谈话是在1984年1月我去斯德哥尔摩参加欧洲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和裁军会议期间进行的。国王非常肯定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见：

“我主张保持并改善我们两国的事务性关系。”

他也不回避讨论政治问题。当我方提及政治问题时，他欣然作出反应。我想，看样子，瑞典皇家王朝的特权，如果不是从宪法的意义上，而是从事实上来讲，已变得越来越灵活了。

同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的一次谈话也是颇有内容的。他阐述的思想同国王的基本相似。当然，不管是首相，还是我，都没有回避瑞典某些集团的人不时挑起的一些问题。看来，如果两国关系中不发生些不寻常的、可以引起激烈争吵的事情，这些人就觉得不舒服。哪怕就是吵吵架，也会使他们心满意足。

我代表自己的国家做了如下表示：

“苏联愿意同瑞典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是苏联领导的一致意见。”

首相听完我的话后说：

“我高兴地听到您代表苏联领导所说的话，我也代表瑞典声明，瑞典坚定地、明确地主张同贵国建立睦邻关系。”

听到瑞典领导人令人宽慰的话以后，我离开了斯德哥尔摩。自然，下一步就要看如何付诸行动了。而实际情况并非那么简单。看来，在同苏联关系问题上尚需一些时日，才能使理智在斯德哥尔摩占上风。

至于奥洛夫·帕尔梅，很遗憾，现在不得不用过去时了。他已被那些反对他的势力雇佣的恐怖分子所杀害。首相的自由主义观点，他关于改善对苏关系并同苏联睦邻友好的主张，他在倡议建立阿根廷、希腊、印度、墨西哥、坦桑尼亚和瑞典为争取和平、裁军、国际合作共同努力的六国首脑集团方面所起的作用，这一切对那些势力来说无疑是眼中钉、肉中刺。

我还记得1986年3月1日那天早晨，在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担任会议主席的维克托·米哈依洛维奇·切布里科夫向代表们宣布了从斯德哥尔摩传来的噩耗：

“奥洛夫·帕尔梅被残暴地杀害了。”

大会代表们都肃立为瑞典首相、社会民主工人党主席默哀。

在丹麦王子哈姆雷特的故乡

瑞典南方的邻居是丹麦。还在少年时代，我刚一读完威廉·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就对天才剧作家这部悲剧的主人公所生活的国度有了某种想象。1964年，我在第一次正

式访问丹麦时，才有机会从实际上检验自己的想象。当然，非我得对时代上的差别做出修正。

我和利季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参观了莎士比亚用那优美妙的文笔绘声绘色地描绘过的著名的赫尔辛堡。是的，伟大的剧作家具有犀利的诗人的洞察力。走进这座城堡，当你穿过迷宫般的走廊、过厅、囚室和监狱、大厅和卧室的时候，思想就会驰向哈姆雷特的时代。似乎，一俟夜幕降临，哈姆雷特父亲的影子就会从上边什么地方飞落而下。

在城堡里，只有手持专门的照明灯才能穿过漆黑的走廊。犯人被关在“石笼”里。

参观这座庞大的石头城堡后，便会得出这种结论：这座庄严的纪念物将永远使每个到过丹麦王国的人浮想联翩。丹麦人为享有世界声誉的赫尔辛堡感到骄傲，他们也有这样的权利。

城堡镶饰着发绿的铜制花边。蓝色的窗玻璃使它具有某种神秘的色彩。一门门古炮依次排列，炮口冲着厄勒海峡。中世纪时，所有穿越海峡的船只都必须向丹麦王国交税。

整个城堡，特别是里面阴森森的走廊，能使人构想出中世纪的故事情节。专家们说，莎士比亚没见过这座城堡，但在中世纪，一个英国喜剧演员剧团到过这里。后来，剧团里有个人在莎士比亚的剧院里演过戏，大概是他向伟大的剧作家讲述了丹麦王子的故事。

如今，在这座城堡里定期上演莎士比亚的名剧，一年演一次。这个传统始于1916年。1937年英国剧团第一次在此演出，哈姆雷特的角色由著名的劳伦斯·奥立弗扮演，莪菲丽霞由伟大的英国女演员费雯丽扮演。后来，这两个人都成了

我的好相识。

同丹麦国务活动家的谈话与我在斯德哥尔摩的谈话没什么两样，当然，稍有不同。丹麦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自然，不论在什么级别上举行会谈，都要考虑集团的利益。

在同该国国务活动家会谈时，我不止一次直截了当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加入北约组织给丹麦带来了什么？”

回答常常是简单的，但总是要经过一定的思索。

丹麦的代表人物对我们说：“丹麦是一个属于西方世界的国家，所以，参加西方国家联盟对它来说是理所当然的。”

这样，自然又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

“那么，如何对待北约的军事行动和丹麦加入这个集团后所承担的军事义务呢？”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这样的：

“北约是防御性组织，所以，它所有的活动也都是防御性的。”

丹麦的交谈者也和其他北约成员国的交谈者一样，通常都回避探讨这些问题的实质，从这些问题上一滑而过。北约中的小国代表在谈及这些国家加入集团问题时，已经形成了一套刻板公式，不断袭用。

尽管每次谈话都要涉及这个问题，但是可以说丹麦的政治家，以至整个丹麦毕竟下意识地认识到，对丹麦来说绝无任何来自苏联的危险可言。

谈话中，每当话题涉及到我们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关系时，气氛顷刻变好。从传统上看，这种关系是不坏的，双方都很珍视它，这对两国都有好处。

我曾两度正式访问丹麦。在同外长和首相的会谈中进行的主要是实质性问题的讨论。

我还会见过国王斐德烈九世。他的女儿玛格丽特公主也参加了那次会见。国王这样说道：

“丹麦对发展经济贸易关系感兴趣。”

我发现玛格丽特公主对政治问题很感兴趣。我们当时已从丹麦人和苏联大使馆得知，她可能成为未来的女王。后来果真如此。

年轻的丹麦女王——现在已是玛格丽特二世，1975年携丈夫对苏联进行了正式访问。她同列·伊·勃列日涅夫的会见和在苏维埃国家的旅行，给她留下了良好印象，并促进了苏联丹麦关系的发展。

邻居的重大责任

在进入挪威之前，得穿越有冻冰群的海湾。需要一个半小时才能使渡轮靠岸，之后，我们才能继续前往奥斯陆。

我对挪威的第一个印象是不寻常的：就生活而言，这个国家的人民好象比其他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的人民更接近大自然。我把自己的想法同其他来过此地同志的看法比较了一下。没错，就是如此。他们和我所见略同。

城市和工业中心同其所在的地区是如此紧密融合在一起，以致给人的印象是，这是一些楼房林立、人口密集的大村庄。就连首都也同周围的田野、森林浑然一体。挪威人喜欢这样。这样一幅图画大概也使外国人赏心悦目。

至于大海，可以说，挪威人经常与之打交道。漫长的海

岸线为国内大部分居民在海上寻找工作，或寻找与海有关的工作提供了可能性。而捕鱼从远古时就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谋生手段。没有它，挪威的生活简直不可想象。如今，国家的福利在某种程度上是依赖在沿海水域开采石油和天然气。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岁月里，在反对共同的敌人——德国法西斯的共同斗争中，苏联人和挪威人的友谊得到了巩固。红军粉碎了希特勒军队的激烈抵抗，给极圈内的芬马克居民带来了自由。这里比挪威其他地区早解放半年。1.2万多名苏联军人在解放挪威、恢复其独立的斗争中献出了生命。

著名的挪威学者、社会活动家弗里特约夫·南森在1923年曾指出过，俄国成为“欧洲救世主”的那一天已为期不远了。结果，这些话对挪威来说，也是有先见之明的。1945年5月这一天来临了，苏联把欧洲人民从法西斯主义的桎梏下永远地解救了出来。

我记得，1944年11月9日国王哈康七世曾给米·伊·加里宁发去一封电报。在电报中，他对苏联武装力量表示欢迎：“它的英勇斗争对解放挪威至关重要。”国王强调，在这一共同斗争中，“我看到了我们两国人民之间一贯的、诚挚的关系的坚实基础。”十年后，首相埃纳尔·盖哈德森说：

“挪威人民不会忘记苏联人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所做的贡献，特别是它参予了解放挪威。”

在挪威阵亡将士公墓里，有许多纪念碑和方尖碑上刻着对苏联军人——解放者感谢的话。挪威人——指给我们看了。在奥斯陆、斯塔万格和其他城市的花岗石纪念碑上刻着：“挪威感谢你们！”“你们是在为我们所有人的斗争中牺牲的！”

同样，几百名挪威人也向红军提供了帮助，尽一切可能使胜利的日子早些来临。近30名挪威爱国者荣获苏联战斗勋章和奖章。

苏联军队把挪威北部从德国法西斯占领者手中解放出来这一事实激发了挪威人对苏联的好感和友谊。不论到哪里，在奥斯陆，还是在挪威的腹地，人们都对我国表示了热情的态度。苏联士兵一解放者的英雄主义精神和援助，是我们两个邻国诚挚的关系史上不应忘记的一页。

挪威人身材魁梧、体格匀称，强悍健壮。这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学把挪威人塑造成勇敢的航海家的形象。当我端详挪威人的时候，他们不仅使我联想起古代以在海上抢劫为生、靠强占苏格兰要塞度日的半商半贼的航海者，而且使我联想起了勇敢的航海家。他们在冰岛定居下来，首先看到了绿色的国家——格陵兰岛，但经过许多世纪之后，在这里根本见不到绿色的植物了。最后，这些人还发现了遥远的大陆。由于命运的嘲弄，几百年之后，哥伦布又重新发现了这个大陆。

由于地理上的接近，苏联和挪威要承担很多义务，其中包括要睦邻相处。苏联和挪威人民历史上的联系可追溯到许多世纪以前。最早建立接触可能是在北方。俄国人——沿海居民和诺夫哥罗德^①人——同斯堪的纳维亚人在那里进行活跃的商品交换。俄罗斯人和挪威人的相互关系从未受过军事冲突的影响。

情况似乎就是这样，也应该如此。因为一切都有利于保持两国间的良好关系。今天，尽管挪威是北约成员国，苏联

① 诺夫哥罗德是苏联的一个中等城市，历史悠久。——译者

还是愿意与其保持事务性的、适度的政治关系，发展经济和文化联系。

苏联和挪威的国务活动家多次举行过不同级别的会见，其中也包括最高级别的会晤。我同前首相盖哈德森进行过气氛良好、内容丰富的谈话。他非常了解挪威的局势，也清楚，虽然他的国家参加了北约，但有同苏联搞好关系的可能。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切积极的东西都为苏挪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双方努力的结果。珍视已取得的成果，并且保护它不受任何侵害，这种态度完全符合苏联和挪威人民向往和平的愿望。

鲁本斯^①的名言

我国一直重视同比利时和荷兰的关系。苏联与这些国家社会制度的不同不是我们同比、荷两国发展关系和接触的障碍。就居民人口和领土面积而言，这些国家相对来说不算大，但它们在政治中的作用并不小。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占领军的铁蹄践踏过比利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的军队也占领过荷兰。对于侵略者来说，没有任何神圣的东西。他们无视这两国领导人关于比、荷两国不想参战、同时有权指望任何人也不侵犯他们领土的庄严声明。

无论是威廉·恺撒的德国，还是希特勒的德国，对这些声明都不屑一顾。对侵略者来说，侵占和掠夺、奴役其他民族的欲望压倒了一切国际准则和道德观念。

^① 佛兰德斯画家，曾在安特卫普工作过。——译者

苏联一直认为，比、荷两国是法西斯侵略的牺牲品。单凭这一点就可为与它们发展关系奠定基础。

就拿比利时来讲。不论什么样的政府上台，它都主张同苏联保持睦邻关系。象保罗—亨利·斯巴克^①、皮埃尔·阿麦尔^②、莱奥·廷德曼斯^③这样一些著名的政治活动家都同我谈到过这一点。1975年6月，比利时国王博杜安正式访问莫斯科时也是这样说的。他们的话都很有分量。他们明白，任何战争，更不用说核战争，对比利时、荷兰和其他小国来说，只能预示着毁灭。

有必要回忆一下1976年10月我正式访问比利时时在布鲁塞尔同国王的谈话。考虑到国王的愿望，我和利季娅·德米特里耶夫娜一起去拜见他。国王和王后接待了我们。

谈话是友好的。这位君主的全部谈话内容都围绕着一个主题思想：

“我们必须保障和平。比利时是个小国，但经济上是发达的。它可以卖给苏联很多东西，也可以从苏联购买很多东西。至于文化和文化联系，那么，比利时珍视苏联人民的伟大文化，愿意扩大文化联系。”

王后也积极支持这个思想。

比利时领导集团决定为华盛顿提供在比利时领土上部署核导弹的权利是比利时政治上的一个污点。从社会舆论对此计划的反应，就可以看出，比利时人民对这个决定深感不安。许多政治活动家也认识到，比利时的未来应建立在巩固和平，

① 1947—1949年任比利时首相。——译者

② 1965—1966年任比利时首相。——译者

③ 1974—1979年任比利时首相。——译者

而不是军备竞赛的基础上。

在同比利时活动家的谈话中，我强调指出：

“那些崇拜军备竞赛的人忘记了，在政治上如同在运动场上一样，有一条相同的规律：赛跑者都极力想超过对手。如果有一个人冲到前面，另一个人定要奋起直追，甚至还要超过他。”

谈到这里，我不得不阐明我们的立场：

“苏联认为，一切无止境地进行军备竞赛的计划，都应放弃。应当而且可能转而制止军备竞赛和裁军。否则，和平这一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就要象著名的比利时作家梅特林克^①剧本里的青鸟一样，只能成为虽具有诱惑力、然而却实现不了的幻想。”

在比利时，同时也在全世界，伟大的画家鲁本斯为许多代人所尊崇。他在自己的画布上反映了丰富多彩的生活。但鲁本斯在历史上也作为一个高超的外交家而著名。佛兰德^②的女统治者派他出使西班牙、英国和其他国家去完成一些复杂的使命。可能因此，命运为他打开了在对外政策领域里从事活动的窗口。他说出了一句今天听来仍是铿锵有力的至理名言：

“对我来说，我希望全世界都处在和平之中，这样，我们就能够生活在黄金时代，而不是铁器时代。”

说得多好！如果把这段话用大写字母浇铸在设在鲁本斯

① 比利时法语剧作家、诗人。他的剧本有《青鸟》（1908年）等。1911年获诺贝尔奖。——译者

② 中世纪的伯国，中世纪欧洲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后来大部分划归比利时，一部分并入法国和荷兰。——译者

故乡的北约总部正门上，那倒不错。

荷兰人民的感谢

以上关于比利时所说的许多话，对于荷兰也同样适用。如果我断言，对于荷兰来说，同苏联保持良好关系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我想是没错的。

两国人民很久以来就渴望互相交往和进行友好合作。例如，怎能不使人回想起，17世纪末彼得大帝曾专程去赞丹的造船厂，在那里当木匠，向荷兰一些著名的工匠学习造船方法。把各个大陆和各国人民连接起来这一航海者们的永恒使命，在这里也得到了体现。可以说，彼得一世在俄国同荷兰的关系上“打开了一个窗口”，使两国关系明显活跃起来。值得一提的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两国间悠久的历史上没有发生过战争。

伟大的十月革命对荷兰人的理智和心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国人民对那个时代的一些事情还记忆犹新：荷兰的劳动人民反对对苏联的武装干涉，阻止装有武器的运输车队从鹿特丹开出，他们在伏尔加河沿岸地区^①闹饥荒时期还向苏维埃俄国提供了食品。

然而，为了尊重历史，不能避而不谈的是，我们两国关系发展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在两国关系中出现过相当困难的时期和停滞阶段。荷兰某些集团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还缺乏远见，拒不承认苏联，直至1942年7月，我们两国才建立

^① 指伏尔加河中下游沿岸及其附近经济上有密切联系的地区，如伏尔加丘陵和扎沃尔日耶等。——译者

外交关系。这时，世界大战之火已在熊熊燃烧，为使人类摆脱法西斯奴役的威胁，苏联肩负起了斗争的主要重担。

荷兰女王威廉敏娜高度评价了苏联在战胜法西斯德国及其盟军中的作用。她在1945年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一封电报中写道：“在我国人民获得彻底解放的时刻，我谨对杰出的俄国军队以其辉煌的胜利为伸张正义和实现荷兰解放所做的重要贡献，向您表示我国人民的无比钦佩之情和深深感谢之意。”

但是，随后为进一步调整好苏荷关系，还是花费了不少时间和努力。真正的转折只是到了国际关系从“冷战”转向紧张局势缓和的60年代才出现。

在那些年代以至在以后的时期，对于发展苏荷各方面的关系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为互利合作的前景拓清道路的政治接触。

每当我回想起同朱丽安娜女王以及现在的贝娅特丽克丝女王的会晤和谈话时，都感到愉快。在1972年我正式访问荷兰时，朱丽安娜女王邀请我和我的妻子到王宫去。她向我们保证：

“荷兰人民对苏联怀着友好的感情。”

参加会谈的女王的丈夫贝尔纳德亲王也做了同样的表示。

她们讲述了彼得一世访问荷兰这一生动的历史事实。这次访问一直珍存在荷兰人民的记忆中。所有这些，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政治上，都自然地促进了两国关系良好气候的形成。

顺便说一下，我们参观了坐落在阿姆斯特丹郊区赞丹的

彼得住过的那所小屋。这所小屋被作为一件珍贵的历史纪念物保存下来。屋子虽小,但却很整洁,看得出是有人关心的。参观之后,我们再一次确信,彼得一世对高大的宫殿没有好感,他愿意住在小房子里,这并不是什么神话故事。

1973年,我有幸在莫斯科会见了贝娅特丽克丝女王。当时,这位后来成为女王的公主和她的丈夫克劳斯亲王正在苏联进行访问。女王说:

“我喜欢贵国。我认为,苏荷关系必须得到发展。”

我有幸在不同的年代会见过荷兰首相巴伦德·比舒维尔、外交大臣韦尔赫尔穆斯·施梅尔策、马克斯·范德斯图尔、汉斯·范登布鲁克以及荷兰其他著名的国务政治活动家。尽管在对某些国际问题的态度上存在着可以理解的差别,但在诸如必须维护和平这类对于所有国家都是带有原则性的问题上,却总是一致的。

例如,我记得,1972年7月我访问荷兰期间同荷兰的国务活动家们会晤时,他们是多么理解和赞成我们所说的这些话:

“曾被两次世界大战席卷过的欧洲,应当为和平解决自己的迫切问题作出榜样,为和平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而不管这些问题是多么复杂。”

扩大政治对话对苏荷关系的所有领域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双方签订的关于航空交通、贸易通航、发展经济、工业和技术合作、文化合作等文件为苏荷关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苏联的对外贸易方面,荷兰在我们的西欧伙伴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文化交往的悠久传统把我们两国人民联结起来。苏联人

有幸目睹了象伦勃朗、凡·戴克、凡·高、凡·爱克兄弟、梅姆林、哈尔斯等著名荷兰绘画大师作品的真本。他们的作品丰富了世界文化宝库。

我们饶有兴趣地了解了荷兰的现代艺术。

令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在荷兰，俄国和苏联的多民族文化也得到了高度评价。

荷兰，如同比利时一样，也受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集团义务的束缚。

荷兰的政策是不简单的：一方面，人民向往和平的生活；另一方面，又要承担集团的义务，毫无疑问，这些义务同荷兰人强烈而又十分自然地追求和平是背道而驰的。

苏联向荷兰和比利时都伸出了友谊之手，祝愿两国人民幸福。苏联活动家在同荷兰和比利时各个级别的人士的会谈中一贯强调的正是这一思想。每当我们向比利时和荷兰的首都告别时，我们都确信，这两个国家的人民渴望和平，诅咒战争。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什么是战争。

中立不应发生动摇

通常，回忆录的作者们在写到西欧小国时，首先注意的目标是瑞士。如果就历史的一个缩影而言，那么看来对此无可非议。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150多年来，瑞士一直拥有长期中立的地位。它的“永久中立”是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签署的宣言中宣布和保证的。当时，讨论并解决了有关战败拿破仑法国的善后事宜。

在苏联，甚至不仅仅在我们这里，很难找到一个人没有

听说和没从书本上得知，瑞士是一个具有悠久民主传统的国家。它位于欧洲中部的地理位置、历史、居民的民族成分，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这样的特征。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100多年来，瑞士一直是来自意大利、法国和其他国家政治移民的避难所。好几代为俄国的自由而战的代表人物都在这个国家获得了庇护。俄国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便是其中之一。

自然界似乎有意识地造就了瑞士，以便向世界表明，那些反对暴政、想呼吸自由空气的人可以在瑞士雄伟的群山和自由的峡谷里，在积雪和鲜花中找到避难所。

俄国无产阶级的领袖弗·伊·列宁在瑞士总共居住了大约7年。

我所会见过的瑞士活动家——国家元首、部长们，都清楚本国历史上这些美好的篇章。他们很乐意接受对他们国家过去的颂扬之词。

这里，对战后时期瑞士的对外政策需要说几句。常常会听到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

“瑞士的中立是不是发生了动摇？”

这个国家似乎越来越经常地要根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政策行事，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甚至仅从表面上来说，被认为是中立国的瑞士，也不应把自己同任何一个国家集团拴在一起，而应超脱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参加国的政治冲突之外。

过去，国际红十字会当之无愧地享有良好的声誉。而它

实际上是瑞士的一个组织。它的主要目的是在发生武装冲突时以中立调停者的身份提供人道的援助。但是，最近以来，就这一组织的行动而言，往往不那么客观了。当苏联公民由于某种情况而同国际红十字会打交道时，该组织的领导人有时就失去了中立的特征了。有时要使这一组织做到公允客观，简直就象一个不是登山运动员的人要登上瑞士的最高山峰那样困难。

我们曾本着友好的精神提请瑞士的活动家注意这一点，包括在马德里和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讨论会上。但是，并没有提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论据来说明为何背离中立原则。

当局的代表在瑞士召开的国际会议上，看到有人在人权问题上对我国采取越轨行为时，不知为什么竟一次也没有这样说过：

“先生们，你们这是把矛头对准谁呀？苏联是一个主权国家，任何人都无权干涉它的内政。”

而如果有谁在任何一次国际会议上批评瑞士的国内立法时，苏联代表出于对主权原则的尊重，总是会对此加以反驳，并把这种批评毫不含混地看作是干涉瑞士的内政。而且已经不止一次这样做了。

瑞士大概仍想在将来成为许多国际组织，其中也包括联合国的欧洲分支机构的所在地，仍想在那里举行众多的国际性会议。这个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愿瑞士能将其中立国的国际威望保持在相应的水平上。

假如瑞士奉行的对外政策方针与享有世界声誉的瑞士钟表的精确度相吻合，那就好了。我想顺便说一下，45年前我戴的第一块外国生产的手表，就是瑞士“浪琴”公司的手

表。直到现在，这块表还走得很准。无论如何也不想停下来。

奥地利的名片

中欧有哪些国家可以首先称之为中立的主要支柱呢？在这种情况下，答案应当是：瑞士和奥地利。这两个国家在这方面各有自己的特征。但两者的共同特征是中立。1955年5月15日在维也纳签订关于《重建独立和民主的奥地利国家条约》之后，奥地利获得了中立地位。签约的一方是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另一方是奥地利。

作为一个国家，奥地利产生于1918年11月，这是曾不止一次地对欧洲其他国家举起战争之剑的奥匈帝国崩溃的结果。1938年3月，奥地利成了德国法西斯的牺牲品。在历史上，这一时期被视为可耻的合并时期。

战胜希特勒德国也给奥地利人民带来了自由。在奥地利面前展现了独立发展的道路。10年以后签订的国家条约使这个国家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向前发展。

我有幸多次到过奥地利，会见过它的一些国务活动家，从总理尤利乌斯·拉布和外交部长莱奥彼尔德·菲格尔到现在的奥地利活动家。现任总统库尔特·瓦尔德海姆，早在联合国被选为秘书长时，我就认识了。他们大家过去和现在都清楚地懂得，中立的政策是奥地利应当始终不渝奉行的方针。

1985年5月，在庆祝国家条约签订30周年时，奥地利官方表示要信守这一方针。我们觉得，甚至维也纳的街道和房屋的墙壁都在颂扬中立的政策。这个大城市的居民热情地表

达了对我国的好感。

大洋彼岸那些不喜欢中立的奥地利的活动家们是大错特错的。他们把这个国家以及其他中立国所奉行的中立政策称之为“不道德的”。然而，事实上，不道德的正是那些企图使奥地利放弃中立政策的人。

1985年5月17日离开维也纳时，我以苏联领导的名义向奥地利及其人民表达了良好的祝愿。

苏联同奥地利的关系，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平等合作的令人信服的典范。我国将继续为使这种合作成为发展苏奥关系的基本路线而作出一切努力。

维也纳尽管是中立国的首都，然而它也是国际生活的一个中心。象国际原子能机构这样愈来愈举足轻重的组织就设在这里。

在维也纳，经常召开一些国际性会议和举行其他一些大型活动。例如，1979年6月18日苏美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就在这里签署。

在奥地利时，一个想法总萦绕于我的脑际：这是一个音乐修养达到顶峰的国家。似乎连我不止一次去过的维也纳森林里，也都充满着音乐。到过奥地利首都的人，谁不想去造访著名的维也纳歌剧院？或者是欣赏一下轻歌剧？再不就是去听听华尔兹——施特劳斯魔术般的迷人旋律？

战后时期在维也纳官场上出现了不少政治活动家。他们每一个人在政治上都有自己的观点。但在签订奥地利国家条约之后，他们在苏奥关系上都没有背离这个条约所奠定的基本路线。似可认为，未来不会带来任何令人不愉快的意外事件。欧洲需要中立的奥地利，奥地利人民也需要中立。

我未能去过的国家

可惜，非常可惜的是，我的足迹可以说遍及全世界，但我却没有去过荷马的祖国。是的，情况所使，我未能有机会去那里。

我到过塞浦路斯。有一次在飞往中东的途中，我从飞机的舷窗下望，尽管不太清楚，但还是看到了希腊海岸的轮廓，仅此而已。

要知道，从我开始阅读历史书籍时起，古希腊就象古罗马一样，总是使我倾心向往。

事情很奇怪，但却是事实。我曾多次欣赏过雅典、巴台农神庙旖旎风光以及其他一些希腊远古时期的名胜古迹，但却是在电影中和电视屏幕上看到的。我觉得很早以前就很熟悉它们了，但我就是没有亲眼目睹过。

卡尔·马克思并非偶然、而是有意识地选择《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这个题目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年轻的马克思在这本著作中好象指责了黑格尔对这些哲学体系没有给予足够的认识，而在当时，这些体系却“是理解希腊哲学的真正历史的钥匙”。^①

提到古希腊人和斯拉夫人的联系，其后是希腊人和俄罗斯人的联系，难道不应该说几句赞美的话吗？这种联系，任何人、任何时候不仅未能使之中断，也无法使其受到根本削弱。

① 马克思：《博士论文》，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页。——译者

古希腊人的移民区分散在内海和攸克辛海周围^①。他们在我国领土上也居住过。考古学家在苏联欧洲部分南方、特别是在克里米亚发掘出来的文物证明了这一点。自远古时代以来，叶夫帕托里亚城^②在克里米亚半岛上一直保留下来。这座城市是以把古希腊人从古罗马人米特拉达梯六世^③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沙皇的名字叶夫帕托尔命名的，其意思是“高尚的人”。

在雅典中心有一个广场叫“自由协会”。19世纪初，在俄国南部的敖德萨建立的希腊爱国主义者的一个秘密团体也取这个名字。这个秘密团体成了摧毁旧制度的引爆器。希腊人民进行了长期艰苦的解放斗争。在斗争中，俄国的许多杰出人物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伟大的英国诗人拜伦也在这里殉难。但是，希腊在1830年终于实现了民族独立。俄国从政治上、道义上和物质上对这个年轻的国家给予了援助。

约翰·卡波迪斯特里亚斯成为希腊共和国第一任总统也具有象征意义。这发生在1827年。而在此之前，他曾在俄国的外交部门供职多年，接近俄国的进步人士，与普希金有过来往。希腊的敌人不能容忍总统对俄国所表现出来的好感，结果，总统在英国和法国策划的阴谋中遇难。

伟大的十月革命之后，苏联政府废除了沙皇同希腊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这包括放弃对希腊实施“国际经济监督”，即拒绝参加为此而设立的国际监督机构，放弃在西方

① 在古代，这被称为地中海和黑海。——原编者

② 苏联城市，位于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克里米亚州。——译者

③ 本都王国国王，曾征服黑海全部沿岸地区。在同罗马的几次战争中最后战败，自杀。——译者

列强强加给该国的这一掠夺性组织中所占的“俄国的份额”。

1923年，意大利侵略希腊，轰炸了科孚岛¹⁾。苏联是唯一坚决主张保卫希腊的国家。

希腊是世界上首批承认苏联的国家之一，于1924年3月8日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这绝不是偶然的。

当希腊第一位公使在克里姆林宫递交国书时，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说：

“我不怀疑，恢复我们两国的正常关系会加强我们的经济合作。”

两国关系随后的发展证明这些话是完全正确的。

难道不应该谈谈今天的希腊在为防止核战争、争取和平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吗？众所周知，米·谢·戈尔巴乔夫发表了一个铿锵有力、令人信服的声明。这个声明对“德里六国”、希腊自己和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总理的政策都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帕潘德里欧的政府在核裁军和欧洲缓和诸问题上竭力捍卫独立自主的方针。这一方针符合它们国家的民族利益。

苏联和希腊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的立场是接近或者说是相吻合的。在建立无核区、把地中海变为友谊与合作之海、和平解决中东问题以及塞浦路斯等问题上都是如此。立场上的相似为加强莫斯科和雅典之间的相互信任创造了条件。

我不止一次地同希腊的一些国务活动家举行过会晤，讨论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问题。这种会谈或者是在纽约，或者是在希腊贵宾正式访问时在莫斯科举行。

一个具有伟大的和独特的美好历史的小国，在今天也可

1) 即希腊的克拉基岛。——译者

以为人类和人类的进步做些有益的事情。

不，古代世界发展的康庄大道上点燃的灯火没有熄灭，希腊缔造的文明果实迄今仍为各国人民以及全世界所享用。

只要越过北极便近在咫尺

在今天的时代，国与国毗邻的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科学技术革命、人类在发展航空、海上、地面运输和通讯工具方面的巨大进步，使某些国家几乎成为邻居。但如果用旧的标准来衡量，那么，就绝不能把这些国家称为邻国。

形象地说，对象苏联和加拿大这种隔北极相望的国家，上述说法完全适用。两国的国务活动家不止一次地确认，两国由于其各自的地理位置，在北极地区具有一致的利益。

加拿大方面，这一思想表达得最清楚的是曾任过自由党领袖的皮埃尔·特鲁多总理。客观事实要求人们承认，加拿大任何一届政府都没有象特鲁多所领导的政府那样如此明确地表示，在双边关系和贸易关系方面，必须同苏联找到共同语言。这倒并不是说，在他当政时期，苏加关系一直是一帆风顺的。虽然有过困难和挫折，但加拿大政府一般都能采取改善两国关系的方针。因为苏联主张同一切国家（不论其社会制度如何）保持良好的关系，所以，产生的一些分歧都能逐步得到缓解，直至完全消除，关系好转。

使我们两国接近的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在加拿大寄居的俄罗斯和乌克兰移民比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其他地区都要多，这些移民保留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同他们的祖父和曾祖父们出生的那个国家有着牢固和友好的联系。

俄裔加拿大人大约共有3万人。实际上他们几乎都是反
正教仪式派的后代，即所谓的“精神基督派”¹教派的代
表。

这个教派在俄国产生于18世纪下半叶，它否定正教的洗
礼和圣事，反对神甫和僧侣。因违抗当局和拒服军役，反仪
式派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19世纪末，在列·托尔斯泰的协
助下，他们迁往加拿大。在加拿大，他们分村社而居。他们
的许多生产单位都是按集体所有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俄罗
斯人在加拿大聚居的中心是位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东南部特
雷尔市的一个区以及温哥华市。

乌克兰裔加拿大人有50多万。这是上一世纪和本世纪初
为了摆脱贫困而离开自己白色的农舍、成伙或单个飘洋过海
的一些贫苦农民的后代。现在，这些人散居在加拿大全国各
地，但大多数人居住在马尼托巴省，那里的草原很象乌克兰
靠近卡霍夫卡和赫尔松附近的什么地方。在马尼托巴省的主
要城市——温尼伯，伟大的乌克兰人塔拉斯·舍甫琴柯²和
伊万·弗兰科³的纪念碑和马尼托巴省创建人路易·利埃
里、英国诗人罗伯特·彭斯的纪念碑并排矗立在立法大会大
楼前面。

1984年2月，康·乌·契尔年科和皮·特鲁多在莫斯科举行
了会谈。双方都表示要保持良好的关系和加强业务往来。引人
注目的是，加拿大总理比过去更为执著地就世界政治诸问题

1 基督教中从正教分离出来的一些教派（如反仪式派等），它否定僧侣作用，反
对许多宗教礼仪。出现于18世纪，是农民反对农奴主剥削在宗教上的反映。——译者

2 乌克兰诗人、画家。——译者

3 乌克兰作家、政论家、社会活动家。——译者

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在担负着世界事务主要责任的核大国之间必须达成协议”。

当然，特鲁多对西方国家政策的可能性和理智有一定的理想主义和评价过高。看来，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我自己同特鲁多数次晤面。在特鲁多1971年第一次访问苏联期间，列·勃列日涅夫接见了她。

我曾于不同的时间在渥太华同加拿大总理进行过几次单独的会谈。从我们最初相识的时刻起，他最引人注目的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才华不凡、很有分寸的人。在会谈过程中，他不喜欢避开问题的实质去兜圈子，而喜欢立即说出自己的意见，并且做得顺乎自然。

有关这位活动家，不妨再多着点笔墨。由于他善于迅速地抓住问题实质、并做出分析，在还没成为总理之前，他就受到人们的注意了。

他在捍卫自己观点方面所表现出来的顽强精神很令人羡慕。他总是拥有大量的论据，并用它们来对付政治上的论敌。而且在做这一切时竭力不伤害他们个人，更不用说侮辱他们了。所有人都注意到了他性格上的这一面。凡是熟悉他的人都强调说，他没有私敌。他同自己的妻子离了婚，但也做得文雅有礼。

如果需要的话，特鲁多会毫不犹豫地对他南部的邻居说出不赞成的话。而他的南部邻居——按普遍的看法——对他怀有戒心。这一点特鲁多也是知道的。

我发现，他对各种国际性问题消息总是十分灵通，能够谈得起来。而如果他偶尔对实际材料的评价方面出了毛病，

那么，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表现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团结精神，尽管他善于巧妙地、毫不强加于人地做到这一点。此外，对此有影响的是，在获取整个世界局势或局部地区形势的情报方面，特鲁多同那些拥有能获得翔实情报的人也不可同日而语。当特鲁多从华盛顿得到情报时，显然，这种情报是不客观的，有时甚至完全是伪造的。应当称赞特鲁多的是，每当出现这种情况时，他总是认真地听取苏方就这些或那些问题所作的说明。

在加拿大的一次会谈中，我引证他同我们大使亚·尼·雅科夫列夫的谈话，对他说：

“莫斯科对于您同我国大使进行的认真的、充满信任精神的谈话给予很高的评价”。

特鲁多答道：

“会谈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我的苏方谈话人”。

我说：“我们在莫斯科认为，在渥太华，象在与苏联有外交关系的其他国家的首都一样，我们的大使应当是聪明的、受过教育的人，更何况是派驻您——特鲁多先生所领导的政府的使者”。

总理回答：

“我很珍视这一点”。

众所周知，作为总理，特鲁多一向被公认是管理内政的能手。有时候人们觉得，他眼看就要沉入政治泥潭之中，大概再也浮不上来了。但特鲁多浮上来了，表现出惊人的生命力。这对国家是明显有益的，因为政治上的主要反对者们不赞成他所奉行的使加拿大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集团中获得更多自主性的路线。

一句话，假如有人请我对这位著名的活动家做个简短的政治评价的话，那么，我会这样说：

“当然，特鲁多是一位资产阶级活动家，他的思想观点从来就不是什么秘密。然而，在国际事务中，他比那些由于在思想意识上敌视社会主义、不能或不愿意承认世界现实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国的国务活动家要高出一头。确切地说，他们不愿承认存在着属于两种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国家，不愿承认必须通过和平的途径来解决国与国之间现存的分歧。比这更明智的选择是没有的。”

1984年9月，在野的进步保守党由于在议会选举中获胜而在加拿大执政，组成了以该党领袖布赖恩·马尔罗尼为首的政府。

很快，借出席第三十九届联合国大会之机，我在纽约会见了加拿大新任外长约·克拉克。我们交换了意见，双方都认为是有益的。我指出：

“当然，加拿大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即与我们相对立的军事政治集团的成员。这是现实，应予考虑。我国也正是这么做的。但是，苏联把加拿大看作是个友好国家，尽管两国间政治和思想上有分歧，但存在着在各个方面发展关系的可能性。据我们看来，两国之间就是在国际政治方面也存在进行广泛合作的广阔天地。”

加拿大总理听着，我又继续说：

“过去，我们两国关系发展得不坏，在对外事务中也有一定程度的相互理解。希望不要失去这一切。应该考虑一下，为了使我们的关系能够继续向前发展，需要再采取哪些步骤。当然，这不是说要牺牲任何一方的盟国的利益，而只是为了

苏加关系的利益。”

克拉克也表示：

“加拿大新政府愿意同苏联发展稳定友好的关系”。

我们还探讨了一些迫切的国际问题，我强调指出：

“为了就限制和停止军备竞赛，首先是核军备竞赛达成具体的协议，苏联准备进行认真的谈判。苏联多次就此发表声明，并提出了一些最积极的建议。但是，我国无法单独实现这些建议，单枪匹马地缩减军备！如果任何一个思维健全的人把自己置于我们所处地位的话，那么，他都会同意，这是不可能的。苏联有一个可以规定各项协议基础的含义深广、精确的公式——平等和同等安全。我们的方针一如既往，这就是巩固和平。”

加拿大总理试图这样来描绘世界形势：

“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全部责任归根结底将落在苏联和美国身上，而给象加拿大这样的国家准备的主要是观察员的角色。”

从这些话中当然使人嗅到一种熟悉的气味。

1985年4月，在克拉克正式访问我国时，我同他在莫斯科举行了新的会谈。

在会谈中，我方集中说明苏联为了使国际舞台上的事态坚决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所作的种种努力。

我的加拿大同行在阐明其政府的观点时说：

“加拿大非常关心寻求缓和世界紧张局势和消除核战争威胁的途径。它充分认识到局势的危险，它也同意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极其关心裁减军备的说法。”

在就双边关系问题交换意见时，对必须使双边关系得到

稳定发展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双方重申，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愿意扩大苏联和加拿大在经济贸易、科学技术、文化和其他方面的互利合作，并使其具有实际内容。

这是一次建设性的谈话，它在很大程度上使人想起特鲁多政府执政时举行会谈的那种气氛。

朋 友 和 邻 邦

反战壁垒 苏联—南斯拉夫的传统友谊 遵照列宁
本人的指示 伊斯坦布尔印象 支持塞浦路斯人民
不可剥夺的权利 俄罗斯的第一首波斯之歌 伊朗
国王 阿富汗：结束外来干涉 圣雄甘地突然萌发
的思想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克里希纳·梅农热
情洋溢的讲话 印度的伟大女儿 拉吉夫·甘地的
话 廖里赫父子 塔什干：夏斯特里与阿尤布·汗
残酷的报复行为——别无解释 不可相信的话 跨
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
义人民共和国 消除历史的反常状态 会见毛泽东
秘密出访北京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产生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目前在该体系中有欧洲、亚洲和美洲三个大陆的国家。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星球的面貌。

反 战 壁 垒

每天都传来令人信服的消息，证明列宁预见的英明：社会主义将成为能对整个世界政治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强大的国

际力量。今天的情况正是这样。

华沙条约联合起来的国家始终关注全人类的重大任务，即努力使各国人民摆脱新的世界大战的威胁，不让地球成为荒凉的沙漠。它们过去和现在都在为达到这一崇高目标而努力奋斗。

如果历史真有公正的裁判、能判断究竟是谁有力地制止了新战争的爆发，那么它一定会公正地宣布，是社会主义各国的大家庭。

社会主义各国为巩固普遍和平的基础而进行斗争的同盟军是地球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是绝大多数的国家。而它们的对手则是北约国家。和平力量同军国主义势力之间的这场历史性决战正方兴未艾。

社会主义国家在自己的宣言和声明中，在具体的建议中，多次向美国及北大西洋集团的其他国家发出呼吁，希望它们与华沙条约组织国家共同努力，使战争之剑永不出鞘。

华约组织提出的倡议实际上包括了保障国际安全问题的各个方面，范围很广。苏共中央总书记米·谢·戈尔巴乔夫代表苏联就这些问题提出的建议是世人皆知的。

华沙条约国家特别尖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即防止宇宙空间军事化必须同大规模削减直至彻底销毁核武器联系起来。在苏美核武器和太空武器的谈判中苏联始终坚持了这一立场。

华沙条约政治协商委员会、外交部长委员会和国防部长委员会的每一次会议都要研究促进消除战争威胁、调整和发展各国间和睦关系的步骤。

每当回忆起政治协商委员会的会议，我总是十分满意。

我参加了该委员会的所有会议。会议研究和解决的是有关华约国家政治和安全的一些关键性问题，目的是为了保障这些国家的人民能够和平地劳动和生活。与会者极其热烈和坚决果断地讨论议事日程上的各种问题。作为本国人民的使者，他们首先考虑的是，为制止战争这个怪物再点燃起新的火焰，还需要做些什么。

我常常高兴地看到，我们的盟友是多么尊重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以及我国提交给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讨论的建议。苏联代表团对其他兄弟国家——华沙条约成员国的领导人和代表团也以礼相待，尊重他们爱好和平的倡议。这种相互尊重的关系，另一个世界的代表是无法理解的。

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在国与国之间建立新型的史无前例的关系上作出了榜样。它们的基础是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这种关系是建立在权利完全平等、尊重每个国家的主权、互相帮助和同志式的支持以及阶级团结的基础之上的。

1985年4月底，在人民波兰的首都，华沙条约成员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进行会晤。会晤中签署了关于将该条约延长20年并可顺延10年的议定书。在这个文件上代表苏联签字的是苏共中央总书记米·谢·戈尔巴乔夫。

一致决定延长华沙条约，再次令人信服地显示出了华约各盟国加强团结、共同维护社会主义在国际舞台上的立场、力求保证欧洲和全世界可靠和平的意志和决心。

他们全面考虑了各兄弟国家的利益，认真分析了当代的国际形势，认识到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国家军事政治防御同盟的迫切需要，此后，决定采取这一集体行动。

兄弟国家决定延长条约的有效期，是对美国及追随美国

的北大西洋集团各成员国在国际事务中推行危险方针的自然而恰当的反应。

华约成员国今后将继续根据北约集团的军事威胁程度采取必要的措施，使其集体防御能力保持在应有的水平上。他们并不对任何人谋求军事优势，但也决不允许别人对他们取得军事优势。

我们同华沙条约成员国的双边关系变得越来越积极和丰富多彩。这里包括他们之间的各种各样的联系。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为加强团结与合作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些领导人中有：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托多尔·日夫科夫；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亚诺什·卡达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埃里希·昂纳克；波兰人民共和国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米洛什·雅克什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古斯塔夫·胡萨克。

兄弟国家之间多方面的合作也发展到了更高的水平。例如，在华沙条约组织各机构内的工作变得更加活跃了。首先，华沙条约成员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定期举行会议。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详细讨论维护和平和防止核战争的问题，并就此作出

决定，这些决定在地球的各个角落引起舆论界的广泛反响。

米·谢·戈尔巴乔夫强调指出：“历史上没有哪一个联盟能象我们的联盟那样，把关系建立在主权国家之间完全平等和同志式的互助的基础之上，这是一个真正的各国人民联盟，是一个不威胁任何人，而完全献身于保卫和平事业的联盟。”

苏联—南斯拉夫的传统友谊

记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的人民对塞尔维亚人有着多么友好的感情。大家知道，当德国和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进攻时，俄国奋起保卫塞尔维亚。我们的人民同情塞尔维亚。这种同情即使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也并没有丧失。尽管战后苏联和南斯拉夫经历了一段复杂时期，但这种同情至今仍保持着。我们同南斯拉夫的联系是多方面的。

我们两国人民在反对共同敌人——法西斯的战斗中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关系的坚实基础。这一友谊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重要的是，双方都努力表现出善良的愿望，双方都愿意在最广泛的领域中进行合作。

我有幸从一开始就参加了苏南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我是1955年前往南斯拉夫首都访问的苏联代表团的成员。苏南双方举行了会谈，并发表了贝尔格莱德宣言，规定了我们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1956年在莫斯科签署的共同声明中又确认了这些基本原则。

我有幸在莫斯科或贝尔格莱德同南斯拉夫总统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多次会晤和谈话。这些谈话是在良好的气氛中进行的，我对此仍记忆犹新。

我也参加了约瑟普·布罗兹·铁托的葬礼，回想起来，感到心情很沉重。追悼仪式结束之后，我们会见了南斯拉夫领导人。以列·伊·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做了如下声明：

“苏联领导人希望苏联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永远充满相互谅解和信任的气氛。苏联是南斯拉夫人民的可靠朋友，这已为苏南多年的合作所证明。”

南斯拉夫的领导人本着同样的精神也做了回答。

遵照列宁本人的指示

遵照列宁本人的指示和在他直接参与下，苏联调整了其南部邻国的关系，为苏联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这就是说，要把苏联同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的关系建立在真正平等、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基础上。尽管这种关系曾经历过错综复杂的时期，但这不是由于苏联方面的过错，而照例是帝国主义玩弄阴谋诡计的结果。因此，这些关系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并不是偶然的。

如果向我们国内的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了解土耳其及其历史吗？”

可以有把握地说，99%被询问的人都会这样回答：

“土耳其是我们的邻国，俄国至少在200年间曾多次同它交战。”

如果拿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为例，历史表明，这两种宗教都曾多次为战神效劳。基督教神父们画十字，为教徒们祝福，保佑他们前去同另一些同样的基督教徒打仗，而另外一方的基督教神父们也在干同样的勾当。

伊斯兰教士们把手放到可兰经上，祈求上帝帮助他们去跟同样的伊斯兰教徒打仗。目前持续了数年之久的伊朗穆斯林反对伊拉克穆斯林的毫无意义的战争难道不就是明证吗？在这场残酷的屠杀中，两个民族的精华都惨遭毁灭。

但是，当交战双方信奉不同的宗教时，战争就变得愈加残酷了。描写以往俄国和土耳其之间历次战争的文学和绘画作品刻画了多少幅鲜血淋漓的场面啊！

当然，现在的土耳其对历史上土耳其进行的反对俄国、巴尔干和其他国家的侵略战争是没有责任的。经过了几个世纪，发展的必然进程才粉碎了奥斯曼征服者力图侵占黑海的种种企图。历史本身也向他们宣告：“不许再前进一步！”然而，血雨腥风并未停止。只是到巴尔干地区人民依靠俄国的力量取得了独立之后，俄土边界的局势以及巴尔干地区的局势才平静下来。

伟大的十月——这是我们两国关系史上可用金色大字标出的分界线。在这个时期，土耳其国内出现了一些目光远大的人物，其中突出的是凯末尔·阿塔丘尔克⁽¹⁾。

列宁同阿塔丘尔克的相互通信，至今读起来仍饶有趣味。这些书信将长期成为那些主张发展两国良好关系的人们从中吸取智慧的源泉。

天才的列宁看出阿塔丘尔克是一位能超越土耳其地主资

(1) 土耳其共和国第一任总统（1923—1938）——译者

产阶级上层集团狭隘利益的重要人物。这位政治家希望土耳其人民能看到摆脱中世纪黑暗和与邻国为敌的前景，希望他们能看到不断前进的未来，即使是一种缓慢的进步。

阿塔丘尔克的生命虽然短暂，但他积极和崇高的活动不仅留存在国家的生活中，而且也铭记在人民的脑海里。

在他的那些在国内身居要职的追随者中，我想特别说一说伊·伊诺努。他是阿塔丘尔克的战友，在国内深孚重望。1938年到1950年间曾任土耳其总统，1961年到1965年担任政府总理。

当然，他没有把国家推上社会改革的道路。他为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利益服务。但人民共和党的传统，换句话说，阿塔丘尔克党的传统，还是把国家向前推进了。

但是，这个党后来没有取得政治上的胜利，在这里，外部因素的作用并不是微不足道的。应该补充说明的是，由于伊·伊诺努不积极开展活动，使得通向达到阿塔丘尔克为之奋斗的目标的道路布满荆棘，再由于土耳其加入北约集团，这条道路就尤为艰难了。

我于1965年正式访问土耳其。到土耳其后，我立即向阿塔丘尔克表示悼念之情，谒拜了阿塔丘尔克陵园，并向他的陵墓敬献了花圈。土耳其人虔诚地纪念阿塔丘尔克。我在这个国家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以敬仰的口吻谈到他。

那时，伊诺努已不担任任何政府职务。然而，在我访问期间，他要求与我会面，我答复同意。他带着一位助手来了，这位助手在党内担任正式职务。

当我想到站在面前的是阿塔丘尔克的战友时，我对他就产生了崇敬之情。当然，不是伊诺努政府所做的一切都符合阿

塔丘尔克在苏土关系问题上的政治哲学。但这一点似乎已不那么重要了。更何况伊诺努处于在野地位，他可以比担任政府首脑时更加自由地就这个问题发表个人的见解，表现得更加无拘无束。

他头脑清楚，对形势分析清晰透彻，他坚决主张进一步发展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这使我惊讶不已。伊诺努在说话中并未忘却使他激动的主要问题。他说：

“土耳其现在做的事，我远非都赞同。不是一切事情都符合我已故导师的遗训。但我坚持认为，土耳其应该而且能够同北边的伟大邻国在列宁和阿塔丘尔克早就明确认定的基础上建立关系。”

我在国外遇到的活动家中，很少有人能这样巧妙、这样有分寸和如此清晰地阐述自己关于土耳其和苏联关系的想法。伊诺努能讲笑话，而且恰到好处。从其举止风度来看，他更象欧洲人。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一个生气勃勃、反应敏捷的人，虽然当时他已是90岁高龄了。

坦率地说，同这位白发苍苍的政界元老的会晤似乎使我特别满意。看着他，我不禁联想到：他的朋友阿塔丘尔克和列宁之间有着友好的通信往来，这些信件的影响及意义是后辈们的宝贵财富。

伊斯坦布尔印象

在伊斯坦布尔有许多名胜，但我认为最有意思的一处是立在街道十字路口的那块不大的路标，上面有两个箭头写着“欧洲—亚洲”。它意味着，这个城市同时坐落在两大洲。从欧

洲到亚洲只需几分钟，越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吊桥就可到达。

这座城市曾是三个帝国的首都。起先是罗马帝国，然后是拜占庭帝国，最后是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传说公元前660年间，希腊移民创建了这座城市。为纪念他们的领袖拜占斯就给城市命名为拜占庭。

这座城市占据着有利的地理位置，位于商业要道上，所以它很快发展和繁荣起来，甚至成为大罗马的竞争对手。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①决定从日益衰落的罗马迁都至日趋繁荣的拜占庭。在迁都65年之后，该城被宣布为东罗马帝国的首都。首都是以建议迁都者的名字命名的，所以，这座城市就以罗马皇帝的名字命名，按希腊的叫法，称为君士坦丁堡，意思是“君士坦丁的城”。我们古俄罗斯就知道，海外有这么一个美丽的中心城市，那里居住着王宫贵胄和帝国的统治者们，所以称它为帝城。

又过了大约1000年，在1453年，土耳其帝国的重骑兵和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精兵经过三个月的围攻之后侵入了这座城市。这次胜利之后，穆罕默德就在历史上留下了“穆罕默德征服者”的称号。

15世纪下半叶是欧洲阴谋反对土耳其、企图解放君士坦丁堡的时期。这时土耳其人已把君士坦丁堡改名为伊斯坦布尔。它成了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并持续了近5个世纪。

现在，这是一个拥有600万人口的城市。它的特点是发展迅速，和土耳其居民的人数增长一样快。土耳其人口增长的速度占欧洲第一位。全国居民的平均年龄为35岁。

① 即君士坦丁一世，古罗马皇帝。——译者

从表面上看，伊斯坦布尔象是一座穆斯林城。鳞次栉比的清真寺令人想到伊斯兰教，这座城里有几百个清真寺。报祈祷时间的人每天进行几次点名，每次要念一大串人的名字，这是他们在召集教徒们做祷告。为了使人们能听到他们的声音，还使用了现代化的技术，在清真寺小阳台上安装了扬声器。许多真主的仆人对着麦克风诵读可兰经。

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高高的海岸上，有一座漂亮的建筑。这里曾是俄罗斯帝国的大使馆。这座建筑是根据建筑师法萨吉兄弟的设计于1837年建造的。现在它是苏联总领事馆。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土耳其共和国的国家。1921年3月16日，签署了苏土友好亲善条约。

抵达伊斯坦布尔后，我立即前往苏联总领事馆。最令人注目的是领馆的主厅，称做库图佐夫^①厅。这里装饰豪华，具有标准的古典建筑风格，更确切地说，是帝国风格^②。我有这样一种印象，好象在这间大厅里甚至连呼吸时的感觉都与别处不同。

是啊，俄罗斯的伟大统帅，博罗季诺^③的英雄，后来人民称之为“俄罗斯救星”的米哈伊尔·伊拉里翁诺维奇·库图佐夫曾一度担任彼得堡王室驻土耳其苏丹王国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关于他的这段历史只有专家才知道。这实在不该！我觉得，他的外交活动值得后辈们崇敬和关注。

① 俄国元帅。多次参加俄土战争。1812年，拿破仑发动对俄战争时任俄军总司令，指挥了博罗季诺战役和塔鲁丁诺战役。——译者

② 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流行的一种仿古艺术风格，特别表现在建筑物和家具的式样方面。——译者

③ 莫斯科州莫札伊斯克区的村庄。1812年俄法军队在博罗季诺附近进行了一次交战。俄军在库图佐夫指挥下以顽强的英勇保卫战和巧妙的行动使拿破仑企图在总决战中粉碎俄军的计划宣告破产，从而注定了拿破仑一世军队的灭亡。——译者

在土耳其的使命被认为是俄国外交活动中最复杂的使命之一。但在这方面，库图佐夫也表现得异常出色。他是一个学识渊博、有卓越天才的人。他那彬彬有礼的语言和温文尔雅的风度使土耳其宫廷官员们不胜惊讶。他那得体的言谈举止使土耳其的大臣要员们感到十分惊奇，以致他们不相信他有军事天才，他们无法想象，这样一位礼貌周到的外交家怎么会是那个同苏沃洛夫^①一起攻打伊兹梅尔^②、并在其他战斗中重创土耳其精兵的那个最厉害的库图佐夫。

库图佐夫担任大使的时间不长，总共两年左右。但是在这期间，他捍卫了俄国人在黑海航行的权利，并力争做到把敌视俄国的外国船舶赶出黑海的港口，而俄国的船舶则可以自由地通过黑海海峡。

当我站在库图佐夫大厅中央时，真想大声说：

“赞扬您，纪念您，向您鞠躬致意，俄罗斯大地的外交使者米哈伊尔·伊拉里翁诺维奇·库图佐夫！”。

应主人的邀请，我们参观了著名的苏丹宫。皇宫奢侈无比，里边上下左右到处都是金子。土耳其的统治者似乎想在挥霍这种贵重金属方面创造记录。这一切与其说令人高兴，不如说令人忧郁，因为这些装饰是否合理值得商榷。

我们正走着，突然在皇宫的某个角落里，发现了阿塔丘尔克的故居。这套住房由两个不太大的房间组成。特别是参观过富丽堂皇的厅殿之后，这里的陈设显得极为平常：一张桌子，几把普通的椅子，两幅我国画家的画，是作为礼物送

① 俄国元帅，1768—1771年和1787—1791年两次参加俄土战争。——译者

② 苏联敖德萨州城市。12世纪起作为热那亚的殖民地而出名。16世纪为土耳其的要塞。在1787—1791年俄土战争中被苏沃洛夫率领的俄国军队攻占。——译者

给阿塔丘尔克的。人们向我们解释说，这位卓越的领袖一个人居住在这里。他不喜欢奢侈豪华，宁愿过清心寡欲的生活。谁也未能向我们解释清楚，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在金碧辉煌的苏丹宫中挑选这么一个朴素的角落作为栖身之地。从各种情况来看，向我们进行解说的那些人当中，没有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在对皇宫的参观即将结束时，我们穿过了陈列着我们杰出的同胞艾瓦佐夫斯基¹绘画的大厅。几乎全部都是大幅绘画。有些画的颜色已相当暗淡，令人觉得它们需要修复。众所周知，艾瓦佐夫斯基是根据合同去伊斯坦布尔绘画的。这些绘画有很大价值，土耳其人为之自豪，特别是这些画卷上描绘的海战场面，显然博得了订画人的赏识。这里展示了艾瓦佐夫斯基20多幅油画，而他的画在伊斯坦布尔各宫里总共将近40幅。

苏丹和他的朝廷重赏了这位俄国画家，奖给他一枚带钻石的“奥斯曼”奖章和一个镶嵌钻石的贵重烟盒。诚然，后来当土耳其人再次同俄国兵戎相见时，据艾瓦佐夫斯基的亲属称，他当众把这些奖赏扔进了黑海。

我们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苏丹宫。因为我们既目睹了土耳其统治者的奢华，又领略了真正的民族领袖日常生活的简朴。

在这座大城市的名胜古迹中只有蓝色清真寺和圣索菲亚大教堂可以与这座宫殿相媲美。

看来，这座大教堂值得专门提一下。历史似乎决意嘲笑这座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宏伟古迹。它是作为拜占庭帝国的

¹ 俄国画家，擅长画海景。——译者

纪念物而建立的。从建筑学角度看，它是欧洲最漂亮的大教堂之一，说它是欧洲的，因为伊斯坦布尔本身就在欧洲的土地上。壁画的内容是东正教的。但城市却在穆斯林的攻击下陷落。它成了奥多曼帝国^①的一部分并归入它的版图。而且奥斯曼人把伊斯坦布尔作为新月国的首都几乎长达5个世纪。

如同在类似的情况下常常见到的那样，这个被占领的城市里过去的圣物让位于新的、来自可兰经的圣物。铁腕人物支配了教堂里的一切。一个时代淹没了另一个时代。圣索菲亚基督教堂不再是东正教的寺院。而且壁画上还特意盖上了某种深色的涂料。现在当局已提出了这样一个任务，就是要把这种涂料从壁画上除掉。

我们看到了曾被涂料深埋、但现已部分修复的几幅基督教壁画。

当地的导游说，修复工作拖拖拉拉地搞了数十年。现在的工作实际上是象征性的。两个时代，两种文化进行着无声的斗争。根本无法分清谁是胜利者，更不知道谁最终将取胜。

在土耳其，现在当然有人更倾向于使圣索菲亚大教堂成为一块埋藏壁画上所描绘的那些神话、圣经故事等一切基督教东西的纪念墓地。同时，信奉基督教的那部分居民和欧洲的影响，又迫使当局在某种程度上考虑修复象征基督教的珍贵文物的愿望。

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围墙内所进行的这场不流血的搏斗是两种宗教的交锋。从整个情况看来，这场交锋即使说注定要结束，也不会很快见分晓。

^① 即奥斯曼帝国。——译者

总之，我们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看到的，一方面是建筑艺术上的伟大杰作、体现在石头中和石头上的戏剧作品、肃穆庄严的往事纪念碑；另一方面则是一种宗教世界观对另一种宗教世界观的“可怕的报复”。

我在土耳其访问期间，会见了当时的总统杰马勒·古尔塞勒、总理苏哈特·于尔后普吕、外交部长哈桑·伊西克，并同他们举行了会谈。会谈中实际上涉及到苏土关系各个方面的问题。土耳其领导人向苏联代表保证说，他们愿意在和平共处和睦邻的原则基础上发展同苏联的关系。

支持塞浦路斯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

同土耳其方面讨论国际问题时，必定会涉及塞浦路斯问题。我们坦率地对土耳其领导人说，苏联支持塞浦路斯人民在维护希土两族塞浦路斯人的合法权益的基础上自己安排自己命运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由于北约的某些集团对塞浦路斯内政的干涉，使那里的局势多次白热化，而围绕着塞浦路斯问题和同它毗邻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出现了多次危机。每一次都证明我们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立场是公正的和有远见的，因为这一立场是从塞浦路斯人民的利益和保障该地区和平的利益出发的。

塞浦路斯……多少次出访时，比如，去埃及或叙利亚和返回的途中，当飞机穿越地中海东部时，我都有机会欣赏这一岛屿。空中航线不经过该岛上空。如果由北向南飞时，它在右边，如由南向北飞时，则它在左边。但在天空晴朗时，整个岛屿都映入眼帘。

我想到，尽管塞浦路斯是个独立的国家，但岛上有英国的军事基地，就意味着有北约的基地。我又想到：这是一块不大的陆地，风景优美，四季绿荫覆盖，曾是古代文明的发源地。塞浦路斯是发掘出易碎的、同时又是极宝贵的古代文明遗物的地方。

数十年来，塞浦路斯问题始终是国际事务中的一个尖锐问题。联合国研究这一问题，个别国家也参加讨论这个问题。然而，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原因何在？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国家不愿意尊重这个小国的独立。在塞浦路斯保持英国的军事基地，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剥夺它的独立性，这就是居住在这个小岛上的人民的敌人企图达到的目的。如果北约的主要国家尊重塞浦路斯的独立，那么，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之间早就会找到共同语言了。在塞浦路斯以及围绕着塞浦路斯问题所发生的一切，只能称之为对这个小国的恣意妄为和横行霸道。

塞浦路斯的国家领导人为维护作为一个统一的、独立的国家的合法权利，也可说是这个国家的生存权利而进行的坚韧不拔的努力和采取的慎重做法，赢得的不仅仅是崇敬，而且还有钦佩。

苏联十分理解塞浦路斯领导人所面临的问题。这些领导人中为首的是一位反对英国统治的战士马卡里奥斯，他忠诚地服务于自己的人民，从1959年到1977年期间担任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可以毫不夸大地说，马卡里奥斯的^{名字}已成为为争取统一的塞浦路斯而斗争的象征，成为忠实于不结盟政策思想的象征。

每当你聆听塞浦路斯代表阐述国家领导人的立场时，就

会感到，只有石雕塑像才会对它当前的状况无动于衷。但是华盛顿、伦敦和北约其他国家首都对此始终采取无情的冷漠态度。

马卡里奥斯大主教领导塞浦路斯政府时的情况也是这样。无论是联合国宪章，还是国际法，什么都不能动摇西方国家的顽固立场。

这方面我想举一个典型例子。那是1974年5月我去开罗的一次访问。我们相互商定，我的访问同基辛格的中东之行同时进行，当时他在尼克松政府中担任美国国务卿。正如商定的那样，我们在塞浦路斯的首都——尼科西亚会面。这次会谈中我们讨论了一系列问题，包括塞浦路斯问题。

听了基辛格解释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之后，我再一次深信，华盛顿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政策的两面手法真是层出不穷。

我直率地问对方：

“美国政府是否支持塞浦路斯的独立和领土完整？”

美国国务卿转弯抹角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主要意思是，在不准把这个国家分成希腊和土耳其两部分，即把塞浦路斯分成两个国家的问题上，华盛顿将不采取任何行动。

基辛格在这次会见中说了不少主张继续寻求解决塞浦路斯问题途径的话，但他的一切谈话只是第一百次地重复美国政府代表在此之前说过的话而已。

他当然清楚，用任何时候都无法证实的一大串毫无意义的话来说服苏联是徒劳的。所以，他说了一段从表面上看来对塞浦路斯不偏不倚的冗长套话之后，焦急地期待着最好尽快把有关这个问题棘手难办的方面搁置起来，而在讨论会上

只是来回重复两三句陈词滥调，如“要继续讨论问题”，“不要刺激土耳其，它能自己解决问题”等等。

基辛格不止一次地用尖酸刻薄的语言来挖苦马卡里奥斯。他避免进行直接攻击，但那种表面上遮遮掩掩的、有时可称为甜言蜜语的攻击却明显说明，他本人和美国政府把马卡里奥斯视为某种奇特的反常现象。甚至塞浦路斯总统的宗教职称也成为露骨讽刺的话柄。从一切情况来看，华盛顿希望大主教只管教会事务。

美国国务卿和整个华盛顿当然都知道，历史上有过一些突出例子，说明教会领袖曾经领导并且长期地领导过世俗政权。只是当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浪潮深入到意大利纵深地区之后，教皇在国内的统治才受到削弱。梵蒂冈和意大利的历史华盛顿本是应该研究的。

如果有谁偷听了我同基辛格在尼科西亚关于塞浦路斯及其政府的那部分谈话，他可能会大吃一惊。无神论思想占主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支持塞浦路斯政府的领导人马卡里奥斯大主教，而宗教地位很高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却把这个大主教当作冷嘲热讽的对象。

华盛顿的这次表现也证实，对一个国家的内政不进行外来干涉的最高原则不符合美国的政策。看来，无论是高级的宗教职称，还是神圣的十字架本身，同美国和北约集团的经济、军事战略利益相比都是分文不值的。

基辛格和我分别与马卡里奥斯举行了单独会谈。我同他的会谈充满了友好的气氛。我代表苏联再次表示了对解决有关塞浦路斯问题的一贯立场。

基辛格同马卡里奥斯的会谈却再次表明，华盛顿特使和

塞浦路斯政府的首脑之间没有共同语言。这是意料中的事，因为美国及其北约伙伴关心的不是公正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而是维持它的危机状态。

从我们那次在塞浦路斯会见之后，又过了许多年，然而这个问题仍旧没有解决。而且，今天这个问题甚至比那时更难解决了。

1974年夏天发生的事件使塞浦路斯局势向坏的方面急剧转化。由于塞浦路斯发生了由当时统治希腊的军事集团操纵的反政府叛乱，土耳其借口保护土族塞浦路斯人，把军队开到岛上。塞浦路斯事实上被分为两个相互完全隔绝的部分。

过去和现在发生的所有这一切都违反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就塞浦路斯问题所作出的决议，违反该岛两族领袖在1977年和1979年达成的关于塞浦路斯未来国家制度的著名协议。这无疑使得公正解决问题的基础遭到破坏。

局势益趋严重是因为有人企图把符合帝国主义集团利益的解决办法强加给塞浦路斯人民。这些帝国主义集团没有放弃破坏塞浦路斯国家完整、甚至消灭这个共和国本身的计划，没有放弃把该岛变成北约的军事战略基地的计划。

苏联至今仍坚决反对背着塞浦路斯人民和违反他们的意志去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任何企图。我们赞成在无条件的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它的不结盟国家地位的基础上合理考虑该岛两族人民的利益和权利。我们赞成撤出外国在该岛的驻军。苏联主张在联合国范围内就塞浦路斯问题举行有代表性的国际会议，如这一建议付诸实施，将有助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公正解决。

俄罗斯的第一首波斯之歌

初看起来，这可能会使人感到奇怪。是的，但这种奇怪也仅仅是最初的一种感觉。关于伊朗，确切些讲是波斯——这个国家以前的正式名称——是我上小学念书时就知道的。我还知道，这个国家是我们的邻国。

大人们有时会哼唱一些古老动听的俄罗斯歌曲。而男孩子们与其说喜欢唱，不如说喜欢听这样的歌。

一天晚上，一阵歌声突然飘向四方，这是男声合唱，歌声清脆、动人：

小島前，河道中，
水面开阔，浪花翻腾……

我们都听得入迷了。

歌声令人感到主人公的蛮横和残暴，但他又无比勇敢。年轻的波斯郡主的命运激动人心。据歌中所唱，亲爱的伏尔加河从斯捷潘手中接过了这一受害者，将她吞噬了，这真让人遗憾。

回想起听过的这首歌，我陷入了沉思：

“我是否需要借此机会讲一讲那位波斯郡主的凄惨故事呢？”

本来是可以不讲的。但这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传说能世代流传并家喻户晓是绝非偶然的！

起先，它只是在其同时代的外国人中间口头流传，故事是枯燥无味的，断断续续的。后来，才以诗歌的形式传颂。萨马拉诗人萨多夫尼科维作的那首已流传了100多年的诗

歌¹即可证明。以后它被某个不知名的作曲家谱了曲，并开始成为一首民间流行的歌曲。

就连伟大的歌手夏里亚宾²也对那些曾在沙皇身边栖身任职的外国人捏造的谎言信以为真。并在一本30年代初在巴黎出版的谈自己创作道路的书《假面与心灵》中重复了这首诗。

美丽郡主那催人泪下的传说纯属虚构！它是由两个外国人——荷兰人斯特鲁伊特³和法布里齐乌斯⁴传播出去的。这两个人对哥萨克犯有严重的罪行，但是自由哥萨克的领袖斯捷潘·拉辛⁵宽宏大量，没有处死他们。这两个在当俘虏时吓破了胆的人，万分仇恨斯捷潘·拉辛和俄罗斯。回到荷兰多年后，他们分别写了各自的《回忆录》。在《回忆录》里，他们编造了许多中伤哥萨克首领的谎言，其中包括那相互矛盾的“郡主溺死”事件。一个人说这是发生在伏尔加河上，另一个人却说是在亚伊克河（现乌拉尔河）上。他们甚至都不会事先商量一下。

实际上，斯捷潘根本就没有俘虏过什么“波斯郡主”。当然，也就不可能将她抛到那“滔滔急流”中去。有个外国人曾宣称，那个郡主就是沙本汗的妹妹。的确，许多历史资

1 该诗作于1883年。——原编者

2 俄罗斯男低音歌唱家，共和国人民艺术家（1918）。俄罗斯现实主义表演艺术的杰出代表。——译者

3 荷兰旅行家（1630—1691），17世纪60年代末曾到俄国。拉辛攻占阿斯特拉罕的目睹者。——译者

4 荷兰画家（1622—1651）。——译者

5 1670—1671年俄国农民战争的领袖。1670年春领导“哥萨克战争”。后被哥萨克上层出卖给沙皇政府，在莫斯科被杀害。——译者

料都证实，拉辛确实俘虏过这位汗。但在拉辛放他回去后，他在给波斯国王的冗长的呈文中根本就没有提及他的亲妹妹被俘虏一事。拉辛那个时代的任何资料，无论是哥萨克首领那里的，还是莫斯科君主那里的资料都只字未提什么外国郡主，而这方面的材料^①保存得并不少。

在红场断头台上处死斯捷潘·拉辛的刽子手同样没有提到这件事。就连那亲自编造“罪行录”和签署对哥萨克首领处以极刑的判决书的人，也未敢把“郡主溺死”这段无耻的谎言记录在案。

并不是很多人都知道，杰出的自由哥萨克首领在当时是有文化的人，通晓几门外国语。正因为他有这一武器，所以莫斯科君主曾多次派遣自己的使臣和翻译斯捷潘·拉辛一起去和自己的东方邻国谈判。

虽然斯捷潘·拉辛建功立业的年代距今已经300多年了，然而，我们的人民，不管是哪一代，都始终深切地缅怀这位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

英雄血洒断头台，贡献终生为人民。因此，不是别人，正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弗·伊·列宁1919年在莫斯科斯捷潘·拉辛临时纪念碑揭幕式上，赞扬了他。伊里奇说：

“这个纪念碑就是纪念一位起义农民的代表人物的。他为了争取自由，就在这个地方献出了头颅……我们要竭尽全力来达到这一伟大的目标，实现社会主义。”^②

值得注意的是下列事实。

① 旧切尔卡斯基历史建筑文物保护区博物馆研究员M·阿斯塔宾科就这个题目进行了研究。见《顿河》月刊，1981年第11期。——作者

② 《列宁全集》1963年中文版，第19卷，296页。——译者

……有一次与米哈伊尔·肖洛霍夫谈话时，谈到了《静静的顿河》中的主人公葛利高里·麦列霍夫，我问：

“象葛利高里·麦列霍夫这样独特的人物形象您是怎样找到的？”

他坚定地说：

“我是取材于我们自己的历史。这也是由顿河哥萨克哺育的斯捷潘·拉辛。不过不是17世纪的拉辛，而是20世纪的拉辛。”

我认为，这一回答意味深长。如果从整个既悲惨、同时又充满浪漫色彩的故事中作出基于事实的无可争辩的结论的话，那么很自然，它只能是：

“不是虚构的郡主，而正是斯捷潘·拉辛本人越过几个世纪来提醒人们不要将他忘怀。”

但几乎每一次，当我会见伊朗国内地位不同的人士时，我脑子里总是回忆起我早在少年时代就听过的那支歌曲的情节。那是一支赞美波斯郡主和光荣的哥萨克领袖的歌曲。

关于现在的伊朗及其政策，我想，从下面这些事情讲起，这些事情发生在远离伊朗领土数千里之外，并大大早于我第一次见到其统治者——伊朗国王之前。

事情发生在纽约。刚刚成立的联合国已经开始工作，我当时是苏联驻联合国的正式代表。

当时，在伊朗北部驻扎着苏联军队。它们是在战争期间出于安全考虑被派驻到我们邻国的那个地区的。因为希特勒分子曾觊觎过伊朗。

当然，苏联在解决自己的驻军问题时不可能不考虑其他一系列因素：英国在伊拉克和印度设有基地，在苏联国土周

围有大量的美军基地，更不用说驻在波斯湾中的英国海军了。战争结束后苏联曾宣布，其军队将在伊朗滞留一段时间。

一时间，掀起了一股反苏恶浪，结果这一问题提交到联合国安理会上讨论。这正是华盛顿和伦敦意欲所为的。

当时还没有联合国现在这座大厦。它的一些机构就分布在纽约市的一些临时建筑物里。其中，安理会是在布朗克斯区的一幢楼里举行会议的。

我得到了莫斯科的指示：如果这个问题要提交安理会讨论，那么就应该声明，我们的军队留在伊朗是以防不测。

听完我的解释后，那些提议讨论的人就在会议上直接向我发问：

“你们的军队要留在伊朗的借口是以防不测，请问，这是指的什么？”

我的回答是：

“以防不测是因为局势未卜，无法预测。”

听众席上传来了暴风雨般的掌声，这是我始料未及的。这意味着，那些只为来观看安理会会议如何进行的普通美国人，甚至就是各国代表，都能理解苏联的立场。因为这一切毕竟是发生在全世界都在感谢苏联在战胜法西斯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的时候。

西方国家操纵了那时还尚能起作用的表决机器，到底还是达到了目的，对这个问题开始进行实质性的讨论。我起身，离开了会议大厅。一个大国代表为抗议讨论他所不能接受的问题而退席，这在联合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伊朗国王

这个身材不高、肤色黝黑的人曾多次访问过莫斯科。当你对他有进一步了解后，就会知道，他是个颇有学问的人。数十年来，他不仅决定着这个邻国的对内政策，而且也决定着它的对外政策，他就是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

众所周知，他是在其父礼萨·汗·巴列维1941年9月退位后登基的。他的父亲早年曾在驻守波斯的俄国哥萨克团里担任中校。1925年国内发生政变，伊朗众议院遂将他推上国王的宝座，那次政变后，在国内确立了资产阶级地主专政。

如果不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那不甚光彩的下台，那么对他应如何评价呢？他及其周围的人都明白，伊朗的北方邻国是一个不管伊朗领导人喜恶而必须与之保持适当关系的国家。而有时恰恰是伊朗方面越过了这一关系中适当的界限。

促使苏伊关系能始终保持一定水平的方式之一就是伊朗国王对莫斯科的多次访问。关于这些访问可以这样说：强调睦邻关系，但戒心甚大，疑虑重重。

……伏努科沃机场。伊朗国王的座机刚刚着陆。

在机场迎接他的有列·伊·勃列日涅夫及其他官员，其中有作为外交部长的我。

与国王的会谈颇不轻松。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得知，伊朗已开始从其他国家，主要是从美国那里得到数量可观的武器，而且主要是重武器——坦克和飞机。

我们决定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正式会谈时坦率地与国王谈

谈这个问题。列·伊·勃列日涅夫阐述了我国的立场。在他的提问里表达了我们的主要担心：

“伊朗要那么多武器干什么？因为它无需和别人打仗。它的邻国苏联愿意与伊朗保持睦邻关系。现行的苏伊条约同样能够保证我们两国和平与睦邻相处。”

我们苏方参加会谈的全体人员都仔细地听取了国王认真准备好的回答。他回答的含意是：

“伊朗领导人和国王本人对其北方邻国是充满善意的。伊朗绝不反对苏联。”

使苏联领导人十分警觉的是，国王及其宫廷中的众多奸臣千方百计寻找机会来动摇源远流长的苏伊关系的基础。他们不太尊重1921年由列宁倡导签署的、并由此奠定了两国牢固的睦邻关系基础的苏伊条约。顺便说一下，正是遵照该条约第6条的规定，苏联军队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驻伊朗的。鉴于存在着第三国企图对伊朗实行侵略政策或利用伊朗作为进攻我国的跳板的可能性，双方商定，如果伊朗政府在接到苏联政府的报警以后，自己无力防止这种危险时，“苏联政府有权把自己的军队开入波斯境内，为了自卫而采取必要的军事措施。”

我还记得，1974年伊朗国王访问莫斯科，在临上飞机前他问我：

“葛罗米柯先生，您什么时候能正式访问我国？”

然后又略带责备地补充道：

“我们已不止一次地向您发出邀请了。”

我回答：

“很遗憾，现在我无法回答您。应该考虑一下时间。”

看来，我的这一回答是恰当的，特别是后来，情况有了变化，再回过头来看也是合适的。

后来，这位头戴国王王冠的人仓皇逃出国外，成为一名流亡者，他的时代也就此结束。我们苏联对此并不感到遗憾。我们真诚地欢迎伊朗革命，并从不掩饰我们希望与伊朗保持友好的、也只是友好的关系。

阿富汗：结束外来干涉

在革命的彼得堡上空高高飘扬起十月革命的旗帜后不久，苏维埃共和国和阿富汗这两个邻国相互伸出了手，建立了外交关系。

苏维埃俄国从政治上和物质上支持阿富汗巩固民族独立的斗争，这是阿富汗人民战胜英国殖民者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们的斗争几乎持续了一个世纪。所以从那时起，苏联和阿富汗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传统的睦邻关系，这是绝非偶然的。

当我开始考虑，该如何谈我对阿富汗的印象时，我感到很棘手。倒不是由于有关10年来我与阿富汗国务活动家会见的实际材料不够，更不是因为近年来在阿富汗及围绕着阿富汗局势所发生的问题太少。

这是另一方面的困难。由于头脑中积累了丰富的材料，因而必须从中挑选出能使读者感兴趣的一小部分，而不是人所共知的这个国家生活中所发生的那些重大变化。

……就这样，我来到了喀布尔。时间是在这个国家革命

前。在王宫豪华的办公室里，国王查希尔·沙阿^①坐在办公桌旁。这是一个身材高大、很有风趣、颇有修养的人。他知道，就他看来，与外国人士谈话从何开始为好。从各方面看，他的谈话是有准备的。

互相寒暄之后，双方强调了这样一个基本思想：苏联和阿富汗是邻邦，两国没有理由不友好相处。查希尔·沙阿的先辈们也深知这一点。

国王高度赞扬了苏联维护和平的外交政策。我想指出这样的事实，即国王不愿涉及他国内的局势问题。这也不奇怪，因为无论是他，还是他的政府都不研究实际的经济问题，包括工业和农业问题。他们实质上也不研究千百万人民关心的社会问题。此外，由于业已形成的部落的社会制度，国内又缺乏必要的资金和资源，使国王以及政府失去了积极干预国家经济生活的可能……

与阿富汗其他高级官员的谈话给我留下了同样的印象。

与阿富汗人士在莫斯科的会见的內容也差不多。这些会见曾有过不少。在那时，苏联就已向阿富汗提供经济援助。

在各个级别上的所有谈话都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苏联和阿富汗应该将相互的关系建立在严格遵守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上。

每次都是苏联提出要强化这一观点。而阿富汗方面作为答复，对苏联领导人采取这种明确的立场表示感激，称苏联的这一立场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又符合阿富汗保持独立的愿望。

^① 1933年11月—1973年7月阿富汗国王，1973年7月17日废除君主专制并宣布阿富汗为共和国后，8月12日退位，现侨居国外。——译者

时至今日，阿富汗革命已经快有10个年头了，然而某些西方人士还说，好象苏联要把阿富汗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这简直是对本国人民，也是对阿富汗人的欺骗。这种欺骗显然是因为他们想继续粗暴地干涉阿富汗的内政，甚至进行武装干涉。

按照帝国主义集团的意志目前正在以武装斗争的方式反对国内现政权的人们，完全是依仗巴基斯坦军人政权和那些帝国主义集团的直接支持。苏联曾十分坦率地提请巴基斯坦领导人注意自己所执行的路线的危险性。

苏共中央总书记米·谢·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时曾就这一问题直接提请他注意。

很难统计出西方国家人士与巴基斯坦代表会谈的次数。巴基斯坦代表的态度是阻挠阿富汗领导人宣布的在民族和解政策的基础上解决阿富汗问题。在举行这些会谈期间，西方国家代表则坚持不友好的，有时甚至是露骨地仇视阿富汗的立场。

他们的论据是站不住脚的。他们宣称，反对阿富汗政权的斗争只能在有限的苏联军队全部撤出阿富汗后才能停止。虽然，众所周知，只是为了帮助邻国才派驻这有限的军队的。

西方国家所坚持的路线实际上已经堵塞了在民族和解的基础上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道路，使阿富汗不能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不结盟的国家，使外来干涉无法停止。

苏联支持阿富汗领导人提出的旨在实行民族和解、使阿富汗成为一个独立、不结盟国家，停止外来干涉的政策。这政策赢得了世界上的广泛理解。

圣雄甘地突然萌发的思想

好像是历史的有意安排，苏联和印度这两个国家彼此相隔不远。两国都执行爱好和平的政策。这一点本身就对整个国际局势产生巨大的影响。

苏联和印度共和国之间有着多方面的关系。这是两国共同努力的直接结果。双方渴望睦邻交往和合作，这已形成为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

早在罗斯公国的编年史资料中就有过关于印度的记载。俄国人很早就向往了解这个国家，向往同这个国家的人民发展关系。15世纪下半叶特维尔^①商人阿法纳西·尼吉丁，曾去印度旅行，他将自己沿途的旅游见闻写成了一本珍贵的文学历史文献——《三海纪行》游记。

18世纪俄罗斯杰出的教育家、学者米·瓦·罗蒙诺索夫建议政府与印度建立贸易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788年就出版了俄文版的古印度哲学思想文献——《薄伽梵歌》^②。

同样，印度人对俄国的社会和文化生活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印度的民族爱国力量，特别是其领袖提拉克^③和圣雄甘地都极其关注俄国进步思想的发展。

深厚的相互尊重之情同样洋溢在圣雄甘地和列·尼·托

① 现苏联加里宁市，1931年前的旧称。——译者

② 古印度论述宗教和哲学思想的著作，是《摩诃婆罗多》第6卷的一部分，产生于公元前10世纪中期，是印度教的哲学基础。——译者

③ 印度民主主义者，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印度国大党左翼领袖。号召用一切手段（包括暴力）同英国殖民者作斗争。——译者

尔斯泰的往来书信中，我不由地想起一件事，那是我1955年第一次访问印度。当我在旅馆里安顿好后，我问好客的主人：

“能否给我带几本当地的书来，我可以在正式活动之余读一读，或至少是翻一翻。”

书拿来了。其中竟有一本圣雄甘地的自传。

我抓紧时间，浏览了一遍，竟看到了一个令人很感兴趣的情节。

作者写道，有一天他坐在火车上，读列·尼·托尔斯泰的作品。他的脑子里突然出现了这样一个念头：这位伟大的俄国作家向人们提出了“勿以暴力抗恶”的呼吁，为什么不照着他说的去做呢？可以说，是托尔斯泰推动了圣雄甘地去形成他的非暴力主义的印度哲学思想。关于这一点，甘地在自传中坦率地写到了。

伟大的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有力地推动了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其中也包括印度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汹涌浪潮。印度的民主人士对十月革命欢欣鼓舞。

苏维埃国家的缔造者弗·伊·列宁以其天才的洞察力预言，东方各国人民定能获得独立，“作为独立的参加者和新生活的创造者而奋起”，并参加“解决整个世界的命运”。他强调必须向印度和东方其他各族人民伸出兄弟友谊之手。

苏维埃国家坚定不移地声援印度人民争取自由和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斗争。1947年，印度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诞生了，苏联对此表示欢迎。同年，苏印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还在印度成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初期，圣雄甘地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观点对印度对外政策的总方向就有着很深刻的影响，他们都是争取独立斗争的中流砥柱。

我和圣雄甘地没有见过面。1948年，他惨遭凶手杀害，此事件全世界为之震惊。我受莫斯科委托，在联合国安理会表示了我們深切的慰问。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在新德里、莫斯科和纽约——联合国总部，我曾多次见到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我坚信，这是一位杰出的人物。他才智卓越，是著名的政治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首先引人注意的是他的博学多识。当他在捍卫自己的哲学思想和政策时，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他对殖民主义怀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也正是他对国际局势评价的依据。

我曾在不同的场合，即在群众集会上发言时，在举行政治会谈时；对尼赫鲁进行过观察。在联合国大会的一次会议期间我和尼赫鲁曾有过一次密谈。

在群众大会上，他是一位政论家。他不是靠自己的嗓音高低与音色的优美，不是靠手势，而是靠富有逻辑性的分析和深邃的思想征服了听众。我有幸出席了一次有几十万印度首都居民参加的群众大会。大家聚精会神地聆听尼赫鲁的每一句话。讲演者所讲的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用形象而精确的语言表达出来。他在讲话中严厉谴责帝国主义，并号召加强同苏联和苏联人民的友谊。尼赫鲁特别强调指出，印度的未来将有赖于和平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和平合作。数十万群众对其总理的讲话反应十分热烈：当他谴责帝国主义时，群情激愤；当他谈到同苏联的友谊时，全场欢腾。

同尼赫鲁的谈话总是在一种无拘无束的气氛中进行的。他不滥用华丽的辞藻，不感情用事。他的谈话风格可以概括为：平稳而审慎。他将各种论据贯串起来，用以证实自己的思想和意见的正确。很清楚，此人不喜欢不成熟的意见，他的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似乎是他从过去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

尼赫鲁几乎从不事先准备书面发言稿。比如，我就不记得有过类似的情况。他能即席发表讲演，运用自如地选择能表达自己思想的言词和语汇。然而这些带有一定结论的即席发言，象他这样有影响的政治家往往都是事先经过思考的，有时则是终生思考的。

命运使尼赫鲁习惯于单独思考问题。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他多年被监禁在单间牢房里，这一习惯还是在那时养成的。他在监狱的层层大门里度过了十多个春秋的铁窗生活。有时在谈话过程中他会突然沉默不语，眼睛半睁半闭，一动不动地坐着，仿佛陷入了沉思之中。他的这一特殊习惯恐怕也与他那残酷孤独的监狱生活的经历有关。

尼赫鲁过去所经历的严酷的监禁、沉重的负担和极度的贫困，磨炼了他的意志。殖民主义者始终也未能使他屈服。从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时期的生活经历中，尼赫鲁继承了平心静气和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印度一获得独立，他就立即豪迈地承担起领导整个印度的重任。印度人民在其精神导师圣雄甘地惨遭杀害之后，怀着一种更加崇敬和爱戴的心情对待自己的领袖。尼赫鲁曾坦率地说过，这一点给了他很大的支持。

在和他的谈话中有这样一个细节也引起了我的注意。尼

赫鲁不仅不回避那些著名活动家往往不愿意研究的具体问题，反而总是对其怀有很大的兴趣，并力求深入钻研。例如，鉴于联合国内部机构繁多，且其职能各不相同，他详细了解过联合国内部的结构，以及该组织内如何通过决议。他毫不掩饰自己有兴趣搞清这些问题。然而，与此同时，他对这一事实也不表示任何怀疑，即联合国的内部机构及其整个活动机制都是经过周密考虑的。苏联在这个机构的作用他是很清楚的，并给予了应有的评价。

尼赫鲁清醒地意识到，随着核武器的出现，世界面临着坚决禁止核武器的任务。印度领袖的想法是，人类应当找到解决这一重大问题的办法，这正是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立即建议的——永远禁止这一武器，并保证原子能只用于和平目的。

1955年11月尼赫鲁在德里与苏联代表团所说的一席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代表团是由尼·阿·布尔加宁和尼·谢·赫鲁晓夫率领的，我是代表团成员。

赫鲁晓夫在谈到当年夏天在日内瓦举行的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领导人会议的成果时说：

“‘冷战’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尼赫鲁认真地听着他的讲话，然后说：

“我想提醒你们不要过分乐观。”

他的脸上浮现出镇定的微笑。然后他补充说：

“‘冷战’还会出现。”

这位印度国务活动家就是这样估计当时形势的，因为他非常了解当时在西方大国政治航船上把握方向的人们的习性。

1960年10月，在联合国大会上讨论苏联关于铲除殖民主义的建议时，尼赫鲁关于要维护各国人民自由和独立的呼声很有分量和权威。联大终于通过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这是我国提出的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

尼赫鲁作为不结盟政策的奠基人之一而载入史册。该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忠于和平事业，争取各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一律平等，不容许任何形式的新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

克里希纳·梅农热情洋溢的讲话

当国际生活又一次处在十字路口时，我见到了克里希纳·梅农。他是圣雄甘地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战友，一位著名的、有自己特色的印度政治活动家。

在印度取得独立以后，深得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信任的梅农担任了一系列政府要职。1947—1952年间，他任印度驻伦敦高级专员，从1956年起担任不管部部长，尔后从1957年到1962年任国防部部长。

梅农曾多次率领印度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他成功地代表了印度，很好地捍卫了它的利益。

我第一次认真地了解这位活动家，还是在联合国讨论所谓克什米尔问题的时候。他在安理会上的发言，以及他为了阐述印度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好和平的国家所执行的政策而引用的论据，犹如利剑击败了对手。

那时，我和梅农有过数十次的会面，因为克什米尔问题一连讨论了好几个月，我和其他苏联同志立即就注意到了这

位政治家所抱有的坚定信念：即他所维护的事业是正义的。

我们还明显地感到，梅农对苏联友好。他很清楚地意识到，一个独立的印度得以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取得了战胜法西斯德国的伟大胜利。因为有头脑的人都明白，一旦法西斯德国在战争中取胜，那么，殖民主义者给许多国家人民戴上的镣铐将会变得更加沉重，因为法西斯已为全人类准备好了一副奴隶制的枷锁。

梅农激动地说：

“您无法想象，印度人民过去和现在是多么憎恨英国殖民主义者的！”

当他谈到这些话题时，他的两眼好似烈火在燃烧。任何一个同他谈话的人都会明白，他与自己的人民息息相通。

在与我的历次谈话中，梅农从不掩饰，他始终反对国际事务中的帝国主义政策。他正确地认为：

“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是一对双胞胎。因此，帝国主义大国同时又是殖民主义国家，这决非偶然。当然，不是所有的殖民主义国家都是大国，但所有资本主义大国一定是或曾是殖民主义国家。”

梅农坚决批驳了那种认为似乎不应把美国看成是殖民主义强国的观点。他很有根据地指出：

“请看看波多黎各和菲律宾这些至今仍未最终挣脱美国殖民主义枷锁的国家吧！”

他接着补充说：

“美国资本家经济上剥削落后国家的方法同样是残酷的。”

梅农对这些问题以及整个国际政治问题的看法，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外交官都是十分清楚的。所以，他们对他极尽报

复之能事。在这方面，西方新闻界也十分卖力。捏造出各种各样的谎言来诬蔑梅农。这些谎言有时是遮遮掩掩的，有时是赤裸裸的，在美国的报刊上几乎就没有停止过；英国报刊比它们也不落后。

在这种环境中要完成自己的使命，对梅农来说，谈何容易。然而，他经受住了考验。他在联合国，包括在安理会上的发言，都是长篇大论，这也使他心力交瘁。在一次这样的发言后，他过度疲劳，倒下了，最后用担架把他抬出会议大厅。

在讨论国际政治问题，包括欧洲问题时，梅农表达了自己政府的意志，坚决反对重新武装西德。这一观点代表了一种清醒而果敢的立场，它为独立的印度争得了声誉。

这位活动家在历次国际会议上所主张的一切，都是对印度今天仍坚定奉行的政策的重要贡献。印度今天仍是不结盟运动中的最有影响的国家之一。这一政策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的尊重，尽管反对者也不少。我想起，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当年谈到这一政策时说：

“不结盟的政策是不道德的。”

在大洋彼岸至今仍经常使用这一术语。公正地讲，不道德的到是那些给光明磊落的不结盟政策以及执行这一政策的国家扣上不道德帽子的人；不道德的还有那些至今仍继续对不结盟运动挥舞这顶帽子的人。要知道，现在参加这一运动的国家在全世界足有上百个。

关于梅农曾流传过不少故事和笑话。比如，我曾听说，他大概是有意要锻炼自己，故睡觉不用床垫、被子和枕头。有一天在喝茶时，我问他：

“那些新闻掇客关于您的传说是真的吗？”

“哪些传说？”他问我。

“比如，说您睡觉时不要床垫、被子和枕头。”

他笑起来，然后说：

“当然，真的。在我们印度成千上万的人都是这样睡觉。”

当时，他谈笑风生、情绪甚高，他开始给我解释说：

“我感到最不适应的是当我出差时，需要住在美国旅馆里。我一走进房间就说：‘把床上的东西全都拿走。’别人总是无法理解我。所以，我只好亲自动手把房间里弄得乱七八糟，这使得旅馆的工作人员大为惊讶。”

与梅农的会见和谈话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他是一位出色的辩论家，同时又懂得幽默。

近几年，梅农不再担任官方的职务。但他作为全印和平委员会主席，仍然起着积极的作用。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在独立的印度，他可称是一位与众不同、才能超群的政治活动家。

印度的伟大女儿

英迪拉·甘地……在我们苏联，她是印度的化身。印度是一个积累了数千年智慧、而又面向未来的国家；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而又在不断追求美好理想和永葆青春的国家；一个表面沉静而古朴、但实际上却充满活力和不愿屈从邪恶、暴力和压迫的国家。印度是一个已经摆脱英国殖民主义压迫、已建立起新的生活、并且在国际舞台上疾呼反对军事威胁的国家。印度也就是苏联人对之怀有传统友谊和尊敬之情的国家。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英迪拉·甘地在苏联享有盛名和受到

深切爱戴的原因。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种友好的态度都扎根于人民之中。在我国各个不同地区，父母亲为新生的女儿取了我们从前陌生和不习惯的名字——“英迪拉”，这种情况屡见不鲜。

我个人有幸认识英迪拉·甘地，在莫斯科、德里和纽约都同她见过面。每次会见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位妇女身体纤弱，她步态轻盈，面带坦诚而温柔的微笑，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头发中露出一缕银丝。然而，就在这样一位妇女身上却可以感到一种巨大的意志力，聪颖的头脑和坚强的性格。

她很富有魅力，善于引起对话者的好感，能从一开始就给谈话确定所需要的基调。她从不追求表面效果。但同她的每次会见都会保留在你的记忆中，同她交往总会使你感到，同你打交道的是一个精明细致、分析力很强、且有高深文化修养的人。

我不止一次地同她谈过话。她谈论问题冷静沉着，不论是谈内政问题、苏印关系，还是国际局势问题，她都能做出精辟的分析。她还具有一种谈话技巧，对所讨论的问题，能用精确的语言，有时甚至用格言点出其最令人感兴趣的焦点。她每次都能抓住主要的，舍弃非本质的东西，提出正确的、合乎逻辑的解决办法。

我不止一次听过英迪拉·甘地对各种不同听众发表的讲话。在印度，人们高度评价她的演讲艺术，她的话能深深打动听众的心。

我读过并比较过英迪拉·甘地活动初期及以后年代里的讲话，可以说，区别就在于涉及问题的范围在不断扩大。在

多年担任总理职务期间，她获得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这对任何一个从事复杂国务活动的政治家来说，都是很有帮助的。但从她踏上重要的国务活动家之路开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对生活和对印度的未来始终抱有坚定不移的信念。

今天回忆英迪拉·甘地，就意味着要回顾往事，思索一下她的国家的悠久历史。

她热爱自己的祖国，对她来说没有祖国，是不可想象的，她醉心于祖国的革新事业。从青年时代起，她对人民的苦难就有切肤之感。

她从师于睿智的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¹。在他的帮助下，她领悟了祖国极其丰富的历史和特点。

独立印度的第一任总理、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对自己女儿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没有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正如尼赫鲁自己所说，研究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帮助他用新的眼光认识当今世界。尼赫鲁把实现崇高的、博爱的理想同争取社会和政治自由，争取个性和人民自由的斗争同发展民族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尼赫鲁努力把对世界的这一认识传给自己的女儿。

她在许多方面象她的父亲。象尼赫鲁一样，她用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来衡量自己的思想。她生于1917年11月19日，就在我国发生革命变革几天之后。她喜欢称自己是伟大十月革命的同龄人。

她象冷静的、勇敢的尼赫鲁一样，不喜欢感情外露。她表达思想一般都是言简意赅。我曾经多次注意到，她宁可少

¹ 印度人道主义作家和社会活动家。——译者

说，也不说过头话。但是，她表达的所有意见，都是很有分量的。我认为，她的这种矜持的态度来自于印度妇女所固有的和天生的谦逊。她似乎体现了她祖国的妇女所特有的一切优秀品质。

尼赫鲁为主权国家印度的爱好和平的政策奠定了基础。英迪拉·甘地是她父亲和政治导师当之无愧的继承人。这种继承性要比简单的家庭传统具有更多的含义。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英迪拉·甘地和拉吉夫·甘地的家庭是个不寻常的家庭，是产生为国家独立而奋斗的杰出战士和自由印度领袖的家庭，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个家庭在世界上享有盛名，这个家庭体现了世界最古老的人民之一——印度人民的优秀品质。这就是爱好和平和富有智慧。

可以肯定地说，在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之后，她的女儿将在独立印度的历史上占据应有的地位，这样讲，毫无夸张之意。英迪拉·甘地竭力使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完全自立，保持和发展其最古老文明的丰富遗产，同时又摆脱贫穷落后、过时的结构和传统的重负。

在她领导印度政府15年多的时间里，印度基本上达到了粮食自给，工业生产开始蓬勃发展。这些已不是秘密。在英迪拉·甘地的领导下，由于执行独立发展的方针，印度成了为数不多的外国资本在国家建设拨款中只占微小比重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因此，回顾过去，才能更强烈地感到今天印度所发生的新变化。

今天缅怀英迪拉·甘地，就是要看到，在这个妇女的领导下，由于全民族的努力，这个大国现在发生了巨大变化。

印度的成就是众所周知的。这里想特别指出英迪拉·甘

地在发展苏印关系方面所起的作用。她一贯主张两国友好合作。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当德国法西斯背信弃义入侵苏联时，英迪拉·甘地就坚决支持苏联人民的斗争，并成为“苏联之友”协会的积极参加者之一。她第一次来苏联是1953年，尔后她不止一次到过莫斯科和我国其他城市。由于签订了苏印和平与合作条约，两国关系达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这同她的名字是紧密相联的。

我有幸成为这一事件的直接参加者。当今天回忆起1971年8月那些炎热的日子时（当时我受权代表苏联在条约上签字），我不能不指出，这个文件不仅在我国和印度，而且在我们两国以外，得到了人民广泛真诚的支持。少数人反对苏印友好的微弱声音就在那时听起来也不能令人信服。

许多年过去了。这个条约带来了可贵的实际成果，现在这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明显，它对国际形势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个条约着眼于未来，确定了苏印合作的原则方向。

对英迪拉·甘地来说，同苏联的合作绝非权宜之计。她多次强调，在印度困难的日子里，苏联总是站在印度一边。

在条约签订以后的年代里，我们两国共同走过的道路的特点是，在各个领域中的合作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种双边合作表现为：在关键的经济部门签订了几十个新的合作项目；贸易的发展规模大、速度快；共同进行的科技设计效率高；文化、科学、卫生、教育、旅游和体育领域的交往积极活跃。两国领导人经常接触对整个苏印关系的顺利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在印度方面，这种接触是由英迪拉·甘地来进行的。苏印之间经常进行高级对话，并且总是卓有成效的。

印度人民渴望发展同苏联的友谊是世界社会主义同民族解放运动力量联合的光辉典范。米·谢·戈尔巴乔夫曾指出：“伟大印度领导人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英迪拉·甘地的名字将永远留在人民的记忆中，永远同印度的历史、同世界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

今天缅怀英迪拉·甘地，也就是展望人类的未来。

她的理想是和平，永恒的和平。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她为反对战争所做的巨大而积极的贡献。甚至单从她在这方面的活动来看，就可以大胆地说，她是当代一位伟大的国务活动家。她在印度总理这个崇高的岗位上孜孜不倦地工作，这仅仅是她忘我生活的一个侧面。然而，恰恰有必要突出这个侧面，因为印度始终不渝地奉行的爱好和平的政策在战争与和平力量在全球范围内的较量中，已经并正在继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英迪拉·甘地为和平、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所进行的积极活动是有目共睹的。她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反对鼓吹核狂热和军备竞赛的理论，无情地揭露剥削和不平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这些，人民将永志不忘。

她在外交和对外政策方面的工作非常具有建设性。她的功劳在于，就防止核战争、裁军、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冲突、缓和紧张局势、在公正和平等的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等问题，她提出了一系列倡议。不妨回忆一下，1984年5月，六国领导人向核大国发出呼吁引起多么广泛的反响，英迪拉·甘地就是其发起人之一。

英迪拉·甘地在第三十八届联合国大会上讲道：“没有今天的和平就不会有明天的生活。”她能明辨独立印度的敌

友，知道和平的威胁来自何方，也知道同谁联合可以对付这种威胁。这就是为什么她的政治信念永远是反帝，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民族压迫、种族压迫和经济压迫。

英迪拉·甘地享有崇高的个人威望。杰出的个人品质使她能跻身于当代世界主要政治人物之林。所以，不结盟国家推英迪拉·甘地任总理的印度为这一运动之首脑，不是偶然的。

英迪拉·甘地的生活充实而又丰富。作为不结盟运动主席而进行的活动，在她的生活中占有特殊位置。不结盟运动各方面工作的主导思想是加强其团结，提高它作为争取和平与缓和，恪守反帝、反战原则重要因素的积极作用，这些原则是不结盟运动的原始基础。

英迪拉·甘地逝世后被授予“加强各国人民和平”列宁国际奖金。这件事足以说明对她活动的高度评价。1985年5月，在莫斯科把这一奖金获得者的金质奖章和证书转交给她的儿子和继任人拉吉夫·甘地总理。这表明了国际上和苏联公众对印度人民优秀女儿的深厚敬意。

她清楚地知道，印度人民的敌人在酝酿谋杀计划。她在最后几年发表的讲话中经常流露出对国家局势和自己生命的担忧。想从肉体上消灭她的阴谋不止一次地被揭露出来。但英迪拉·甘地没有被吓倒。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都把实现自己终生选择的方针视为自己的公民义务。

尼赫鲁在狱中写给女儿的一封极其深刻和感人的信中表示，希望她成长为印度一名勇敢的战士。她就是象一个战士那样牺牲的，牺牲在战斗的岗位上，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

英迪拉·甘地是国立莫斯科大学的荣誉博士。离这所大学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苏联首都新辟的广场。这里矗立着这位著名妇女的纪念碑，大理石上刻着“纪念英迪拉·甘地”。纪念碑附近有一行半圆形的白桦树。坐落在旁边的“大学”旅馆的大楼墙上有块牌子，上面写着：“英迪拉·甘地广场。1985年为纪念印度杰出的国务活动家、苏联的挚友英迪拉·甘地（1917—1984）而命名。”

岁月在流逝，树木会长大，街道会变样，变得更繁华。但是，这个广场将在这里永存。它已与城市的面貌融为一体，成了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同苏印友谊已经有机地渗入两国伟大人民的民族意识中一样。我国人民将永远铭记刻在莫斯科白桦树丛中花岗石上印度伟大女儿的名字。

拉吉夫·甘地的话

英迪拉·甘地的儿子拉吉夫·甘地成了她的继任人，出任印度总理和印度国民大会党（英）¹主席。他在最初的讲话中就重申：

“印度共和国忠于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英迪拉·甘地所奉行的独立自主与爱好和平的对外政策方针。”

在这些讲话中，他还强调：

“印度珍视同苏联已形成的友好关系。这种关系得到了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和全体人民的广泛支持。因此，今后对进一步加强同苏联的关系将给予极大的重视。”

¹ 印度国大党（英迪拉·甘地派）是印度执政党，联合了英迪拉·甘地政策的拥护者和追随者。——原编者

他还讲过这样一句话：

“让我们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巩固和卓有成效地发展。”

苏联人民对印度人民为加强国家安全和统一，解决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所做的努力伸出了同情之手。在拉·甘地就任印度总理时，苏联部长会议在其贺电中指出：“您可以确信，苏联准备在印度进一步加强自己的经济、提高自己的国际威望方面给予支持。”

1983年7月，我同拉·甘地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会谈。当时他是作为印度国大党（英）总书记和印度议会代表应苏联议员团的邀请而访问苏联的。

我们的会谈是在诚挚的气氛中进行的。他虽然年纪较轻，但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是一位知识渊博，眼界宽广的政治家。

会谈期间，我们在评价当代国际局势及其严重尖锐化的原因方面有许多相同的看法。我们还满意地指出，苏印在下面一些问题上观点是接近的：即在现在的条件下，停止军备竞赛，防止核灾难，巩固普遍和平的基础等问题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我代表苏联领导强调指出：

“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提出了广泛的爱好和平的建设性意见，并准备同一切致力于巩固国际安全的力量，其中当然包括为和平做了不少努力的印度，联合起来一道努力。我们高度评价印度对苏联有关对外政策倡议的支持。”

拉·甘地这样表示：

“我感谢您对印度对外政策所讲的友好的话。”

会谈还涉及了苏印双边关系的某些问题，并指出，两国关系中积累的经验表明，今后仍须继续加强苏印合作。

1985年5月，印度总理拉·甘地对苏联的正式友好访问和所举行的高级会谈，是苏印关系中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的事件和重要的里程碑。会谈是在友好、相互尊重和信任的气氛中进行的。会谈中，双方对苏印关系的顺利发展、保持稳定和具有的规模，对双方在世界政治重大问题的观点相吻合，表示满意。

两国都确认将致力于进一步巩固政治、经济和其他领域的友好合作，同时确定了实现这一任务的具体措施。其中，拉·甘地访问期间签订的关于2000年前苏印经济、贸易和科技合作基本方针协定和在印度兴建一系列新的大型项目的苏印合作协定，是对发展两国合作的重要贡献。

米·谢·戈尔巴乔夫指出：“岁月消逝，几十年将过去，在我们两国，人们将世代更替，但苏印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将蒸蒸日上。这是因为，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建立在两国对当代根本问题的立场相吻合或接近的基础上的。”

这两个伟大强国的相互促进与合作在世界政治中已成为举足轻重的因素。1986年11月，苏共中央总书记米·谢·戈尔巴乔夫对印度的访问及他同拉吉夫·甘地的会谈，对苏印关系和两国相互关系获得新的形式具有巨大意义。两位国务活动家在坦率和相互谅解的气氛中进行的对话，涉及了世界发展和苏印双边关系中极其重要的问题。

两位领导人所做的大量工作使苏印双边关系中友好合作的潜力大大增加。访问表明，两国领导人意识到，他们对两

国关系的状况和整个和平事业肩负着重大的责任。而且，作为访问结果而通过的德里声明使一个新的政治术语——“无核武器和无暴力世界”，在国际上广为流行。它完全符合当代国际生活的要求。“关于无核武器和无暴力世界原则的德里声明”本身成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

声明共有十项原则，在其中的一项原则中说，和平共处原则应当成为各个国家和人民相互关系的普遍准则。

这次签订的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是两国关系史上最大的一项协定。两国贸易在高速地发展，商品交换的形式和结构也正在完善。

访问期间所签订的所有文件对两国关系的发展是新的强大的推动力，对在亚洲以及在地球上建立没有核武器、没有暴力和仇恨、没有恐怖和怀疑的和平事业也起了很好的作用。

米·谢·戈尔巴乔夫同拉·甘地在德里以及在莫斯科（1987年）的会见和会谈是政治新思维鲜明生动的体现。这表明，苏联和印度领导人的接触是加强两国友好和信任关系的有效机制。

廖里赫父子

两国科学方面的联系，包括宇宙研究这一领域的联系也在发展，在苏印两国专家共同努力下发射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我们同印度朋友一道感到由衷高兴的是，印度公民作为苏印联合机组的成员第一次实现了宇宙航行。

两国议会和社会团体的接触也有了进一步扩大。文化交流也是如此。例如在文化领域：在我国人们很熟悉迦梨陀娑、¹ 米尔扎、加利布、² 拉宾德纳特·泰戈尔的名字；而在印度，列·尼·托尔斯泰、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安·帕·契诃夫、阿·马·高尔基、弗·弗·马雅可夫斯基、米·亚·肖洛霍夫及其他俄罗斯和苏联作家的作品非常受欢迎。

在两国人民文化交往方面，值得特别指出，俄国画家、考古学家、作家和保护文物古迹运动的发起人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廖里赫（1874—1947年）及他的儿子尤里和斯维亚托斯拉夫所进行的活动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

由于命运的支配，尼古拉·廖里赫到了国外，在印度生活了很久。这给他的创作打上了明显的印记。尼·廖里赫这个时期的作品，首先是他的许多风景画，充满了对印度大自然的赞美之情和对印度人民深深崇敬的精神。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英迪拉·甘地都对尼·康·廖里赫的创作和社会活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同时，尼·廖里赫又是一个爱国者，在自己国家困难时，他竭尽全力相助。当德国强盗侵入苏联国土时，他募集资金并将这些捐款转交苏联作为资助红军的基金，积极宣传苏联人民的英勇斗争。他坚信，苏联人民一定会战胜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取得最终的胜利。

伟大卫国战争结束后不久，尼·廖里赫就决定返回祖国，

1. 印度诗人、剧作家。作品有抒情长诗和叙事诗；以民间传说和史诗为题材的剧本《罗摩迦与夫打打》、《迦哩慈湿》和举世闻名的描写人民生活的剧本《沙恭达罗》。

——译者

2. 印度诗人。——译者

就象库普林^①在战前，科尼奥可夫^②在战后回到祖国一样，象夏里亚宾和拉赫玛尼诺夫^③渴望返回祖国一样。但是，尼·廖里赫的宿愿没能实现。1947年12月，就在他动身回苏联的前夕，他与世长辞了。

这位艺术家的长子、著名的东方学家尤里·尼古拉耶维奇·廖里赫（1902—1960年）遵照他父亲的遗嘱，在返回苏联后将尼·廖里赫的大部分作品赠送给了列宁格勒俄罗斯博物馆和新西伯利亚画廊。

我同尼·廖里赫的小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在德里，也在莫斯科不止一次见过面。他时而来到莫斯科，特别是当我们这里为他父亲和他本人的作品举办画展的时候。有几次会见时，他非常可爱的夫人戴维卡（过去曾是印度著名演员）也出席了。

斯·廖里赫是个富有才华的画家。他画有肖像画、风景画、象征派作品，风格接近他父亲晚期的作品。他认为，画家应当画真正的美，这种美会吸引人们本能地前去观赏，甚至会吸引那些不懂艺术的人前去观赏，斯·廖里赫自己正是这样做的。他的创作在苏联得到高度评价。他是苏联美术研究院的荣誉院士。

当你同这位艺术家会见时，你会不由自主地注意到他非常象他的父亲。根据照片，人们很熟悉他父亲的面貌。他有着和他父亲同样聪明、敏锐的目光，同样自然和富有尊严的姿态。

1 俄国作家，1917年后移居国外，1937年回国 ——译者

2 苏联雕塑家 ——译者

3 俄国著名作曲家，后定居美国 ——译者

有一次，在访问印度时，我有幸参观了斯·廖里赫的画展。作者在门口迎接我并陪同仔细参观，向我讲解了每一幅作品。

在大厅里展出了几十幅他的绘画作品。在这些色彩鲜艳、明快的画面上描绘的主要是印度的山峦：白雪皑皑的山岭远景，绿荫、白雪和冰川覆盖的山丘。充足的光线、色调的对比、大自然的强烈色彩，这一切生动地表现了印度，特别是印度北部独具风格的、无与伦比的自然风光。从颜色的变化上看，我觉得它们很象高更¹的绘画。同时，在这些作品中也可以看到大自然杰出的赞美者、画家的父亲尼古拉·廖里赫的强烈影响。

“毫无疑问，您们崇拜的是同一种事物，这就是山。对不对？”我问道。

他证实了我的说法。

1984年10月，在苏联和印度同时庆祝了尼·康·廖里赫诞辰110周年和斯·尼·廖里赫诞辰80周年两个周年纪念日。在莫斯科东方民族艺术博物馆里十分成功地举办了他们父子两人的联合画展。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斯维亚托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廖里赫被授予各族人民友谊勋章，以表彰他对发展和加强苏印两国人民友谊所做的巨大贡献。尼·康·廖里赫和斯·尼·廖里赫这两位优秀的画家、社会活动家，为促使两个伟大人民的文化相互接近做了许多工作。他们的创作至今仍在继续履行着自己崇高的使命。

在印度，我同许多苏联人一样，对这个国家极其丰富的

¹ 法国画家，后期印象派的成员之一——译者

历史古迹，如泰吉·玛哈尔陵^①、库特布高塔^②等古迹赞叹不已。但是，引起我们浓厚兴趣的不仅是印度人民的过去，而且还有他们的今天，他们在生活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苏联著名的外交家、当时任苏联驻印度大使维·费·马尔采夫向我介绍了许多有关这个国家的有意思的东西，帮助我了解这个国家。

印度人所固有的勤劳、卓越独特的才能和传统的好客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对印度人怀有真挚的好感，他们对我们也怀有同样的感情。对此，我们是心领神会并十分珍视的。

塔什干：夏斯特里与阿尤布·汗

印度获得民族独立、并被分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以后，两国得到的是一笔错综复杂的遗产。单就克什米尔问题的领土冲突来说，应当承认，尽管冲突的尖锐程度时有缓解，但却一直潜伏存在着。

因此，毫不奇怪，苏联在通过国家渠道同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进行的许多接触中，总是感受到印巴矛盾的影响。要知道，20多年前苏联就建议两个国家之间应达成和解，并愿为此提供自己的友好帮助。这决非偶然。

1965年秋，印巴边境地区的军事行动使局势急剧恶化。苏联政府发表声明，愿意促进印巴尽快解决相互之间的冲突。

① 又译“泰姬陵”。位于印度北方邦的亚格拉近郊。1632—1654年莫卧儿帝国皇帝沙杰汗为其姬蒙泰姬建造的墓。——译者

② 库特布高塔位于旧德里，建造于13世纪至14世纪，塔高达72米。——译者

我国做了巨大的努力，以促进恢复南亚地区的和平，和防止任何能加剧冲突并挑起战火的外来干涉。

苏联的建议得到了积极的响应。我清楚地记得，1966年1月4日到10日，以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总理为首的印度代表团和以阿尤布·汗总统为首的巴基斯坦代表团在塔什干举行的谈判桌旁相会了。以阿·尼·柯西金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出席了他们的谈判。三国的外交部长也列席了谈判。尽管双方的立场有重大分歧，但是相互戒备、不信任和民族隔阂的坚冰还是被打破了。

遗憾的是，印度总理拉·巴·夏斯特里与世长辞。这一悲痛事件给这次谈判的结尾蒙上了阴影。

事情发生在深夜，告别招待会已经结束。印度总理在招待会上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大约在凌晨1点左右，我得知出事的消息，于是立即驱车赶到夏斯特里下榻的馆邸。印度总理躺在床上，旁边坐着神情忧郁的柯西金。他比我早到大约两分钟。除了印度官员外，这里还有一位苏联医生。在我到达时，他正在给病人做人工呼吸。柯西金和我忐忑不安地注视着这位苏联专家的动作。夏斯特里已经没有任何活着的迹象。

很清楚，他已经死了。那位医生和其他医务人员仍在尽一切可能来试图点燃他的生命之火，但未能成功。

这位印度人民的儿子与世长辞了。他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都倾注在克服他的国家所遇到的困难上。

塔什干会晤的成果是签署了一份宣言。这份宣言把印巴之间达成的竭尽全力建立睦邻关系的协议巩固了下来。

但是，时至今日，印巴关系仍很复杂。巴基斯坦几乎从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存在之日起就陷入一个阴险的圈套中，这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首先是美国，运用了政治的、经济和军事（用提供军火的方式）的手段，力图把这个国家纳入自己的政治轨道。直到今天，巴基斯坦仍未挣脱这个网络，恰恰相反，它陷得越来越深。

尽管如此，苏联不仅一贯致力于同印度保持友好关系（她的对外政策赢得了世界的尊敬），而且也竭力发展同巴基斯坦的正常关系。不仅如此，苏联还曾帮助巴基斯坦摆脱经济上的落后状态。

我国同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接触是一面独特的镜子，它能反映出这两个国家在对外事务中的方针政策。这些接触是多种多样的。至于说到印度，那么，可以说，这种接触是积极频繁的。

残酷的报复行为——别无解释

苏联力图同巴基斯坦保持积极的关系。除通常的外交渠道外，还设法保持包括相当高级别的官方关系。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多次访问过苏联，他曾任巴基斯坦外长，尔后任总统，1973年至1977年期间任总理。他每次来访，同他举行会谈，都意味着苏巴关系呈现一定的活跃。

布托是一位政治活动家。我同他曾多次见面，有时在莫斯科，有时在国外，主要是在联大会议上。这是一个具有非

凡才干的、很有风趣的人。他在英国和美国受的教育，而且在英国，他毕业于享有特权的牛津大学。

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布托为发展巴基斯坦的对外关系，不让西方国家阻挠巴基斯坦同其他国家，其中包括同社会主义国家保持正常的关系做了不少努力。

诚然，从国际政治广阔的角度考虑，他在奉行这条路线时，在具体的印巴关系中很少表现出灵活性。但是，在局势发生重要转折的时候，他还是避免同印度发生严重冲突。而且巴基斯坦同苏联保持的正常关系总是使印巴关系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缓和和平静下来。苏联不止一次地为此做了努力。

在巴基斯坦内政问题上，布托意欲实行文官制度，而不想靠枪杆子来维持自己的权力。这一点使他的政权同在他之前和之后的政权相比，略高一筹。甚至在发生军事叛乱、现总统齐亚·哈克成了国家首脑之后，布托仍然忠于文官政体。他虽然身陷囹圄，但仍不放弃自己的原则，宁死不屈。

作为一位政治家，布托的世界观同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按现代的标准来看，他是一位观点和哲学都符合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利益的活动家。但是，他注意到了千百万平民百姓的利益，正是这一点使他在国内享有一定的声望。然而，我们有权指出，主要的是，布托反对在处理对外政治事务时，唯某些外部势力马首是瞻。

不，夺去布托生命的刽子手的绞索不是最后的“公正审判”。最英明、最公正的审判官是历史。

坦率地说，齐亚·哈克将军拒绝赦免布托（列·伊·勃列日涅夫也曾就此向巴基斯坦总统提出了请求），给苏联领

领导人留下了非常不愉快的印象。布托的被绞死成了一种毫无意义的报复行为。

苏联恪守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认为巴基斯坦发生的变化，是这个国家的内政。但既然谈到苏联与巴基斯坦的国家关系，那么我们有权正告巴基斯坦现领导人，他们使苏巴两国关系倒退了很多年。

近几年来，巴基斯坦的领土一直被用来对奉行不结盟政策的邻国——阿富汗的事务进行武装干涉。巴基斯坦政府为何要推行敌视阿富汗的方针呢？它这样做，也就是反对苏联，这又是为什么呢？苏联所以向与我们友好的阿富汗人民派遣有限的军队，是为了帮助他们进行反对不宣而战的战争。在会见巴基斯坦当今的国务活动家时，苏联领导人多次提出过这些问题。

不可相信的话

1982年11月15日，在大克里姆林宫叶卡捷琳娜大厅里，谈判桌的一边坐着尤·弗·安德罗波夫和作为外交部长的我；另一边坐着1977年军事政变之后领导巴基斯坦军人政权、而一年后又成了国家总统的齐亚·哈克将军。同他在一起的还有巴基斯坦外长雅各布·汗。

会谈中，苏联方面向齐亚·哈克明确地阐述了苏联对双边关系、对近几年来一些武装集团从巴基斯坦领土上对阿富汗采取的那些行动的看法。与此同时，提请哈克将军注意：

“企图把事情说成似乎巴基斯坦与围绕阿富汗问题所发生的一切无关，那是毫无用处的。”

苏方直言不讳地向对方指出：

“巴基斯坦是反对阿富汗战争的参加者。但是，苏联绝不允许欺负阿富汗，因为两国间悠久的、密切的关系将我们联系在一起。这种关系在四月革命以后又以友好、睦邻、合作条约形式固定下来。苏联现在和将来都要给友好的阿富汗人民以援助。巴基斯坦奉行敌视阿富汗的政策，从而也破坏了苏联和巴基斯坦的关系，这是大错特错的。”

我们从齐亚·哈克那儿听到的回答是不能令人相信的。他彬彬有礼、态度温和、表情谦恭、曲意逢迎的低沉声音和平稳均匀的语调，这一切在其他场合下甚至可能引起人们的好感。然而，齐亚·哈克所说的一切，同巴基斯坦对阿富汗以及对苏联所奉行的实际政策截然相反。

齐亚·哈克信誓旦旦地说：

“巴基斯坦真诚地希望发展同阿富汗和苏联的友好关系，希望用和平的政治方式解决‘阿富汗问题’。”

然而，这不过是口头上说说而已。巴基斯坦政府的所作所为追求另外一种可说是截然相反的目的。

会谈中，我们不禁产生一个问题：巴基斯坦军政府的领导人是否知道，阿富汗的男人、妇女、儿童、老人被手持美国武器、经常从巴基斯坦领土侵入的匪徒和刽子手杀戮的痛苦？

我不由得想起齐亚·哈克以前的领导人。他们对邻国、对也是其近邻的苏联，奉行更为明智的政治方针。联想到此，在会谈期间，自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苏联和巴基斯坦之间建立友好关系的道路还很漫长。如果巴基斯坦领导人认识到，他现在奉行的与邻国为敌的政策是对巴基斯坦有害的

政策（不久前的教训已证明了这一点），那么，这条道路可以变得更短些。假如巴基斯坦领导人对此置若罔闻，那么，事态的发展将会使他沿着危险的道路走向垮台。

除了这次在克里姆林宫进行的谈话外，我个人还在不同的时间——1982年6月9日和10月1日在纽约，1983年6月10日在莫斯科——同巴基斯坦外交部长雅各布·汗会见过几次。关于这几次会见的观感，可以说，与我同齐亚·哈克谈判的观感完全一样：满口热爱和平的辞藻，但实际政策却与此南辕北辙。因其宗旨不是在尊重阿富汗主权和恢复这一地区和平的条件下促进阿富汗局势的缓和。

不管围绕阿富汗问题的事态今后将如何发展（它只能朝着巩固阿富汗独立的方向发展），对阿富汗事务进行武装干涉将成为巴基斯坦对外政策史上极不光彩的一页。借口受了巴基斯坦外部势力的影响来为这场不宣而战的反阿富汗战争进行辩解，无论如何都是不能令人置信的。首先是因为巴基斯坦领导人对这类企图没有给予反击，而一个真正的主权国家是应该反击的。

经过同巴基斯坦领导人的多次接触，我们坚信，解决阿富汗问题的主要障碍是巴基斯坦统治集团及其幕后支持者采取的不现实的立场。有些人不惜损害巴基斯坦人民的民族利益，让别人把自己当作对邻国推行敌视政策的工具。这些人所采取的立场只能令人惊讶。

与此同时，正在失去或许是唯一的机会，可用来解决伊斯兰堡似应最关心的问题，即：同阿富汗保持稳定、和平的边界。我们曾反复地向巴基斯坦领导人说明，他们所采取的这种立场是不明智的，并指出，他们迟早必须承认现实。

苏联信守在各国人民之间维持和平和友谊的政策，现在和将来都将竭尽全力来发展同巴基斯坦的关系。但这要求相互共同努力。

跨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蒙古人民 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自从苏维埃国家和自由蒙古的战斗联盟诞生以来，我国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始终是友好的，兄弟般的。苏联和蒙古人民之间高度的信任、友谊和合作渊源于弗·伊·列宁与苏赫巴托尔^①的历史性会见。

从封建主义跨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人民蒙古在人民政权的年代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它为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树立了这样一个榜样：自由的人民能够取得多大成就。苏联人民为蒙古的这些成就感到高兴。

1949年10月29日，苏联领导人委托我同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乔巴山谈谈。我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乔巴山自豪地介绍了蒙古在发展国民经济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并强调指出：

“蒙古人民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因为苏联人民给予了我们兄弟般的援助。”

乔巴山高度赞扬了在蒙古工作的苏联专家。在我们会见前不久，苏联通往乌兰巴托的铁路建成竣工。他是这样评价这件事的：

“这是蒙古历史上一件非同寻常的事件。我们共和国有

^① 蒙古人民革命党创始人（1893—1923），1921年任蒙古人民革命的领导人，蒙古人民军总司令。——译者

了一条把蒙古首都同苏联联结在一起的铁路。这是为我们的友谊树立的丰碑。”

自那时起，我同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举行过不少次正式的会谈和会见。这些会谈和会见无不是在最热情、最真挚的气氛中进行的。

我独自一人去过蒙古人民共和国，也曾作为代表团成员去过那里。我们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人进行了诚挚的交谈。在双方联合发表的文件中，无论是在两国双边关系还是国际政治问题上，都表明双方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我所记得的乌兰巴托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那里有宽阔的街道、新建的楼房和住宅区。这座城市同欧洲城市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不过差别还是有的，那就是在某些地方，在高层现代化楼房的旁边，突然会有些不大的、带尖顶的蒙古包闯入你的眼帘。

人们对我们说，有时居民们保留蒙古包是作为对过去的纪念。在我们的时代，这种蒙古包在蒙古首都现实生活中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有两件事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第一件是现代化的工厂。尽管这些工厂规模不大，但它们是国家未来的窗口。蒙古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正在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第二件是蒙古人口的增长令人吃惊。近25年来，人口几乎增加了一倍。

令人高兴的是，苏联国家和党的领导人同以姜巴·巴特蒙赫为首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人之间存在着亲密无间的兄弟关系。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两国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命运将永远巩固我们的友谊与睦邻关系。

友好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有着一部充满矛盾冲突的历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国主义被消灭，才使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得到发展。但是，新的战火又在这个国家燃烧起来。

朝鲜被肢解为两个部分。直到现在还被美国军队占领的南半部变成了美国的军事基地。北半部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它仿佛向世界、也向国家的南半部表明，民族自由和独立的时刻迟早要到来。

苏朝关系中近来发生的一切也是今后发展两国关系的坚实基础。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访问苏联以及他同苏共中央总书记米·谢·戈尔巴乔夫的会谈便是苏朝关系中最光辉的篇章。

消除历史的反常状态¹

近30年来，苏中关系处于一种历史的反常状态，任何一个态度严肃的人恐怕都会同意这个观点。苏联领导人曾多次声明，苏联准备同中国就双边关系问题以及与巩固和平和国际安全有关的关键性问题进行政治对话。苏中关系应该建立在照顾和相互尊重各方利益以及不损害第三国的基础上。苏中关系的积极发展会有利于两国人民，并促进世界政治气氛的改善。

毛泽东是世界上非常著名的一位政治人物。

¹ 1988年3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葛罗米柯的回忆录中对中苏关系的历史和现状及其他许多叙述是不符合事实的，有些观点我们不能同意。——译者

我不想分析他的世界观和他对社会发展所持的观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对此基本上已作出评价，并已将此以及毛泽东对中国国内形势产生巨大影响的实践活动都置于应有的地位。苏联共产党和绝大多数国家的兄弟党对他的外交政策见解也给予了明确的评价。

在历史文献中很少谈到，毛泽东是一位对国际形势的发展也产生了影响的活动家。要知道，在几十年内，中国的对外政策体现了他的思想和他的哲学观。因此，我想，毛泽东与我的直接谈话或当我在场时说过的某些话，可能会引起一定的兴趣。

我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是在1949年12月他访问苏联的时候（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那时中国正在庆祝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从资产阶级和地主手中夺取了政权，蒋介石的军队被击溃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因为他们有可能建立一个独立的、在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可以沿着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前进的国家。

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表示了欢迎，从而也就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表达了崇敬之情。苏联人民对于中国人民在各个阶段所进行的反对殖民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斗争一直表示同情。1917年10月，红旗在俄罗斯上空飘扬起来。这一事件对东方国家，其中包括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规模越来越大。在打败希特勒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之后，这个运动的力量更加强大，中国革命终于取得了胜利。

毛泽东在莫斯科受到了极其友好的欢迎。除了相互表达同情之意外，主客双方还准备签订政治性的条约来巩固两国

之间的友谊。

为欢迎毛泽东访问苏联，1950年2月14日在“大都会”饭店餐厅举行了午宴。午宴进行得十分热烈，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人出席了宴会。宴会的气氛是隆重的。

与此同时，我作为这些会见和谈话的参加者明显地感到（不只是我感到），斯大林和毛泽东这两位首脑之间的谈话，可以说，进行得不太流畅。他们交谈了几句话（当然通过翻译），尔后就是一阵间歇，远远超过一分钟的间歇。午宴时，两位首脑坐在一起，情况也是如此。

我坐在桌子的另一边，正对着他们。我试图帮助他们把谈话进行下去，但是没有多大效果，因为通过翻译，这一切显得相当困难。我认为，主要的是，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毛泽东，显然都缺乏一种能够帮助他们建立必要接触的个人素质。

看来，只有高明精细的心理学家看到这种场面后，才能对两位领导人的心情作出某种接近真实情况的判断。但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尽然。因为，当时被观察的对象是斯大林和毛泽东，所以，一切通常惯用的心理模式无论如何也不会有助于弄清细节，因而看来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这次会晤后，我有一种感觉，即斯大林和毛泽东还“互相不适应”。但这一想法，在我们的同志中，我对谁也没有说过。我想，我的这一感觉可能是错误的。时间长了，有些事情也许会弄明白的。

利季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在走出大厅正门时悄声对我说：

“斯大林和毛泽东不知为什么相互很少说话。”

她当时坐在他们的旁边，因此，一切都看得非常清楚。

我答道：

“我也有这个印象。”

第二天，我听其他同志说，他们觉得“两巨头”吃饭时不够亲切。几天过去了，但总的来说，气氛没有什么改变。

尽管如此，1950年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宫隆重地签署了已经拟好的条约。两大国的关系变成了同盟国的关系，它们的共同利益在条约中得到了反映。

条约的签署意味着，不仅在保障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方面，而且在保障远东、亚洲，乃至整个世界安全方面，都迈出了巨大的一步。这一友好、同盟和互助条约并不反对任何人。

众所周知，当中国后来对苏联采取了另一种立场时，它拒绝在条约第一个30年期满后延长该条约。

会见毛泽东

苏中关系史中有一件事值得一提，这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不久，中国方面建议结束苏中两国关于在中国西北地区的新疆省建立“苏中石油公司”和“苏中金属公司”两个合营股份公司的谈判。需要把达成的谅解用文字规定下来。

于是，双方商定由专门指派的代表团来进行谈判。我受命率领苏联代表团，中国代表团由新疆的活动家赛福鼎率领。双方代表团在莫斯科会晤几次以后，事情就清楚了：中国方面实际上已经改变了自己的立场。

当我把情况报告政治局后，斯大林马上就明白了，中国方面不愿意合作。在会议上，他就此讲的话很严厉，反应很强烈。

考虑到中国人的立场，苏联方面对自己的立场也做了修正。于是出现了芥蒂。在筹建苏中合营公司时发生的这段插曲绝没有为整个苏中关系增光添色，它在苏联领导人心目中留下了不快之感。

毛泽东第二次来莫斯科是在1957年11月。在这次访问期间，我得知，中国首脑希望同我见面并谈谈国际政治问题。这次会晤是在克里姆林宫内举行的。担任翻译的是精通中文的奥·鲍·罗满宁。当时，他已经是一位中国通和我们研究国际问题的著名学者。

今天看来，交谈中最重要的部分无疑是毛泽东对苏中关系所做的评价。在谈话中，中国领导人以中国人民的名义主动地表示：

“我对苏联给予中国的经济援助，以及在国际舞台上，其中包括要求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上所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

他保证说：

“中国永远不会恶化同苏联的关系并将同你们一起为争取和平共同奋斗。”

毛泽东感兴趣的主要是下列问题：

“能不能讲，美国，具体来说，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政策是侵略性的政策？”

“美国在经济上当真就那么强大，以致同他们斗争都很困难吗？”

无论是第一个问题，还是第二个问题，谈话的时间都拖得相当长。

我在回答时主要谈了以下这些想法：

“成立北约军事集团和在全世界大量建立军事基地，绝不表明美国是爱好和平的。华盛顿政府拒绝苏联提出的所有有关裁军和禁止核武器的建议也证明了这一点。”

我接着说：“至于美国的经济实力及其经济潜力，那么，应当考虑的是，在战争期间，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更新了工业设备，把‘第三帝国’时期在各个康采恩公司和工厂企业建立的许多实验室从西德迁移走了。无疑，这更增强了他们的生产实力和经济实力。但是，这并不说明，美国是高不可及的，不能有效地同他们竞争。社会主义只需要发挥出自己的能量就行。这一点它是可以做到的，这一天也终将会到来的。”

总的来说，毛泽东也表示了这种看法。但他是按自己的方式表达的。他非常欣赏“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这个形象的比喻，因此，他津津乐道地重复这句话。会谈时，我说：

“美国人在谈到自己的经济实力时爱吹牛，但当经济危机这样的老朋友和严酷的客人或其他类似的灾难光顾他们的家门时，他们就不那么吹嘘了。”

毛很有兴致地接过这个话题，谈到了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总之，从各方面来看，使人感觉到，他读过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论述经济危机的部分。他想让我知道，他读过这一部分。

在具体谈到中国在发展工业，特别是冶金工业方面的可能性时，他说：

“近几年内，中国就能每年炼出3000万至3500万吨钢。”

会谈结束后，我象通常那样自问道：

“毛泽东谈话中的重点是什么？他想借此告诉我们什么？”

我认为，他主要是想边谈话边估量一下中国作为这样一个大国的实力，尤其是经济方面的实力。他还想知道，是否有能力不让美帝国主义把其意志强加于人，首先是强加于中国。

因此，他同我谈话时力图使我们苏联人明白他在这方面的观点。

秘密出访北京

1958年8月，我在北京同毛泽东进行的一次谈话，使我个人对评价毛泽东关于战争与和平、国际形势和美帝国主义政策的观点获得了最为可靠的材料。苏联领导作出决定，要我作为外交部长前往中国首都，同毛泽东就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就当时美中关系中由于中国沿海岛屿而出现的紧张局势进行商谈。中国领导欣然同意了这次访问。我当时是秘密前往北京的，即未通过舆论工具宣布这次访问。

1958年8月至9月，远东的政治局势急剧尖锐化。美国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赤裸裸的威胁。杜勒斯在9月4日声明中公然指出，由于远东局势发生了变化，为了保证美国的“安全”，美国总统“决心”采取“及时和有效的”措施来保护蒋介石以及美国在台湾和沿海岛屿的地位。

美国大肆渲染战争气氛。在各项声明中强调美国军人准备采取原子讹诈手段，直至用原子武器轰炸中国境内的目标，

决心继续在中国领海水域为船只护航。

这一切都是为了进行军事讹诈，吓唬中国，并使美国人民对美国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可能产生的后果有所准备。

苏联政府首脑9月7日致美国总统的一封信中明确警告说，华盛顿的行为将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指出这些行为是干涉中国的内政，从国际法上看，也是不适当的。同时，苏联表示准备促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

我在北京同毛泽东的会谈中，主要讨论了远东紧张局势，尤其是岛屿周围的形势；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美国侵略中国的可能性以及苏联和中国在政治方面协调行动等问题。

毛泽东谈话的基调是，不能对美国人让步，应该根据“针锋相对”的原则采取行动。

他说：“不错，美国可能进行冒险，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动战争。中国应该考虑到并已经考虑到了这种可能性。但是，中国不准备投降。”

毛泽东在发挥这一思想并强调苏联和中国作为盟国应相互配合时，继续说：

“如果美国进攻中国，甚至使用核武器，中国军队应该从周边地区撤回到内地。他们要诱敌深入，使美国军队陷入中国的夹攻之中。”

然后，毛泽东象是向苏联领导提出建议，指出应该做些什么似的说道：

“如果发生战争，苏联在战争初期不要用自己的主要手段对美国人进行军事反击，从而不去阻挠他们进一步深入中国广阔的领土。等到美国军队进入中国中部地区后，苏联再

采取一切手段袭击他们。”

在这次会谈之前，我对毛泽东关于战争与和平，以及美帝国主义问题的很多说法是了解的。但第一次直接听到他这样的讲话。他几乎描绘了一幅美国动用核武器侵略中国的图景，谈了如何同这一侵略做斗争。他的这番话不仅“独具特色”，而且讲得“口气轻松”，使我惊讶不止。我适当地做了表示：

“我可以明确地说，对所描绘的战争图景我们不可能持肯定的态度。”

军事战略问题的讨论到此就结束了。

在1957年莫斯科兄弟党国际会议上，毛泽东讲了类似的话，使所有在场的人，包括我在内，都感到震惊。总之，在会上他坚持己见。这说明，当时毛泽东同社会主义国家——华沙条约成员国和大多数兄弟党——在观点和政策上的距离已经很大了。

1959年10月，以尼·谢·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访问了北京。代表团中有苏共中央书记米·安·苏斯洛夫，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塔·尼·尼古拉耶娃、我（作为外交部长）和其他同志。同毛泽东和中国其他领导人的谈话又一次证明了一个事实，即两国之间已存在分歧。

正如当时多次声明过，苏联和苏联领导人不希望苏中关系恶化，为了维护两国关系发展中已取得的成果尽了一切可能。但看得出，另一国领导人采取了破坏这一关系的战略方针。

关于毛泽东作为一个人，应该补充谈几句。如果不谈他的理论观点，不谈其世界观体系和政治上的特殊观点，那你

面前看到的，总的来说是一位待人殷勤，甚至容易交往的人。毛懂笑话，自己也说笑话。他对中国古代哲学熟悉到如数家珍的程度。他认真地研究过中国哲学，他自己也谈到过这点。他能相当内行地引经据典。

毛泽东尊重同他争论问题的人。但当谈到尖锐的政治问题时，他就会另换一副面孔，毛马上会变为另外一个人。在北京，我亲眼看到他同自己的主客赫鲁晓夫共进午餐时，席间讲的客套话却不超过十句。我的努力以及中国部长陈毅的某些努力，都未能改善这种状况。

我想特别指出，苏联大使斯·瓦·契尔沃年科当年在中国做了大量细致耐心的工作。无论是当时，还是随后在任驻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以后驻法国大使期间，他发挥了自己的积极作用，是我国最有经验和有才干的外交家之一。

我有幸会见，并如通常所说的，能从近处观察刘少奇和周恩来这样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活动家。他俩在中国政治生活中长时期起过显著作用，被看作是毛的支柱。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6年，周恩来连任中国政府总理。他同毛泽东一起来到莫斯科，参加了1950年1月至2月苏中谈判，并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签署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①

以后，我不止一次地会见过周恩来。例如，在1954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期间，我曾见到过他。晚些时候，我们在1959年苏中谈判时也见过面，当时为庆祝中华人

^① 应为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译者

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苏联代表团到了北京。另外，1964年周恩来前来莫斯科出席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时，也见过面。

苏联和苏联共产党对待中国的立场是：奉行使苏中关系正常化的路线。我们一贯强调，这种关系的改善是符合苏中两国和整个社会主义的利益、符合全世界和平利益的一件大事。

1984年9月在纽约，我作为出席第三十九届联合国大会的苏联代表团团长，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外交部长吴学谦举行了两次会谈，原则上讨论了苏中关系问题以及一些国际问题。

在这两次会谈中，我代表苏联方面发表了这样的意见：

“我们认为，必须经常关注苏中关系的前景，同时，应该考虑采取哪些合理的措施来改善这种关系，以使苏中关系的发展能出现积极的转折。抛开国际舞台上目前的形势，未必能讨论得了改善苏中关系应采取什么步骤问题。因为我们苏联和中国是大国，是有影响的国家，对世界上发生的事件不可能，也没有袖手旁观。”

我接着说：“现在完全有根据断定，世界局势是复杂的。帝国主义势力极力想取得军事上的优势，以此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的国家和人民。他们宣称要向社会主义发动‘十字军远征’，企图逼迫社会主义，而且还不仅如此。同时，他们还相当重视力图使社会主义国家相互敌对。”

于是，我作出的结论是：

“根据这一方针，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统一，加强它们的一致行动，以便增强社会主义的国际地位，在国际政治中，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社会主义的最高利益与世界的最高利益是一致的。苏联和中国之间如能在更大程度上不仅做到互相谅解，而且还能进行合作，那么，在实现世界政治气候的健康化和巩固安全基础方面，就会更加容易和更有保障。我们对此是赞成的。”

会谈中，对方对世界紧张局势的论述却与此不同：

“世界紧张局势是由于苏美相互争夺军事优势造成的。”

吴学谦重申，中苏关系的正常化，两国之间恢复友好和睦邻关系，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现领导的一项基本政治方针。他实际上重复了近几年来中方一贯坚持的观点，即实现这些关系的积极变化直接取决于苏联能否满足中方提出的众所周知的条件，尤其是涉及越南、柬埔寨、阿富汗、蒙古人民共和国等第三国利益的条件。

我曾就这些和其他一些共同讨论的问题向我的对话者做了相应的解释。我还指出：

“我们认为，苏中两国代表继续进行接触是很重要的。”

吴学谦对此作出了积极的反应。

为了使这种接触连续几年来不致减弱，苏联精明能干的外交家列·费·伊利切夫^①院士做了不少的工作。他经常飞往北京和在莫斯科接待中国代表。毋庸置疑，对苏联著名汉学家、很有才能的米·斯·贾丕才也该讲几句最美好的评语。他精通中国的语言、历史、文化，为发展同我们这个伟大的东方邻国的关系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近来，苏中关系有了一些改善。1986年7月28日米·谢·戈尔巴乔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讲话时指出，经济关系取得了

^① 苏联副外长，1982年—1986年任中苏磋商苏联政府特使。——译者

积极的发展。双方正在解决共同利用阿穆尔河^①流域极其丰富的资源、修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同哈萨克斯坦的铁路问题、建议同中方在宇航方面进行合作。这些问题以及其他方面的合作问题几乎都摆上了日程。边界问题谈判现在正在求实的、良好的气氛中进行。

我相信，苏中关系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有着历史意义。两国的辽阔幅员、资源、丰富的文化，并不遥远的过去的友好关系的传统——这一切都有力地促使人们想到保持睦邻与友好关系是有利的。

^① 即黑龙江 ——译者

——第十二章

再谈邻居和朋友

日出之国 看，这就是富士山 首相的道歉 日本
活动家的见解 京都和茶道 日本奇迹 观察思路
的微妙变化 印度尼西亚上空独立的旗帜 苏加
诺——政治家及其人 解放的钟声在菲律宾也已敲
响 苏联呼吁结束殖民主义 非洲的新天地 克瓦
米·恩克鲁玛和塞古·杜尔 埃塞俄比亚革命领袖
门格斯图·海尔·马利亚姆 萨尔瓦多·阿连德的
功勋 声援尼加拉瓜 磁铁般的相互吸引作用

科技进步难以置信地使距离迅速缩短了。在本世纪初，人们为了赚钱 餬口离开俄国前往澳大利亚或加拿大，这就好似去别的星球，途中需辗转几周，甚至数月。现在，乘坐现代化的大型客机，走完同样的路程不需一昼夜。宇航员乘飞船和空间站围绕地球一周，甚至只需几小时和几分钟就行了。

对于人来说，地球似乎变小了，象猢猻似的紧缩了。因此，地球上所有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成了邻居。

日出之国

1951年9月4日至8日召开了旧金山会议，在会上华盛

顿提出了对自己有利的对日和平条约草案。

我受权率领苏联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

在这个问题上，苏联主张同日本签订一项真正民主的、符合和平利益的和约，并阐明了这一立场。

代表团阐述了应成为这一条约基础的原则，这些原则的实现将有助于建立远东持久和平。但是，美国没有改变杜鲁门政府所采取的立场。因此，苏联拒绝在美国提出的对日和平条约草案上签字，并令人信服地陈述了自己拒绝签字的理由。

我代表苏联说：“这个和约与盟国协商一致的决定相矛盾，它不能保证那些遭受日本侵略的國家的安全，无视它们的合法要求，为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创造了条件，这对各国人民来说孕育着严重的后果。”

旧金山和约正式签字仪式举行之后，美国和日本立即签订了《安全保障条约》，这个条约把美国在日本的驻军长期地固定下来，并把这个国家变为美国在远东的军事战略基地。

当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迪·艾奇逊和国务卿顾问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炮制单独的对日和约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他俩不顾苏联的反对，千方百计地把这个条约塞给会议。这个本来应当成为真正和约的条约变成了实际上只符合美国狭隘的军事战略目标的文件。

但是即使是这场二重唱也未能阻止苏联要求日本放弃对萨哈林岛南部和千岛群岛的一切权利和覬覦。在罗斯福总统当政时期，苏美就这个问题达成了权威性的协议，这个协议是不容违背的。尽管如此，美国和英国违反他们根据雅尔塔

协议所承担的义务和历史公正的原则，在旧金山和约中避而不谈这些岛屿应作为苏联固有的领土归还给它。条约仅规定，这些岛屿脱离日本。

上述事实对当时的杜鲁门总统及其周围的人是个最好的写照。这说明，他们在这个十分明确的问题上力图对苏联采取大规模敌对行动，同时也是对罗斯福亡灵的践踏。当然，他们也知道，诸如此类的反苏攻击丝毫不能动摇苏联的立场和剥夺我们的合法权利。尽管苏联在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中以及在反对军国主义日本的战争中是他们的盟国，但他们还是要同它作对。

在1945年这段时间内，苏日关系发展很不稳定，这对所有的人都不是秘密。苏日关系的相对缓和时期被长期停滞、有时趋冷甚至紧张的时期所代替。这种情况的发生，绝不是由于我们的过错。我们过去和现在一贯主张同日本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

苏日关系不稳定的直接根源是日本政策多变和东京不愿意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现实。

在那些年代里，在日本政策中有合理成分，也有虚假成分，但随后的发展趋势是：合理的越来越少，而虚假的越来越多。

同我国关系正常化问题悬而未决，这不能不引起日本公众的不安。在日本，争取改善对苏关系的运动日益扩大。到1954—1956年间，这一运动已相当活跃。当时，鸠山一郎政府执政，它从日本的民族利益出发，提出要同苏联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

经过近两年的谈判，苏日双方于1956年10月19日在莫斯

科签署了关于结束两国战争状态和恢复外交及领事关系的苏日《联合宣言》。联合宣言中实际上包括了通常作为和平条约基础的所有问题。然而，由于日本方面采取不现实的态度，不愿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局面，这样的条约至今没有签订。

但是，毫无疑问，鸠山政府签署苏日宣言这一事实表明，这位国务活动家具有远见卓识。在他执政期间，日本曾试图在某种程度上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在日本对苏关系的一系列具体步骤中，也体现了这种新的姿态。虽然日本领导没有放弃臆想出来的领土问题，但没有把它同解决整个日苏关系问题直接联系在一起。在那个时期，两国关系的发展往往因日本不时掀起的反苏浪潮所中断。由于日本方面在合作道路上人为地设置各种障碍，许多双边合作问题的解决拖延了下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对外政策独立性减弱和日本更加屈从于美国全球利益的趋势日益明显。东京开始寻找各种借口，以便使苏日关系停滞，甚至倒退。

1976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我与当时的日本外相小坂善太郎进行了会谈。

我坦率地阐述了我们的意见，并强调指出：

“苏日关系应当建立在友好睦邻的基础之上。这就是我国的立场。我们将恪守这一立场。”

看，这就是富士山

我于1966年、1972年和1976年3次到过日出之国。每一

次都看到朝着苏联飞机迎面跑来的日本美女——富士山。在我们的下面，城市越来越大，它好象无边无际。在飞机降落时，旅客们都不愿离开舷窗，聚精会神、饶有兴味地注视着地面。

如果谈对东京总的印象，那么，那里的摩天大楼不太多，在这个城市里，基本上是低层楼房。如果谈到大街和小巷，虽然很多，但非常狭窄，从飞机上几乎分辨不出来。在夜里，只有根据灯光能够隐约地看出在某个方向似乎有一条大街。但到了白天，在五花八门的广告的掩映下，就难以辨认出这条大街了。如果再加上许多街道和小巷都没有名称，甚至没有号码，你可以想象，一个人，特别是不熟悉这个城市的外国人要在东京找到某一幢他要找的楼房，会落入什么样的境地。

日本官方人士完全按正规礼仪来迎接客人，当然也考虑国际礼节。在前往下榻处的途中，我们好奇地注视着人们的面孔，浏览着无穷无尽的、弯弯曲曲、纵横交错的街道和小巷，竭力想对日本首都的面貌有所了解。

当你乘车从机场去旅馆的时候，要不止一次地经过两层、甚至是三层立体交叉的高架桥。当你看着这些复杂的交通运输设施时，就觉得自己已身处于一个工业国的中心了。

我们下榻的“新大谷饭店”是一幢非常现代化的带有旋转餐厅的大楼，主人喜欢邀请客人到这里来用膳，或者只为观赏城市的全景。

多次访问日本，使我有机会了解这个国家。是的，我访问日本的目的是为了与国务活动家会见和会谈，因此，我基本上只能通过政治视角来了解日本。但也到各地旅行过。

总的来说，在日本的代表人物访问莫斯科以及我访问东京时，我同他们有过多次会晤。我3次会见过日本天皇。同日本首相们谈过话并进行过谈判，他们是鸠山一郎、田中角荣、佐藤荣作、福田赳夫、三木武夫和中曾根康弘。我也曾同日本外相椎名悦三郎、爱知揆一、大平正芳、木村俊夫、宫泽喜一、小坂善太郎、园田直、伊东正义、樱内义雄、安倍晋太郎及其他著名的日本活动家谈过话。

在回顾同他们的这些会见和会谈时，我再次确信，尽管我们之间就一系列问题存在着意见分歧，这些接触一般都取得了有益的结果。我想指出，当日方参加会见的人认识到这些接触对苏日关系的重要性并有相应的愿望时，双方对某些问题曾经找到共同语言，甚至还达成过协议。

首相的道歉

佐藤荣作是日本的重要国务活动家。他从1964年11月至1972年7月担任首相长达8年。

战后，日本首相更迭十分频繁，通常每隔两三年日本政府的领导就更换一次。佐藤担任首相的时间最长，可称之为冠军。他顽强地，而且应当说巧妙地保住了这一职位。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他在国内政界中的影响。

访日期间，我会见过佐藤。在同他会谈的过程中，我感到，他比在他前后担任过首相的其他政治家们更了解保持苏日睦邻关系的必要性。正是在这一时期内，我们签订了一系列苏日协议。这些协议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两国联系的条约基础。这些协议有：苏日领事条约、直接航空协定以及其他

协定。

当然，佐藤也提出过所谓“北方领土”问题。但他明白：“胃口”过大，这是一回事；而能否把它填饱，完全是另一回事。

与佐藤的会见，总的来说，是彬彬有礼的。他从不谈论什么日本对苏联提出要求的根据，避免使会谈气氛紧张化。佐藤更多地强调必须在那些能够搞好关系的方面来调整两国关系。

有时，我头脑里甚至产生过这样的想法：“也许，对发展苏日关系的现实主义态度会在东京占上风？”但是，很遗憾，在日本，在对外事务中愿意采取现实主义态度的活动家为数不多。

我想，有必要提一下1972年访问日本时的一段插曲。在访问了日本其他几个城市回到东京后，我去同佐藤进行预定的会谈。苏联驻日本大使奥·亚·特罗扬诺夫斯基陪同我前往。

刚走进首相的办公室，我们马上发现，佐藤为了什么事有些不安。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我们坐下准备会谈时，首相千方百计地对我们表示殷勤和关心。

然后，他说：

“部长先生，在我们讨论双方感兴趣的问题之前，我想向您表示歉意。当你们的轿车驶离东京车站时，有一枚炸弹在车前爆炸了。很幸运，您与您的随行人员都没有受伤，但我感到过意不去，因此对所发生的事表示歉意。”

我回答说：

“是的，当我们的汽车在某一路段从一群情绪激动的人

们身旁驶过时，我和我的夫人听到了一种异常的响声。在他们中间还有警察。警察对一个穿着便服的人在干着什么。”

当时，我和利季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在车里没说什么话，而陪同我们的日本副外相和汽车司机对所发生的事情装作没有注意的样子。

首相一再表示歉意。而我也一再安慰他说：

“佐藤先生，您不必不安，不是一切都很好吗！”

首相对我的话很满意。于是谈话转入正题。

当我回到莫斯科后，列·伊·勃列日涅夫对我说：

“外国通讯社都报道了令人不安的消息，说苏联部长的汽车似乎发生了事故。后来，一切才清楚了。”

日本活动家的见解

1972年在我访日期间，在东京举行的会见和会谈是颇有裨益的。其结果表明，双方都愿促进苏日关系的发展。

在同佐藤首相会谈时，我强调说：

“如果苏联和日本不仅保持友好关系（这种说法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而且能建立真正的睦邻关系，这种状况才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积极主张加深同日本的经贸、科技和文化联系，主张苏日国务活动家不断进行政治接触和定期会见的缘故。没有任何理由担心，苏日关系的改善会损害第三国的合法利益。”

这位日本政治活动家善于倾听对方的意见。他在会谈中的风度令人尊敬。当时，佐藤这样说：

“日本已结束了军国主义，对此我想援引宪法和在宪法

基础上通过的法律。现在的情况与过去不同了。”

在这种时刻，我不由自主地想到：“日本首相真的心口如一吗？”

历史使我国人民对这个国家的政治家所宣称的良好意向怀有深深的戒心。众所周知，1904年日本背信弃义地进攻旅顺口，导致日俄战争爆发。哈桑湖和哈拉哈河事件^①举世皆知，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者经过秘密准备突然决定要试探一下苏联边界的稳固性。日本空军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事件也无人不晓。

最近几十年来，在日本领土上建立并存在美国的军事基地这一事实也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惕。而这意味着，日本并不能完全自由地选择其制定政策的方向，即朝着和平的方向还是朝着屈从外部压力的方向。

在对苏关系的某些具体问题上，这个国家几位首相和外相的言论，同包括我几次访日时日方所发表的一般声明的积极精神很不和谐。通常，在这些言论中，对苏联的所谓“领土要求”越来越占据主要地位。

在日本，不是所有的人都从头脑中清除了日本对苏政策中落后于时代的领土野心。因此，今天与日本领导人物进行接触和会谈的主要目的之一仍是使之明白：那些决定东京政策的人士越早屏弃不合时代的想法，对日本和对整个世界就越有益处。

^① 哈桑湖和哈拉哈河（哈勒欣河）事件：1938年7—8月间，苏军在哈桑湖（位于苏联俄罗斯联邦滨海边疆区的东南部，邻近波西耶特湾）附近粉碎并击退了入侵的日本军队。1939年5、7、8月，日军在哈拉哈河（流经蒙古和中国）地区入侵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被苏蒙军队粉碎。——译者

苏联确信，保持清醒头脑应当是永恒的，而不应是日本对外政策中暂时的现象。日本的未来及其独立存在不能建筑在扩张和复仇之上，而应建立在与所有国家，首先是与邻国的和平合作上。从历史的角度看，摆在日本面前的任务是：在日本与美国签订了军事协定的情况下，不让套在它脖子上的这条绞索扼杀这个独立的国家。

在访问东京期间，作为苏联外交部长，我代表苏联领导并受其委托向日本的各级领导人阐明了这些思想。当日本首相和外相们访问苏联的时候，苏联领导人也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向他们说明了上述想法。

在日本著名的国务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中，应特别谈一谈福田赳夫。他在执政的自民党和政府中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其中包括首相、副首相、外相、大藏相以及其他职务。在60至70年代，他在指导日本的内外政策方面起过重要作用。

福田是日本的富翁之一，他与国内实业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其观点来说，他是个保守主义者，主张日美紧密合作。在福田积极参政期间，他在日本领导层中享有稳健、甚至是灵活的活动家的名声，他很熟悉经济和对外经济问题。

在1972年和1976年访问东京的时候，我与福田进行过一系列会谈。应当指出，对方对一系列问题有正确的见解。比如，他强调：

“日本与苏联有许多共同的经济利益。日本需要在相互谅解和信任的基础上广泛地发展苏日关系。”

这位日本官方代表发表了很好的见解。剩下的就是行动了。但是，日本的实际政策在许多方面与福田所表示的思想

是相背离的。

在整个战后时期，苏联有关部门的代表在同日本领导人会谈时，一直强调扩大两国经济合作，特别是在捕鱼、贸易和其他方面的合作的意义。提请日本方面注意，这种合作会在很多方面促进整个苏日关系的“解冻”。

这种态度与日本实业界的情绪是相吻合的。实业界对同苏联发展关系的兴趣从未消失过。有时，出现过这种情况：主要由于受外来的影响，日本同我国的政治关系的发展放慢了，这束缚了苏日经贸关系的发展。是的，直到现在，两国经贸关系尚未摆脱这种影响。

今天，也应指出日本对外政策中的一个特点。当这个国家在经济方面，特别在工业和技术方面取得迅速发展的时候，在对外事务中总表现出明显的惰性。昔日扩张主义观念的泥潭正在对它产生愈来愈大的吸引力。而日本对外政策中所出现的“新东西”，即表现在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战略，对作为独立国家的日本来说，是一种畸形的反常现象。这个国家的某些集团企图让日本人忘记那个叫做广岛、长崎的可怕悲剧，则更是莫大的讽刺。苏联领导从不轻易援引这个悲剧来证明，政治上奉行军国主义的方针与日本争取和平未来的斗争是背道而驰的。

在交换意见时，我们苏联方面总是指出：

“签订苏日和约很重要。但是，日本不应当对签署这一条约提出明显不能接受的条件。”

苏联注意到日本暂时还不准备签订和约，于是建议：

“继续就这一条约进行谈判，同时讨论签订使苏日关系具有稳定性的睦邻合作条约”。

日本方面对这一供它选择的建议没有表现出积极的态度。然而，这条道路並沒有堵死。签订这样的条约不会损害第三国的合法利益，不管这第三国距离我们是远还是近。

我们曾建议就苏联保证对日本不使用核武器，而日本承担始终不渝地恪守无核国地位的义务达成一项协议，这一建议现在仍然完全有效。

目前的苏日关系清楚地证明，只有睦邻合作的方针才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好处。反之，背离这一方针会削弱互利联系，加深相互间的疏远和不信任。

京都和茶道

我会见过的每个日本领导人都各有特点，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分量也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几乎都是属于掌握政策和确定战略的那个范围里的人。

至于说到同天皇的会晤和会谈，那么，我个人的印象和曾会见过日本国家元首的外国代表人物的看法没有什么差别。每次会见都是依照日本的礼仪安排的，并都没有为这些会见举行任何盛大的仪式或招待会。甚至可以说，在皇宫内，我们看见的是最大众化的风尚。

穿过大门驶入东京中心一个比较宽阔的地区。头一个印象是，这里非常肃静，使你有置身于大原始森林之感。天皇官邸附近地区的交通安排得使你完全感觉不到周围有车辆行驶。到处都是英国式的草坪。皇宫本身不高，至少其主要部分都不超过二层楼高。它完全是木制结构的——看来，这是日本传统的要求。我们无须乘任何电梯，我们好象只到第一

层，没有再往上去。

我是同利季娅·德米特里耶夫娜一道在翻译列·阿·奇若夫的陪同下进行拜会的。天皇也和皇后及他们的翻译一起接见我们。会见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谈话没有超出讨论有关地理、文化、人员交往的题目以及两国愿意和睦相处的一般表示。

天皇及皇后谈话的风度和举止使人感到，他们有不少同外国活动家交往的经验。只是同他们不应谈具体问题和讨论“高深的问题”。

无论会谈的内容，还是语气，都是友好的。会谈在宽敞的客厅里进行。而且，我们在皇宫内所见到的房间都非常大，木头的地板上没铺地毯，而且还不是镶木地板。

我们没有发现有成群的或是单个的日本人在皇宫的大门旁停留，人们根本就不把皇宫看作是某种新奇的东西。看来，日本人把天皇奉为神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所以，同我谈过话的日本活动家中没有一个人在某个问题上引用过天皇的言论、观点和意见，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大概国家的象征、君主及其家属的全部上流社会生活，根据传统，都被一个巨大的屏障与政治隔开了。

来到日本，除东京以外，不能不去看看其他一些城市，不能不去参观一下日本的企业。一般说，进行这种旅行的时间很少。因此，所有这些旅行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来去匆匆。我们不以小时，而是按分秒来计算时间，不过，我还是去了大阪、横滨、京都、名古屋和丰田。

在大阪，我们参观了造船厂，在横滨参观了电视和无线电设备厂。当我们参观工厂的时候，我注意到，几乎所有的

工人都非常年轻，而且大部分是女工。他们好奇地瞥视从他们身旁走过的客人，但尽量偷偷地看，以防被工长发现。

我们怀着极大的兴趣参观了日本的古都——京都。每当谈起这个城市，日本人总是怀着敬意。京都对于他们就好像是古罗斯的首都基辅对于我们一样。

在京都，按古老的传统方式为我们举行了极其讲究的茶道。要知道，对于日本人来说，茶与花一直是受尊敬，甚至是受崇拜的东西。茶道给人留下了印象。如果主人想显示一下某种不寻常的东西的话，那么他们并没有选错，他们完全成功了。

在京都市公园里几乎没有什么人，我们在那儿又参观了一座古老的皇宫，它保护得很好。当我们走近这座宫殿后，一个当地的陪同人员悄悄地提醒我们说：

“你们很快将听到和看到一个不寻常的东西。”这一不寻常的东西就是：当你走过宫殿的一个大凉台时，结构巧妙的地板会“唱歌”。它发出一种介乎钢琴的低音和弦与没有上油的车轮发出的吱扭声之间的声音。

我说：“日本古代的建筑师异常巧妙地建造了这座宫殿。他们工作得十分出色，就象我们那里说的那样，伴着歌声工作。”

在这个公园里，我们还参观了几条日本河流、横跨河上的桥梁以及其他建筑物的模型。所有这些都是按相应的比例做的，工艺精美。假设你抽象地想，不认为是在公园中，不把它们看成是模型，那么你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印象，似乎所看到的一切全是真的。这表明，一个富有美感和想象力的人能创造出什么样的奇迹。

日本奇迹

对日本不感兴趣的人寥寥无几。在当今的世界上，在一定意义上说，日本是个奇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个国家在经济和技术上发生了真正的飞跃。对此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和解释。有时候人们的议论是如此忘乎所以，以致客观成分所剩无几了。

譬如，人们说，日本之所以取得成就，是因为日本人具有特殊的气质，他们处事精明，做事准确、耐心细致。因而，他们喜欢到那些要求准确性特别高的电子及其他生产部门去工作。

但是，如果纵观一下历史事实和现实生活，再来看这个奇迹，那么，展现出的是这样一副图景：日本被军国主义集团拖进了战争，在战争失败以后的期间内，这个国家的军费开支降到了最低点。它生产的几乎都是民用产品。从这一事实看，就会产生一个不无教益的问题：

“战后时期，一些国家由于各种原因把自己大量的物资用于军工生产。如果它们不这样做，也同样只发展民用经济部门，他们会比日本落后很多吗？”

我可以大胆地断言，很可能一点儿也不落后。而且即便落后，也是相差无几。

这样看来，日本自己似乎首先应当由此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这就是，如果这个国家想继续顺利发展，它不论是单独地还是同其他国家一道，都不应走军国主义的道路。

可惜，这一结论与那些今天掌握日本政策，包括对外政

策的人的政治思维差得那么远，就象地球距离太阳那么遥远。当代日本政治活动家们不喜欢做这样的结论，更不喜欢在人民中间宣传它了。从各方面来看，这不符合他们的思想倾向。

日本现领导奉行增加国家军事潜力的方针，使日本参加许多年来从外部强加给它的全球对抗战略。我不想使用更为激烈的言词，但日本如此明目张胆地这样做，很值得人们警惕。

然而，事态表明，日本人民的根本利益与该国的军国主义集团的想法是完全不同的。

观察思路的微妙变化

1976年1月正式访问日本时，我会见了现任首相中曾根康弘。当时，他没有担任国家职务。但在自民党内是第二号人物——自民党干事长。

会晤是中曾根主动提出的。在访问期间，我同日本政治家们谈过话，中曾根与他们不同的地方大概就在于，他信誓旦旦地保证要致力于建立苏日人民间的“真正友谊”。中曾根注意斟酌自己的谈话用语，以便给交谈者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为了观察中曾根思路的微妙变化，我给自己提出了几个问题：

“为了使人相信他说的是真话，他是否讲得太娓娓动听了？难道能不考虑在我面前的人是谁？难道这位政治家不是来自多次对我国兵戎相见的那个国家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年代里，日本成了法西斯德国的帮

凶。而中曾根也是一个在战争时期已经完全成熟了的日本国民。中曾根从东京帝国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到日本内务省任职，1941年他从那里去军队服役。战争结束时，中曾根是海军会计官。因此，我的会谈对手是属于用日本传统的黩武主义精神教育出的一代。

在执政的自民党内，中曾根赢得了保守派活动家的名声。他牢牢地握着这块牌子，积极主张加强日本的军事潜力。

“武器多多益善”，这就是合乎他心意的座右铭。中曾根说过：

“必须把日本变成不沉的航空母舰。”

中曾根在争夺党和政府的领导职位的政治斗争中，善于改换盟友而不感到良心责备。因此，日本记者给中曾根起了个“政治风向仪”的雅号。如，1972年，当自民党两个最有名的活动家福田和田中为争夺首相职位而发生尖锐冲突时，中曾根在最后一刻转向田中一方，使田中得到了朝思暮想的宝座。

当然，现实生活有时强迫政治家们重新思考，用新的眼光去看自己国家的历史，借鉴过去的教训。如果一个人是诚实的、关心本国人民的福利的话，那么，他在承认错误之后，应该促使国家沿着和平的道路发展。我愿意相信，日本在经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惨剧之后，日本政治家的理智和现实主义的态度最终会苏醒。1976年我访日时，总的来说，国际局势是有利的，存在着改善苏日关系的客观条件。因此，我受苏联领导的委托向中曾根声明：

“只要看看地图，就可得出结论：苏日必须在和平和睦邻情况下相处。至于苏联，我们力图建立的正是这样的关系。

这不是追逐时髦，也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原则性的方针。”

中曾根相当肯定地回答说：

“我们主张发展苏日关系，并使其内容更丰富多彩。我想特别指出，这种关系对维护远东和平与安全是有意义的。”

然后，他又补充说：

“有些日本人士认为，企图利用苏联和中国的分歧来投机取巧是没有前途的，这最终会损害日本自身的利益。我赞同他们的这种观点。”

最后，中曾根说：

“如果我当上首相，我将认真地着手改善苏日关系。”

人们可能觉得，中曾根是一个有现实主义思想的政治家，他了解日本的根本利益所在以及同苏联保持睦邻关系的重要性。

事有凑巧，1982年他真的当上了首相。而在讲话中，他居然把两个方面奇怪地拼凑在一起了，一方面表示主张要发展相互的合作，另一方面对我国提出了毫无根据的要求。

1985年3月11日，米·谢·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中曾根，并就苏日关系的关键问题和世界局势同他简短地交换了意见。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谈。

米·谢·戈尔巴乔夫说：

“苏联愿意同日本发展互利联系，并使两国关系具有睦邻的性质。”

中曾根的回答实际上重申了自己的立场，虽然没有象他在日本讲话时那样地直言不讳、毫无顾忌。

中曾根有哪些特别使人注意的外貌特征和举行会见、会谈的风格举止呢？

通常，中曾根在谈话开始时摆出的姿势，在整个会谈过程中始终不变。中曾根不动声色，难以捉摸。他自我克制和控制感情的能力是惊人的。第一次会见中曾根时，他在我记忆中留下的印象同1985年3月在克里姆林宫会谈时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毫无二致。

我讲中曾根所特有的举止，不是不赞成它。这种风格也许是值得注意的。归根到底，每一个人，当他面对着交谈者时，都可以采取他认为需要的姿态，只要不越出礼貌和惯例的界线就可以了。我所以提到这一点，仅仅是因为这种举止风格本身就很少见。

1984年9月在联合国第三十九届大会期间，我在纽约同日本外相安倍举行了一次认真的会谈。我很直率地提请他注意以下的事实：

“东京现在的对外政策使日本在国际事务中开始丧失自己的特点。我们认为，这丝毫不会提高它的威信。看来，日本的某些人士对坦克、军舰和堆积如山的武器又朝思暮想了。他们怀念过去，虽然过去不止一次给日本人民带来的只有灾难。”

我特别向对方强调：

“这种情况不能不对苏日关系、特别是在政治方面投下阴影。所以我们认为有权直截了当地把这一切告诉日本代表，更何况日本是我们的邻邦。”

我向安倍重申了苏联的原则立场：

“如果东京作出有利于和平和睦邻的抉择，那么，无论在发展双边关系方面，还是在国际事务中以及在争取和平与缓和的斗争中，我国将是日本可靠的伙伴。日本领导声明愿

意调整同苏联的关系。但是，能够说东京对苏日关系的态度已呈现出某种向好的方面变化的迹象了吗？也许需要通过高精度的光学仪器才能发现这种迹象。”

1985年2月，我们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已满60年了。苏日关系的经验表明，两国关系只能建立在和平和睦邻的牢固基础之上。

1986年7月28日，米·谢·戈尔巴乔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讲话中提出的建议对苏日关系的发展是个新的推动。这指的是扩大沿海地区的经济合作、在苏日毗邻和靠近的地区建立合资企业、在研究和综合开发海洋资源方面进行长期合作、协调和平研究和利用宇宙空间的计划。这样一来，日本人所特别擅长的“经济外交”就会为苏日合作服务了。

米·谢·戈尔巴乔夫说：

“苏日关系中出现了好转的征兆。如果能出现这种转折，那就好了。”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苏联表明了我国在亚太地区政策的各项基本方针。这是一个为了和平的利益而进行广泛合作的纲领，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理由反对它，因为它不是只符合某一个国家的狭隘利益，而是符合和平与安全的整体利益。

印度尼西亚上空独立的旗帜

在苏联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同世界上一个广阔地区——东南亚和大洋洲建立联系的广泛可能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对希特勒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取得伟大胜利的结果。沙皇俄国与这一地区多数国家的关系仅仅处于萌芽状态。而且

这些国家本身尚未独立，仍遭受着殖民主义的压迫。

印度尼西亚就是其中之一。荷兰王国很不情愿并迟迟不肯放松自己的殖民主义统治。但是，1945年8月，民族独立的旗帜在这个远离我们的国家的上空开始飘扬，尽管确立其独立地位的斗争还持续了好几年。

说也奇怪，当在独立的印度尼西亚还没有一个苏联的代表、这个国家也没有一个代表访问过苏联的时候，印度尼西亚人民就已向往着同苏联友好，而且这个愿望变得日益强烈。其原因很简单。可以说，印度尼西亚人民本能地感觉到，占据欧洲大部分和亚洲相当大部分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本身就在促进着整个殖民压迫体系的崩溃。

有两个强大的因素——苏联为粉碎法西斯侵略者所起的作用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鼓舞了印度尼西亚人民和其他殖民地人民为反对殖民主义、争取独立而斗争。在国家存亡的转折关头，特别是当他们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时候，总会涌现出一些名垂青史的卓越人物。当然，他们所留下的痕迹各不相同。有不少这样的例子，某些人的活动成了妨碍国家沿着独立进步的道路前进的沉重包袱。但是也有另外一些例子，那些从人民中间成长起来的人物，能把自己的命运同争取独立和社会进步的崇高目标联系在一起。

苏加诺就属于这类活动家，印度尼西亚人民把他称做“国父”不是没有道理的。在殖民制度的条件下，他理解人民的利益所在。当然，苏加诺没有把自己的思想同社会主义世界观联系在一起，也绝没有追求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他高举民族独立的旗帜，同时也捍卫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国家经济的落后在很大程度上说明，独立后的新

国家在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采取的那些具体步骤是有其原因的。

我同苏加诺会见时，他已经是国家元首了，这些会见给我留下了生动、丰富的回忆。我是以苏联外交部长的身份去印度尼西亚的，是作为尼·谢·赫鲁晓夫率领的苏联代表团的成员。在大约一周的时间里，我对总统的活动进行了观察，可以说，他就没有离开过苏联代表们的视线。他不知疲倦的精神令人吃惊。他既能照顾客人，又能使管理国家的各个基本环节运转。

顺便说一下，苏加诺是一位善于提出要求和愿望的能手，特别是在经济方面。通常，他对每项请求都要从政治、经济、历史和心理方面提出洋洋大观的论证。有时候，你觉得总统的眼睛马上就要流出泪水了。

在这方面，对苏加诺很难、甚至也不可能提出什么责难。要知道，印度尼西亚刚站起来，几乎什么都缺少。工业刚刚建立，农业处于原始状态，商业，象整个财政系统一样，掌握在外国人手中。

多年来，苏联向印度尼西亚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以振兴其工业、农业和文化。但是，我们看到，印度尼西亚政府在国家管理、经济和文化建设以及对外事务方面还缺乏经验。由此产生了不少障碍。

看来，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为什么苏加诺本人及其政府机构热衷于搞特别讲究的公开活动。既然有了自己的国徽和国歌，那就应当充分利用！于是，不管在什么场合，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而举行会议，哪怕是最不重要的会议，也一定要奏国歌，有时还要奏两遍。看得出，居民喜欢这一套。

而且他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

作为元首和主要的政治家，苏加诺在举行正式会谈和谈判的时候，很了解自己及其国家的努力方向。他本人缺乏解决经济和生产问题的经验，因此，吸收一些懂得这方面事务的专家参加。不过，这样的专家在刚刚摆脱殖民主义压迫的印度尼西亚自然是为数不多的。非常缺乏精通业务的民族干部。所以，苏加诺抱怨说：

“用自己的专家来取代外国专家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过去殖民主义者根本不从印度尼西亚人中间培养专家，尤其是割胶和加工橡胶方面的专家。”

总统对自然条件也甚感抱怨地说：

“印尼是个岛国，领土的各个部分之间相距几十、甚至几百公里，这本身就给管理造成很大困难。”

这当然是事实。

我除了访问爪哇岛及岛上的城市雅加达、日惹、茂物和泗水市以外，还访问了巴厘岛。在这个岛上，一位地方当局的代表在迎接我时开玩笑地说：

“神父在基督教圣经中所描写的天堂，大概就是指的根本不信奉基督教的巴厘岛。”

印度尼西亚人，甚至那些从来没到过这个岛的人都非常喜欢它，并引以自豪。不管是就小气候、还是就文化发展而言，它都是与众不同的。

这里引人注目的是，许多村庄的居民喜爱绘画。他们在道路两侧摆出几十幅，也许有几百幅风景画，并且当作纪念品很便宜地卖给外来的人。这笔收入不大，但毕竟是收入。

与我们访问过的雅加达及其他城市的湿热空气相比，在

这个岛上似乎连呼吸也要轻松些。

印度尼西亚的城市在许多方面都很相似，但各有自己独特的名胜古迹。在泗水有一个大动物园，从远古时起，在大自然中保存下来的、外表很不雅观的巨蜥是这个动物园的光荣和骄傲。

有人为我们做了表演，看巨蜥的灵巧动作。人们把3公斤重的一大块肉递给这个庞然大物，一眨眼的功夫就被这个巨兽吞进肚里。而且，使我们惊讶的是，它怎么没把服务员的手也咬了。

离雅加达70公里的茂物市是这个国家的古都，它被辟为疗养区，这里有个总统府。

一清早，就有人告诉我们：

“今天，在某个时候茂物市将有雨。”

听到这话，我们感到很奇怪，天空中没有一点儿要下雨的预兆。但是，确实，到了所说的时间大雨就倾盆而降，一直下了半个小时。

在从茂物返回雅加达的路上，我们又遇到了热带的大雨。如果说我们的汽车没被漂起来的话，那仅仅是因为汽车更多的时间是停着不动，而不是在行驶。

在印度尼西亚访问的时候，我们有机会看到几座火山。其中有一座在活动。起码，当你站在火山口边缘时，可以看到，从很深的地方喷射出数米高的沸腾的水柱。

苏加诺——政治家及其人

关于对苏加诺的印象，我还想补充几句。在我的印象中，

他是个很有才干、有教养和善交际的人。很难断定他爱好哪门科学。他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政治之中，而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世界观却好象没有多大兴趣。苏加诺喜欢对事物做明确的分类——殖民主义和独立、富人和穷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战争与和平。他擅长这样做，而且对此确信无疑。

有时，无论是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会晤还是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谈期间，苏加诺从不明确表示，他打算使印度尼西亚沿着什么道路前进：是走进步和社会改革的道路，还是走加强资本主义基础的道路。他惯于根据不同的谈话对象做些谨慎的暗示，并希望对方能明白他的暗示。

苏加诺擅长演讲，是一位有经验的演说家。他懂得，应当对听众讲什么和如何讲，特别是对印度尼西亚听众。凡是了解他的人都发现了他这一特点。

那么，苏加诺到底是何许人，根据其政治和思想信念看，他是哪一种人呢？这样说大概是正确的：如果是在另外某个国家，他很可能成为社会民主党人，或者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

谈到苏加诺的为人，也许可以指出一点，他非常喜欢为客人们举办各种表演，特别是跳舞。会谈一有空隙，他一定组织舞会，而且不止一次，连续两三个晚上用这种方式来招待贵宾。

苏加诺的印尼族夫人哈蒂尼在舞蹈方面的造诣也不比他差。听说，当第二次同一个日本女人结婚后，他也对新夫人进行了舞蹈训练。

1967年苏加诺在政治上垮台了。那个时期发生的事件，是印度尼西亚历史上悲惨的一页。在这些事件中，许多无辜

者人头落地。

国际事件瞬息即逝。苏联同印度尼西亚的外交关系的历史已有30年了。在此期间，苏联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中虽然有过坎坷，但合作的传统已形成，积累了有利于两国人民合作的丰富经验。发扬这些传统，用新的内容来充实我们的关系，是应该遵循的重要方向。如果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存在着不坏的客观前景。

1984年4月，印度尼西亚的外长穆赫塔尔·库苏马阿马查正式访问苏联。在我同他会谈的过程中，双方满意地指出，对一系列具体的国际问题，其中包括战争与和平及裁军问题，两国的立场接近。但是，在印度尼西亚有这样一些有影响的人士，他们更关心的是别让国家走上民主发展的道路，而不是巩固国家的独立。

解放的钟声在菲律宾也已敲响

解放的钟声不仅在印度尼西亚，而且在菲律宾也敲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菲律宾也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美国费了许多笔墨和口舌来宣扬要尊重菲律宾的独立，他们常常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菲律宾获得独立是由于美国表现了高尚的气度。但实际上，自从西班牙的殖民压迫被美国的压迫取代之后，美国只不过把菲律宾视为美国远方的“菜园”。

数十年来，美国垄断组织残酷地剥削菲律宾人民。但当时，英国这个殖民主义帝国已经分崩离析，另一个殖民主义宗主国——法国也已遭到同样的命运，而比利时和荷兰的前

殖民地获得独立的问题已成定局，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殖民主义者也无法保持其地位。美国也不能不考虑到这样的情况，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菲律宾曾被日本占领。1946年这一国家宣布了独立。

菲律宾缓慢地，但不断地朝着不仅是形式上的，而且是事实上独立的方向发展。但是，至今还不能认为这一过程已经完成，因为在这个国家中还保留着美国军事基地及其带来的一切后果。只有幼稚天真的人才会认为，美国在菲律宾的这些基地不会损害菲律宾的主权。

苏联一贯主张菲律宾应当获得真正的独立，欢迎菲律宾方面为巩固其主权国家地位而采取的每一个步骤。

菲律宾同在殖民地体系废墟上出现的绝大多数国家一样，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1976年）。苏联对自己采取的这一步骤感到满意。苏菲关系走上了正常的轨道，并逐渐发展，特别是贸易和文化领域的交往在逐步扩大。

早在建交前几年，总统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就访问了苏联。她是该国一位政治和社会活动家。应其请求，我们举行了会谈。我们方面强调指出：

“苏联主张同菲律宾关系正常化。一旦其国家领导人认为时机已成熟，我们准备互设大使馆。”

会谈是友好的。

事隔不久，苏联和菲律宾互派大使。世界上不是所有人对这件事都感到高兴。但是，看来，想阻挠它也并非容易。

1976年6月，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正式访问了苏联。这次访问中的会晤和会谈也是友好的。双方都强调了发展双边关系的决心。

1985年，米·谢·戈尔巴乔夫会见伊梅尔达·马科斯时，再次阐明了我国的对外政策，强调苏联希望同菲律宾保持良好的关系。

马科斯及其政府代表的是买办资产阶级和大土地私有者的利益。在他执政期间，国家政策中还残存着依附于美国的痕迹。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痕迹在菲律宾的政治生活，尤其是经济生活中根深蒂固。菲律宾前总统常说的那种独立，是受到美国套在这个国家脖子上的沉重经济枷锁的束缚的。

没有理由认为美国政府在这个国家的目的已经发生了变化。

1986年，菲律宾最高决策集团发生了变动。苏联愿意在该国新领导上台的情况下一如既往地发展同该国的良好关系。这包括双边联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政治问题。

苏联人民希望，以共和国总统科拉松·阿基诺为首的新政府将维护和发展苏联和菲律宾过去在两国关系中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

苏联呼吁结束殖民主义

伟大的十月革命对殖民地国家和殖民地人民产生了巨大影响。战胜殖民主义的信念在人们心中开始萌生并得到增强。

从那时起，绝大多数国家人民摆脱了殖民主义的压迫。当然，为砸碎殖民主义的枷锁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第十五届联合国大会（1960年）通过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对铲除殖民主义体系具有真正的历史意

义。当年是苏联向联合国提出了这一问题，并把这个宣言的草案提交给联合国大会讨论。就这样，世界权威性组织承认了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即殖民主义的丧钟敲响了。

这是联合国召开的唯一取得成果的大会。而且可以说，这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国际大会第一项通过废除殖民主义的决议。几十个国家派遣了国家或政府首脑，其余国家派遣了外交部长前来参加这次会议。我从未见过联合国开过比这更有代表性的会议。这在联合国历史上也未曾有过。

作为这届联合国大会的参加者，我始终关注着这一决议酝酿产生的过程。当时，位于东河畔的联合国总部充满着激动兴奋的气氛。

殖民地国家的代表纷纷登上讲台，愤怒地谴责殖民主义者。这次会议犹如国际法庭在对罪犯作出判决，这一罪犯应对半数以上人类遭到掠夺和剥削而造成无数人的牺牲负有责任。

当时，绝大多数国家都对殖民主义作出了政治判决。联合国大会的那次会议是一次激动人心的事件。我当时想，几百年来束缚几十个国家和人民的枷锁这下就要砸碎了。

当大会通过基本决议时，全场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好象要把大厅拱顶掀掉似的。政治活动家们互相握手庆祝。

当时每个人的心情也不尽相同。殖民主义大国的代表未表现出特别的兴奋，但会场上占上风的是大家表现出来的激情和兴奋，如同一股洪流把他们也感染和鼓动起来了。

当然，主要都是向苏联代表祝贺。尼·谢·赫鲁晓夫和我们所有人都欢欣鼓舞，并开玩笑地问代表团的同志，要握那么多的手，我们能受得了吗？

自然，在那些日子里，全世界的新闻媒介对与通过决议有关的材料也做了充分的报道。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倡议在联合国大厦旁边建立一座纪念那次事件的纪念碑。这件事也不妨可以考虑一下。

虽然，在某些地方还存在着殖民主义的温床，但在那里可以看到明显的迹象，说明历史注定殖民主义必然灭亡。

苏联始终不渝地拥护彻底和全面地实现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希望人类隆重庆祝彻底战胜殖民主义的时刻能够到来。

今天，我们满意地看到，亚非拉不结盟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积极性日益高涨。为了解决自己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艰巨任务，他们需要和平。不结盟运动明确地反战和反帝方针在这些国家的会议上不止一次地得到反映。

苏联始终不渝地支持发展中国家确立自己经济上独立的愿望，支持他们享有支配自己的自然财富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和在平等基础上改造国际经济关系的正当要求。这些国家的人民在克服其经济落后方面，得到了苏联的援助。他们对这种援助的规模和性质是有切身体会的。

非洲的新天地

众所周知，除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外，革命前的俄国同非洲几乎没有交往。英国、法国、葡萄牙、比利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还有德国，将非洲逐块分割。当时，这些国家支配着非洲人民的命运。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非洲大陆上可称之为独立

的国家（其实也只能说是附有条件的独立国家），只有埃塞俄比亚、埃及、利比里亚和南非联邦。而现在，独立国家共有50多个，它们都是联合国会员国。

随着这些国家的出现，苏联始终如一地奉行同所有这些国家建立正常关系、发展平等、互利合作的路线。

前殖民主义者“以退为进”，推行的是另一种政策。为此目的，他们一直在利用已解放了的国家在财政经济和其他方面对前殖民地宗主国的依附关系。美国与他们遥相呼应，正在考虑对非洲实施新殖民主义计划。

从前的比属刚果（现扎伊尔）曾发生的十分悲惨的事件令人难忘。1960年6月30日，刚果宣布了独立。殖民主义者很快明白，帕特里斯·卢蒙巴为首的刚果政府想获得真正的独立。于是，他们决定把盛产铜、金刚石、铀和黄金的最富有的加丹加省从独立的刚果中分裂出去。

以后的事态发生了剧变。有人在刚果匆忙地发动了一场军事叛乱。随后，殖民主义者在保护其公民生命财产的惯用借口下，向刚果派出了大批比利时军队，其任务是确保在加丹加建立傀儡国家。

对美国来说，独立的卢蒙巴政府怎么也不合它的胃口。华盛顿决定采取比布鲁塞尔的规模更大的行动。美国认为，前殖民主义者手里只保留加丹加的财富是不够的。华盛顿决心将这个非洲最大的国家全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美国一方面把直接进行恐怖活动和破坏活动作为自己的手段；另一方面，操纵派往刚果的联合国武装部队。那时，美国在联合国这一机构中有不少忠实的走卒，而年轻的独立国家对这支武装部队的使命还存有幻想。

我们对美国在刚果的政策是非常清楚的，尽管有些具体事实，特别是与暗杀卢蒙巴有关的事实是稍晚些时候才弄清楚的。现在从美国的官方材料中，全世界都清楚地知道了，华盛顿是怎样逐步地，甚至每日每时地策划了和实施了消灭卢蒙巴的计划，艾森豪威尔总统如何批准这一罪恶行动，具体地是交给哪些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来执行这一行动的，打算采用哪些手段来杀害刚果合法政府首脑，等等。

美国对非洲杰出的儿子组织的这场阴谋活动生动地表明，大洋彼岸想实现其“从精神上领导世界”的野心究竟是怎么回事。无论什么说法，如说当时美国领导人似乎“一时糊涂”了等，都永远无法为这一暴行开脱罪责。

克瓦米·恩克鲁玛和塞古·杜尔

我只想简单地谈一谈同非洲国家的一些国务活动家会见和会谈时留下的印象。

加纳是非洲一个古老的国度，有丰富的独特的文化、历史和至今仍保留着的传统。克瓦米·恩克鲁玛在加纳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领导人。作为领袖，他显示出了其团结人民为消除殖民主义制度残余进行斗争的卓越才能。1961年，他对莫斯科的访问是两国关系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最高级会晤表明，领导加纳的是一位有坚定信念、思想成熟的政治家。

在会晤和会谈中，他的谈吐和举止不亚于欧洲国家的国务活动家。所有参加同他会谈的苏方人员都高度评价了恩克鲁玛的原则立场和他庄严自重的风度。

但是，恩克鲁玛任国家元首之职时间不太长（1960—1966年），便被别人取而代之。这当然不应由苏联来进行什么“公正的审判”，以确定在骚乱事件中究竟谁是谁非。无论如何，这是一项内部事件。但是，上述事变发生后，苏加关系还是经历了一段冷淡时期。

同过去一样，我国主张同加纳保持友好关系。

苏联欢迎非洲另一个国家几内亚的独立。我们认为几内亚的领导人塞古·杜尔是一位争取非洲自由的坚强战士。苏联同几内亚有着良好的关系。1958年、1960年和1965年，塞古·杜尔作为该国总统对苏联进行了访问，1961年列·伊·勃列日涅夫作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对几内亚进行了访问。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进了这一良好关系的发展。与塞古·杜尔举行的会谈给我们所有同他见过面的人都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1962年10月11日，我在纽约同塞古·杜尔的会谈更是令人难忘。几内亚领导人详细地介绍了他的国家所面临的任务和解决的办法。

他说：

“几内亚政府和几内亚民主党认为，我国必须同苏联发展各方面的联系。几内亚人民感谢苏联的无私援助和支持，使他们的国家巩固了独立和在国内建设中取得了成就。几内亚奉行的是由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决定的政策。这一政策不仅考虑到了几内亚内部形势的特点，也考虑到了整个非洲大陆的形势。”

塞古·杜尔说：

“苏联和其他与几内亚友好的国家对非洲大陆当前形势

的某些方面，以及非洲国家的某些行动可能还不完全理解。但是，几内亚和与几内亚在同一行列中的非洲国家的政策的锋芒是针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这一点是主要的。”

几内亚领导人承认：

“在几内亚实行广泛民主改革，使人民能真正行使自己不可剥夺的主权，这些远不是使所有人都感到高兴。首先是那些过去处于特权地位的社会阶层并不高兴。的确，他们作为帝国主义的帮凶，怎么会同意对工业企业、所有外国银行、保险公司实行国有化，对内外批发贸易实行垄断呢？这些丧失了特权阶层的人们，在国外帝国主义大国的支持和唆使下，企图破坏几内亚政府正在实行的民主措施。”

我喜欢塞古·杜尔在介绍几内亚面临问题和任务、展望国家发展前景时所表现出来的直率和真诚的态度。他的分析有根据，既考虑到国内形势，也考虑到国际形势的因素。

几内亚领导人还讲了这样一个有意思的思想：

“几内亚没有宣布它正在建设社会主义，但它敢于开诚布公地宣称：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特别是同苏联的合作，是在非洲大陆上彻底消灭殖民主义制度、争取非洲大陆各国人民国家和社会进步斗争中的最重要因素。”

塞古·杜尔认真听取了我对苏联对外政策基本方针所做的说明：

“苏联同几内亚之间有着良好的基础。这一基础能使我们不仅继续保持两国之间的关系，而且可进一步发展它。我们两国完全能够在实现我们面临的重大任务的征途上取得新的成就。”

我同塞古·杜尔的一次会见是1979年在柏林举行的。苏

联党政代表团在那里参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国30周年庆祝活动。在国庆招待会上，我同塞古·杜尔进行了热情的谈话。他重申了以前说过的发展苏几关系的思想。他强调说：

“我深信，苏联始终是非洲人民的朋友。非洲人民还需要经过漫长道路才能实现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的完全独立。”

毫无疑问，塞古·杜尔的确是非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斗争老战士队伍中的一员。

现在，独立几内亚的奠基人已经去世，新的领导人已经在这个国家执政掌权，但苏几关系仍然存在着良好的发展前景。

埃塞俄比亚革命领袖

门格斯图·海尔·马利亚姆

埃塞俄比亚革命领袖、现任埃塞俄比亚人民民主共和国总统门格斯图·海尔·马利亚姆每次访问苏联，都对苏埃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他在非洲其他反殖民主义的国务活动家中无疑是出类拔萃者。

门格斯图的观点有一个演变过程。他最初是为了争取埃塞俄比亚真正独立而开始了斗争，领导了反对君主制度的革命。他的行动表明，他不仅看到了国家发展的近期任务，而且还看到了社会改革遥远的前景。

许多其他国家的经验告诉门格斯图，国家的独立不能建立在要政治手腕和暂时缓和同帝国主义大国矛盾的不稳固基

础之上，而必须依靠国内局势的稳定和选择好外部朋友。在他的领导下，革命的中坚力量勇敢地着手进行有利于人民的社会改革，消灭那些靠剥削劳动人民生活的阶层和集团所享有的阶层特权和其他特权。

门格斯图认真地、从容不迫地着手解决埃塞俄比亚革命的根本性问题——创建埃塞俄比亚劳动人民的先锋党，它是国家向前发展的主要动力。埃塞俄比亚工人党的建立是革命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具有生气勃勃的力量。

同门格斯图会见时得到的最初印象是，他是一个有正确见解和讲求实效的人。他简明扼要地介绍他的计划，并强调实施计划方面所遇到的困难。谈话时令人佩服的是他阐述自己的见解经过深思熟虑，并且坚信做事必须有充分把握，不能仓促行事。

其他见到过门格斯图的苏联代表在同门格斯图会晤和会谈后，也都有这样的印象。

1982年10月，门格斯图·海尔·马利亚姆访问莫斯科时强调指出：

“埃苏两国人民的传统友好关系在埃塞俄比亚发生革命后获得了新的特点和规模。从那时起，我们的关系不再仅局限于友谊了，它已成为为同一目标而奋斗的盟友关系。如要指出埃苏两国人民共同任务中的主要内容，那就是巩固国际和平，建设没有剥削、充满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

有充分理由说，目前苏联同埃塞俄比亚的关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友好。埃塞俄比亚进入了崭新的阶段——国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向前发展。

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功勋

你只要浏览一下拉丁美洲地图，就会知道，地球上的这个洲，是一个广阔的世界。这个洲现有33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传统、文化和今昔的英雄，这些英雄与祖国的土地、人民的生活及其甘苦有着最紧密的联系。他们都在不同的时期为争取国家独立和使国家能够在独立的条件下发展而流过血。

拉丁美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已持续了几百年。实际上，在有些国家，这一斗争至今仍未结束。外来的经济和政治压迫束缚了这一地区国家的发展。

拉丁美洲国家和苏联相距甚远，发展的道路也各不相同，但这些并没有妨碍它们共同要求发展彼此之间的友好关系。地球上这一地区的人民清楚地知道，是苏联人把世界从威胁全球的褐祸¹中拯救出来。

在我国革命的最初日子里，当远离墨西哥城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彼得堡出现新世界的曙光时，我国人民就把拉丁美洲人视为自己的朋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初期，拉丁美洲国家就开始纷纷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至今，这些国家仍是我们争取和平、反对核灾难的天然盟友。

毋庸置疑，终有一天，那些目前暂时还在外国垄断集团仆从铁蹄下呻吟的国家将紧握苏维埃国家伸出的友谊之手，并将加入到为和平、为各国人民真正独立而奋斗的战士的队伍中来。

¹ 指希特勒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译者

全世界严厉谴责智利的皮诺切特反动傀儡政权。10多年来，这个国家一直遭受华盛顿扶植上台的一伙刽子手军政府的压迫。

智利人民不顾对民主力量的镇压、对最广泛意义上的人身自由和人权的无情压制，正在逐渐地积蓄力量，振作起来。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他们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首先，智利大小城市举行的群众集会和游行就说明了这一点。警察的镇压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它已无力平息群众的抗议活动。

苏联人民对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名字还记忆犹新。虽然，他领导智利的时间比较短，但却在人民争取使国家摆脱外国强权势力和美国垄断集团的压迫的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我国人民怀念阿连德，他是一位反对帝国主义的无畏战士，是支持同苏联友好的拥护者，是主张各国人民间保持和平的著名活动家。

1972年12月，阿连德对苏联进行了正式访问。在我的记忆中，同他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谈是一次极其友好的会谈。他深刻了解国际形势及美帝国主义的习性，深知美帝国主义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不仅把智利，而且把整个拉丁美洲都看作不过是自己的塞外疆土。

阿连德不是共产党人，但他制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纲领却是智利实行进步改革和摆脱美国垄断资本奴役的纲领。

萨尔瓦多·阿连德在法西斯政变10个月之前在联合国的讲话，充满了对智利命运的深切担忧，他说：

“我们是诡计多端、凶狠危险的帝国主义展开新一轮进攻的牺牲品，帝国主义的目的是要阻碍我们的主权国家行使自己的权利……反对我们的势力躲在暗处活动，没有识别标志，

但他们拥有强大的武器，他们在各个领域处于强有力的地位……我们不仅面临财政封锁，而且是赤裸裸侵略的牺牲品。”

同阿连德及其随行人员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谈可以说是亲切的和坦率的。无论是讨论国际问题，还是双边关系问题，都是在充分谅解的气氛中进行的。

智利总统表示希望向这个力图自立的国家提供一些经济援助。苏联在这方面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这并不是因为苏联拥有多余的财富，而是因为我们国家真心想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智利人民克服它在同帝国主义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压力斗争时所遇到的困难。

智利总统阿连德是一个谦逊、高尚的人，他不掩饰自己在莫斯科朋友中间时感到的喜悦心情。无论是在克里姆林宫城墙内的大克里姆林宫乔治大厅举行的招待会上，还是在克里姆林宫城墙外，我们的智利客人都体会到了我国人民的亲切和友好之情。阿连德所到之处，都受到许许多多莫斯科人的热烈欢迎。

总统的夫人奥滕西娅·布西·德·阿连德也是一个驰名的人物。她现在仍是一位重要的社会活动家，她为和平，为使智利人民从皮诺切特政权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而发出的呼吁具有不小的影响。

每一个参加会谈的苏联人都同阿连德本人和他内阁的部长们交谈过。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欢迎智利客人的招待会为我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自然，我们的谈话是围绕着如何评价美国对智利和整个拉丁美洲政策的问题进行的。

阿连德说：

“我坚决谴责华盛顿从我国建立民主政权第一天起就对智利所采取的敌视和不友好的态度。”

当时，连阿连德本人都不完全清楚，他的内外敌人为了推翻人民政权准备施展什么样的阴谋诡计和采取什么样的残暴行动。

上面这段话联系到阿连德在会谈时所发表的言论，给人以明确的印象，阿连德是一位能够为正义事业献身的活动家。所有苏联领导人在同访问莫斯科的智利总统会谈后，都有这样的看法。

就他本人来说，阿连德是一位特别勇敢的人。看得出，他忠于理想和他所致力的事业，这使他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

当皮诺切特匪帮包围了总统府时，他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打出白旗投降，保住自己的性命。但阿连德没有这样做。他眼看着同志们牺牲了，勇敢的总统不仅没有投降，而且自己投入了战斗。他就这样倒下了，手中还握着冲锋枪。一位民主国家的总统手持武器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并终于捐躯身亡。在20世纪的历史上难道还有类似的事例吗？不！这样的事例是绝无仅有的！

可以满怀信心地说，阿连德为之奋斗和献身的事业迟早会胜利，智利人民将重新自由自在地呼吸。

声援尼加拉瓜

几年来，围绕尼加拉瓜搞了许多阴谋诡计。这还不够，

一些傀儡政权统治的邻国还公开向尼加拉瓜派遣了成千上万的反革命分子和雇佣军。美国的武器源源不断地运进这些国家，以供由美国教官训练的破坏分子用来反对尼加拉瓜。可以说，有人正在对这一国家实行国家恐怖主义政策，其方式是示威性的、不加掩饰的、大吵大嚷的。

事实上，美帝国主义反动派反对尼加拉瓜的阴谋活动引起了全世界的愤慨。这个英勇的国家和人民的领导人很清楚，谁是尼加拉瓜的真正朋友，谁又是他们的敌人。

苏联与尼加拉瓜的外交关系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正式建立的，那时的外交关系是形式上的，索摩查分子也不想使这种关系有其他发展。而且从客观上来说，当时其他发展也是不可能的。

1979年人民革命¹后，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并得到了良好的发展。苏联人民向尼加拉瓜及其进步政权伸出了援助之手。苏联人民坚决谴责华盛顿现政府对桑地诺国家实行的侵略政策。苏联信守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从来没有，也不准备违反上述原则去利用自己向拉丁美洲或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提供的援助。

帝国主义骗子手们大造舆论，颠倒黑白，诬蔑尼加拉瓜人民为自己提出的崇高目标。他们说什么，似乎尼加拉瓜也许已经是，也许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在中美洲的据点和苏联在中美洲的基地，这一荒谬的论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市场。只有那些企图采取一切手段来扼杀尼加拉瓜人民政权的人们，只有那些早就以此为已任的人们，才会轻信这些谎言。

尼加拉瓜人民取得的重要民主成果之一是，尼加拉瓜不

¹ 指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推翻索摩查王朝。——译者

顾桑地诺革命的敌人千方百计的阻挠，于1984年11月成功地进行了普选。这是尼加拉瓜历史上第一次自由选举。选举结果令人信服地证明，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持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和尼加拉瓜政府执行的方针：重建国家，巩固民族统一，加强政治和经济独立，争取以公正的政治方式解决中美洲问题。

选举中，绝大多数选民投票选举了丹尼尔·奥尔特加为尼加拉瓜共和国总统。丹尼尔·奥尔特加1962年加入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从此开始走上革命道路。奥尔特加十分积极地参加了人民反对美国傀儡索摩查血腥独裁统治的武装斗争，1967年被捕后，在索摩查的监狱里被囚禁了7年。

奥尔特加越狱后，又加入了争取人民自由的战士行列。革命胜利后，他马上领导了新的尼加拉瓜的最高立法和执行机关——民族复兴政府执政委员会。

1982年，奥尔特加访问了莫斯科。在当时举行的会谈中，他令人信服地介绍了本国的困境，谈到了美国及其在拉丁美洲的傀儡对尼加拉瓜的侵略行为所造成的复杂局面。

奥尔特加简明扼要地阐述了桑地诺政府的对外和对内政策。

我们的同志们，其中包括我，在克里姆林宫代表苏联方面同奥尔特加进行了会谈，大家都对他怀有深深的敬意。他对所选择道路的正确性深信不疑，冷静地判断问题，谈论困难时不过分渲染，他相信，尼加拉瓜人民在维护自己独立的斗争中是团结一致的，这些都是他的特点。总之，奥尔特加给人的印象是，他是一位具有独特风格和意志坚强的人。

我同尼加拉瓜外交部长米格尔·德斯科托会见过几次。他是一位十分有教养的、忠于自己的人民的政治活动家。他有天主教神父的教职，这一事实很好地说明了尼加拉瓜的社会情况，在这个社会中对不同世界观的人给予应有的尊重。1987年5月1日，我的老朋友、尼加拉瓜的著名国务活动家、外交部长被授予1985—1986年度“加强国际和平”列宁国际奖金，我为他感到非常高兴。

我国高度评价尼加拉瓜领导人和苏联领导人之间已建立起来的那些接触，通过这些接触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渴望过和平生活和争取独立发展的尼加拉瓜人民思想和计划。

苏联是尼加拉瓜的朋友，并且这种友谊是建立在相互对等的基础上的。尼加拉瓜同其他越来越积极地为争取自由和独立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国家也在建立这种关系。

苏联一直主张，任何人都不应干涉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国家的事务。这个地区已成为紧张局势的危险策源地，应该通过和平手段，在美国无条件停止干涉这一地区国家内部事务的基础上解决那里业已形成的局势。尼加拉瓜和古巴的建设性立场，“孔塔多拉集团”和“支持孔塔多拉集团”¹⁾国家的倡议为采用这种解决办法创造了条件。

美国为了替自己的行为辩解，进行厚颜无耻的欺骗，抛出了凭空捏造的莫斯科和哈瓦那搞“阴谋”的谎言。但是，任何欺骗都掩盖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一地区国家掀起强大的解放运动的真正原因是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人民群众的极端贫困。

1) 又称“利马集团”。——译者

磁铁般的相互吸引作用

毋庸置疑，苏联同墨西哥关系中，磁铁般的相互吸引作用一直占有很大比重。当然，这些关系的水平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但是它们始终是在友好的旗帜下发展的。

1924年苏联同墨西哥建立了外交关系，1926年，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伦泰^①作为苏联大使来到墨西哥城。那时，苏联忠于自己奉行的要在各国人民之间建立和平与友谊的政策，向墨西哥表明了自己的善意态度。柯伦泰在墨西哥期间，两国关系的发展呈现着不断上升的趋势，而这一趋势似乎又延续不断地通向了未来。

1938年3月，拉萨罗·卡德纳斯总统采取了一项果敢的行动，将国内的石油资源和石油工业收归国有，这就成了两国关系发展中一个突出的里程碑。墨西哥结束了美国石油垄断集团在墨西哥为所欲为的时代。墨西哥人民及其领导人正确认识到，苏联和苏联人民在这个重要和尖锐的问题上是同情墨西哥的，尽管这个行动显然是墨西哥的内部事务。

然而，出现了一些情况。还在1930年，在地方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我们两国的关系中断了，到1942年才得以恢复，我们于1943年任命康·亚·乌曼斯基为驻墨西哥大使。可惜，1945年初，他在墨西哥因飞机失事遇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墨西哥站在反希特勒同盟一边。

过去，我们同墨西哥的经济贸易关系不能说是积极的，尽管现在双方已采取合情合理的态度，力图发展这种关系并

^① 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1872—1952）。世界上第一位女大使。——译者

为此目的利用一切可能性。数十年来，墨西哥始终不渝地执行加强自身独立的政策，并对帝国主义企图将墨西哥的外交政策（并尽可能地将墨西哥的经济）纳入华盛顿的计划的野心尽力给予回击，这一事实本身就为苏墨两国的友好关系创造了良好的气氛。在两国的对外政策方面，这表现得最为突出。

1968年5月，墨西哥外交部长安东尼奥·卡里略·弗洛雷斯访问了苏联。后来，他在80年代初出任墨西哥驻莫斯科大使。那次访问之所以令人难忘，是因为它是拉丁美洲资产阶级国家这样级别的代表第一次正式访问苏联。卡里略·弗洛雷斯强调：

“自两国恢复外交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再也没有蒙上任何阴影。在双边交往方面，我们两国的利益在任何一个领域里都不是互相矛盾的，所以没有任何理由能阻碍我们交往的进一步发展。”

路易斯·埃切维里亚总统在1973年6月和何塞·洛佩斯·波蒂略总统在1978年5月对苏联进行的访问，他们同苏联领导人的会晤和会谈，对加强苏联同墨西哥之间的信任和友谊无疑具有重大意义。这两次访问又一次表明，双方对扩大合作都有兴趣，在争取和平、裁军和缓和的斗争中的立场是一致的。我们同墨西哥领导人的会谈完全是友好的会谈。

我们谈判桌对面的人完全清楚，一定要维护自己独立的国家同美国垄断资本走的不是一条路。美国垄断资本这个伙伴在同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中只承认一种模式，即主仆关系。我们理解墨西哥领导人的这些想法。

苏联方面强调说，社会主义国家愿意同墨西哥，正如同

拉丁美洲其他国家一样，在尊重不干涉他国内政、平等互利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关系。

每次进行的这种访问都在整个拉丁美洲引起很大反响。当然，华盛顿官方对此是不欢迎的，但这却又一次证明，这种会晤是必要的，而且有巨大的政治意义。

为发展洛佩斯·波蒂略总统访问莫斯科的成果，1981年5月，墨西哥著名政治活动家、外交部长豪尔赫·卡斯塔涅达正式访问了苏联。同他的会谈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会谈主要讨论了两国的经济关系问题。

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我同墨西哥代表团团长经常接触。我同墨西哥许多著名外交家的会晤至今记忆犹新，他们是在战争年代曾任墨西哥驻莫斯科大使的路易斯·金塔尼利亚，以及帕迪略·内尔沃等聪明和卓越的活动家。

即使今天也完全可以说，苏墨关系的发展有着良好的土壤。两国在许多问题上的对外方针是一致的，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是相近的。为两国合作开辟了广阔天地的主要因素是双方都关心争取和平和消除战争威胁的斗争。

1986年8月，阿根廷、希腊、印度、墨西哥、坦桑尼亚和瑞典6个不结盟国家领导人在墨西哥会晤这一事实说明，墨西哥对争取和平的斗争采取积极关心的态度。6国领导人从墨西哥发出强劲有力的呼吁，要求消灭核武器，要求和平。

— 第十三章 —

近东的十字路口

戴维营的交易 “这些法老是怪人” 丰富的处事艺术 比太阳的光辉更灿烂 海市蜃楼和萨达特的衰落 辛辣的讽刺 金字塔下的侏儒 不，一线之光还没有出现 阿拉法特其人 特拉维夫头脑发昏 列宁的话的现实意义

考虑到近东事件的频繁迭起及其意义，我觉得将这个地区的问题单列一章是很自然的。

帝国主义势力在这个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不止一次地发展成为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侵略战争。

戴维营的交易

苏联为解决近东问题所采取的行动是人所共知的。我国提出了许多建议来实现这一目标。苏联领导人同各个不同级别的外国活动家举行过数百次会晤以讨论近东问题和解释苏联对此问题的立场。

在苏联的积极参与下正在进行一场捍卫阿拉伯人合法要求和权利的斗争。

1967年以色列对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的进攻更尖锐地提

出了如何对待侵略政策的问题：是允许侵略者用被侵占的领土来进行政治交易，从而奖励他们所犯的罪行呢，还是要求他们立即撤军？是扼制还是纵容侵略者——事件发展的逻辑使所有的国家都面临着这样的选择。苏联的出发点是必须竭尽全力来消除以色列侵略所造成的后果。

苏联对阿拉伯国家的支持阻止了侵略者达到他们的许多目的。但尽管如此，由于以色列及其帮凶和庇护者们无休止的阴谋活动，近东的局势仍然令人忧虑。

近东问题日内瓦和平会议（1973年）的召开是苏联外交以及其他爱好和平国家所做努力的重大成果。我受权在这次会上发表声明，阐述苏联对近东事务的立场。我说：

“我们的立场是要求以色列从所有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出自己的军队并承认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合法权利，包括他们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我们的立场是：必须有效地保障包括以色列在内的所有近东国家在和平条件下独立生存的权利。”

遵循这条原则路线，苏联同世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过去和现在都谴责以色列的侵略行径。

埃及退出阿拉伯统一阵线是对整个阿拉伯世界利益的沉重打击。这似乎是最不可能的事情，但终究还是发生了：埃及走上了同侵略者勾结的道路，而华盛顿和特拉维夫高兴得手舞足蹈。

但这是在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总统逝世以后发生的，萨达特成了他的继任人。如果我不谈谈纳赛尔和我同他的会晤，那么，我的关于同各国国务和政治活动家会晤的回忆就会是残缺不全的，更何况正是他在世时，苏埃关系实现

了向发展方向的转变。

在苏联的积极协助下建成的阿斯旺水坝给埃及带来了光明，这是那个时期两国关系中美好的象征。

人们亲眼看到，同我国友好给人民带来现实的好处，促进国家经济的高涨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埃及人民越来越注意倾听阿斯旺涡轮机发出的轰鸣声。

苏埃关系的不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纳赛尔深深懂得自己国家的利益和了解苏联所奉行的爱好和平的政策。他清楚地意识到，埃及无论是在发展国家经济、巩固国防潜力，还是在解放被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方面都得不到帝国主义的援助。他意识到了，在同我们见面时也多次谈过这一点。

我多次听到纳赛尔说，阿拉伯人不能向以色列投降。他总是重复说：

“必须解放所有被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领土。”

他了解阿拉伯人的事业及性格，善于用通俗的语言使他们树立正义必胜的信念。纳赛尔对我国的访问，苏联活动家对埃及的访问更巩固了他的信念，使他确信事情一定会这样。

“这些法老是怪人”

同纳赛尔的每次谈话都各具特色。这种特色也取决于就什么性质的具体问题交换意见。但总是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共同特点。因为纳赛尔是个有固定原则的人。

从第一次会见纳赛尔到最后一次同他见面，我觉得他一直对苏联很友好。他高度评价苏联在建设阿斯旺水坝时给予的帮助，认为苏联的帮助是高尚的。纳赛尔信任我国

他说：

“苏联不止一次地在埃及感到困难，有时甚至是遇到危机的时刻同它站在一起。”

在纳赛尔时期，埃及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保持着友好关系。纳赛尔是不结盟运动的奠基人之一，他做了不少事情来促进这一运动，扩大其活动范围。

至于对待帝国主义国家，更不要说对以色列，埃及的领袖一直采取不妥协的立场。他认为，向侵略者、向帝国主义分子做让步的思想是一种不能容忍的思想并予以屏弃。在交谈中，他不止一次地强调：

“不能相信西方大国的政治家们，他们一定会欺骗阿拉伯人。”

自然，纳赛尔的政策方向不合乎帝国主义势力的胃口。

如果有人断言，纳赛尔一开始就想通过扩大劳动人民的权利和权力来实现改变埃及社会的社会结构的方针，那么，这种说法是把事物简单化了。不过，这也是可以理解的。1952年，在一批军官的领导下，军队进行了推翻帝制的革命。

革命的领导人关于国家今后发展的道路没有任何理论根据。纳赛尔自己就曾指出过这点。当时的主要任务是保障埃及的独立和自主。

自然，产生了改善劳动人民，尤其是占国家人口70%的农民的地位问题。1952年宣布的土地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顺便说一下，埃及是近东和非洲第一个宣布这种改革的国家。谁也没有指望这场改革会根本摧毁封建主义的基础，就连纳赛尔本人也是这样。尽管如此，它对那些缺少土地的农民的地位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却是无可争

议的。

纳赛尔是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逐步地认识到，如果不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国家就不可能顺利发展。他开始对社会政治学，其中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越来越感兴趣。这是他自己说的。他研究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因此，纳赛尔努力在某种计划性纲领的基础上发展经济、承认埃及社会中存在着阶级斗争和认为必须建立一个政党作为政权的政治支柱就都是合乎规律的了

纳赛尔思考着埃及和人民的未来。他尽最大的努力使这一未来更加美好、更为光明

在同我们交谈时，纳赛尔对客人总是关怀备至。毋庸讳言，我喜欢纳赛尔谈话的风度。他不喜欢长篇大论。通常，纳赛尔一坐下后就说明希望就什么问题交换意见，然后阐明自己的立场。而且纳赛尔不在乎他先说还是后说。他认为讨论谈话的程序如果不是多余的话，也是无多大益处的。

纳赛尔的发言通常都很简短，但意思表达得很明确。他不大喜欢回顾历史。当然，同所有埃及人一样，纳赛尔也为埃及古老的历史和丰富的古迹感到自豪。但在同外国人交谈时，他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尽自己的爱国主义义务。

每当有人赞美金字塔时，他总是开玩笑。有一次，他在同我谈话时说：

“这些古怪的法老们干吗要修建金字塔呢？要知道，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它们对劳动人民都是毫无用处的。他们建造金字塔的目的同人民毫不相干。”

纳赛尔在与人交谈时从未提高过嗓门，甚至在谈到以色列和帝国主义时也是如此。他似乎根本不动感情。当然，这只

能说他非常善于控制自己而已。

我不止一次地看见过和听到过纳赛尔在群众集会上的讲话。他通常是按预先准备好的稿子讲。声音不高，甚至声音很小，但很有说服力。从各方面看，他对专门的演讲技术问题不大重视。尽管如此，他的话语总是一针见血，所以听众怀着很大的热情听他演讲。

当纳赛尔在工人、职员或者农民面前讲话时，他一般都是讲听众易懂的阿拉伯语言中的埃及方言。他很了解劳动人民的问题，并将这些问题的解决同全民族的任务联系在一起。

据我和其他苏联同志的观察，纳赛尔及其家庭生活很简朴。我不止一次地去过他们在开罗的官邸，同其他住宅相比，它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里面没有任何奢侈的东西。纳赛尔不欣赏富丽堂皇的王宫，从各方面来看，人们喜欢这一点。

纳赛尔从不炫耀总统的地位和权力，虽然他享有无可争议的威望。

但是，连纳赛尔那么健壮的身体也承受不了紧张的斗争。他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在我国高加索治疗一段后，他的身体稍见好转。他强壮起来，容光焕发。但是，纳赛尔回到开罗后，不顾医生们，包括苏联医生的劝告，又一头扎进事件的漩涡中。不这样，他就不成其为纳赛尔了。

有一次，在我访问开罗时，纳赛尔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说：

“从高加索回来后，我的身体75%是健康的，25%是不健康的。”

随后又补充道：

“这都怪我自己。25%——这都是我的过错。”

我没有别的话可说，只能说：

“我还是劝您按苏联医生们说的那样去做。”

纳赛尔答道：

“我尽力而为。”

但是，他脸上的表情说明，这样回答更多的是出于礼貌。他的整个外貌表明，他正经受着疾病的折磨。几个月后，1970年9月，这位杰出的人物就溘然长逝了。

在近东的具体条件下，尽管强调主观因素的作用有陷入极端的危险，但我敢说：

“如果这个人还能活上几年的话，那么这个地区的形势就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但如果对一连串事件做一分析的话，那么，他已经做的一切，对确立阿拉伯人的自我意识及其合法权利就是一副强大的催化剂。而这本身就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丰富的处事艺术

我不能不谈谈马哈茂德·法齐，他是纳赛尔的战友、埃及外交事务中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这个人在所有的埃及外交官中，看来在某些方面甚至可说是在阿拉伯各国的所有外交人员中，也是非常突出的。

早在1952年推翻国王宝座的埃及革命发生之前，法齐就已经是外交官了。法齐官运亨通，在被任命为外交部长之前，他从1947年至1952年担任过埃及常驻联合国的代表。革命后，他在新的领导班子中确立了牢固的地位，成了纳赛尔总统在外交事务方面的得力助手。

我认识法齐至少有25年之久。我同他最初的会晤和会谈

是在联合国进行的。他各方面素质很好，经验丰富，善于捍卫本国和阿拉伯人民的利益。

早在50年代初，以色列外交政策的侵略趋向就越来越明显了。在联合国内，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的冲突日益增多。在这些政治搏斗中，美国的日子也很不好过，因为实际上是它在指导以色列的外交政策。

苏联在那个时期就采取了积极支持阿拉伯国家和谴责特拉维夫政策的侵略趋向的立场。苏联认为，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相互关系只能建立在和平的基础上。这显然使苏联的立场同美国的立场对立起来，因为后者鼓励以色列对阿拉伯人推行扩张主义政策。

当时，阿拉伯世界本身在捍卫自己利益方面，特别是当它同美国发生冲突时，就已经不是团结一致的了，这使得局势变得更加复杂。既然是关于阿拉伯人的事，在这种条件下许多事情就取决于埃及的政策了。

确实，在捍卫阿拉伯人的权利时，法齐也常常受偏激情绪影响，根本不承认以色列有生存的权利。但是，法齐比其他许多人更清楚，迟早总得承认存在着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这一事实。在他的发言和声明中，一直贯穿着这样一个思想，即在处理近东事务时应该最大限度地捍卫阿拉伯人的合法利益。

法齐被任命为埃及外交部长对苏埃关系的发展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就其言行和讨论问题、进行谈判的风度来看，法齐属于具有欧洲气质的人。他具有能从各个不同角度一连数小时不停地分析同一个问题的才能，善于在分析过程中用谈话对方的眼光来看待所讨论的问题。

我在访问开罗以便同纳赛尔会见的那些日子里，高兴地

发现，甚至在因健康原因辞去外交部长职务后，法齐还出席我们的会晤。他仍然是纳赛尔的亲密顾问。他的继任者们处理对苏实际事务的艺术，比起他来就相形见绌了。

比太阳的光辉更灿烂

不谈一下我赴埃及古城卢克索的旅行，也许将是个疏漏。它离阿斯旺仅咫尺之遥。这儿有一度是古埃及的首都、被称为“一百扇门”的底比斯（忒拜）城。关于它的美丽和富饶的美名早在古希腊时就传到了欧洲。

这是“历史之父”——古希腊学者希罗多德在公元前5世纪参观过底比斯城并将它称为“一百扇门”之城。底比斯作为伟大文明的中心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而现在卢克索似乎是在欢迎苏联客人并对他们说：

“我们知道，你们是到阿斯旺去，这是名副其实的埃苏人民友谊纪念碑。但是请你们也一定去看看时代本身保存下来的远古时期的遗迹。”

我曾两次参观过卢克索。城内雄伟的神庙群历经数千年风雨的侵蚀仍巍然不动；外敌的侵略虽使许多埃及圣殿遭受严重破坏，但它们却屹立不动。

毫无意义的破坏狂留下的痕迹至今在哈夫拉金字塔旁石制的狮身人面像身上仍不难发现。在卢克索古老的神庙上也有许多这样的痕迹。但是，甚至在这种半坍塌的状态下，它们也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该城的主要古迹是所谓的南神庙，显得特别漂亮。它那雄伟挺拔的圆柱倒映在尼罗河平静的水面上。此庙建于数千

年前，现已成为古埃及人勤劳和创造天才的纪念碑。

当你走近神庙那残存下来的圆柱时，你会为这一高耸几十米的巍峨建筑感到震惊。用来装饰正门的拉美西斯二世法老的3座雕像，每个都高达20米以上。

有一座由玫瑰色的阿斯旺大理石砌成的、刻满象形文字的漂亮的方尖碑也保存了下来。人们告诉我，这座碑有2500多吨重。昔日曾与它并肩而立的“伙伴”今天流落到巴黎的协和广场，它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让人们联想起一次由拿破仑的可耻失败而告终的对埃及的远征。

南神庙的艺术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它四周墙上美妙的人物组画令人叹为观止，它描绘古埃及历史中一个值得纪念的事件——公元前14世纪埃及人和赫梯人之间的一场战斗。率领埃及部队进行战斗的是拉美西斯二世。

另外一组，即卡纳克神庙群，位于卢克索城的北部。这儿也是廊柱林立：一些杂乱无章，另一些则形成极为和协的群组。

神庙著名的圆柱大厅内100多根圆柱整齐地排列成行。中央，12根圆柱每根都高达21米，粗10米。就是按现在的标准来看，这也是相当宏伟的建筑。

几百年来，人们一直企图解开埃及金字塔及神庙的某些建筑艺术之谜。但是，时至今日，许多东西仍然不清楚。

卢克索这些庞大的古代建筑的遗迹占据着很大的面积。光走马观花地浏览一下那些巨大的雕像和浮雕、宏伟的廊柱及林荫路两侧排列成行的羊头雕像斯芬克司，就不是一天能做到的。对参观卢克索的人提出的问题只有专家们才能回答。

而来过卢克索的人又有谁能不想去看看著名的帝王峡谷呢？要想去那里，只需到尼罗河的对岸，即西岸就行了。那

儿在利比亚高原的峭石林立的支脉中有一个“死人城”。

这儿在不同的时期发现了古埃及统治者们的遗骨和遗物。这些发现对科学和我们现代人来说当然具有不同的价值。但是，所有这些都撩开了那幅将我们与法老帝国的世界隔开的帷幕的一角。在那个世界里，有过富贵和贫穷、权贵享有无限权力，而奴隶们则无权无势；有过战争的胜利与失败，有过被时间的烟幕笼罩起来的普通人的生活以及在法老和祭司参加下举行的盛大堂皇的仪式。

有经验的导游将我们带到图坦卡蒙法老陵墓的入口前（图坦卡蒙法老于公元前14世纪执政）。他是名扬四方的宗教改革者埃赫那顿法老的女婿。埃赫那顿的妻子、美丽的涅菲尔提提的名气也不比他小。至今，人们还在文学、雕塑和绘画中称颂她的美貌。

图坦卡蒙取消了岳父所进行的宗教改革，但是他在刚满18岁时就死了。由于偶然的原因，这位少年法老的陵墓是唯一未遭洗劫、几乎是完好如初地被保存下来的陵墓。帝王峡谷其他墓中的陪葬品成了小偷和强盗的猎获物。因此，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现在正在尽最大可能竭力保持这座陵墓里面和外部的原貌。

我们兴致勃勃地沿着在岩石上凿成的阶梯往下走。通过一个狭窄的走廊就来到了一个比较宽敞的地下室。其面积约有20—25平方米。右边有个小一些的房间。那儿放着用浅色的岩石做成的法老的巨大石棺。4个美丽的、展开着翅膀的地下王国仙女的雕像精心守护着棺椁的四角。

人们告诉我们，在石棺里找到了几千件供法老在阴间使用的物品。现在，所有这些东西以及这位古代统治者的木乃

伊陈列在开罗的埃及博物馆内，我们在那儿参观过。这些在陵墓里发掘出的珍宝曾在许多国家展览过，使成千上万的人得以欣赏可称得上是一件艺术瑰宝的图坦卡蒙法老华丽堂皇的金面具。这些珍品在我国的博物馆中也展出过。

当我们置身于任何外界声音都传不进来的地下陵墓里时，我们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思想已驶向那个年轻的帝王在统治其臣民和奴隶的世界。

忽然，利季娅·德米特里耶夫娜问道：

“如果悬在我们头上的岩石塌下来把棺椁压住了怎么办？这里可看不到任何支撑的东西啊。”

我不知如何回答，只好说：

“为什么这块岩石要等到我们在这儿的时候塌下来呢？”

从我们进来时走过的地下迷宫的那一边射过来的一束明亮的光线驱散了我们有些阴郁的心情。人们向我们解释道，这是古代的秘密之一。其实，这个谜很容易就解开了。在深深的地下，古代艺术家们似乎是在天然的太阳光下绘饰墙壁，这是因为，在通往法老陵园的迂回曲折的地下迷宫的所有转弯处，都安排着一些手持磨得发光、因而能象镜子一样反射太阳光线的金属片奴隶。地面上用第一块金属片摄取来的光线就按照规定顺序逐级反射到地下深处，因而在下面就好象是在天然阳光照射下进行一切工作。

这使我想起了古埃及建筑的另一杰作——离阿斯旺不远的阿布辛拜勒神庙。祭司们经过巧妙的设计，使法老诞辰那天地平线上出现的第一束阳光正好照射在位于神庙深处的法老塑像的皇冠上。当太阳把一天中的第一束火焰投向地球的时候，似乎是为照耀它的宠儿。

我们在图坦卡蒙的最后“栖身地”度过了将近一个小时，所有的参观者都以比进去时要快得多的速度急匆匆地离开了陵墓，好客的主人也发现了这点。呼吸一口新鲜空气之后，我们把视线投向那座不算太高的石崖，那里建有保存埃及过去统治者遗骸的陵墓。

这些埃及古代文明的遗迹所以能传到今天，要归功于干燥和炎热的气候。

当我们去阿斯旺附近的上埃及时，我问地方当局的一位代表：

“你们这儿什么时候下过最后一场雨？”

他略加思索后，答道：

“我们这儿是利比亚沙漠、阿拉伯沙漠和努比亚沙漠的衔接处。气候非常炎热，还是在23年前下的最后一场雨。”

的确，任何一个埃及人，不管其社会地位如何，都有可引以自豪的东西，这就是自己国家的过去，科学正一点一滴地对其进行研究。但是，纳赛尔曾号召人们：“埃及在尊崇过去的同时，应该为自己的幸福而建设自己的未来。”他说的这句话真是再正确不过了。

尽管纳赛尔并不完全清楚，应该在什么基础上建设未来，然而他总是极力强调：

“一切都应当服从人民的需要。”

这就是为什么尽管萨达特之流企图贬低纳赛尔活动的意义，但是纳赛尔所奉行的政策、他对国家的责任感以及善于为自己国家选择真诚朋友的能力将为埃及人民照亮通向未来的道路，并且照耀得比那束在一天中的某个时刻射进神秘古神庙深处的阳光，或者比那束钻进陵墓黑暗的地下的阳光更

加灿烂。

海市蜃楼和萨达特的衰落

在埃及历史上，各种事件层出不穷，在这个国家的命运中充满了各种意想不到的转折、腾飞及衰落。由于历史的安排，在纳赛尔之后，安瓦尔·萨达特成了他的继承人。前者是为埃及的安全及合法利益、为阿拉伯人的权利而奋斗的典范。而后者则首先是在蔑视埃及本身的切身利益以及阿拉伯人的根本需要方面表现出了惊人的才能。

最令人吃惊的是，当纳赛尔还是埃及人民的领袖时，萨达特曾被认为是忠于他的人。但是，那些真正了解萨达特的人一直对他持有戒心。

据了解那时埃及领导层情况的人讲，萨达特作为一个政治家，纳赛尔对他并不完全相信。至少人们知道，甚至在萨达特担任第一副总统期间，纳赛尔也不将自己特别重要的计划告诉他。

至于萨达特的思想观点和政治思维水平，可以根据他的政治爱好来进行判断。他曾经从事过恐怖活动，同“穆斯林兄弟会”这种反动组织合作过，喜欢希特勒和他的强盗哲学，欣赏极右派的社会民主党人士，狂热地反对共产主义思想。但真是命运的嘲弄，他竟死于那个曾与他有过密切关系的“穆斯林兄弟会”组织中的宗教狂热分子之手。

苏联领导所听到的有关萨达特的情况远不能说明他是个正面人物。可以认为，这一点纳赛尔也是清楚的。还在那时，我们就注意到了，在苏埃最高级会晤时萨达特几乎没有

发言，更多的是默不作声。

现在让我回忆一下亚历山大之行。那是在1964年5月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访问埃及时去的。在从开罗驶出的车队里，在一辆主要的轿车中坐着赫鲁晓夫和纳赛尔。在它后面的轿车中坐着我和萨达特。沿途还做了短暂的停留，旅途总共延续了3个小时左右，所以谈话的时间是很长的。

对方非常健谈。能感觉得出，他的主要任务是用各种不同的方式重复同一个思想：埃及和苏联是真正的朋友。

萨达特说：

“埃及及其领导人全心全意地忠于同苏联的友谊并且钦佩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

我觉得他似乎马上就要高呼口号：

“埃及的社会主义万岁！”

尽管萨达特并没有喊出这个口号，但是他一直在喋喋不休地说：

“埃及领导致力于使人民，而不是某一狭隘的社会集团成为国家的主人，就象在苏联一样。”

而我对他说：

“每个国家的人民当然是自己选择他愿意在其中生活的社会制度。但是，我们苏联人自然是希望社会主义取得成功，并且相信，世界的未来就在于走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对此，萨达特回答道：

“我们丝毫不害怕这样的前景。我们埃及自己也在做一些通常是在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内进行的、被看作是社会改革萌芽的事情。”

萨达特对我的问题又做了进一步的说明：

“我指的是在埃及农村出现了一些经济单位，其土地和生产资料实质上归国家所有，而不是归私人所有。”

顺便提一句，在这次旅行中，我们代表团在埃及北部地区参观了一个生产单位，它拥有转交给它的苏联的机器设备。但是，根据我们的所见所闻，很难搞清楚这个以及与其相类似的生产单位的社会面貌。看来，这儿所做的事至多还处于某种试验阶段。

我和萨达特谈论苏埃友谊谈得那么入神，险些没错过看海市蜃楼。这是在我们的汽车快驶近亚历山大的时候发生的。眼前忽然出现了地中海的海岸，于是，我对副总统说：

“您看，到地中海海岸了。”

萨达特平静地答道：

“我们离大海还有10多公里呢。”

“可是前面已经看见海岸了。”我坚持说。

他解释道：

“这不是海岸，而是真正的海市蜃楼，在这个纬度上经常可见。”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看见类似的现象。

现在，当我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我想把它同后来萨达特当上埃及总统后出现的遮住了他政治视野的“海市蜃楼”做个比较。萨达特未能看到客观现实和埃及人民的真正需要同政治上的海市蜃楼之间的鸿沟，因而最终成为其自身无能的牺牲品。

在亚历山大稍事休息之后，我们同埃及代表团举行了会

谈。会谈是在符合那时苏联和埃及间的友好关系精神的气氛中进行的。

在两轮会谈中间休息时，我们采纳纳赛尔的建议，乘游艇在海上兜风。由于拍岸的浪花把大量的重油带到了岸边，所以从举行会谈的别墅到海边大约150—200米的路程上，我们走得非常艰难。在回来的路上，我们也是勉强才回到了屋里，因为鞋、裤子、袜子上都沾满了重油，除了将皮鞋扔掉、换身衣服外，简直就无法将它们除掉。我们甚至开玩笑地说：

“是不是有人专门组织了一场反对苏联代表团的重油破坏活动？”

纳赛尔讲：

“我们暂时还无力对付这个灾难。问题在于运到海岸上的石油产品是远在公海中就从轮船上卸下来。因此，甚至看不清楚，谁应当对造成这种污染负具体责任。结果，几十公里长的海岸地带都被毁坏了。”

那时，我又一次亲眼目睹了环境遭到污染的具体情景，并且也更加明白了，为净化环境而斗争的任务是多么重要。

参观过市容及名胜古迹后，我们的正式访问就结束了。在人们所说的“降下帷幕之前”，我们向主人问道：

“位于亚历山大地区的世界七大奇迹之一、著名的法罗斯岛灯塔^①在什么地方？”

我们知道这个灯塔差不多是在公元前3世纪建造的，那时克娄巴特拉女王还没出世。在数百年内，它殷勤地为航海者指引着航向。

主人们虽然知道该灯塔以前坐落的大概位置，但是不能

^① 公元前280年建造，后消失。——译者注

指出确切的地点。这座灯塔的历史也跟曾经呼吸过亚历山大空气的克娄巴特拉、恺撒和安东尼的名字一样，充满了许多神话和传说。

亚历山大之行给我们所有的人都留下了生动的印象。我们似乎亲身与远古时代进行了一次接触。

然而，更使我们满意的自然是同纳赛尔的谈话和他所做的声明：

“我们主张进一步发展苏埃关系！这是埃及的一贯政策。”

我们代表团在两国关系发展前景问题上取得巨大政治成果后回到了莫斯科，并确信纳赛尔不会食言。纳赛尔确实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他在世时，我们的关系从未出现过裂痕。这种关系更加巩固了。

辛辣的讽刺

几年过去了。当我正在莫斯科郊区进行例行的休假时，传来了纳赛尔逝世的消息。

萨达特成了埃及总统。在一些年内，苏埃关系好象是由于惯性的作用，虽然没有得到发展，但总的来说也没有退步。然而，后来埃及的政治领导人越来越不执行纳赛尔路线的迹象就越来越多了。萨达特几乎不再提纳赛尔讲过的话了，至少在苏联代表同他进行会晤、会谈时，甚至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最高级会晤、会谈时是如此。

引人注目的是，萨达特在请求经济和军事援助时，不断地增加请求内容，特别是对武器的请求。苏联方面根据手中

掌握的事实和数字不止一次地向他证明，不管是我们供给埃及的武器的数量、还是这些武器的质量，不仅都能同以色列保持平衡，甚至能超过它，至少在某些种类的武器上是如此。

但是，萨达特对此却不以为然。任何一个参加谈判的人都会发现，他是在寻找借口以表示不满。苏联方面想将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导入明智的轨道，但未能成功。

萨达特企图改变埃苏关系并使其日趋收缩，他推行的这一路线越来越清楚了。当我们听到华盛顿正对萨达特投以各种诱饵、作出种种许诺时，我们就明白了，埃及正同美国策划某种勾当。其高潮就是萨达特对耶路撒冷的访问以及随之而来的反阿拉伯的戴维营交易。

萨达特明白他在干什么。这些行动不是失策，也不是失误。这是信念促使他采取的行动，是他实际观点的反映。

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竟作为“和平战士”被授予诺贝尔奖金，这难道不是辛辣的讽刺吗？这个贝京的双手总是沾满阿拉伯人的鲜血，而且在他成了“诺贝尔和平奖金获得者”之后，他仍象在黎巴嫩一样，继续推行侵略和对阿拉伯的和平居民进行血腥镇压的政策；而这个萨达特出卖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以及所有阿拉伯人的利益，把埃及的领土提供给力图将自己的政治军事统治强加给近东各国，以至更多国家人民的美利坚合众国。

萨达特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可以从他对待历史遗产以及对待纳赛尔的态度上作出判断。在他最后一些公开讲话中，特别是在他所著的《对个性的探索》一书中，他开始公开地贬低纳赛尔在组织1952年7月革命中的领导作用，自然地也就突出了他自己。

在我多次访问埃及，同纳赛尔、萨达特以及其他政治家的会晤中，我曾同几位著名的埃及军方人士见过面。我不打算从职业的角度去评价他们。但是，在奉行明确的巩固国家安全路线的纳赛尔时期，在军官和将军们的眼中不难发现一种火花，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它反映了他们对埃及所捍卫的事业的正义性的自豪感。

后来，这个火花黯淡了。但是，我并不认为使这朵火花在今后燃得更旺的潜力减少了。埃及在军事上所遭受的失败不应当动摇国家及其武装力量捍卫自己正义事业的决心。

萨达特及其奉行的方针，在政治上遭到了巨大的破产。

人们还说萨达特是“埃及的黑暗”。这一词产生于远古时期。从历史书中可以知道，约在3500年前，埃及曾一度陷入无边的黑暗中。直到不久前，华盛顿史密森学会^①的学者才搞清楚，那时在爱琴海锡拉岛^②上的桑托林火山爆发。这是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火山爆发。爆发时天空中形成了大面积的尘埃云。这片乌云被风吹到了埃及。就这样，萨达特执行的政策使人们联想起这一场灾难。在公元前1100年，它使这个古老国度的大片疆土笼罩在黑暗的尘埃中。“埃及的黑暗”与萨达特是两个互不矛盾的概念。

金字塔下的侏儒

有时，我们苏联同志以及外国活动家都向我提出这样的

^① 美国最老的国立科研和文化机构，由英国科学家史密森出资于1846年在华盛顿建立。——译者

^② 又称桑托林岛，爱琴海的火山岛群，在基克拉泽斯群岛中。希腊领土。

问题：

“您同萨达特见过很多次面。尽管各个不同国家、不同政治集团对他的政策评价不一，但或多或少总还是清楚的。而萨达特本人的为人又如何呢？”

我是这样回答这个问题的。我说，在交往中，特别是当萨达特同大国的代表打交道时，他从表面上非常殷勤。他总是命令侍者：

“去拿几种果汁来。”

“您喜欢喝什么，是咖啡还是茶？”他总是这样问客人，几乎要问遍所有的人。

在家时，萨达特是谦恭、有礼的化身。他带客人参观各个房间，向他们展示有纪念意义的照片，以便让对方知道，他见过许多名人。

萨达特在谈话时脸上总是挂着微笑。给人一种印象，他脸上制造笑容的材料明显地是太多了。他一般都是用似乎专门在说好话时才用的柔和、甜蜜的声音讲话，但是视不同情况，萨达特能够用这种声音阐述他那使人感到寒冷、甚至令人毛骨悚然的思想。

我曾经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情况下观察过这个人——不管是在谈判桌旁，还是在群众集会上。他是一个平庸的演说家。我没有听过他在没有事先准备好讲稿时在群众集会上所做的即席讲话。但是，在谈判桌旁，他把各种材料往面前一摊，可以讲上好几个小时。当萨达特出于某种原因开始感到焦虑和不安时，他的话就变得语无伦次了。例如，在萨达特最后两次访问莫斯科时的会谈中，就是这样。

现在，“演说术”一词在政治词汇中很时髦。我们赋予

这个词一定的贬意。

但是，就是这个词对萨达特也不适用，因为它不能充分地反映他那根据事态发展而“见风使舵”的特点。他具有某种捏造事实的惊人本领。引人注目的是，无论是政治家、记者、还是历史学家，一般地都不喜欢援引萨达特的话，免得陷入尴尬的境地。

萨达特一生都患有自大狂，在他担任总统期间，他的自大狂更发展到了病态的程度。这个毛病就决定了他作为政治家和作为一个人的言行。他甚至不怕陷入可笑的境地，企图将他个人的作用同著名的埃及金字塔的伟大相比较。在埃及，有许多人一下子弄不明白，为什么萨达特将自己的一个总统官邸（他有许多官邸）建在金字塔附近的吉萨区内。显然，这样做不是为了寻找清洁新鲜的空气，因为萨达特从未在那里休息过。他主要是同外国客人一起去造访自己在吉萨的官邸。

萨达特自己帮我们解开了这个谜。他指示自己的私人摄影师给他拍了一张以金字塔为背景、他站在房前的照片。这张照片被广为散发。而且在同外国客人一起到这幢房子里来时，萨达特在选择座位和确定活动范围时，总要精心选择能够使他这位总统同宏伟的金字塔都处于交谈者视野之内的地方。

在埃及，希罗多德的名言家喻户晓：“人怕时间，而时间怕金字塔。”这句话意味深长。每当在金字塔前为客人们举行靠光线的变化和录在磁带上通过电动扬声器播放的音乐和解说词组成的表演时，人们总是要重复这句话。萨达特这个演员企图用自己的方式达到被载入史册和把他本人的形象同金

字塔的雄伟风貌相提并论的目的。

1974年3月，当我到开罗时，萨达特也邀请我到那座官邸去就中东问题进行谈判。我也看了这个装腔作势的人的这些表演，心里想：“真荒唐，这是站在金字塔下的侏儒。”

我同他一起度过了几小时。早在那时，就已经可以看出，这位活动家摆向了阿拉伯世界的敌人一边。

萨达特常说：

“您瞧，有那么多人，成千上万的人在举行游行来支持我。”

至于这些游行是怎样组织起来的，以及当局还要给参加游行的人付钱等，许多人都知道。

值得注意的是，当安葬萨达特时，开罗的大街上空无人迹。跟在灵柩后面的，只有萨达特身边最亲近的一些人、3位美国前总统、当时的以色列总理贝京和几个外国代表团。连一个有名的阿拉伯国务和政治活动家都没有出席他的葬礼。

这难道不是阿拉伯人对萨达特作出的宣判吗？

这怎能不令人回想起1970年9月纳赛尔总统逝世后埃及全民的哀悼情形呢？千百万埃及人来到了开罗。他们感激自己的总统，怀着巨大的悲痛为他送葬，整个开罗在恸哭。几百名警察试图阻拦人们涌向驶往陵墓的载着棺槨的炮车。数千人将覆盖死者遗体灵柩上的白色殓布撕成小块以留作纪念。

几十个国家的许多代表团和著名的国务活动家，其中包括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尼·柯西金为团长的我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了纳赛尔的葬礼。

不，一线之光还没有出现

近东紧张局势和战争危险的发源地已存在40多年。从这个发源地不时地迸发出可怕的火花。以色列对阿拉伯邻国的侵略一浪高过一浪。帝国主义对该地区各国人民内部事务的干涉仍在继续。

华盛顿所奉行的把近东宣布为美国“切身利益范围”的政策以及特拉维夫在美国鼓励下力图实现的扩张主义野心，是这个地区至今仍保持着一触即发的危险局势、而其解决又遥遥无期的主要原因。

在美国的政策中明显地表现出意欲在近东保持尖锐的冲突局势的方针。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不惜直接使用武力，美国军事黠武集团对黎巴嫩的干涉行动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然而，其重点仍放在利用以色列及其侵略野心上。试问，以色列以其本身有限的人力和物力在侵略和战争的道路上能坚持那么久吗？显然是不行的。是美国过去和现在一直在为以色列的政策输血打气，它现在已经成了以色列在近东推行扩张主义的帮凶。

同以色列的各种单独交易正被顽固地强加在阿拉伯人身上。人所共知，同以色列签订和约使埃及付出了多么大的政治代价。而以色列对黎巴嫩和叙利亚的要求难道不是非常无礼的吗？

指出叙利亚是近东最重要的地区之一，是非常恰当的。这个国家从以色列发动侵略一开始，就坚持原则立场。苏联

正是这样评价它所奉行的方针的。叙利亚一直主张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

所有这一切在同近东著名的活动家、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的事务性会晤中都得到了反映。在他访问苏联和我访问大马士革时，我同他都举行过会见。他对问题总是有深刻的了解，在评价以色列的政策时表现出原则性和清醒的态度。

至于巴勒斯坦问题，按以色列的观点看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仅仅是同意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实行有限的“行政自治”。从而否定了400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的权利。

无论是美国，还是以以色列都不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更有甚者，华盛顿向特拉维夫承担了不同其进行任何谈判、不进行接触的义务，尽管巴解组织获得了广泛的国际承认，在联合国及其机构中有代表。

这一切表明，根据近东各国人民的合法利益来解决这一地区问题的一线之光还没有出现。

阿拉法特其人

阿拉伯世界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亚西尔·阿拉法特是巴解执委会主席。领导这个组织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因为组织内部有许多派别，围绕其政治路线问题有时出现非常激烈的分歧。

阿拉法特不仅作为政治家，而且作为个人，都是一位很有特色的人物。从老远就能轻而易举地认出他来，因为他总

是穿着巴勒斯坦的民族服装，这种服装很朴素，但以其典型特色而引人注目。我不止一次地同阿拉法特见过面，我简直不能想象他还可能会有什么别的或其他模样的打扮。

这位巴勒斯坦领袖具有不平凡的性格并且坚信他为之奋斗的事业是正确的。这个人有很强的性格特点，要让他改变自己的观点是很不容易的。阿拉法特在为自己的观点提出论据之前，先微笑一下，甚至微笑几次，并且似乎有些羞涩。但是，他绝不会放弃自己的观点。他通常不会提高嗓门。但是，当阿拉法特谈到自己的人民时，他的眼睛就会闪烁出激动的光芒。这时他就开始用这句话来说服对方：

“我们巴勒斯坦人已失去了家园。我们连个低头的地方都没有。”

美国和以色列竭力阻挠巴勒斯坦人民实现其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这同联合国1947年通过的决议完全背道而驰，该决议规定在巴勒斯坦的基础上建立阿拉伯和犹太国家。谁也没有取消过这个决议。苏联主张遵守这个决议。而目前只建立起了犹太国家。

未来会表明，阿拉法特能否顶住那些对巴勒斯坦人真正的民族愿望明确地表示反感、顽固地反对巴勒斯坦人民要求建立自己独立国家的合法要求的势力的影响。阿拉法特不是因为他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敌人妥协，而是因为他是为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而斗争的战士才被推举为领导人的。

特拉维夫头脑发昏

我至今还记得巴勒斯坦的犹太居民争取建立自己独立国

家的时期。那时，以色列的政治家们在每次同苏联代表谈话时，都认为首先必须向我国、红军、苏联领导表示感谢，感激他们为把犹太人从希特勒的毒气瓦斯室里拯救出来所做的一切。再晚些时候，以色列许多人士在同我谈话时，感激我国对建立犹太国家的支持。阿拉伯人士也同样感谢我们支持在以前巴勒斯坦的领土上建立阿拉伯国家。

但是，在以色列成立后的整个时期内，这个国家的当权者们却奉行侵占他国领土的政策。特拉维夫政治家们的活动象一面镜子似的反映出它的扩张主义习性。我曾多次会见过以色列领导人。每次，我都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

“难道以色列想无休止地同阿拉伯国家保 战争状态吗？”

我提请他们注意这样一个不可辩驳的真理，即以色列国家靠在近东制造敌意和仇恨的气氛是不能建立自己的幸福的。同时强调指出，“实力政策”是缺乏远见的。

任何一个头脑健全的人不能不看到，阿拉伯国家年复一年地在加强自己的潜力，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声音也越来越有分量。如果以色列不放弃自己缺乏远见的政策，那么，在近东局势的发展中还能期望有什么新的转折呢？

1984年9月，我作为出席三十九届联大会议的苏联代表团团长，应以色列外交部长伊扎克·沙米尔的请求在纽约会见了。那时，我对他说：

“苏联从一开始就赞成成立以色列，与此同时，它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即犹太人民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一样，有权成立自己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遭受过法西斯分子的蹂躏，这就使他们更有理由得到这一权利。甚至现

在，当以色列对我国采取不友好的态度时，我们也不同意将以色列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加以消灭的主张。”

沙米尔专心致志地听着，并且似乎他理解了我的话。而我则向他着重强调了这么一个基本思想：

“在坚持这个立场的同时，我们也严厉谴责特拉维夫所奉行的侵占他国土地的政策，它对这些土地无任何权利。你们自己判断一下，你们国家奉行这样的政策是赢了，还是输了。我们相信，以色列当然是输了。要知道，无法相信，阿拉伯世界和国际社会舆论有朝一日会对以色列的扩张主义政策听之任之，这是不可能的。也许，不会是明天，也不会是后天，但是迟早总有一天正义会胜利，以色列将被迫把阿拉伯土地归还给阿拉伯人。”

以色列应该生存在国际上所承认的属于它自己的疆界之内。寄希望于炸弹和枪炮是一条不可靠的道路。它可能延续1年、2年、3年，乃至20年，但不会永远如此。否则，这就会成为圣经中的一个奇迹了。

列宁的话的现实意义

地球上任何一个其他地区大概都不象近东那样，是由政治和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政策方针上截然不同的国家组成的如此复杂的聚合体。并且这个地区似乎是被“压缩”了似的，疆域有限。君主制度国家与选择了独立发展、社会主义倾向的道路、反帝斗争道路的国家相邻而立。

阿拉伯人的敌人为了自己的狭隘利益，人为地加剧各阿

拉伯国家之间客观存在的差别和现有的分歧。这个地区人民的敌人一直在努力破坏阿拉伯的团结，企图在阿拉伯人中培植与侵略者合作的精神，破坏他们对自己正义事业、对能够战胜帝国主义阴谋的信心。遗憾的是，这些努力并不是毫无效果的。

苏联对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都不抱成见。它主张同所有这些国家，不论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观念如何，建立正常的、甚至友好的关系。苏联所奉行的这一方针得到了阿拉伯国家及其领导人的肯定和理解。

试举一例。1982年12月，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沙特·费萨尔作为阿拉伯国家代表团的一员访问莫斯科时同我进行了交谈，他说：

“我想高度评价苏联所奉行的近东政策并对贵国一贯支持阿拉伯人民争取自己合法权益的斗争表示感谢。”

顺便提一句，那时这位大臣曾正确地指出：

“我这次来莫斯科正好和50年前我父亲，已故的国王费萨尔访问苏联的日子相吻合。他访问贵国时是沙特阿拉伯的外交大臣。”

两个在国际事务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国家的领导人之间的个人接触当然应该更经常地进行，而不是半个世纪一次。从这一角度讲，上述事实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双方都可以从这种接触中得益不浅。

苏联在近东也同在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不为自己寻求什么特权或者自私的利益。但是，苏联在这个离它的边境仅咫尺之遥的地区所起的作用也并非一个不相干的旁观者的作用。列宁曾经说过：“在我们看来，我们的近东政策是最实

际最切身的利益问题。”¹在今天，列宁说的这些话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

根据这一实际和直接的利益，苏联就解决近东问题的原则及其实现途径多次提出建议，这些建议发展了它过去提出的各种倡议。这些建议是众所周知的，得到了所有人的广泛支持。

苏联认为，解决上述问题的可靠途径是召开关于近东问题的国际会议。会议的结果应签署一个或几个协议，它们应包含下列一些有机联系在一起解决近东问题的组成部分：

以色列从它1967年侵占的所有阿拉伯领土上撤出自己的军队；

实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利，包括其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

确立和平，保证所有参与冲突的国家和独立发展；

与此同时，应该制定和通过遵守解决条件的国际保证。

苏联过去和现在都呼吁冲突各方在自己的行动中要清醒地考虑相互的合法权益。

¹ 这句话的完整句子是“在我们看来，我们的近东政策是俄国和许多同俄国结成联邦的国家最实际最切身的利益问题。”见《列宁全集》，1963年中文版，第33卷，第317页——译者

——第十四章

谈谈对美关系

往事并非不堪回首 一个闯入政治中心的问题 历史的谬误 杰拉尔德·福特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 梅特涅立场的烙印 从一种立场转变到另一种截然相反的立场 为条约而斗争 在维也纳的亲吻 谬误一个接着一个 再谈人权 危险观念的“教父” “离婚”前后的赛勒斯·万斯 “温和派”马斯基 在维也纳 飞机事件 马德里——会议开场 勉强维持的和睦总比真正吵起来好 “必须寻求协议” 他们要把事情引向何方？ 与舒尔茨会见 使凯南倒霉的考验 麦戈文的成功与挫折 “哈默”的含义是“锤子” 与总统的谈话 “您的丈夫赞成和平还是赞成战争？”

苏美关系的全部历史令人信服地表明，每当苏美两国遵循互谅与合作方针的时候，两国人民就会受益，国际安全也从中得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两大国在规模空前的反法西斯大搏斗中成为盟国的时候，这一点表现得尤其明显。

往事并非不堪回首

70年代前半期，在紧张局势有所缓解的时期内，苏美关

系中也出现了不少有益的东西。这自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整个缓和进程的发展。苏美关系取得进展的首要条件是苏维埃国家积极的爱好和平的对外政策，它在国际事务中不断增长的影响和威望，以及它所达到的在军事战略上同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对外政策中也开始显露出现实主义成分。尽管美国的那些敌视同苏联合作的有影响的势力仍很活跃，但华盛顿领导集团内部还是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苏美关系总是绷得这么紧，孕育着引起严重麻烦的危险，甚至武装冲突的威胁，这是不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越来越普遍的看法是，同苏联保持相互关系的可靠基础只能是和平共处，两国都要考虑彼此的安全利益。

当时领导美国的是以尼克松为首的共和党政府，它可能是最先意识到必须同苏联建立和平关系的。

理查德·尼克松也许是美国总统当中最矛盾的人物。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爬上国家权力顶峰。但是，你不能不承认尼克松为通向总统宝座而表现出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和披荆斩棘的本领。甚至在1960年同民主党候选人约翰·肯尼迪竞选总统的角逐失败后，尼克松也没有放弃通向既定目标的道路而后退。

美国那些有着万能之力的工业与金融垄断巨头们终于认出了尼克松是自己人，于是就毫不犹豫地选中了他。1968年的大选使他置身于国家最高权位。在1972年的选举中，共和党再次夺魁，尼克松得以保住总统宝座。

尼克松并没有使大实业家们失望，丝毫也没有。在他第一个总统任期的4年内，军事工业集团常常赞许地拍着他的

肩膀。关于这个集团，艾森豪威尔在离开白宫前不久曾告诫人们说：它对美国国内生活及对外政策的各个方面都有着极其有害的影响。尼克松第二个总统任期的前半大体上也还算过得去，没有太大的波折。

可是在这以后，尼克松命里注定要经历一场辛酸悲剧：由于“水门事件”的牵连，他面临要追究他责任的威胁，以至在1974年8月，当他的法定任期还未满时，就被迫向白宫道了“再见”。

这一政治丑闻之所以突然间掀起轩然大波，是因为共和党领导的代表人物和白宫官员们在大选期间的违法行为败露了，他们被揭发出试图在华盛顿“水门”饭店民主党总部安装窃听器，还搞行贿收买、威胁恐吓、作假证等。

“水门事件”还要留待历史学家们长时间地去研究。但是，如果按其本来面目来看这件不同凡响的事，则不难看出，这本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是美国社会全面堕落的一个现象。美国那些身踞要津的人们千方百计地要保住权力，他们采用的手法超出任何做人的道德标准和政治上要光明正大的规范。就连宪法也经常受到他们的蔑视。他们表现出不可遏止的强烈欲望，想把国家航船之舵抓住不放。在他们看来，为了达到目的，就可以不择手段，哪怕这种手段近乎于犯罪。

难道说尼克松就比别人更坏些？绝不是这样。只不过别人走运罢了。也许别人采用的手法更高明些。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样地掌握了笼络选民的“学问”。

说到这里，不妨试问：

“还有比准备打一场必将使人类遭灭顶之灾的核战争更为罪恶的目的吗？”

“还有比肆无忌惮地搞核军备竞赛更为罪恶的行为吗？”
任何一个能客观思考的人都会回答：

“没有！”

可是在一些国家里，从那最高级别的国家讲坛上却滔滔不绝地发出蛊惑人心的声明，昧着良心的宣传就象洪流一般地漫溢开来。这些声明和宣传的用意是不容许禁止核试验、彻底禁止核武器和销毁各类核武器。如果同这种道德、这种政策相比，“水门事件”只是小事一桩，并且仅仅是美国内部的事。

但这里却有个颇为引人注目的情况，那就是不论在尼克松当政期间，还是在美国后来的一些年代里，尼克松政府在对苏关系领域内所做过的某些积极的事，似乎全都淹没在“水门事件”引起的高潮迭起的狭隘党派之争和全面内政之争当中。

一个闯入政治中心的问题

可以说，核武器问题已闯入苏美两大国的政治中心。无需别人说服，苏联早就确信，这是一个非同寻常、位居一切问题之首的问题。

而美国领导集团在当时及以后很多年内，一直无意解决这个有如燃眉之急的问题，其缘由前面已经说过。但是，一起起复杂而矛盾的国际事件越来越有力地表明，责任重大的领导人应当尽力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

在两大国对外政策的地平线上出现了可达成协议的基础，尽管还不能马上看清楚它的具体轮廓。这是可以理解的。

为争取达成协议尚需进行工作，进行一系列的会晤和谈判，双方都还需要仔细地研究对方“赞成”和“反对”这种或那种方针的论据。但坚冰已开始出现裂缝。两国领导人原则上已商定一定要寻求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于是他们便花费精力去探索。

当时，在两国首都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一个访问接着一个访问，一次会晤接着一次会晤。我还记得尼克松在1972年5月底抵达莫斯科进行访问时对勃列日涅夫说过的话：

“根据美国方面掌握的资料，”他说，“美国和苏联已经积累的武器足以相互消灭许多次。”

勃列日涅夫对此回答说：

“按照我们的统计，情况也是这样。”

正是在那时明白说出的这种相互谅解，成了为制定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某些措施临时协定而进行工作的基础。这是一项不轻松的工作。在尼克松访问莫斯科时进行了这项工作，并签署了协定。

诚然，该协定没有涉及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所有组成部分，只包括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那次谈判没有谈战略空军，当时的安排是以后谈判时再讨论这个问题。尽管如此，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某些措施临时协定不论在当时，还是现在，对限制核军备竞赛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签订上述协定的消息马上以闪电般的速度从莫斯科传遍了整个世界。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人们都松了一口气。

谁都不会说，尼克松政府签订上述协议就是向军工集团发出挑战。尼克松政府只不过没有按最极端集团的意愿行事，它优先考虑的是观点比较温和的美国“大实业”集团。当然，

美国的公众舆论对此起了重要作用，大多数美国人民同其他各国人民一样，希望生活在和平之中。

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至今仍然有效，这本身就可显示出它的意义。正是由于这一协定的签署，后来才得以制定并签署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是的，美国方面后来没有批准这个条约，但是按苏美之间彼此商定的协议，该条约事实上在数年内是有效的。

毫无疑问，在尼克松1972年5月访苏期间签署的《苏美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也是一个重要的成果。苏美双方承担了不建立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义务，不论是海基、空基、天基，还是机动陆基的，统统都不建立，并且保证不向其他国家转让，也不在本土之外部署本条约所限制的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反弹道导弹防御条约至今仍然起着应有的作用，继续限制着在这个最危险的领域里搞军备竞赛。

1972年5月，还签署了一份具有重大意义的文件——《苏美相互关系原则》。双方在这一文件中声明，它们将遵循这样一个共同信念：“在核时代里，它们之间除和平共处之外，再没有可赖以保持相互关系的其他基础。”这段话是值得用青铜浇铸后保存起来的，它可提醒决定华盛顿对外政策方针的人们，必须用理智来代替大帝国的蛮横野心。

在《相互关系原则》中还指出，尽管苏美两国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存在差异，但这不应成为两国在主权、平等、互不干涉内政和互利原则基础上发展正常关系的障碍。

还有必要提一下，在1933年11月美苏建交时交换的有关文件中曾经强调指出，互不干涉内政是苏美关系正常化的主要条件之一。这一原则当时是根据美国方面的建议确定的。

今天这一原则同当时一样仍然是正确的。各国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自列宁时代起就是苏联对外政策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1973年6月苏美两国达成防止核战争的协议，这无论在苏美双边关系方面，还是在国际关系方面都是件大事。这一协议的实质是，双方商定要采取行动，防止出现可能引起苏美关系危险尖锐化的情势，排除苏美之间或它们中任何一方同其他国家之间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

这一协议的意义无论怎样评价恐怕也不为过。根据这一协议，两个最强大的大国承担义务，调整双边关系，以减少继而完全消除核冲突的严重危险。如果说最近几年这一严重危险不是减少，而反倒日益增大，那么，对这种事态的责任完全在美国方面，因为美国方面的方针是加剧核军备竞赛、谋取美国和北约对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的军事优势。

列·伊·勃列日涅夫1973年6月访美期间，以及尼克松两次访苏期间（第二次访苏是在1974年6月至7月），双方还签署了一系列在各个领域进行合作的协议，从经贸和文化领域到研究与和平利用宇宙、环境保护和人造心脏的研制。

那一时期苏美缔结的协议比两国自建交以来所签订的协议总和还多。这些协议为保持双边联系建立起了广泛的结构。两国还建立了政治谈判和协商的机制。

历史的谬误

苏美关系的进展，首先是在国际安全的根本问题上的进展，使人们对未来产生了希望，展现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

合作的前景。出现了减少军备竞赛的某种希望。

但是，苏美关系的状况由于华盛顿在世界上一些地区，首先是在印度支那的侵略行径而复杂化了。同时，印支各国人民解放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又是令人信服的论据，促使美国领导层最终表现出了健康思维，摆脱了以前的迷惘，也摆脱了“美国无所不能”的幻觉。就连美国国内的一些现实地思考问题的人士也开始意识到，这是历史的谬误，早该摒弃。

任何一个历史学家，包括美国的历史学家，在评价尼克松政府政策的得失时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位总统至少在执政的后期还是开始转变了，明白美国对越南人民的侵略是没有前途的，并有了足够的健康思维采取一些步骤来停止这一冒险行动。

在评价过去的时候，并不是我们要帮助尼克松多得几分。但客观现实就是这样。1973年1月，美国签署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这一协定规定从南越撤出美国军队。这支败军不久就接到了撤退的命令。军队全部撤完已经是下一任总统杰拉尔德·福特任内的事了。

当然，越南、老挝、柬埔寨人民争取自由、独立的英勇斗争，对于战胜侵略者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斗争得到了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其他国家在道义上和物质上兄弟般的援助。

但是，谈到尼克松政府，也应该指出，该届政府和它所依附的那些集团干了不少扼杀许多国家合法政府的事。

这一方面的鲜明例证是智利。为反对阿连德的人民政权，使用了阴谋、恐怖、收买等伎俩。为了搞垮这一政权，明枪暗箭，无所不用。华盛顿就是这样粗暴地干涉智利内政的。

阿纳康达这一大垄断集团在行动上积极配合尼克松政府反对阿连德政权。这一集团早就象用一道道锁链窒息着智利的经济，特别是铜矿开采和铜的生产这一主要行业。这家美国垄断集团由于参与了华盛顿所采取的一系列犯罪行为，使它的恶名比以前更加臭名昭著。之所以采取这些行动，是为了在智利把血腥的法西斯集团扶上台。对所有这一切的责任都应由尼克松和他的政府来承担。

这是政治肖像画的两面吗？是的，是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但是，站在全世界面前的尼克松就是这样的，他的政府的政策就是这样的。

作为一个会谈对手的尼克松，能说他些什么呢？当然，他掌握着所讨论的主要问题的线索，但并不总是了解得那么具体。是别的人按照他的指示再谈得具体些。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来成为美国国务卿的亨利·基辛格起着特殊的作用。他很内行地起着这种作用，当然他本人也靠着一个强干的顾问和专家班子。

尼克松与苏联代表谈话时一般是平稳的。他同我谈话时也是这样，克制着情绪。依我看，他并不特别热衷于在报纸上、电视上抛头露面、炫耀自己。我甚至要说，他看上去是一个谦虚的人，尽管这种谦虚有些做作。但是，那些了解他生平的各个时期、那些常与他打交道的人都清楚，这个人性格固执，要同他达成协议并非易事。

同尼克松会晤后，通常都使人觉得他倾向于寻求同苏联相互谅解。也应当指出，同总统的各次会晤一般来说，都能在解决所讨论的问题方面有某种进展。

讨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时，我不记得尼克松有离开正题

去谈论两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情况。在同我多次谈话中，他从未谈到这一题目。他谈起话来总是象个实用主义者。实际上，他并不掩饰，他不想就问题的理论方面大作文章，他喜欢更接近于实际需要的那种讨论。

“水门事件”给尼克松带来了不利的变化，迫使他于1974年8月辞职。总统的职位转到了此前的副总统杰拉尔德·福特手中。

杰拉尔德·福特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

经常有这样的事：一个人虽然身居国家要职，但是当人们说到他和写到他的时候却是一带而过。我认为，福特就属于这种人。

当然，他当总统的时间并不长，不过两年多一点。在1976年的竞选角逐中，福特未能斗过民主党候选人卡特。两个总统候选人中毕竟只能有一个人获胜，另一个人则失败。在总统竞选中没有平局。

虽然大家都认为，作为政治家的福特和卡特两人相比都没有什么压倒对方的优势，但形成的结果却是：对卡特有利的因素多一些。其中有这样一个情况不能说不重要：卡特的形象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可说是“新颖”的，他的政党民主党也更为灵活。而且“水门事件”损害了共和党的声誉，对作为该党候选人的福特绝非有利。

在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外国人比一个美国人更容易客观地评价作为政治家的福特和他的活动的某些特点。为了公正起见，应当强调指出，在福特总统任期内发生的某些事件对

当时的国际政治产生了一定影响。他的政府总的来说继续奉行了在尼克松时期形成的对外政策路线，那是一条“从对抗时代向谈判时代”转变的路线。

记得1974年11月福特和国务卿基辛格来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同勃列日涅夫会晤。总统座机在离符拉迪沃斯托克不远的机场着陆。福特精神抖擞地走下舷梯。他出现在我们这些前来欢迎的人面前，他身材高大，象运动员那样挺拔，神态端正。他待人接物彬彬有礼。此外，我认为，他平易近人，谈吐、举止比较随和，很不象是一个脑力劳动者。

从机场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一路风景给美国客人留下了明显的印象。他们差不多一直是沿着一望无际的田野行驶，还有那一片片的森林，满眼都是秋天的金黄色，使周围美丽的大自然更加妩媚动人。

这次苏美会晤的目的是继续讨论与拟定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新协定有关的问题。在为期3天的会晤中进行了紧张的会谈。可以感觉到，不仅是苏联方面，而且美国方面也愿意找到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的办法，以便消除通往协议道路上的障碍。

我仅举出所讨论问题其中的一个。这个问题后来公诸于众了，而且由于华盛顿的意愿（那已是福特下台以后）成了苏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一块绊脚石。

福特和基辛格坚持要苏联放弃相当大一部分所谓陆基重型洲际弹道导弹。这当然会严重损害我国的利益，也不符合双方平等和同等安全的原则。不言而喻，苏联方面对此不能同意，并令人信服地阐明了为什么不能同意。

勃列日涅夫说：“对谈判题目应当采取现实的态度。任

何一方都不应该企图靠损害对方的利益来谋取战略优势。美国在欧洲和我国附近的其他地区拥有前沿基地核武器，这并不符合苏联的心意。但是，美国领导人现在甚至拒绝讨论关于这些武器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方面提出的关于苏联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问题不在讨论之列。”

福特最终把这一问题从谈判日程上撤消了。从而，妨碍达成协议的主要困难消除了，出现了商定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前景。

毫无疑问，福特是在美国专家详细分析之后，并在美国军事领导机构赞同的情况下采取这一步骤的。只是到了后来，那些身着军装的一心想升官的人才开始把这件事描绘成这样：好象只有根据里根政府指示办事的现在的五角大楼才掌握了真理，而福特时代的五角大楼似乎干得不对。

可以说，福特政府对维持苏美关系中较温和的、相互考虑对方利益的气氛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福特政府任内还有一件积极的事件：美国同意了赫尔辛基的最后文件。在包括苏联在内的35个全欧会议参加国最高领导人当中，福特总统代表美国在这一重要的国际文件上签了字。

在赫尔辛基举行了苏美代表团团长勃列日涅夫和福特的会晤，会晤是在求实的气氛中进行的。这次会晤表明，美国的政策中对话、谈判、谋求和平解决争端的趋势仍在起作用。

在福特政府执政期间，最终结束了越南战争。福特对美国的侵略遭到惨败还记忆犹新，他被迫承认：

“15年来，甚至更长的时间里，越南一直是我国的一个伤口。现在，越南战争结束了。这是一场在许多方面都是可

悲的、惨痛的事件。我想，以后的总统、国会、美国人民将会吸取过去在越南的教训。”

这倒是一番清醒的话。但愿华盛顿的人士今天也不要忘记这番话。

综上所述，可以说，尼克松和福特的共和党政府的政策中有积极的、现实主义的倾向。但极其反常的是，所有这许多年来与后来一任共和党政府的方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是，在福特总统任期内的美国对外政策中也有消极的一面。其中之一是，1974年12月美国国会投票表决，要把是否在贸易与贸易信贷方面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与解决同贸易及国家间经济联系毫不相干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而最惠国待遇在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是很平常的事。苏联声明，它坚决反对在歧视的基础上同其办理经贸事务的企图。

还有件具有象征意义的事，1976年3月，福特总统为了迎合国内极右势力的情绪，指示他的政府的成员们要完全停止使用“缓和”一词，代之以“以实力求和平”的提法。

如果这个政治上翻觔斗的冒险动作并不含有严肃的内容，那倒还可以说是这位白宫的主人在模仿某种体操动作。可惜，并非如此。他的政府实际上正在竭力缩小这从缓和方针一下子翻到实力政策的觔斗的意义。然而，对国内舆论界和外部世界来说，这一变化的实质很快就真相大白了。

我们可以看到，福特的政治肖像同尼克松的肖像相比其矛盾之处并不逊色。这两位总统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如此。

梅特涅立场的烙印

在尼克松和福特政府制定和推行外交路线方面，亨利·

基辛格占有特殊地位，他是这两届总统在位期间的美国国务卿。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他。

我之所以认为有必要谈一下这位与众不同的人物，哪怕是简短地说上几句，至少是因为我同基辛格会见的次数大概比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任何一位其他国务卿都要多。大战期间，基辛格本人曾在欧洲某地的美国军事情报部门服役。这是第一点。

我认为有必要谈一下基辛格的第二个理由听起来也许更有说服力，那就是我同他的会见正是在苏美关系出现积极进展的年代。

总的来说，基辛格这位政治人物值得较详细地谈一谈。我亲眼见过许多美利坚合众国的政治活动家。他们各有特色，各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必要时会援引一些通常早已惯用的理论套套。至于各有不同经验，更是自不待言。

基辛格在担任美国国务卿之前，并没有按部就班地攀登那漫长的仕途阶梯。然而，不论是他起初担任尼克松的助理，还是后来担任美国国务卿，人们普遍认为他担任这些职务是称职的。

为了准备前面已经提到的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临时协定，举行了许多次各种级别的会晤。在这些会晤中，我同基辛格一起没少喝茶。在莫斯科、华盛顿、维也纳、纽约、日内瓦举行的苏美会谈都是务实的，在讨论有关问题时大部分都涉及具体内容。至于最高级别的会晤，那是进行总结，确认在其他级别上达成的协议，并推动今后要做的事情。

每当两位部长坐到谈判桌旁，他们每一位都认为，第一，对方希望达成协议，否则他就没有必要坐到谈判桌旁来了；

第二，对方的谈判代表已为讨论有关问题作好了应有的准备。

这就是说，投机取巧和耍滑头是不适宜的，也是没有用的。这些手腕只能损害耍手腕者本人的声誉。

因此，我不否认，当我读到基辛格回忆录的某些章节时，感到相当惊奇。他试图表明，在某些场合，也包括最高级会谈，他似乎“把俄国人给耍了”。但是，基辛格并没有举出事实来证明自己的说法。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样的事实根本就不存在。

在此，我要为基辛格辩解一下。同什么人争辩呢？还是同基辛格本人。我们在谈判中所涉及的题目是绝对不容许耍滑头的。私人商店中做买卖的那套手法在这儿是行不通的。因为所有的细节，甚至每个问题的最微妙之处，都已经过周密的思考、推敲、各种科学方法的分析，并经过权威专家和顾问们的研究。

国务卿对此是一清二楚的，他在谈判中表现得相当聪明，并没有采用他在回忆录中所提到的那些手段。即使基辛格真地试图搞点儿小动作，悄悄地从口袋里掏出什么东西来，那他也只能“连眼皮也不敢抬”，立刻把这点儿“东西”放回口袋里去。而现在，他在回忆录中却忍不住想告诉别人，在制定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协定时，他有时竟能成功地“蒙骗对手”。是怎么蒙骗的？关于这一点，在他的回忆录中只字未提。

毫无疑问，基辛格是个能干的人，甚至可以说，非常能干，并且拥有相当丰富的外交经验。在他的权限范围内，他能提出解决问题的各种方案。

我觉得同他谈判是很有意思的。他不是不着边际地泛泛

推论，也不是重复没有味道的陈词滥调，这是经验不多的外交官有时采用的方法。当基辛格论证他的某项建议时，在他的论据库中总能找到这样一些论据，只说这些论据没有说服力是不够的，还必须证明，为什么这些论据没有说服力。

在分析某个问题时，基辛格常常运用高度概括的方法，在讨论世界紧张局势的原因、讨论国家关系中，首先是苏美关系中产生不信任的原因时，尤其如此。

他总是非常想为华盛顿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的政策找到理论根据。

在我同他谈判削减武器和裁军问题时，他愈来愈多地强调指出，所有那些使东西方，其中包括使苏美两国疏远的问题，都是相互联系着的。他常说：

“这些问题不能单独地、一个一个地解决，它们都是相互联系着的，因此，只能综合解决。”

基辛格喜欢谈论在他看来应是两大国在对外事务中所应遵循的共同原则。但他对此发表的议论有不少是可疑的，甚至是混乱的地方，在逻辑和事实上也是常常有缺陷的。比如，他不止一次地引用过克莱门斯·梅特涅的话，并把梅特涅奉为19世纪欧洲政治史上他所崇拜的偶像。基辛格认为，这位身为前奥地利帝国的外交大臣、尔后为帝国首相的活动家坚持一种正确的观点，即对欧洲各国存有分歧的那些问题，不应当孤立地一个一个分开来观察，而应该在一个统一的过程中，哪怕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中一起解决，因为按这种办法来做就可较容易地达成协议。

与此同时，当谈到梅特涅和他的追随者们的所作所为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奥地利帝国趋于崩溃时，基辛格显然说不出

什么令人信服的论据。要知道，奥地利帝国在崩溃之前，几乎不断地在进行战争，更不用提它国内那动荡不定的政局了。帝国的崩溃是必然的，因为奥匈帝国在历史上本来就是人为的产物，它是建立在民族压迫和帝国的狂妄野心基础上的。奥匈帝国的大厦早在拿破仑时代就已开始出现裂痕，尔后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彻底崩溃。

为了使美国国务卿对梅特涅的热忱冷却下来，我就说：

“这位国务活动家的确通过提出自己的方针和理论著述为奥地利君主国的政治作出过贡献，但那只是促使其朝着崩溃的方向发展。帝国存在没有多久就垮台了。”

最使人惊奇的是，基辛格的理论言词同他的实际行动是互相脱节的。举例来说，在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国务卿的活动取得了成果（这些成果是同苏方共同取得的），这方面的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原因是，华盛顿没有以一些问题的解决作为就某个问题达成协议的条件。

我不止一次地提醒基辛格注意：

“您坚持要把所有问题联在一起的想法是一种没有生命力的和在理论上站不住脚的方法。”

基辛格一直未能对这一评价作出有力的回答。

在担任美国国务卿的几乎全部任期内，基辛格主张在凡是有可能的一切地区——在亚洲或非洲，在近东或世界其他地区——要对苏联施加压力，要迫使苏联作出让步。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同苏联达成协议。

这种办外交的方法，只不过是把美国国内政治领域里广泛采用的所谓“兜圈子和绕弯子”的办法，把买卖人习气和政客手腕搬到国际事务中来。显而易见的是，华盛顿用这种

被吹嘘为外交艺术“顶峰”的手法来同我们进行谈判，是什么好处也捞不到的。只有当现实主义和兼顾双方利益的思想在美国政策中占上风时，事情才会得到顺利发展。

苏美两国在限制核武器方面已经着手做的事情，包括两国已经达成的重要协议，同基辛格所制定的那套公式是不能相容的。在这里，国务卿努力想做一个现实主义者，而没有提到要等到其他有争议的问题都解决了，再搞这类协议。于是，在这个问题上基辛格就同他自己发生了冲突。

喜欢把外交行动区分为各种不同类型的人，也就是说喜欢把某些外交行动看作是出于实用主义考虑而采取行动的人，就有可能这样干（即要等到其他有争议的问题都解决了再搞限制核武器等协议）。然而，基辛格毕竟是一个更为复杂的人物。

从一种立场转变到 另一种截然相反的立场

基辛格在某些问题上能从一种立场跳到另一种截然相反的立场上去的本事当然应该受到谴责。因为当初他承认过，苏美两国在进行战略武器谈判时，必须恪守平等的原则。他喜欢在会谈中反复强调：

“平等原则具有最重要的意义。”

而现在，当他在政府中不再担任任何职务时，这位曾对制定有关协定作出过不小贡献的人，实际上已把这个原则抛在一边。除此之外，他还不顾事实，企图证明两国间现有协定并不完全符合平等原则的要求。证据何在呢？没有。这才

叫做随风转舵。

同基辛格的多次会晤使我相信，他具有热衷于策略而损害战略的特点。他同新闻界打交道时高超的应变技巧也是众所周知的。

基辛格常常忽视原则。而忽视原则，却是一种要招惹报复的玩艺儿。这种报复的例证就是，关于他流传着各种难以入耳的议论。比如，传说在整个战后时期，华盛顿对不合其胃口的国家政权进行破坏和阴谋活动，作为国务院领导人的基辛格不仅是参与者，而且是领导这些活动并决定其具体目标和对象的关键人物之一。

看来，基辛格永远难以洗刷掉他身上的一个污点，即直接参与了杀害阿连德和扼杀智利人民政权的可耻行动。尽管把智利变成政治压迫、暴力与专横盛行的监狱之国的罪恶行径完全是美国政府干的，但这丝毫也减轻不了基辛格的罪责。

这位前任国务卿还有一个他本人很忌讳的特点，他在回忆录中对此也只字不提。这就是他有一种令人吃惊的本事：迎合当权上司并把自己原先坚持的原则置于脑后。在基辛格政治生涯的某些时期里，无原则性就是他的最高原则。这种说法一点不假。他哪一点不象梅特涅？真是无独有偶。

是的，有一条原则基辛格没有背叛，那就是哪位总统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采取最不友好的立场，基辛格就更喜欢哪一位。当然，也不全是这样。比如，尼克松在主掌白宫时，认为必须同苏联寻求共同语言，可基辛格并未因此而拒绝正式为尼克松效力。但是，他以确保自己“浮而不沉”为限度。

可现在又发生了奇特的变化。基辛格不当国务卿后，一度似乎沉溺于写回忆录的天地里，后来则企图在美国政治生

活中东山再起，再次表示愿意给里根和他的政府效力。他愿意效劳的这个政府长期以来只要一听到“社会主义”这个字眼，就要喊“离我远点儿”，要把苏美关系中一切有益的成果统统埋葬。基辛格硬是毫不迟疑地这样干了，指望着新总统也许会突然愿意把他拉进自己的班子里。但他未能如愿，因为已经事过境迁了。

纪元初期的罗马哲学家、尼禄¹的老师——卢修斯·塞涅卡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名言：

“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向哪个码头航行时，来自任何方向的风对他来说都不会是顺风。”

说实话，有时觉得基辛格踌躇满志，就要浮现在波涛汹涌的国际政治海洋的水面上，并将沿着正确的方向大展宏图，就裁军，首先是核裁军，禁止把军备竞赛扩展到太空以及其他双边问题达成协议。但到目前为止，这一切还没有成为现实，这是令人遗憾的。

为条约而斗争

如同在苏美关系史中多次出现过的情形一样，反对同苏联发展正常关系的人再次提出所谓“苏联威胁”的神话，他们在政治上广泛地宣扬这样的论调：似乎只有紧张、敌视与对抗才算是苏美关系的理所当然的状态。

随着华盛顿卡特政府于1977年开始执政，这股势力开始

¹ 尼禄（37—68），罗马朱里亚·克劳狄王朝皇帝（公元54年起）。据文献资料记载，为人残暴、好色、妄自尊大。因实行高压政策和没收公众财产等，遭到罗马社会各阶层的反对。——译者

对美国整个对外政策产生影响，使其越来越具有自相矛盾、不能始终如一的特点。总统本人在白宫任职期间，一步步地滑向同苏联对抗的路线。

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国尽力维护并尽可能地发展前些年苏美关系中通过双方共同努力好不容易才积累起来的积极成果，极其重视在苏美之间继续就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进行谈判以缔结一项新的协定，即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

同卡特政府就这个问题进行的最初几次接触就已经表明，卡特政府想从苏美过去已经达成的协议后退，尤其是要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最高级会谈所达成的协议后退，并想签署一项能使美国在战略核武器方面对苏联占明显优势的条约。1977年3月，美国国务卿赛勒斯·万斯访问莫斯科时，阐述的正是华盛顿的这种立场。

万斯会见了勃列日涅夫，他们就核武器问题原则性地交换了意见。我同美国客人们进行了一系列的会谈，相当详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我用手头掌握的大量数字和事实向万斯解释说：

“美国政府的主要要求就是，苏联必须消除一半‘重型’导弹（陆基洲际弹道导弹），这种要求不仅是不能接受的，而且是荒谬的。我们坚决反对动摇苏美经巨大努力所达成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的基础。应该维护这个基础，使其免遭破坏，并且要在此基础上最终缔结苏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第二个协定。”

后来，1977年3月31日，在莫斯科为苏联和外国记者举行的招待会上，我又公开重申了苏联的原则立场，并以苏联领导人的名义发表了声明，做了相应的解释。

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在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上，整个国际社会舆论并不站在美国立场一边，而且对苏联的立场表示了理解。

1977年9月，我同卡特总统在华盛顿举行第一次会见时，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是中心话题。同我一起去白宫的还有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格·马·科尔尼延科、苏联驻美国大使阿·费·多勃雷宁。我们穿过几间卡特助手们办公的房间后，走进了美国总统主持召开政府会议的大厅，也可以说是“制作”美国政策的地方。赛勒斯·万斯、无处不在的总统外交事务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和美国驻苏联大使马尔科姆·图恩已经在那里等候。我们一起等候卡特。谁也没发觉卡特是从哪一扇门走进来的，因为白宫里这种大厅的门多得难以数清。

总统总是那么笑眯眯的（那些诙谐的人说，他在睡梦中也总面带笑容），他向我们走来，热情地向我们问候。

他显然想让我们明白，他已准备好采取建设性态度。

大家在椭圆形桌旁坐下。一边是参加谈判的苏联人，另一边是美国人。我对罗斯福以来的美国历届总统是了解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能够比较判断的。我认为，美国的历届总统在举行这样会晤的时候，更喜欢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进行谈话。在那里，每个参加会见的人都得端正地坐在柔软的圈椅里，连同自己的邻座交谈的机会也很少，使人感到很不方便。看来，卡特的风格与此不同。他喜欢手下的助手和顾问们呆在身边，一旦需要，他们就能把各种咨询材料立即传递到他的手上。这种做法是有所考虑的，因为卡特关于对

1. 原文如此，应该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译者

外政策具体问题的了解并不总是那么充分，再说他入主白宫时间也不长。

会谈由我先开始发言。我说：“我甚感满意的是能有机会同您，总统先生本人，讨论一些重要问题，首先是同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有关的和有待解决的问题。”

我们向卡特阐述了苏联对解决这些问题的立场。我们吁请总统促使这些问题能取得一致意见。

卡特代表美国方面指出：

“我们愿意努力加快已进行多年的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准备工作。”

但是，在同总统继续会谈中，当说起具体内容时，则十分明显，求得互相谅解可不那么简单。

当需要运用双方导弹核武器的数据及其型号的资料时，就困难重重。甚至连哪些地区部署了这类武器，美国人也吞吞吐吐。尽管这些地区及其名称对对方来说，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举例来说，当卡特想说出苏联某些城市和地区的名称时，他的发音简直叫人听不懂。又比如，他好几次十分吃力地说过这样一个单词。

“捷—拉什—尼亚”。

我们很长时间弄不明白，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后来才搞清楚，原来说的是“杰拉日尼亚”，是乌克兰一个居民点的名称。

总的来说，卡特是一个精明细致的人，所以他在会谈中很想炫耀自己了解问题的实质。但是，在我和他认识伊始就感觉到（并且也为后来几次会谈所证实），美国总统还是很难

抓住苏美关系中一些问题的实质，其中包括最困难问题之一，即制定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问题。在谈到具体问题，他总是显得不大能运用自如。这并非是要指责他。

举例来说，那些美国专家们向总统灌输了这样一种思想，即美国方面在谈判中应该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苏联拥有的“重型”导弹上，要苏联方面必须削减的正是这些导弹的数量。这种思想牢牢地印在卡特的脑海里，因为专家们可以说是掰着手指头向卡特详细解释了这种思想的。顺便说一下，卡特也正是想以同样方式向我阐述这种思想。

当我们进行的会谈到某个时刻时，卡特就把一组塑料制成的礼品式的导弹模型拿了出来并把它们放在桌子上。模型中一排是苏联导弹，而另一排是美国导弹。他首先展示了我们的两个导弹模型，其“身高”明显超过美国最大的导弹。他用手指敲了敲这两个模型后说：

“我们最害怕的就是这个。”

总之，他通过展示某些小玩具，企图回避作出实质性的论证，看来，卡特对此很为得意。

卡特同其他的前任美国总统们一样，一贯把限制苏联的核潜力作为首要任务，并同时力图保持美国主要核打击力量不受损害。只是在苏联不容置辩的论据和得到全世界广泛支持的建设性方针的影响下，卡特才从其竭力为美国谋取单方面优势的立场上勉强地向前移动一步。我们还是向达成新的苏美协议的方向前进了。

限制和削减核武器问题关系到每一个人。因为这涉及到世界命运、保护地球上的生命，任何人都不能对堆积如山的武器还在不断增长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

如果说许多人仅仅是从电影或者书本上知道核爆炸及其后果的，而政治家是根据军人或学者的报告了解这一情况的，那么，对卡特本人来说，核战争的危险就应当是更具体的和更可以直接感觉到的。事情是这样的，卡特是美国历届总统中唯一的一位在出任总统之前就已与核动力和核设施有过直接关系的。卡特身为一名年轻的潜水艇军官，曾在“通用电气公司”这个电机垄断集团的企业里实习过，这些企业为美国第二艘核潜艇“海狼”号制造过钚反应堆。他曾和一些军官被派去消除一座原子反应堆所发生的事故。卡特在危险地区呆了一分多钟，受到的辐射达到一年的摄取标准。这样的行为非同寻常。

卡特曾近在咫尺地感受到核死亡的威胁，因而他似乎本应对同核能直接有关的一切持有特殊的态度。但是，时间证明，他并没有对美国在核武器问题上的政策作出果断的决定。

在白宫会谈的时候，总统常常同周围的助手们相互交换意见。这时，我们出于礼貌，尽量不去倾听他们之间的谈话。会谈持续了3个多小时。会谈结果还是朝着达成协议的方向有所进展。然而，我们远远没有克服所有的分歧。为了消除这些分歧，还需要回过头来再讨论那些本来已经讨论过的问题。

就在几天后，我又在白宫会见了卡特。在这次会谈后，只剩下个别问题没有解决，是些非原则性的问题。假如美国方面在制定条约最后文本时不再为迫使苏联作出单方面让步而要拖延手腕的话，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准备工作本可以很快就结束。

总共花了一年半多点儿时间的耐心细致的工作，在1978

年同卡特进行了一次会见，还同万斯进行了几次会谈之后，最后才得以商定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草案。

在维也纳的亲吻

那一时期的政治上的埃佛勒斯峰¹就这样被征服了。

为了隆重地签署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苏美两国最高领导人列·伊·勃列日涅夫和吉米·卡特同各自的外交部长及国防部长一起来到了维也纳。

在签字之前的会议上，卡特提出一个有关条约生效的问题。他宣称：

“双方当然应该按规定批准条约。”

苏联代表团这样表示：

“这个已经准备就绪的条约对维护和平和各国人民安全是如此重要，应该毫不拖延地使其完全生效，也就是说苏联和美国的立法机构应毫不拖延地予以批准。条约应该完全有效。”

正如后来事态发展所证明，当时提醒必须尽快批准条约太恰当不过了。

……1979年6月18日。霍夫堡宫。隆重庄严的环境。各大厅金碧辉煌。它们多次成为一些重要会议的见证者。这些会议所取得的成果给欧洲的历史留下了印记。

签署条约的时刻即将来临。法律专家们已不止一次地检查过约文里的句号和逗号。但愿上帝保佑，可千万别蹦出一个错误的标点符号而歪曲了这一重要文件的意思。要知道，

¹ 即珠穆朗玛峰 ——译者

整个世界都在翘首以待。

在霍夫堡宫雷杜特大厅举行了签字仪式。双方代表团团长拿起笔，坐好之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当他们还未欠身站起时，我向苏联国防部长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乌斯季诺夫（当时我和他稍微靠边站在一起）问道：

“你看，他们会不会亲吻？”

“不。”我听到的回答是，“没有必要亲吻。”

“说不准，”我回答说，“虽然我同意，不一定要做这种姿态。”

但是，卡特表现出来的主动性使我俩都感到愉快和惊讶。条约签字后他们亲吻了，大厅里掌声四起。

如此规模的事件总是使人不由自主地产生历史的联想。在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签字仪式上，我脑子里产生了如下对比：就在这里，在维也纳，1814—1815年举行了一次欧洲君主们的会议，完成了欧洲国家联盟反拿破仑战争的总结。尽管这一事件在历史上十分重要，但是其意义无论如何也不能同苏联和美国之间达成的关于限制战略核武器的协议相比拟，该协议为减少威胁着全人类自身生存的危险提供了可能性。

后来，双方代表团在维也纳歌剧院观看了演出，演的是莫扎特的著名歌剧《后宫诱逃》。包厢上挂着苏联、美国和奥地利国旗。

签订的这个条约要比在它之前签订的临时协定（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大大前进了，它包括进攻性战略武器的各个方面，并架起通往进一步限制和削减核武器的桥梁，

人们曾预料，在不久的将来，这将成为下一阶段谈判的主题。条约令人信服地说明，只要双方愿意考虑相互的合法利益，最困难的问题终究也是可以达成协议的。同时，这个条约具有很大的潜力，会有力地影响有关控制军备竞赛和裁军的其他步骤。

在维也纳停留期间，双方代表团团长还就国际形势的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总的来说，他们重申愿意继续就那些仍然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谈判。赛勒斯·万斯在同我们的谈话中对此表示赞成。他并不掩饰自己对签署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感到满意的心情。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戴维斯·约翰对德·费·乌斯季诺夫差不多也是这样说的。但是，美国方面作出的表态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情绪影响的，这并不能为今后将举行的核武器谈判进行可靠预测而提供依据。

卡特政府后来在苏美关系乃至整个国际事务中的行动，加强了美国反对签订条约的那些人的立场。美国政府实际上是听命于那些千方百计阻挠条约生效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卡特向议会发出的要其批准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有气无力的呼吁看来只是权宜的政治手段，其目的主要是想做个样子，显示总统是忠于自己已经承担的义务的。1980年1月，卡特宣布了自己的决定，干脆不定期地推迟审议这个问题。

很清楚，卡特政府是想方设法要破坏条约的批准。众所周知，这件事后来是由里根政府完成的。这样的行动，毫不夸张地说，成了美国的耻辱。能客观思考问题的人们，包括美国的在内，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谬误一个接着一个

在卡特政府的政策中越来越明显地显露出军国主义意向，所追求的目标说到底是为了打破业已形成的东西方军事力量均衡，就象美国总统在维也纳会晤时没有郑重其事地承认过必须保持这种均衡似的。

为了使世界战略均势产生有利于美国和北约的变化，华盛顿急剧增加了军事拨款，通过了动用几十亿美元生产武器的计划，还怂恿北大西洋集团的盟国也这么干。北约作出了关于扩军的补充计划和在西欧国家的领土上增加部署美国核导弹的决定。与此同时，华盛顿毫无根据地暂时中断或完全停止了早先开始的关于限制军备竞赛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谈判。

卡特政府还竭力破坏欧洲缓和的进程。这就注定了美国在欧安会参加国代表贝尔格莱德会晤（1977年10月到1978年3月）和马德里会晤（1980—1983年）时要采取作梗的立场。

美国方面采取步骤缩减同苏联的经贸和文化联系，不履行早已承担的义务，开始重新审定已签订的合同。华盛顿将一些商品宣布为“战略”物资，禁止向苏联出口，对出售粮食实行禁运。

谬误一个接着一个，接二连三地层出不穷。华盛顿宣布打算把苏美关系建立在所谓相互“关联”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以下两者之间确立相互依存的关系：要发展苏美关系，苏联就必须满足美国在一些问题上非法提出的条件，而这些问题又是属于我国内部主权的事或者涉及苏联同第三国的关

系。正是基于这种立场，美国围绕“人权”问题掀起了可耻的宣传运动，说什么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似乎“人权”遭到了侵犯。

在这个问题上浸透谎言的高谈阔论，连同所谓“苏联威胁”和“扩张主义”的种种捏造，成了卡特政府的惯用手法。越到后来，卡特政府越是起劲地组织反对苏联的思想破坏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蒙骗社会舆论，将华盛顿政治战略的真正面目、破坏苏美关系和扩大军备竞赛、加剧世界紧张局势的方针伪装起来。

卡特本人直接参加了关于“人权”问题的挑衅性运动。这个话题象喋喋不休的商业广告一样充斥于他的讲演中。卡特差不多每次同苏联代表会见时，都把谈人权问题几乎看成是自己的义务。

同卡特谈话时，我也感受到了这一点。

白宫。刚才还在谈论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核武器协议的必要性，说这个协议将是对发动战争的严重障碍，双方强调他们在这方面应担负多大责任。这时卡特突然说：

“我想从另一个方面，就是从保卫人权方面提个问题。”

问题的实质是要苏联释放一个因犯罪而被判刑的持不同政见者。卡特大概以为在讨论导弹核武器之后突然转到人权问题是走了巧妙的一着棋。可是，总统的这一着，不管他意识到与否，至少是随心所欲地超越了自己的职权，因为关于持不同政见者罪犯的问题，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属于苏维埃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美国与此毫不相干。我当时说：

“就在我们会谈的过程中，总统主动提出这个问题，我对此只能表示不解。至于那个持不同政见者，对不起，我以

前连他的名字也没有听说过。”

卡特有点儿发窘。他原以为，所提出的问题是关于一个很体面的人物，后来才弄清楚，原来是一个叛道分子，而且还因违反了苏联法律而被判刑。

在谈判桌的美国一方开始窃窃私语，然后卡特又回到了所提出的问题上，企图证明，还是释放这个罪犯才符合“遵守人权”的利益。

在白宫的这段插曲给我们留下了阴郁的印象。卡特竟然挑起这样的话题，这显然是很不严肃的。

美国方面为刑事犯辩护，把自己乔装打扮成人权捍卫者，这当然是虚伪的。在谈判议程上本来有着十分重要的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从数量和质量上限制核武器问题，而这次会谈本应就这些问题进行的讨论还没有结束。可正好在这个时刻，总统故意将微不足道的问题提到谈判桌上，这样提出问题本身就是不合法的。

对这一点我直截了当地并用斩钉截铁的方式对总统说：

“象这样毫无用处的手法是否该放弃了？”

这样，关于一个被判刑的犯罪分子的权利的辩论就到此结束了。

再谈人权

在卡特政府的政策中，围绕人权问题的蛊惑宣传还是日益甚嚣尘上。华盛顿越来越以人权问题的最高法官自诩。可谁授权它扮演这个角色呢？不论是联合国宪章，还是全欧会议签署的最后文件，任何一个其他国际文件都没有授予，也

不可能授予它这个权力。除此之外，人们都知道，美国国内关于保障劳动人民、少数民族和有色人种的权利以及劳动权、言论自由等方面的状况如何。

仅以问题的国际方面为例。不是别人，恰恰是美国至今要么拒绝批准，要么甚至拒绝签署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和关于防止种族灭绝以及消灭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和制止种族隔离罪行的国际公约。

无论是同美国活动家小范围的交谈，还是在国际会议上，苏联代表经常强调，我也这样指出：

“苏联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这些权利的捍卫者。为了人权，为了劳动人民，为了自由，完成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为之骄傲的，正是我们的国家在世界上第一个在自己的土地上确立了真正的人与人的平等，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人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年代里，苏联人民作出巨大流血牺牲，正是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和自由，为了把人类从法西斯奴役的威胁中、从无权和被压迫的黑暗中拯救出来。”

我们向全世界宣布：

“在现阶段，我国在完善社会主义的进程中，解决着巨大而复杂的任务，努力扩大和深化社会主义民主，保障自己的公民拥有极其充分的政治、社会经济和个人权利与自由。对苏维埃人生活方式的诽谤，不能不引起他们理所当然的愤慨。他们鄙弃那些要他们应该如何做自己的事、在他们家里应如何安排之类的说教。谁企图诋毁我们的社会价值、公民价值和道德价值，干涉我们的内部事务，谁就同以前一样定将得到应有的回击。与此同时，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表示愿意在真正人道和诚实的基础上在保卫人权方面进行国际合作。”

我们对华盛顿也这样说了。

我们国家单方面承担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如果其他还没有宣布这样做的核大国响应我们的这一呼吁，也这样做，那么世界的整个政治军事形势将展现出根本好转的前景。这也就是争取人类生存权利的斗争，而这个权利同所有其他权利相比应是至高无上的。反对承担这个义务的任何理由，哪怕是精心炮制的理由，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是谁向联合国提出关于谴责将会对人类犯下最野蛮罪行的核战争的建议？是苏联。我们坚定地认为，对于任何将世界推向毁灭深渊的行为和任何以所谓“合法性”为依据而主张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理论都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理由为它们辩解的。

西方大国一直投票反对苏联的这个建议。试问，在它们的政策中，哪里有对人权的关心和人道主义的表现呢？

是苏联提出全面彻底禁止核试验的建议。现在地下核试验尚未禁止，反对解决这个问题的阻力来自何方？也是来自西方大国。请问，这两种立场中究竟哪一种是人道的，哪一种是反人道的呢？

无需多加评论。

苏联关于禁止生产新式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倡议是众所周知的。经验证明，当这种或那种武器出现在各国武器库时，再想从那里把它消除掉就困难多了。是谁回避了这个建议呢？

还是那些西方国家。

可以形象地说，现在人类正坐在用武器堆起来的高山上，并且这些山峰每月、每周乃至每天都在增高。但是，是谁顽固地利用各种诡辩术反对在世界各国都参加的国际会议上认

真讨论具有全人类意义的迫切问题，即反对讨论苏联和所有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一直为之奋斗的全面彻底裁军问题呢？

还是那些制定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外交政策的集团，在它们的政策中，既没有对人权的应有尊重，也没有人道主义。

苏联和其他华约国家建议签订互不使用武力和保持和平关系的条约，缔约国应承担义务互不使用任何武器，包括核武器和常规武器。是谁反对这个建议呢？

还是他们。

这样的事例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但仅是这里所说的已足以使客观思考问题的人从中得出结论，谁的外交政策是真正人道主义的，而谁的外交政策是同人道主义格格不入的，他们正在作出这样的结论。

社会主义外交政策的人道主义和爱好和平的明确方向是同世界各国和各大洲人民的切身权利和利益联系在一起的。

危险观念的“教父”

华盛顿明目张胆的帝国主义方针与人民利益尖锐对立，这一方针最露骨的表现之一就是任意宣布世界这一地区或那一地区属于美国的“切身利益范围”。特别是卡特政府作出了建立“快速反应”部队的决定，以增强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内部事务进行军事干涉的应变能力。这样，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在20世纪末仍在遭到肆无忌惮的践踏。

卡特成了威胁和平事业和各国人民自由的这一危险观念的“教父”。在卡特任总统的年代里，这个观念具体地体现

在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所采取的行动之中。在卡特总统任期的末期，华盛顿的对外政策处于美国统治集团中最反动势力的军国主义情绪的直接和强烈影响之下。这个集团实际上掌握了决定对外政策方针的主动权。卡特的政治路线在开始时本来就不稳定，后来越来越受这些集团压力的影响，变得违背了他自己的本意，也违背了民主党的意愿。在1980年大选时，卡特为了达到再次连任总统的目的，又当了民主党的候选人。

在这次大选中卡特输给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纳德·里根。另一派势力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占了上风，他们把赌注押在了里根身上。这是卡特自食其果。

同卡特的多次会晤给我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如果单纯从为人的角度来看，他还是比较友善的。但只有当话题不涉及战争与和平这个尖锐问题时，才能感觉到这种友善。在这种气氛中，他可以一连十次举杯祝酒，而且把话讲得很漂亮，很得体。但重要的问题是自然而然地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想回避也是不行的。

看来，卡特过去的经历对他进行社交活动颇有裨益，他曾当过牧师，而这种职业要求他常在大庭广众发表演讲，因而善于同人们保持接触总是很重要的。

在谈话过程中，卡特有时说些“离题”的话（似乎为了松弛一下），使交谈双方都可以暂时避开讨论那些严肃的问题。例如，有一次在白宫开始会谈前，总统把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请到谈判大厅。

总统突然对我说：“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母亲。她经常到白宫来。”

总统的母亲是一位善于交际、和蔼可亲的妇女。她热情

地欢迎我们，并说：

“美国人，包括我在内，都希望同俄国人保持良好的关系。”

我们异口同声地表示赞同她的想法，而且我还补充说：

“如果同我们谈判的美方代表也持您这种观点，那就好了。”

卡特和他母亲都善意地笑了。

“离婚”前后的赛勒斯·万斯

在卡特总统任期内的大部分时间，赛勒斯·万斯是美国国务卿。在美国外交政策舞台上，他是一个有意思的、有分量的人物。

万斯之所以被任命为国务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和卡特之间的个人关系：在1976年总统选举之前的竞选活动中，他在卡特的竞选“班子”里担任外交政策顾问的要职。

更早些时候，他们两人都参加过半官方的所谓“三边委员会”的工作。该委员会是在戴维·洛克菲勒倡议下于1973年成立的。参加者有美国、西欧和日本实业界的知名人士、政治活动家和政治学家，他们研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怎样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相互协调的问题。

当时，万斯已经被认为是一个有经验、能干的法学家和著名的政治社会活动家，这个声誉当然也起了作用。所以卡特将自己政府中最重要的职务之一委任给他，这是不足为奇的。

在当国务卿之前，万斯在我国也已颇负盛名。他曾参加

过苏联和美国的联合国协会举办的由各阶层人士参加的各种会议。70年代初，他曾加入过美国社会团体“争取政治解决越南问题全国委员会”，并对美国军事干涉越南及印支其他国家的事务发表过批评性的言论。

现在万斯虽然不担任官方职务，但他仍然是美国争取限制军备和缓和世界政治气氛的社会运动中有威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参加国际裁军和世界安全委员会的工作。该委员会在1986年以前是由社会党国际的著名活动家、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领导的。

众所周知，西方出现的这类社会各界人士参加的会议和运动反映出人们对世界局势的忧虑。虽然西方国家社会各阶层人士表现出来的这种情绪对这些国家对外政策的形成并不总是能产生直接的影响，但对社会舆论反战倾向的发展仍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仅此就足以说明这种集会必需的。在这种活动中，知识分子的代表，特别是科学界人士——医务人员、法律工作者、物理学家、化学家和其他领域的专家起着显著的作用。

万斯刚进美国国务院，一大堆事务就落到他头上。如他本人所说，核军备及限制和裁减核军备问题象一副沉重的担子压在他的肩上。

万斯卷进了时局急剧动荡的漩涡，他被抛来抛去，来回折腾。尽管如此，他从本性上讲决不是个悲观主义者，他总是力图找到一种说法，以表示他对前途感到乐观。而在这后面一直隐藏着对未来的担忧。

在我们的接触中，万斯总是对寻求苏美互相都能接受的协议表现出兴趣。我曾多次注意观察他，不仅观察他代表美

国政府说了什么，而且还观察他是怎么做的。

万斯在一些方面的观点是有独到之处的。当然，他坚持官方的立场。但是，他这样做的时候还是表现出某种灵活性。例如，在讨论核导弹问题的某些方面时就是这样的。万斯阐述了政府的观点，然后他不再就此问题进行过细的辩论，而是很策略地转向别的话题。他可以说是比别人更能体察情势微妙之处。

万斯在一系列对外政策问题上不同意卡特的路线，因而他终于不愿再继续担任美国国务卿的职务。万斯辞职的直接原因是，他公开表示不同意用武力营救在伊朗的美国人质，而武力营救是美国在1980年4月底经总统批准后采取的行动。这一行动以失败告终。总统接受了这一辞呈，并象通常所做的那样，把这件事处理得相当得体。

在某些政治家的生涯中，有时会出现一些因祸得福的情况。万斯就遇上了这种情况。美国国内外的政界人士和社会各界人士都认为，万斯的辞职本身表明，这位前国务卿是一个有坚定信念的人，一个讲原则的人。这种看法不是没有根据的。

离开国务院后，万斯回到了“辛普森——撒切尔——巴特列特”私人律师事务所重操旧业。该律师事务所甚至按美国的标准看也是很体面的，它是由万斯同别人合办的。但是，政治活动家的影子总是同他寸步不离，而且他当时曾同美国当局“离婚”这一事实明显地没有使他在国内的威望受到影响。

在万斯辞职以后，我曾有机会见过他（还有卡特），那时里根政府外交政策中具有的沙文主义和帝国野心的一切特征已暴露无遗。同万斯谈话对我来说总是饶有趣味的事。

当然，万斯是另一个社会制度的代表人物。他现在也依然如此。但这并不妨碍他主张通过和平途径克服美苏之间的分歧。

万斯在谈话中多次阐述过这样一个完全正确的思想：

“美国人民不要战争，并对爆发战争的危险感到不寒而慄。我相信，两大国之间在客观上有可能达成互相能够接受的协议，我现在要强调这一点。”

万斯同我们会见时，不论是代表官方还是个人，甚至在美苏立场截然不同的情况下，他的态度总是彬彬有礼的。他不喜欢尖刻的言辞，而这种尖刻的言辞却是里根当局惯用的，在公开发表的演说里更是如此。

万斯具有一些非常类似安东尼·艾登（我想起英国战时的外交大臣）的特点。如果说，相比之下万斯有什么不足之处的话，那就是在策略问题上他不如艾登那样有创造性。万斯生性乐观，富有朝气，精力充沛，颇有才能。象有些人一样，他有时也被轻易扣上“亲共分子”、“同情共产党分子”之类的帽子，但这纯属无稽之谈。

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过去和现在都有这样的人，而且为数还不少，他们并不是通过发财和贪婪这个小窗口来看世界的，而是尽量把眼光放得宽一些。当涉及外交事务时，这一点特别重要。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说，万斯正是属于这样的一种人。

“温和派”马斯基在维也纳

如果我不谈一谈另一位美国国务卿埃德蒙·马斯基的

话，那未免是个疏漏。他是和前总统卡特一起结束其仕途生涯的。他任国务卿的时间不长。我同他只会见过一次。这次会见是1980年5月在维也纳举行的，苏美两国外长当时在那里参加重建独立和民主的奥地利国家条约签订25周年的活动。

这次同马斯基的会晤是事先安排的，会晤中双方就重大的国际问题和苏美双边关系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不出所料，国务卿阐述了卡特当局对上述问题的基本立场。卡特当局明显地表露出对苏联的敌意。不论讨论地区性冲突，还是讨论双边关系时，这一点都可以明显感觉出来。

针对美国政府的这一路线，苏联方面提出了和平、裁军、遏制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的政策，以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改善苏美关系的政策。

在讨论核武器问题时，我代表苏联领导强调了以下思想：

“华盛顿拒绝批准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这是背信弃义的行为。就在不久前，在奥地利首都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勃列日涅夫和卡特签署了条约。可是，接着发生的事情又说明了什么呢？别的姑且不说，至少说明华盛顿把自己所承担的义务和在有关防止核战争危险这样重大问题的文件上所签的字看得很不值钱。”

马斯基在回答我们就上述及其他问题所发表的意见时所说的一切，进一步证实了卡特政府是在朝着加剧世界紧张局势、恶化苏美关系和加深苏美在核武器问题上的分歧的方向漂泊。

当然，马斯基在维也纳和卡特本人在华盛顿所坚持的立场，意味着朝卡特在此后不久同里根竞选总统时面对选民所

强调的那个方向迈出了一步。但是，卡特这样做的结果似乎和缓了里根的处境。因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的政治路线信条就是：在对外政策的各个方面都采取比卡特更右的立场。卡特愈向右迈步，里根就更向右多迈几步，而且力图拉开他同卡特之间的距离。那些掌握着决策大权的极右势力正是要求里根这样做的。

在马斯基这个政治人物的言谈举止中，还是多少可以看到一种心平气和、明白事理的样子，但这只是与后来的里根当局相比较而言的。我比较倾向于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由于马斯基本人的性格决定的。在华盛顿的政治舞台上，一般都认为马斯基在判断国际局势问题时是能够表现出这种气质的一位活动家。但是，这位国务卿在举止上，甚至在言谈中所表现出来的温和迹象还是淹没在华盛顿总的政策之中了，特别是淹没在苏美关系和核武器问题之中了。

如果今天有人这样问我，在讨论有关的国际问题和苏美关系问题时，我愿不愿意有马斯基这样一个对手？我会毫不犹豫地：

“是的，不过马斯基可别带着他在维也纳所坚持的那种消极政策参加谈判。”

飞机事件

1980年随着里根政府上台，由于华盛顿的过错，苏美关系开始出现了越来越紧张的形势。国际政治气候骤然转入寒冷时期。

这届政府费了不少力气来破坏它的前任为苏美关系所做

的事。它是这样干的：一会儿攻击这个协议，一会儿攻击那个协议，阉割这些协议的内容，或宣布这些协议无效，就如同对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所做的那样。白宫不断地葬送一个又一个条约，竭力追求一个最小的数值——零。

已经发生了的事情终归是事实。要想从历史上删掉是不行的。只是到了苏美日内瓦、雷克雅未克、华盛顿最高级会晤并签署了消除中短程导弹条约之后，两国关系才出现好转。

至于说苏联，它不止一次地以自己的行动表明，人们可以同它打交道，可以相信，它一定会履行自己的义务。

今天，国际法中“约定必须遵守”这样一条基本原则大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这虽然是一条古老的原则，但它的价值丝毫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少，反而日益增大了。实际上，在所有的最重要的国际文件中，从联合国宪章到全欧会议最后文件，都包含着这条原则。

70年来的对外关系史证明，苏联在履行所承担的国际义务方面堪称是一个严肃认真、始终不渝的伙伴。甚至温斯顿·丘吉尔这个任何人都不会疑心他是对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抱有好感的人，有一次也说过：

“我不知道有哪一个政府能比苏联政府更为认真地履行自己的义务……”

认真地履行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准则规定的义务，这是苏联对外政策中一条由宪法规定了的原则。我国宪法第29条载有这样的规定。

在国际生活中有时会发生这样的事件：有些事情，就其规模来说，初看似乎并不重要，但用形象语言来说，可以把它比作一颗政治炸弹的爆炸。1983年8月31日深夜，在远东

发生了一起南朝鲜飞机由于粗暴侵犯苏联国界而被击落这一人所共知的事就是这样的事件。

关于这一事件的消息瞬间传遍了全世界。各个国家性质不同的反应也接踵而至。

华盛顿的反应最为神经质，并且前言不搭后语。美国的某些集团有意地利用这一事件来加剧局势。他们掀起了一阵诽谤苏联的浪潮。

美国各个部门的代表竞相散布很多相互矛盾的虚假信息。美国政府亲自出马，扮演了诋毁苏联的主要诽谤者的角色。仅这一个事实就很说明问题。

只要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马上就可看出，华盛顿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飞机辩护，只不过在飞机上贴上了南朝鲜的标签，这一反苏挑衅的真正策划人、指使这次被用于军事侦察目的的飞行的正是美国有关部门。这一挑衅行动失败后，它的组织者又利用这一事件来煽动军事狂热。

这件事的发生离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参加国外长级代表马德里会晤最后阶段会议召开只差几天。华盛顿当然明白，如要破坏这次会议，那它做得就有点儿太过分了。看来，它也预感到，迟早会真相大白，天下人终将会得知美国对飞机事件应负的责任。在西班牙首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马德里——会议开场

马德里，1983年9月8日。会议参加国的外长们一个接着一个地走进舒适的、工作条件很方便的大厅。与我一起走进大厅的是苏联外交部副部长阿·加·科瓦廖夫，他是我国

一位老资格的外交家。是他几年来率领苏联代表团出席马德里会晤。

当时的气氛有一种捉摸不定的东西。每个参加者都向自己、向同事们提出一个问题：

“将会发生什么事？”

气氛中的电荷是相当大的。就象通常在类似的情况下一样，总是有些悲观主义者，他们估计：

“会议可能会遭到破坏。”

他们当然估计想破坏这次会议的很可能就是华盛顿。但是也有乐观主义者，他们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华盛顿还不至于采取这样的极端措施，因为它要考虑到这样做对美国自身有什么后果。”

许多人纷纷向我们苏联代表和我个人提出问题：

“将会怎么样？马德里会晤结果会怎么样？”

当然，我们没有去扮演预言家的角色，但我们明确表示：

“想破坏这次会议的只有那些根本不想召开这次会议的人，虽然他们正在掩盖自己的这种意图。”

部长们开始发言，就会议所面临的问题阐述了各自所代表的国家的政策。多数北约国家的代表发言支持美国散布的关于飞机事件的说法。说的是多数，而不是所有的代表。一些代表说，这次事件是可悲的，惨痛的，但却明确表示，他们不相信五角大楼和美国特工部门所做的解释。

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发表了总的来说是敌视苏联的讲话。

我们不得不对美国政府的代表进行反击。

我指出：“这架飞机侵犯苏联边界，是军事侦察性质的

蓄意挑衅。我以苏联领导的名义宣布，苏联拥有守卫自己边界的神圣权利，不允许任何人侵犯而不受惩罚。这是它的主权。其他国家也有同样的权利守卫和保卫自己的边界。”

美苏代表发言之后，紧张气氛可以说达到了最高点。大家都在等着瞧，看究竟会发生什么事：会议将继续开下去，还是就此夭折。

勉强维持的和睦总比真正吵起来好

与此同时，根据美国国务卿在抵达马德里之前就已提出的倡议，我同他已经达成了关于进行双边会晤的协议。本来预计，这次会晤将就苏美关系问题和诸如关于限制战略核武器及欧洲核武器谈判的进程等国际局势中带根本性的问题认真地交换意见。

于是，在我们发言之后的第二天，我们见面了。不需要具有深邃的洞察力就能发现，美国国务卿看起来满面愁容。我们两人，正如所说，面临着一次坦率的谈话，只不过是从不同的立场来谈。

舒尔茨立即开始就纯属苏联内部事务的人权问题大作文章。我委婉地说：

“讨论这一题目没有意义，因为谈的这些纯属我国内部事务。”

而舒尔茨几乎是逐字逐句再次重复了刚才说过的话。看来，只不过为了加重分量，又补充了一句：

“我一开始说的那些话是总统委托我说的。”

我再次克制地对我的交谈者说：

“我们不打算同任何人讨论我国的内部事务，至于说您作为国务卿所接受的委托，那么，它不能约束我，我作为另一国的代表没有义务听从美国总统的指示。您终究不会自己和自己讨论这些问题吧？我们还是走出这个小房间，到另一个房间里去，我希望，我们在那里能够讨论苏美关系和国际政治的重要问题，让我们的顾问们也参加，这样不是更好些吗？我们事先正是这样商定的。”

舒尔茨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同意到另一个房间去，开始进行较大范围的会谈。苏联方面出席这一部分会谈的有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弗·格·科姆普列克托夫和译员弗·姆·苏霍德列夫，美国方面有总统苏联事务特别助理杰克·梅特洛克，副国务卿里查德·伯特和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阿瑟·哈特曼。

不出所料，舒尔茨刚坐下就谈论起飞机事件来。他对于我提出的关于会谈议程的建议没有作出反应，却阐述起本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的观点，并再次说，这是总统的指示。

企图把会谈议程强加于人的做法表明，美国方面干脆不想讨论别的真正重要的问题。我只好要他停下来。

我说：“您企图按照早在华盛顿就拟定好的蓝本行事，这是行不通的。我们应当讨论诸如苏美关系、与核武器问题有关的欧洲局势和日益紧张的世界局势等根本问题。”

双方争论一番之后终于商定，会谈应当按双方利益所要求的那种安排继续进行下去。不过，在转入按这种安排行事之前，又经过了许多回合各种各样的明争暗斗。其中有过这样的情景：我不得不直截了当地声明：

“如果美国国务卿要回避讨论重要问题而企图把整个会谈归结为宣读华盛顿关于飞机事件的声明，那么，在这种情

况下，我同您就没有可谈的题目了，可以认为我们的会谈到此就结束了。”

我同美国官员有过多次数晤，但我不记得有哪一次会晤时美国国务卿如此顽固地企图把自己的工作日程强加于人并避而不谈当代最重要的问题。

舒尔茨声明：

“里根政府赞同与苏联进行建设性对话。”

这一声明使他的表现更令人难以理解。

其实，这种声明并不反映实际情况，因为美国当时根本就不想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请国务卿注意问题的这个方面，我说：

“我准备讨论双方感兴趣的问题，当然如果你们也准备这样做的话。主要任务在于修整苏美关系，缓和由于美国在两国关系中以及在全世界的行为所造成的紧张局势。”

然后我就核军备的根本问题阐述了我国的立场，并指出：

“关于飞机问题好象是头号问题的说法是臆造的。实际上，全世界面临的头号问题是防止核战争。很难找到一个美国人，当然，如果他神经正常的话，不认为正是防止核战争问题才是全人类最迫切的任务。”

我代表苏联领导说：

“世界正滑向一个十分危险的边缘，离它越来越近。显然，苏美两国对于防止核浩劫负有重大责任。我们认为，美国应该以新的方式来评价它所肩负的这一重大责任，总统和他的政府不应象过去那样看待对外政策事务。所有旨在遏制军备竞赛、限制军备竞赛的建议都被拒绝了，更不用说关于削减核军备的建议了，难道这不是事实吗？不管苏联为此提

出多少建设性建议，美国都不假思索地予以拒绝。这样的事例实在太多了。”

“苏联领导认为，”我接着说，“苏美两国应当积极地促进消除核浩劫的威胁。况且，在这方面我们两国在过去已经通过了共同的正式文件。它的条款要求我们两国朝着这个方向采取行动。”

舒尔茨坐着一言不发。

我说：“苏联正在为此而坚定不移地作出努力。即使是在复杂的条件下，对话也是可能的。这话听起来可能会使人感到奇怪，但就连我们这次会晤也表明了这一点。再不好的对话也比打仗好。”

我有意地把“勉强维持的和睦总比真正吵起来好”这一著名谚语稍微改动了一下。我接着说：

“我们还怀有一线希望，但愿美国政府还没有放弃这样的想法，即必须通过谈判寻求解决争议问题的办法。不能允许今天笼罩在世界上空的乌云突然爆发成一场浩劫。这样的浩劫对于大家——对于美国、对于我国、对于全世界将意味着什么，这一点美国了解得丝毫也不比我们差。”

舒尔茨仔细听取了我的发言。看来，他已经放弃了自己的初衷，即不再把会谈仅限于讨论关于南朝鲜飞机事件这一个题目。

“必须寻求协议”

我提醒国务卿注意苏美关系中的一件事例：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问莫斯科时，通过谈判，两国得

出一个结论，即应当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国际问题的办法，并确实进行了寻找。是的，让我们回忆一下，尼克松时期进行了寻找。堆积如山的武器和整个国际局势要求我们珍惜一切有助于架起和平桥梁的东西。因此，我们呼吁美国总统和您，国务卿，带着责任感去寻求协议，利用一切可能性，以使我们在停止核军备竞赛和裁军问题上的立场相互接近。”

接着，我提了一个问题：

“如果美国打算在西欧部署新式导弹核武器的愿望得以实现，那以后会怎样呢？因为苏联不会睡大觉，我们将努力恢复平衡，而且一定会做到这一点。那时的世界将变得更加脆弱，因为这种平衡将建立在更高的水平之上。这就是美国实际上会导致的局面。”

舒尔茨仍认真地听着，一言不发。

“我和您，”我接着说，“有责任相互说明本国的立场，并向本国领导报告每一方提出来讨论的那些建议。”

说到这里，我再次请他注意尤·弗·安德罗波夫曾提出的关于欧洲核武器的建议。考虑到美国的立场，我认为向舒尔茨提醒一下苏联的观点不会是多余的。

美国国务卿是怎样回答的呢？舒尔茨宣称：

“没有人比里根总统更忠于和平的思想。”

双方摆了各种论据，以论证各自的立场。谈话双方不仅仔细倾听对方的谈话内容和论据，就连对方遣词造句的语气也很注意，竭力弄清楚对方是否很坚决地坚持它所宣布的立场，其中是否有什么薄弱之处。

我们的会晤是在一座老式别墅里进行的。从前它大概是某位西班牙高等贵族为自己建造的，现在美国驻马德里大使

的官邸就设在这里。

摆了一通空洞的理论之后，舒尔茨又重新谈到南朝鲜飞机事件。

总之，很清楚，舒尔茨在会谈过程中尽量避免苏联在限制军备竞赛问题上提出的倡议，而只想就飞机事件挑起辩论。

我阐述了苏联的观点：

“我们指责美国方面进行大规模的反苏活动，而且是经事先策划的活动。美国的声明不能驳倒我们这一观点。试问，这里所说的那架飞机怎么会偏离公认的原定的空中走廊达500公里呢？并且不是偏向国际水域一侧，而是偏向苏联国界一侧，侵入苏联领空纵深，飞行两个多小时呢？”

我还提醒舒尔茨注意，美国声明避而不谈这样一个事实，即飞机是在苏联远东最重要的军事战略地区上空飞行的。

“为什么这架飞机，”我问，“在苏联领空不听从警告信号和要它降落的要求呢？这些信号和要求是完全符合国际法和我国法律的。这架飞机拒不遵守国际法准则和苏联法律。而所有与此有关的人都清楚地知道这些准则和法律，就象我们知道美国的有关法律一样。”

向对方提出的所有问题都没有得到回答。

“这就是为什么，”我最后说道，“我们指责美国政府组织反对苏联的罪恶活动。飞机事件并不是反对苏联的个别敌对行动。同时，我们还坚决反对现在已成了美国政府惯用语的那些字眼，即坚决反对对苏联、对我国社会制度的谩骂。”

至此，我同舒尔茨的会谈实际上结束了。

这大概是我多年来同14位美国国务卿谈话中最激烈的一

次。这些美国国务卿的姓名是：科德尔·赫尔，爱德华·赖利·斯退丁纽斯，詹姆斯·弗朗西斯·贝尔纳斯，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迪安·古德赫姆·艾奇逊，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克里斯琴·阿奇波德·赫脱，迪安·腊斯克，威廉·皮尔斯·罗杰斯，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赛勒斯·罗伯茨·万斯，埃德蒙·西克斯塔斯·马斯基，亚历山大·梅格斯·黑格，乔治·普雷特·舒尔茨。

他们要把事情引向何方？

在马德里会晤的前后，我和舒尔茨还有过几次会晤和会谈，当然，谈的是另外的内容，用的是另外一种调子。

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当他第一次到苏联驻纽约代表处同我会晤时，我们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谈话。双方都对这次谈话进行了认真的准备。

但是，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作为苏联领导的代表，我准备的是尽可能使会谈具有建设性。当然，只有对方不回避讨论苏美之间在双边关系和国际形势的关键问题上出现分歧的实质，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而舒尔茨准备的仅仅是指出我们两国之间的分歧，不去寻找克服分歧的途径。这一点马上就看得很清楚了。

会谈开始时，我提了一个问题：

“美国政府想把苏美关系引向何方？它准备同我们一起就现有的分歧寻求政治解决办法呢？还是将继续加剧紧张局势，把军备竞赛的车轮转得飞快呢？”

“苏联，”我随后强调指出，“坚持和平的方针，坚持

和平发展我们同美国的关系的方针。遗憾的是，华盛顿没有表现出同样的态度。”

我方列举了与美国政策有关的事例，首先是裁军谈判方面的，尤其指出了亟待解决的核武器问题的意义。

舒尔茨一面认真地听取我的发言，一面做些摘记。起初我曾想，对方至少会对我发言的某些部分表示理解，并且这不仅仅是由于他曾同外国人做私人生意时打交道的经验使他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必须最认真地对待对方的谈话，甚至要做出理解对方的样子。但后来，在会谈过程中我清楚了，舒尔茨在会谈中的表面姿态与其立场的实质之间有相当大的距离。

舒尔茨是这样回答我的问题的：

“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所作所为，以及它为保障自己的安全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美利坚合众国的威胁。”

他一口咬定说是威胁，没有任何证据。

在这以后的会谈中，舒尔茨也未能拿出什么证据。但是什么都不说又不行，于是，舒尔茨后来谈了两点思想。第一点是关于地区性的国际问题，第二点则是关于核武器问题。

在地区性问题方面，国务卿只是无中生有地说我们怂恿某些国家敌视美国。

至于核武器问题，舒尔茨重复了总统说过的话：

“苏联的核潜力既威胁美国，又威胁西欧。”

然而，他还是只字不提华盛顿有什么根据得出这样的结论。

美国的代表们就是经常这样行事的。其实，他们阐述自己观点的这种特点，就是连远非同情苏联的许多外国观察家

也早就看出来。

在会谈过程中，舒尔茨有时似乎要翻开自己的文件夹寻找什么参考材料。文件夹就放在他膝盖上，如果会谈是围桌进行的，文件夹就放在桌子上。于是我想，他现在要引证事实和数据了。可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一切还都是按老样子办。

当我方拿出事实和数据材料来阐明有关声明的时候，对方感到很不自在。例如，我们利用数据着重指出，华盛顿及其北约盟国很不喜欢的苏联中程导弹并没有使苏联对北大西洋集团取得任何优势。苏联的中程导弹仅仅是保障了双方在这种武器上的核军备的均势。

但是，我的对手对这些数据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他甚至对这些数据不加反驳。不知他是手头没有数据，还是有数据而不愿意列举，因为这些数据同华盛顿的说法是不一致的。

这次会谈后，我们对华盛顿的立场得出了一定的看法。这一立场的实质是幻想通过对苏联施加压力，使美国取得并加强单方面的优势。

与舒尔茨会见

后来我同舒尔茨的会谈，其中包括1984年1月18日在斯德哥尔摩的会谈，很少有什么新内容。

在斯德哥尔摩，苏联的立场同美国的立场再次出现了十分明显的分歧。苏联是抱着促使会议取得成功的强烈愿望前去参加斯德哥尔摩会议的。苏联提出了两个重要建议。

第一个建议是：参加斯德哥尔摩会议的所有核大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换句话说，就是苏联建议其他国家仿效苏联

的榜样。

第二个建议是：签订一项在国家关系中完全禁止使用武力的条约。

苏联同时还宣布，它准备在军事领域加强信任方面制定若干性质更为重要、范围更为广泛的补充措施。这些措施也会在与会国的国家关系中创造更多的信任气氛。

十分清楚，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带到斯德哥尔摩去的，也就是他在纽约和马德里参加会谈时的那些东西。

在美国的新闻界，甚至在国际政治界，有时候人们试图给身为国务卿的舒尔茨下一个评语，并把他同他的前任们相比较。一些人说他比黑格略胜一筹，在处理对外政策问题时，他有比较求实的作风。有时候还有这样的说法，舒尔茨差不多是近几年来美国最灵活的一位国务卿。

当然，在谈到大国和大国之间在战争与和平这种根本问题上的分歧的时候，很难说有灵活性，还是没有灵活性。任何这样的比较都可能是相对的、假定的、近似的和不准确的。

毫无疑问，舒尔茨是主要资本主义大国的代表，是属于另一种社会制度的思想的代言人。可以说，这是一位纳入社会程序的人物。作为政治家，作为美国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言人，他忠实地为以谋取世界统治地位为目标的美国服务。

他是否明白，作为另一种社会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是客观历史发展的结果呢？他是否明白，排挤社会主义，甚至完全消灭社会主义的任何政策都是毫无前途的呢？对于这些问题我不准备回答。

我愿相信，这位非凡的美国活动家，甚至可与之颇有意思地讨论国际政治问题的活动家心里明白，玩弄消灭社会主

义的辞藻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他真是这样想的，那仅此一点就足以使他比其他一些活动家高出一头。那些人的话匣子里尽是些华而不实的辞藻，表面上也许很尖刻，但其实很不严肃。如果他是这样想的，那就容易转而得出这样一个重要的结论：国际关系必须建立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基础上。

我不想把舒尔茨同其前任们相比。我认为这种比较不完全恰当。

舒尔茨作为政治活动家，是我的一位对手。他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应该对他大有裨益。看来，他也确实受益匪浅。非我能断定：舒尔茨在美国政府中属于哪一类政治活动家：是发号施令的，还是随从别人的。这很可能判断错。在对这位或那位活动家，特别是对从事外交事务有关的活动家做一些惹人注目的评价时，我一向都是小心谨慎的。通常，只有那些追求耸人听闻之辈才喜欢对人做这种评价。

而现实情况是，苏联今后仍将要同有关国家负责对外政策的活动家进行交往。这种交往不应该由于对他们中间这一位或那一位活动家怀有个人好恶而受到干扰。

使凯南倒霉的考验

美利坚合众国政策的性质，由于华盛顿的过错而在苏美关系中出现的紧张，早就使美国许多有现实主义思想的政治活动家、著名学者、美国舆论界人士和某些实业界人士越来越不安。有一些著名的活动家指出了军备竞赛的危险后果，呼吁华盛顿从同苏联对抗转向缓和紧张局势。在这些活动家

中，可以举出赛勒斯·万斯，爱德华·肯尼迪，波尔·约恩克，以及其他许多人。在这方面，昔日著名的外交家，而今显赫的史学家乔治·凯南是引人注目的。

在美国的学术界与社会各界人士中，凯南享有很高威望。在差不多已经30年的时间里，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美国新闻界，出现在美国的报刊和书籍中。

他是在外交界得以出名的，他于1925年进入了这个领域。凯南是“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炮制者之一，是主张对苏联实行“实力地位”政策的理论家当中的一个。

我是在莫斯科同凯南相识的，他当时是美国大使馆的公使衔参赞。我和凯南的第一次谈话就是在美国大使馆进行的，他当时以临时代办的身份代表着美国。

我们谈话的题目是美国政策的总方针、欧洲形势和远东形势。他一个劲儿地强调说：

“美国在处理战后安排问题时，不论是在欧洲，还是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所奉行的都是爱好和平的对外政策。”

他还说了不少要发展苏美关系的话。

当和凯南谈话的时候，我注意到他是一个能够对当时的国际事件作出颇有见地评价的人。我不由地想到，此人当时的职位只不过是外交官生涯中的一级阶梯而已。

如果凯南在当大使之前先在使馆取得更多的工作经验的话，他也许真能在事业上干得更顺手些。但是，华盛顿的决定却不是这样，而是于1952年3月任命他为美国驻苏联大使。

时间表明，这项任命对凯南来说是一次考验，但他力不胜任。他之不能胜任全然不是因为他缺乏素养，而是因他还不甚了解，对于任何国家的大使来说，哪些事该做，哪些事

不该做，界线在哪里。尤其是当他对驻在国的事表态的时候，更是如此。殊不知这类界线常常是随着周围情况、两国关系的性质及国际形势的状况而变化的。

当时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1952年9月19日，凯南大使从莫斯科去伦敦途中在西柏林滕珀尔霍夫机场做短暂停留的时候，说了些对苏联不友好的话，世界新闻界马上如获至宝。

苏联政府注意到这一举动的全部经过，不仅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交涉，而且还宣布凯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将其从驻苏大使的岗位上召回。在莫斯科的这段不长的时间里，凯南对我国的了解并没有增加多少。但是，他却因为这一事件而在西方名声大噪，然而这对他并没有什么好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每当外交界提到凯南的时候，人们通常都是这么说：

“噢，就是他呀，那个被苏联宣布为不受欢迎的大使。”

直到今天，他尚未能完全甩掉这个“好名声”。

可是，生活中却会有这样的事，凯南竟能够鼓起勇气站得高于个人恩怨和屈辱，对此应该说他一句公道话，尽管他不是马上就做到了这一点。在苏美关系的一系列问题上，总的来说，凯南对苏联能够采取比里根政府及其几届前任较为客观的立场。

凯南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中和在各种公众场合的讲演中，多次批评美国政府破坏苏美关系，鼓动反苏狂热，搞军备竞赛和加剧国际紧张局势。他在发表的言论中，经常呼吁政府悬崖勒马，改弦易辙，在苏美关系方面走温和的道路，协商的道路。

当然，凯南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特别是在苏美关系问题

上的这种观点，并不表明他在意识形态方面与我们有什么接近。绝非如此。他是百分之一百的资产阶级的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但是，凯南却明白了这样一个平凡的真理，那就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分歧，两种社会经济形态之间由来已久的争论，应该在和平竞赛的范围内解决，苏美之间在这些问题上或那些问题上产生的争论，不但应该，而且能够在谈判桌上解决，而不是通过军事冲突的途径解决。现在美国反战力量的活跃，正是表明上述这些观点在今天已受到越来越广泛的美国公众和实业界的赞同。

麦戈文的成功与挫折

同美国政界、舆论界、实业界人士的多次会晤和谈话使我相信，在他们中间不乏按现实主义方式思考的人，他们意识到，对抗政策对很多国家的人民，包括对美国人民，都具有造成灾难性后果的危险。这里，我想简单地谈谈我同著名的美国活动家乔治·麦戈文的会晤。

这位原来身为卫斯理大学（南达科他州）历史教员麦戈文，自从30多年前投身于政治活动，并于1956年被选入众议院以来，他的政治生涯，成功与挫折，都同民主党，更确切些说，同民主党的自由派人士紧紧地连在一起。

麦戈文是按着本阶级所惯用的观念来思考问题的，他是用他得以成长为一名政治活动家的社会环境里通常采用的尺度来衡量美国生活的社会价值。其实，他在1962年能被选入参议院，这不仅是凭借约翰·肯尼迪的大力支持，而且还因为他的观点在当时基本上符合有影响的实业集团的利益。

可是，如仅仅这样讲，对麦戈文的评价未免也过于片面。在美国政治舞台上，麦戈文的形象真可谓独树一帜。他的活动与观点在美国人中间常常引起很不平静的反响，一些人狂热地支持他，另一些人则同样狂热地反对他。他的名字总是被相互矛盾的评价包围着，但绝对没有无动于衷的。

当竞选总统的罗伯特·肯尼迪于1968年6月初被杀害以后，他的支持者们就去找与肯尼迪家族过从甚密的、并且积极支持罗伯特·肯尼迪竞选总统的麦戈文，请他出来“领导他们的运动”。起初，麦戈文因将要再次竞选参议员而有些踌躇，后来当他得知肯尼迪家族中最小的爱德华拒绝做总统候选人时，他同意了。

1968年8月10日，就在民主党在芝加哥召开选前代表大会前夜，麦戈文正式宣布自己要做美国总统候选人。但是大部分前来开会的人已经选定休伯特·汉弗莱，推举他做民主党方面的总统候选人。麦戈文一筹莫展，只得声明支持汉弗莱。

挫折并没有使麦戈文垂头丧气。在下一届总统选举时，他又一次试图要当总统。1972年，正当美国在越南的“肮脏战争”引起的反战运动方兴未艾，麦戈文激烈地抨击了尼克松的对外政策方针。民主党人，特别是年轻人支持他。于是他赢得了作为民主党方面参加竞选美国总统正式候选人的提名。但是，在一般的美国人当中，大部分是支持尼克松的，在选举时投了尼克松的票。麦戈文再次败北。

麦戈文不论是对美国内政问题的观点，还是对美国国际问题上的观点，比起美国国内在新闻媒介的有力影响下所形成的那些观点要进步得多，可偏偏是支持共和党及其竞选纲领的集团拥有无比强大的组织手段和财政手段，真可谓强中

更有强中手。

在1984年总统竞选运动中，麦戈文再次参加大选前的争夺，但是看来他自感希望不大，在民主党基层选举的初期阶段他就自动退下跑道。尽管如此，他的经验与威望却对民主党大有补益。他在制定民主党筹备竞选运动的战略和策略方面，在加强党的队伍以反对“里根主义”的斗争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对外政策方面，麦戈文始终如一地主张改善苏美关系，主张苏美就限制和削减军备的全部问题积极地进行谈判。

我和麦戈文有过两次谈话，并且两次都是在苏联，先后于1977年和1984年。

我们是在外交部会见的。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个笑容可掬的（又有哪个参加竞选的美国人不上脸上带笑呢）、象运动员一样身材挺拔的人。他是一位很风趣的交谈者。

那次谈话的内容我还记得。这位对手很顽强地、又很讲外交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善于选用论据，并言简意赅地表达思想。他具有难能可贵的注意听取并尽量理解对方观点的才能，哪怕是谈到因双方立场对立而难以谈拢的问题时也是这样。

麦戈文很憎恶要人为地设置障碍、阻挠苏美两国在维护和平以及消除战争威胁的问题上进行合作的思想。这可以看出他在政治方面是现实主义的。

无疑麦戈文是属于这样的一种美国人，他们经过反复掂量“赞成”和“反对”苏美关系的各种模式后，觉得愿意根据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同苏联打交道。他当时说：

“我的出发点是，尽管苏美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差异甚大，但两国应该通过和平途径在谈判桌上解决一切争端。”

我和他第二次见面是在离雅尔塔不远的米斯霍尔。当时正是7月。虽然谈话是在上午进行的，太阳还是晒得火辣辣的。麦戈文很乐意地接受了我的建议，脱掉了外衣。

谈话持续了将近3个小时，谈得兴致勃勃。麦戈文所谈的观点不同于里根政府在国际事务中所遵循的那些观点。我俩在发展苏美关系问题上和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的立场相当接近或近似。

我发现麦戈文不仅能精确而详尽地弄清所讨论问题的实质，而且是个头脑灵活的人，善于冷静地从各个方面来分析这样或那样的现象，然后才发表明确的议论。

他坚定地说：

“限制军备与改善同苏联的政治关系，是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美国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开始举行苏美谈判，以实现首先限制核军备并取得两国之间的全面相互谅解。”

我确信，这位活动家对造成当今世界局势的原因及危险性的理解，要比美国许多政治活动家高明得多。

“哈默”的含义是“锤子”

在美国实业界有影响力的集团中，有不少人主张发展苏美业务合作关系。不论是美国国内由于敌视缓和的人掌握了决定对外政策方针的主动权而出现不利局面，还是国际上紧张局势的加剧，都未能打消这些人要同我国进行经济合作的强烈愿望。

华盛顿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

动经济“冷战”，但是都失败了。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方针也并没有给美国带来什么特别的好处，只不过使它经济失调的状况更加糟糕，很多经济部门开工不足，失业情况更加严重。粮食禁运触动了农场主们的利益，美国当权者们不得不将其取消。禁止向苏联出售石油和天然气工业设备同样没有带来比这更好一些的结果。

可是，里根政府仍然无意放弃在经济贸易关系方面对苏联奉行歧视路线的企图，这一直使美国广大实业界深感不安，因为他们的利益是要求同苏联进行合作，并建立起有助于保持这种合作关系的政治气候。

阿曼德·哈默是美国实业界巨头当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是“西方石油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关于哈默，完全可以这样说，他是一个身装发动机的人，他总是在不停的运动之中，不停地在拟订某些计划。他在谈话中涉及的交易数额往往是数百万、数千万，甚至高达数亿美元。

说来也巧，如按字面译成俄语，“哈默”的含义就是“锤子”，再联想到哈默其人的那股钻劲，这个词的含义对他还真有些象征性。我还想补充说一下的是，哈默在政治上是个现实主义者，这正是他的一个强点。虽然他身上有相当大成分的理想主义，但他终归是个现实主义者。

“商人不应该透过玫瑰色的眼镜来观察周围发生的事情，”哈默说，“但是，也不应该透过黑色眼镜来进行观察。”

哈默出生在俄国。还在十月革命以前，他的父母就带着他迁居美国。因此，哈默和他的家庭不属于政治移民之列。

他早就在美国实业界牢固地扎下了根，干起事来信心十足。并且，他的行动中很有一股革命前俄国伏尔加富豪们的

热情奔放和大商巨贾的豪爽。对他们来说，小额交易简直不值一提，倘若数目巨大，那才值得真正大干一下。对哈默来说，不管是搞矿肥，还是做艺术品生意，干什么似乎都一样，只要能给他带来实惠，有气魄并对神经有刺激性就行。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在他生存的世界里，如不具备这样的气质，就肯定会被别人挤掉。

哈默在同我会见时直率地说：

“对我来说，做生意其实是一种体育活动。区别只在于：由于命运安排的某种机遇，做生意可以使我增加资本。”

哈默的话是可信的。他有时赚得少一点儿，有时多一点儿，但不管怎么说总还是有利可图。

“有一点是清楚的，我倒霉的时候少，走运的时候多。”他肯定地说。

这是因为他有经验，生来就机灵，甚至是有某种天资，另外运气也好。哈默的确是福星高照，交了好运。

众所周知，是弗·伊·列宁请来了哈默。在苏维埃俄国困难的年代里，这位美国人取得了租让合同。

苏维埃政权在俄国刚刚胜利，又要实施扫盲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经营租让企业是完全必要的。千百万儿童拿起了“哈默”商标的铅笔，有生以来第一次在纸上写出了字母。我在学校里读书时也是这样过来的。对哈默来说，这一切都是做生意，能给他带来一笔可观的收入。

哈默在我国做够了“铅笔”生意，我国工业在短时期内也克服了“铅笔荒”。但哈默同苏联继续做生意的兴趣并没有减少。

在罗斯福时代，他没有直接在政府里担任重要角色，但

他的信念同总统奉行的政治路线是相符合的。

不论是从前，还是现在，80年代中期，哈默对苏联都很友好。即使在苏美关系紧张时期，他也始终如一地主张发展苏美之间的贸易联系。

在莫斯科会谈时，哈默向苏联赠送了他收藏的马克思和列宁的书信原件。我们为这一极其珍贵的礼品向哈默表示了感谢，因为一切有助于进一步搞清楚人类的这两位天才人物的活动的资料对苏联人来说都是宝贵的。

近几年来，他在苏联进行的会谈中最有意思的要算是和米·谢·戈尔巴乔夫的谈话。那次谈话是内容丰富和颇有受益处的。

我从未听哈默说过，谁将成为他的事业和资本的继承人。在同苏联官方人士的接触中，他从不谈及这个问题。

拥有资本的哈默在美国大实业界里是否被认为是自己人呢？对这个问题可以这样来回答：如果从他拥有的资产情况来看，那他无疑可以被认为是自己人。就连美国的几任总统有时也接见他，听取他对发展苏美两大国之间贸易往来的见解。

但是，不只是我，而且其他苏联代表都不止一次地发现，美国大垄断集团对哈默存有一定的戒心。美国的这些集团不太喜欢哈默对苏联的友善态度。哈默完全明白这一点，但他宁可我行我素。

毫无疑问，哈默是属于那种美国人，他们想揭穿歪曲苏联及其政策的一些胡言乱语。苏联人有充分理由为美国实业界的这位代表人物说句赞扬的话。他们也确是这样赞扬他的。

与总统的谈话

苏美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影响了整个国际局势，但这并非我们的选择。苏联不愿苏美关系处于这种状态，也没有为这种状态的产生推波助澜。

苏美高级政治接触中断4年之后，1984年9月28日，我同里根在白宫举行了自里根政府执政以来的首次会晤。在此之前，这位美国总统装出一种姿态，即无论是苏美关系，还是同苏联领导人的联系，对他来说似乎都无关紧要。

这种观念是虚假的。果然不出所料，当里根面临要通过1984年总统竞选时，美国政府自己就把这种虚假的观念撇在一边。随着竞选的临近，总统及其同僚们猛然醒悟过来，认识到，苏美两大国之间还没有总统直接参与的政治接触，将会对竞选的结果产生不利的影响。

苏联领导人无须改变方针。在同美国接触问题上，它一向坚持原则立场，深知进行接触的意义。而对白宫和整个美国政府来说，则是一种策略转变。

1984年9月下半月，我率领苏联代表团飞往纽约出席联大会议。在此之前不久，美国方面发出了与里根总统会晤的邀请。

这样，我们就来到了白宫椭圆形大厅。陪同我前去的有苏联第一副外长格·马·科尔尼延科和苏联驻美大使阿·弗·多勃雷宁。总统出现了……

我们进行了两个小时的政治会谈。接着，我们在进行便宴时又继续了会谈。美方出席便宴的除总统本人外，还有副

总统乔治·布什，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总统顾问詹姆斯·贝克，埃德温·米兹，罗伯特·麦克法兰，麦科尔·德弗，以及白宫和国务院其他负责官员。

谈话的许多内容涉及对双方政策的评价。由于双方立场上存在着原则分歧，当然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两种方针的冲突：一种是和平、缓和及裁军的方针，另一种是保持紧张局势，继续军备竞赛的方针。

总统的主张可以这样来表达：

“苏联的几乎全部打算就是要消灭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因此，美国应当武装起来，以免有朝一日面临要么投降，要么灭亡的抉择。”

不言而喻，我以最坚决的方式驳斥了这类说法：

“这些说法与事实、与现实生活毫无共同之处。”

“我们的政治哲学的实质在于，”我对里根说，“一种社会形态由于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不可避免地要被另一种社会形态所取代。在当前具体情况下，我们的出发点是，资本主义形态将被社会主义形态所取代。我们相信这一点，正如人们相信明天早晨太阳一定要升起一样。但这只能随着客观的历史发展而产生，而不是由于某某人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政治目标。我们反对唯意志论。因此，谁也无权把所谓要用暴力破坏美国或者任何其他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的计划强加在我们身上。我们没有想过这样的计划，从来都没有。”

总统在讲话中谈到了这样的思想：

“苏联军事力量的加强对西方，对美国是一大危险。”

但是，客观事实有力地驳斥了这种论调。

“是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炮声刚刚沉寂下来的时候，就开始在全世界建立军事基地？”我问道，并紧接着回答说：

“是美国。我们试图撤消在外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并走上裁军的道路，但未能做到，因为美国在这条道路上设置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大墙，抵制了削减军备的任何建议。”

我还不得不强调指出：

“进一步积聚军备已成为美国及其西方盟国政策中的决定性路线。在西方大国实行军备竞赛的道路上倒应该树立一些路标，写上这样的字句：‘来吧，多来点儿武器！’这样才能准确地反映出美国和北约要生产更多核武器的路线。”

接下来就需要阐明我们在所有基本问题上的立场，于是我继续说道：

“看来，这一切背后有一项长远的加紧军备竞赛的计划，其如意算盘可能是要苏联把自己的物质资源消耗殆尽，最后迫使它屈膝投降。而美国即可登上全世界的指挥台。”

“总统先生，”我声明说，“这是永远也不会实现的。当然，继续军备竞赛将迫使我们用掉大量的物质资源和智力资源。但我们能够经受得住。我们经受住了一场残酷的、前所未有的战争。那时，我国人民不仅表现出了钢铁般的意志，而且显示了支配国家资源的才能。尽管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我们胜利了。因此，想通过取得军事优势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苏联的计划是不现实的。这样的计划应该抛弃。”

最后，我把自己所说的话归纳如下：

“现在，两国都拥有大量的武器储备。形象地说，我们和你们正坐在一座用核武器堆成的山上，不光是坐着，而且

还在不断地往自己身下增添愈来愈多的武器。这座核武器堆积起来的山还在不断增高。请问，这样下去可怎么办？这座山还要长多高才算到顶？”

里根听完这些话以后，继续为他的政府在军备领域的方针进行辩解。总统甚至走出了事先准备好的“一步棋”：当谈到军事力量对比的时候，他把身子探向放在他圈椅旁边的小柜子，拉开抽屉，取出画在单页纸上的一些图表，用来证明似乎苏联武器的增长速度要比美国快。但是，里根在谈话时几乎没怎么利用这些图表。不过，在会晤快结束时，美国人把这些图表交给了我们“供参考”。

总的来说，交换意见和阐述各自对外政策的立场表面上进行得彬彬有礼，但双方都各持己见。由于美国方面对发展苏美关系，对停止军备竞赛和裁军态度消极，双方的立场没有接近。

当你听到关于愿意进行对话、愿意谈判的漂亮言词的时候，可能会这样想：“说不定突然间……苏美关系会热乎起来。”但问题就在于，言词总归是言词，除了言词，并没有感到美国愿意在解决基本问题上改变自己的立场。

我想详细谈谈与里根和与舒尔茨讨论的一个中心问题——承认平等和同等安全原则的问题。里根与舒尔茨都说，这一原则美国可以接受。

我们对此的反应是：

“如果美国政府承认这一原则，那就应该遵守这一原则，并以此为基础来制定实际政策。”

美方的声明包含着许多要进行接触、会晤、对话之类的华丽辞藻。但这些声明空洞无物，甚至连朝积极方向修正政

治方针的一点儿暗示都没有。

不过，从总的情况看，美国总统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明白了：试图向苏联施加压力是拙劣的手段。

于是，我对白宫主人和他的部长们说：

“这类拙劣的手段不会给美国的对外政策增添光彩，只会适得其反。”

后来，在与国务卿舒尔茨谈话时，我不得不提醒他注意：

“美国的立场是矛盾的：一方面，声称忠于当年由反希特勒联盟几个大国签订的盟国协议；另一方面，又对当前局势作出与此不一致的评价。”

舒尔茨竭力想给人以美国立场没变的印象。他肯定地说：

“美国忠于盟国义务，其中包括对欧洲边界问题的义务。”

对此我说道：

“美国声明忠于自己承担的义务，包括对欧洲边界问题的义务，我们对此感到满意。但是，与这种精神相符的实际政策何在？苏联信守盟国协议，今后也将继续遵守这些协议。我们期待着美国能以实际行动证实自己的言词。”

“您的丈夫赞成和平
还是赞成战争？”

里根同他周围的人一样，在会见时表现得很客气。没有听到冷落的语调，尽管实际上可察觉到一种内在的不自然和感情上的二重性，总统的表现更是这样。因为他在过去差不多4年的时间里讲了很多对苏联不友好的话，现在，却又同

苏联代表就重大而尖锐的问题进行一次交谈。

总统握手坚定有力。

在让人拍照的几分钟内，里根似乎好奇地打量着同他谈话的对手。在这段时间内，他不停地微微挪动着坐在圈椅内的身体，这可能是他一向好动的习惯的表现。

白宫里有那么多英国座地古钟，看上去令人惊奇。这大概是总统的爱好。我们被请到会客室隔壁的大厅内共进便餐，一个弦乐六重奏小组正在那里演奏一首古典乐曲。

在便宴开始前几分钟，总统和我步入大厅，其他被邀请的客人已聚集在那里。总统夫人南希·里根也在场。她是前来迎接客人的，但没有入席。进餐时，夫人们没有在场。

总统把我介绍给他的夫人。她给人的印象是一位精力充沛和充满自信的女性。我们进行了简短的交谈。南希很快就把谈话的内容告诉了那些无所不在的美国记者。报上是这样发表的：

“葛罗米柯是和我丈夫一起来的。我们认识以后，他提议为我干杯。他杯里是酸果蔓汁，而我的杯里是苏打水。当然，我们都非常乐意地喝下去了！然后，他转过身来问我：

“‘您丈夫赞成和平还是赞成战争？’

“我回答说：

“‘赞成和平。’

“这有点使他感到惊奇，他说：

“‘您能肯定吗？’

“我回答说：

“‘是的。’

“‘那为什么他不接受我们的建议？’葛罗米柯问道。

“‘什么建议？’我反问道。

“这时人们向我们走来，我们的谈话被打断了。后来在便宴就要开始之前，他转向我说：

“‘每天夜晚您在总统耳边要提醒他想着点儿和平。’

“我回答说：

“‘噢，那当然。但我也要对您悄悄地说这个。’

“葛罗米柯报之以微微一笑。”

还不错，南希·里根说的这些话同我们谈话的内容很接近。

里根在那一次把第一助手的角色分配给了舒尔茨。舒尔茨在椭圆形办公室内，特别在便宴时多次插话。温伯格没有出席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座谈。便宴时，他被安排在靠近餐桌边头的位置。他坐在那里仍想参与同客人们的交谈，但只要里根一开口，他立刻就默不作声了。布什则举止稳重，他尽力“不表露”自己的见解。

无论是在那次便宴上，还是同任何美国人士谈话时，我都反复地说：

“我们始终不渝地坚持这样的观点，即苏美之间保持正常的关系是符合两国利益的。我们主张改善苏美关系。”

苏联在处理对美关系的时候，考虑了和美国合作的现实可能性，同时也理解苏美关系对各自一方具有的全部重要意义及其在当代生活中的地位。同美国保持和平共处、发展互利关系的方针，是我们政策的原則路线。

在苏美关系的全部历史过程中，我们同华盛顿各届政府都打过交道。每当美国领导人在对苏关系上表现出现实主义和认真负责的态度时，事情就正常好办，对整个世界局势也

产生有利影响；而缺乏现实态度的时候，无论是苏美关系，还是国际局势，都随之恶化。

为了真正改善苏美关系，使其具有稳定性质，必需有政治意志。苏联方面是有这样的意志的。如果美国方面也表现出政治意志，那么，使我们两国现在疏远的许多具体问题就会逐步得到解决。

“我们建议美国政府这样办事，”米·谢·戈尔巴乔夫声明说，“让所有的人，让我们两国人民和其他国家都清楚地看到，苏美两国的政策方针不是朝着敌视与对抗的方向，而是朝着和平方向发展。”

我国不搞反对任何人的侵略计划。我们的思想和意图体现在一些具体建议之中，其目的在于努力使国际事务取得决定性好转。

我认为，随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苏美消除中短程导弹条约的签署，这一转变正在开始。1987年12月8日这一天将在史册上大放异彩。我相信，不论是当代人，还是子孙后代，都将永远把这一天作为人类最难忘的一天来纪念。

林肯的国家中的黑暗与光明

美国人意识中的毒素 有人无处栖身，房子却空荡
无人 庸俗的标准 资产阶级报刊海洋中的船长
州长是怎样忽视马克思理论的 同凯恩斯的谈话
用什么来取代严肃的艺术 资本是无情的铁筛子
平等与司法的真正价值 “您知道德莱塞吗？”
一个美国外交官的痛苦自白 加里·库珀和玛丽
莲·梦露 美国真正的爱国者 普通的美国人是什么
样子的？

多年里，我有机会对所谓的美国民主进行了近距离的观察，而且是饶有兴趣的观察。当然，这不是一种偶然产生的兴趣，而是因为华盛顿及其代表人物经常为了自己对外政策的目的，利用虚伪的“民主的美国”形象进行投机，对此需要给以揭露。

美国方式的民主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美国人意识中的毒素

当然，我交往的基本上都是美国社会金字塔上层的人物，有政治家、实业家、重要的文化界人士；很少有机会与工人、

农场主和处于这个金字塔中层及靠近底层的普通职员、工程师、小商人、大学生进行交谈

一个刚到美国的人在和别人交谈的时候，很快就会注意到，不管碰到谁，除共产党人或者倾向共产党人观点的人以外，人们通常都喜欢谈论美国民主。但是，谈话人中几乎没有一个人对什么是真正的民主，什么是真正的民权，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更谈不上深刻的认识了。他们所有的人在谈话中使用的概念，都是从上小学起就向他们的头脑里灌输的那套东西。如再往前追溯，他们的父辈、祖辈、曾祖辈脑子里灌输的也是这些东西。

乔治·华盛顿时代的人还在美国奴隶制盛行的时候就已大讲起自由来，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在艾布拉姆·林肯时代，美国人也谈论着民权，说美国在当时是民主的楷模，尽管那里刚刚在形式上废除了奴隶制，黑人奴隶们被铁镣磨破的伤口还未愈合。

在西奥多·罗斯福^①时代，资产阶级报刊竭力颂扬美国民主。这位白宫主宰企图用火与剑把美国民主强加给其他国家和人民，特别是拉美地区的国家和人民。正是在这种民主条件下，美国本国的劳动人民受到垄断集团越来越沉重的压榨。

在赫伯特·胡佛^②总统时期，美国制度的维护者们也是声嘶力竭地把充满追求暴利精神的虚幻价值吹得天花乱坠。

① 美国第二十六届总统。执政期间，提出并推行“大棒政策”，曾对拉丁美洲国家进行干涉。——译者

② 赫伯特·胡佛（1874—1964），1929年至1933年任美国第三十一届总统。执政时期，曾于1932年命令武装军警镇压向白宫请愿的失业工人和失业退伍军人，造成美国历史上有名的“星期四血腥大屠杀”。——译者

甚至在从事法西斯活动的反动分子麦卡锡¹⁾即将掌握美国国家政权的时候，当一个美国人因仗义执言保护平民权利而遭受精神迫害的时候，对美国民主大喊大叫的宣传连一分钟也没有停息。

那么，今天的情况如何呢？颂扬这种民主的大合唱似乎比以前更加响亮。

苏联人在美国常能看到在我国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有的场面：人们为了找到工作，或者领取失业救济金，或者仅仅为领到一盘菜汤而排长队。在美国，这类长队一年四季总是数不清的。假如你问一个美国人，他干吗要来排队？他会回答说：

“我没有工作，家里没法过活，不管怎么努力找工作，但每次都是白费劲。”

可是，如果你问他这该怪谁呢？你也可能会听到这样的回答：

“有什么办法呢！要知道我们是民主国家：有的人找到了工作了，有的人找不到工作，还有的人失去了工作。”

显然，这个人的脑子里早在童年时期就被灌输了这样的思想：失业尽管有多种有害的后果，仍不失为民主的一种表现，尽管他的生活和生存环境都与这样的民主相抵触，但他还是这样说，特别是当他意识到是在回答外国人的问题时更是如此。的确，这些人的思想意识受到的毒害已根深蒂固了。

1) 约瑟夫·麦卡锡（1909—1957），1946年至1957年任美国参议员。1951—1954年他操纵参议院调查小组委员会，利用该会和其他机构，对许多机构和个人进行“忠诚调查”，实施非法审讯，煽动反共歇斯底里，摧残文化艺术，打击民主和进步力量，在美国国内制造恐怖气氛——译者

在美国南部那些曾是奴隶制的各州里，罪恶的种族主义组织三K党至今仍然横行无忌。它杀害了成百上千个黑人的生命——有小伙子们和姑娘们，有孩子和老人，有失业者和工人，有知识分子和农民。为什么这些人会死于罪犯之手呢？就因为他们皮肤的颜色不是白的。

和从前一样，当局对三K党仍然采取姑息态度。所有想取缔这类犯罪组织的认真尝试都归于失败，因为当局纵容这些犯罪组织。当局是需要这类组织的，只是通常不这样公开讲罢了。这就是美国大约一半领土上所谓“民主”的鲜明表现。

再拿美国北部来说，其中包括象纽约、芝加哥、波士顿、费城、底特律、辛辛那提、旧金山这些重要的经济和工业中心，以及首都华盛顿，这些州的所有居民表面上享有同等权利，但仅仅是表面而已。实际上，这里不仅是黑人，而且所有少数民族都受到极其粗暴的歧视。

很多娱乐场所和其他地方，比如电影院、剧院、餐厅等处实际上是禁止黑人入内的，干脆就不放他们进去。我就亲眼见过一些非白肤色的人在入口处被一双摊开的手臂挡住去路。拦阻他们的人脸上毫无表情，也不吭声。与这些人顶撞是没有用的。想闯过去？那马上就会突然出现一个彪壮的警察来帮助看门人。

在纽约甚至还专门有一个黑人居住区——哈莱姆。如果你在市内其他区碰上黑人，那基本上是被雇用的仆人。当然，黑人和美国其他居民一样，也受到宣传的熏陶，只是宣传对这些人的影响肯定要小一些。因此，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选民在美国总统选举时拒绝参加投票，以示对种族主义制度的

抗议。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

但是，就是在这些阶层的居民中，也常常听到一些黑人、波多黎各人、墨西哥人的老生常谈：

“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

就连一些著名的黑人牧师，也是一方面尖锐地揭露美国的种族歧视，同时又认为种族歧视与“美国是民主国家”的说法并不矛盾。

有人无处栖身，房子却空荡无人

如果说到美国工会的活动，那十分清楚，它仅仅是忙着工人和职员物质利益。至于要解决由美国社会制度的本质和美国内外政策所引起的那些问题，工会实际上是被排斥在外的，如果不算它参加总统选举的话。

就是参加选举，也只能选统治阶级的代表。一般来说，在美国，不要说总统，就连国会议员，也没有工人、劳动人民的真正代表当选。

工会领导经常教育会员要尊重那被广为宣扬的美国家民主。如果你问一下工会会员，他是否认为美国真是一个民主国家，除极个别的人以外，都会回答说：

“是的，当然是。”

甚至每年有八九百万美国人因被剥夺劳动权利而生活没有着落的惊人事实，也不影响他这样断言。就连那些使工人和全体劳动人民丧失许多社会成果的法律也未动摇他的这种信念。而这些剥夺去的财富被用于本来就十分庞大的军事预算。要知道，美国的民主，就是军工集团的民主，就是搞军

备竞赛的五角大楼的民主。简言之，就是大实业界的民主。

那么，美国社会上层代表人物、实业界人士、文化界代表、高级职员是什么观点呢？当然，他们绝大多数是拥护美国民主的。可我曾见到的这些人当中，有一些人一方面坚定地说最完善的民主形式是美国的民主，同时又拿不出任何能证实自己观点的论据。

记得很早以前，我与美国国务卿爱德华·斯退丁纽斯曾有过一次谈话，为的是当时美国报纸上又一次出现了各种诽谤苏联对外政策和苏联驻美使馆活动的报道。当我提请国务卿注意此事时，他自己也很恼火，他说：

“这些报道全是欺人之谈。”

“那为什么不能要求发表这些报道的人循规蹈矩些呢？”我问，“要知道，在许多国家对搞欺诈诽谤的人是要追究责任的。”

斯退丁纽斯回答说：

“您说的对，葛罗米柯先生。但是毫无办法，因为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

我看了看他，相信他说的是真心话，他认为自己说的话是对的。生活环境和所受的道德和文化教育毒化了他的头脑和灵魂。斯退丁纽斯可算是一个正派人，一个可以与之打交道的活动家。然而，他毕竟在童年和青年时代就已被塑造成型，至今没有改变。

有一次，我和其他几位苏联同志乘车路过纽约的一个贫民住宅区。在这些街区内有許多房子被荒废了，无人居住。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几百栋房子对居民是关闭的，又不出租，所以呈现出萧索破败的景象。夜晚，常常不仅仅

在夜晚，一些没有住房的人就在此栖身。然而，这些房子是不允许无房人长期居住的。在这些房子里小住也需要付钱，而那些无家可归者或失业者哪里来钱呢？

我们询问市政府官员：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他对我们的问题很惊讶，甚至比我们对市里很多人无家可归，同时又有不少房子却空着这个事实更为感到惊讶。这位官员回答得很干脆：

“在我们美国实行的是民主制度，谁想出租自己的房子，就出租；不愿意出租，就不出租。”

那些头上无片瓦的人丝毫未使他感到不安，对他来说，司空见惯的还不止这些呢！

最近一个时期，在美国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的其他许多国家里，开始出现这样的现象：那里的确是建了不少漂亮的新住宅，但多数房子却空着没人居住。与此同时，又有数量可观的人无家可归。房子空着的原因是，房租高得连熟练工人和职员都负担不起。

苏联人对这种情况只有感到惊奇：一方面，美国的住宅多得很；另一方面，又有千百万人没有栖身之所。资本主义的丑恶嘴脸就是这样。

庸俗的标准

如果问一下在美国国内的或者在国外的美国士兵：

“你干吗要当兵？军队在保卫着什么？美国部队为什么要侵入这个或那个国家呢？”

他多半会回答：

“我保卫美国的切身利益和美国的民主。”

当然，他对什么是美国的切身利益，什么是美国的民主，并不了解。他也不会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从小是怎么教他的，他就怎么回答。

如果是一名军官，他大概还会说，所有美国国会议员都是选举产生的，并且是通过民主途径而不是其他什么途径选出的。他或许还要补充说，各州民选机构也同样是通过民主途径成立的。用他的话说，美国报界也是民主的。

可从来没有人告诉他这个军官，因而他也不会想到，无论是选入美国国会的人，还是选入各州机构的人，无论是当选州长，还是当选法官，都有富翁们和各大公司的支持。这些富翁与公司每次都慷慨解囊，以便保证自己的候选人有必要的“声望”，并把他“推上”选举的职位。

实际上，美国国会中绝大部分的当选证书总是属于有产阶级代表的。例如，一个参议员席位值多少钱？有各种不同的价码。但需要的不会是小数目。1984年美国选举时，国会上院更换1/3，竞选33个参议员席位的65个候选人，平均每人花了2106154美元。公布这些资料的社会组织“共同的事业”还报道说，参议员席位的竞争者们开销总额达1.369亿美元，与1982年选举相比增加了31%。

1985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总人数为535人，其中433人是法学家和企业家，占80%以上。在国会议员中，没有一个工人，经营农场者有31人，主要是一些大土地占有者兼企业家。在参议院中没有一个黑人，在众议院中也只有20个黑人。国会中的妇女“份额”简直如凤毛麟角，有2名女参议员，22

名女众议员

如果你向那个军官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他会认真地听你说。在大战期间，有一次，一个负责华盛顿与蒋介石之间联系的美军上校就曾听过我的解释。但对他来说，要全部消化所听到的东西，则完全是力不胜任的。多年来，关于美国民主的那套固定不变观念在他的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要想清除掉可没那么容易。

美国的民主是怎样“运转”的呢？

在美国总统选举运动或者在国会选举过程中，评价候选人时所采用的标准，在其他国家会被认为是不成体统的或当成笑料。

然而，事实上却是常会提出这样一种标准，如要求候选人在电视屏幕上的形象要好，如果他能发表优美动听的演说，那就更好了。人们甚至直截了当地说：

“这样的候选人看上去真漂亮……”

或者：

“他的讲话听起来真悦耳。”

至于他的政治纲领，那是第二位的，有时连第二位都排不上。排在第一位的是他是否善于把自己打扮得仪表堂堂，会不会微笑，能不能打漂亮的手势，是否善于在需要的时候戴上颜色得体的领带。在这种场合下，首先考虑的是要在社会上赢得半边天——女人们对要提名的候选人的好感，因为女人更看重这些方面。

这种情况的产生，是因为尽可能让评价候选人的庸俗标准，而不是让严肃的政治标准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这对统治阶级及最终靠其资助的新闻媒介是有利的。在这种情况下，有

更大可能性当选的是那些不关心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甚至不关心怎样保证给国家以和平、消除战争威胁，只关心如何保护世上强权者的利益、大资本家利益的人

有些人愿意效忠于资本家，而不愿意维护失业者、工人、职员、农民的利益，不愿维护所有争取停止军备竞赛，消除新的战争威胁的人们的利益，他们所喜欢的正是这种风度翩翩和粉饰现实。对统治阶级来说，把那些长相好、会做演说家的手势、脸上堆满笑容、经常更换各色各样领带的人作为高级官员候选人，是有好处的。有根据认为，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谁在这方面占有“优势”，谁就能获得更多的选票。

资产阶级报刊海洋中的船长

任何一个多少知道一些美国报刊的人都不能否认，这是一个真正的汪洋大海，有着许许多多的潮流派系。在这片汪洋中，每一个知名人士都有可能遇到最意想不到的危险。

可以断定，对美国报刊海洋的生存和发展来说，有一条唯一的、不可违反的定律，这就是为掌握着国家基本财富的阶级服务。大垄断组织、公司、银行拥有的权力正是那股支配一切的势力。

这股势力尽管坚定而巧妙地控制着报刊的汪洋大海，但是当今世界的甚至某些强人有时也会沉没在大海的漩涡中或者在暗礁上碰得遍体鳞伤。就连新闻界本身的一些代表人物也可能成为牺牲品。

不是所有的人在报刊（从广义上理解自然应包括电视、广播在内）的汪洋大海中航行时都能保证自己不出意外，甚

至免遭灾难。连有经验的船长也是一样。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船长的经验越多，他遭受的危险就越小。而那些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上从不偏离为资产阶级服务这条金科玉律的人，所担风险最小。

政治评论员华尔特·李普曼在数十年的时间里，表现出自己是一个敏捷和聪明的船长。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李普曼就已成为新闻界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他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的主要题目是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国际地位问题。李普曼的文章均刊登在那些发行量为千百万份的大报上。不论是美国的，还是其他国家的许多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外交官，都以与此人会见为荣。

我在华盛顿任大使时，有机会与李普曼见过几次面。很清楚，这位大政治记者想了解有关苏美关系问题以及我们对美国在苏美关系方面所奉行的路线的评价。他毫不拘束地提出问题，并注意地倾听对方的回答。在我的回答中包括对美国政策的评价，有时理所当然地含有相当多的尖锐言词。

李普曼很想知道我对罗斯福及其政策的态度。从他总是冲着这个话题提问题的那股劲头来看，我断定，李普曼对当时的白宫主人有自己的看法。于是，我不得不坚决地强调：

“在苏美关系问题上，不用说，罗斯福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他的前任——威尔逊、柯立芝、胡佛，谁都没有表现出这一点。正是在罗斯福时代，我们两国之间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且是在他出任总统仅一年后就建立的。他无疑表现出了刚毅和坚定。他的行动是与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集团背道而驰的。那些人在对苏关系问题上无论如何也不想转到较为现实的路线上来。至于大战期间两国关系的状况，那已经

具有新的性质，因为两个大国在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中是盟国。”

李普曼对罗斯福政府的对苏政策乃至当时美国的整个对外政策没有提出任何怀疑。使他特别感兴趣的倒是这样一个问题：

“您认为粉碎法西斯德国以后苏美关系的前景会怎样呢？我看盟国战胜德国已是确定无疑的了。”

于是我们就谈起来了。我不光回答对方的问题，而且也向他提问题。他明白，不好意思光是向别人提问题，也可以谈谈自己对未来苏美关系的看法。他表示：

“战时两国关系取得的政治资本不能丢掉。苏联和美国应当在安排战后生活和建立未来的相互联系方面找到共同语言。”

李普曼还强调了贸易的意义。他说：

“也许，今后美国将向苏联提供贷款，以便恢复被希特勒分子破坏了的苏联经济，特别是工业。讲到贷款，当然，我不能推测太远，因为美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态度还没有确定下来。”

李普曼在谈到美国向我们提供贷款的可能性时，显然故意说得很谨慎。于是，我追问道：

“这方面您是否有什么具体消息？”

他说：

“据我掌握的材料，罗斯福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上呈总统的有各种建议和方案，无论是关于贷款的数目，还是关于提供贷款的条件，众说不一。”

李普曼说的这些，与我们从接近政府的某些人士那里所

得到的半官方信息是一致的。其实，美国政府在贷款问题上并没有特别隐瞒自己的观点。

李普曼对战后各国之间的关系如何发展很感兴趣。他指的不仅仅是苏美之间，而是范围更广，还包括英国、法国、加拿大，也许还包括德国与意大利。在谈到后两个国家时，他说：

“在华盛顿流传的关于把德国人迁居到某些遥远的地区去，比如迁到非洲去的各种想法是不现实的。德国人很可能还是留在德国。同德国，以及同意大利的关系，将建立在某些原则的基础上。这些原则还有待确定。”

我认为，李普曼的这些议论是一种谨慎的暗示，意味着将要成立北大西洋联盟。但是，当时无论是李普曼，还是美国政府的官员，都还未曾提到这种可能性。就连罗斯福当时也没有什么深思熟虑的计划。这些计划是在杜鲁门当上总统的时候才出现的。李普曼——这位我与之谈话的人——后来成了建立北大西洋联盟的最起劲的支持者之一，甚至可以说他还是论证这种必要性的理论家呢！

李普曼同美国报界其他很多代表人物相比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显然是他在外交事务方面的渊博知识。李普曼对华盛顿权力走廊里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他在那里的活动是满怀信心的。内阁成员的门对他都是敞开着。

虽然李普曼没有担任什么正式职务，然而他却是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委以部长级重任的人物。特别是在战争结束期间和战后初期，李普曼被派去参加各种小组和委员会的工作。这些小组和委员会，正如当时所说，为和平会议准备材料和草案，为杜鲁门参加波茨坦会议拟定立场。后来杜鲁门政府

在巴黎和会上、在几大战胜国外长会议和许多其他会议上所采取的就是这一立场。

李普曼写过一系列论述国际关系问题的著作，其中有《对外政策：共和国的盾牌》（1943年）、《美国在战争中的目标》（1944年）、《冷战》（1947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还远未开始的时候，他就参与了高等学校的活动。1933年至1939年他是哈佛大学的督学之一。这所大学至今仍被视为美国备受推崇的高等学府。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的地位与英国的牛津大学相似。

一些美国人和外国人士认为，李普曼的主要功绩是他对建立北大西洋集团的必要性加以理论论证而作出的贡献。这些人的看法是对的，只要把“贡献”一词换成“过错”，因为这恰是这个美国大记者、作家和政治家的罪孽深重之处。

不过，李普曼对华盛顿的越南政策所持的立场，无疑是他活动中的闪光之处。他反对美国对越南人民的冒险行径。早在东京湾事件以前，李普曼就预言，美国反对越南的战争是没有前途的。他对越南问题乃至对整个印度支那问题的态度表明，他对世界这一地区形势的认识比华盛顿官方要清醒得多，他对美国武装干涉越南民主共和国可能产生的后果所做的估计也比官方现实得多。

与李普曼相比，那些对越南人民奉行侵略方针的美国活动家们则是真正的政治侏儒。这样的侏儒首先要数当时的总统林顿·约翰逊。由于在越南冒险的惨败，约翰逊在政治上彻底垮台，他连提出自己作为候选人与尼克松竞选总统的勇气都没有。

1974年李普曼去世，终年85岁。美国报界一位无可争辩

的秦斗离开了人间。

美国统治阶级为了防止他们建立的那套美国民主观念在美国人的心目中被动摇，他们建起了一道巨大的屏障。所有新闻媒介——报刊、电视、广播、各种会议、演讲会等，都被垄断资本家们动员起来了。他们不惜工本，以便保住这道屏障，不仅保住，而且筑得更高，更加牢固。而新闻媒介也忠实地为统治阶级服务，首先是为那些在对外事务中持最好战立场的集团服务。

例如，格林纳达这个不是在所有地图上都能很快找得到的加勒比海中的小小国家遭到了美国的野蛮入侵。可是美国政府及它所依靠的势力借助于新闻媒介，竭力向美国社会歪曲报道了对这一弱小国家所采取的强盗行径，以致美国社会，至少相当一部分人最后不仅容忍了这种冒险行为，而且还同情这么干。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什么呢？为的是让五角大楼再多得到一个军事基地，一个在自由被践踏了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基地。

然而，谁都不应怀疑真理的强大力量，对世界局势、对华盛顿的现行军国主义方针、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爱好和平政策的客观报道，必将为自己开辟越来越宽广的道路。

州长是怎样忽视马克思理论的

一个美国人的思想从童年起就开始受到毒害，这样的影响使他渐渐地对他所出生的这个国家形成一种被扭曲了的看

法。他的父母不住地给他灌输这样的思想，什么生活在美国有多么美好，总统是大好人，他家所在的州参议员是正派人，警察局长最公道，等等。当孩子上小学的时候，那里则不厌其烦地对他讲，象美国当权者这样秉公办事的，即使你走遍世界也找不到。如果他升入中学，尤其是考入专科学校或大学后，那他听到的说教就是必须神圣地尊崇美国的现存秩序和法律，要敬重警察当局和警棍，要同共产党人做斗争。凡是批评美国政策的人，同情苏联、赞成苏联的和平外交政策的人，甚至仅仅是阅读苏联文学著作的人，统统被当作共产分子。

谁都知道，那些胆敢向大学生介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教授和讲师是怎样受迫害的，通常是对他们进行欺侮凌辱，有时干脆制造些条件，迫使他们无法在学校里工作下去。

寻求保护？一个普通的人怎么能够得到督学理事会的保护呢？要知道，委员会的成员都是些忠实可靠的人，他们全都是忠心耿耿地为那些向学校提供资助的大财主们效劳的人。如果有人想在学校里讲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那肯定会受到财政制裁。也许不会把这叫做制裁，而是巧立一个温和一些的名目，一切都干得不露声色，但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学校必将受到沉痛的打击。

还可使用一种证明有效的方法，或称之为“民主的”方法，那就是堵住不肯顺从的教授的嘴，甚至不让他继续教课，或者干脆撤掉他的工作，这只需在报纸上登出一两篇诽谤中伤的文章就够了，因为他已被列入持不同政见者的行列。臭名昭著的麦卡锡时代就是这方面的生动例证。

我同不少熟悉美国高等学校讲授社会科学状况的人士有

过交往，其中有些人后来在政府里和外事机关身居高位。

就以我同哈罗德·史塔生的谈话为例。他曾经当过宾夕法尼亚州的州长。身为共和党人的史塔生曾差点儿由本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此人在实践中深知美国受高等教育的通常模式。他坦率地说：

“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完全得遵循陈规俗套，决不让学生接触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我问史塔生：

“难道象您这样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大政治家，也没读过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没读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吗？”

我们的交谈是随意的，非正式的。史塔生喜欢进行空泛的抽象议论，我也愿意同他聊天。他以使我赞赏的坦率说道：

“我曾试图熟悉一下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因为我感到不满足的是教授们总是浮光掠影地提到马克思的著作，并且在评述中更多的是批判马克思，而不是阐述他的理论原理。于是，我就打定主意自己着手研究《资本论》。可是，我不瞒您说，当我读到第二章的时候就念不下去了。我很想把这一章读完，但头疼得厉害，结果就没能读下去。我只得到此罢休了。”

在交谈中，史塔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只字不提。由此可以断定，他压根儿就没有读过。出于礼貌，我尽量避开这个话题。

我可以肯定地说，我所见到的并与之深入交谈过的美国、英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大国政府的大多数部长们，都不了解马

克思学说的实质。

同凯恩斯的谈话

我曾不止一次地处于尴尬的境地，这是因为我所提到的那些与之交谈的人对黑格尔、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对马克思以前的亚当·斯密、李嘉图、穆勒的经济理论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对凯恩斯的经济著作还能一知半解地说上几句。英国人对凯恩斯的理论知道得稍微多一些，这是自然的，因为凯恩斯是他们本国人。我在这里提一下这件事还是很有必要的。可这里谈的是美国的民主和文化，而凯恩斯毕竟是个地地道道的英国人。

凯恩斯关于政府干预国家经济生活的可行性及干预限度的许多原理正在美国实施。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人们的这种设想从凯恩斯那里得到了理论上的认证。确切地说，恰恰是与此相反。这位经济学家之所以开始在理论上来论证这些设想，是因为资本家们的实用主义的想法早就迫使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集团和政府在实践中采用干预手段。

凯恩斯是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最大的理论家。毫无疑问，这位有才华又极其勤奋的人在资产阶级经济学领域中留下了很深的足迹。至于他主张的那一套同马克思在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大相径庭，这是另一码事。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里，不仅是西方各国的许多经济学家和学者崇拜凯恩斯，而且美国那些与科学无缘的人们，一些百万富翁和千万富翁们也都很推崇他。美国一些最大的公司，如同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

垄断集团一样，实际上已经采用了凯恩斯的主要理论观点并用它们武装了自己。

富·罗斯福在大选获胜入主白宫之后，为了解决他面临的任务并克服美国经济危机提出了一些设想，就连这些设想也不无凯恩斯的影响。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虽然不愿接受凯恩斯的某些观点，但却借用了他的另外一些思想。

现在，各国经济学家都十分明确地认识到，当年的凯恩斯本人和现在的凯恩斯主义到底是为哪些人的利益服务的。这位年高望重的学者所致力研究的主要题目是，能否通过国家垄断调整经济的办法克服资本主义经济的弊端。

我第一次见到凯恩斯是在1943年，在大西洋城召开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理事会会议上。说实话，我以为他在这次会议上似乎无事可做。因为会上讨论的是关于筹建一个政府间组织的问题。但重要的是，这次会议是大战期间召开的第一次讨论被希特勒占领国家经济问题的会议。

在这些国家，政治任务自然是同复兴经济的任务密切相连的，而向那些急需外援的国家提供各种援助，这理所当然地要求各国政府从政治角度作出决定。

参加会议的有各国政界代表，有经济学界名流，还有这两方面都不是的人士，但他们提出的建议可能是很有用的，因为他们十分了解那些遭到战争摧残的国家的经济状况。

在与会的经济学家中就有这位深得英国政府信赖的凯恩斯。作为有威望的学者，他常常被吸收参加为大会工作定调的人士们的行列，但他自己却尽量避免抛头露面。尽管如此，由于他身材魁梧，在顾问、专家们中间他仍是一个很引人注

目的人物。

我同凯恩斯交谈过几次。在我们初次谈话时，他的主要兴趣不在于对受战争破坏的国家复兴经济采取什么政策，而在于当时仍然处于法西斯军队占领下的那些国家的现实状况。

要想弄清楚哪个国家需要哪种援助，凯恩斯所掌握的情况是不够的。同大多数与会者一样，他引用的也都是报刊上公开发表的一般资料。

我们谈话的其余部分基本上涉及的都是些一般性的政治内容，谈到法西斯分子在其占领土地上对居民的野蛮暴行和希特勒匪徒指挥官们的残酷无情。凯恩斯很坚定地说：

“我完全支持几大盟国彻底粉碎敌人的方针，我认为同纳粹德国毫无妥协的可能。”

在第二次会见之后，我对凯恩斯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才有了较全面的了解。比如，他说：

“西方盟国，首先是英美两国，不仅在必将胜利的反法西斯战争期间有共同利益，即使到战后，两国对进行共同合作的兴趣也不会减少。”

对此，凯恩斯提出了两点理由。他说：

“第一，英国和美国都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而这一点是无法从历史上抹掉的。第二，两国在经济方面似乎相互补充。”

根据这一切来判断，凯恩斯清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列颠殖民帝国将一贫如洗。因此，英国不可能完全独立地发展，首先是在经济方面，它将经常需要实力雄厚的盟国——美国的帮助。

我问凯恩斯：

“英国对美关系的独立性将会严重动摇，这种局面会不会对英国造成威胁？一些美国人士有时已在发表这种意见，尽管还未就此发表正式声明，因为美国政府出于可以理解的考虑，不会赞成这类声明。与此同时，英国新闻界在展望未来时，偶尔也发表一些这样的推测。”

凯恩斯没有直接回答向他提出的问题，尽力强调另外一点：

“请注意，”他说，“英国的潜力是很大的，我相信，即使战后，它也能保持这种潜力。”

在关系到不列颠殖民帝国未来的问题上，他发表意见时很谨慎，回避做任何预测。

我向这位学者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

“您的名字在我国也是人所共知的，特别是在社会科学学者中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世界，其中包括反对希特勒德国同盟的几个大国，即将进入一个复杂而重要的时期，您将怎样阐述您的经济理论学说，使之适用于这个时期呢？”

凯恩斯不慌不忙地字斟句酌地说道：

“资本主义国家将继续沿着它们已经走了数百年的道路，即资本主义道路发展。我不相信社会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要分成黑白两半。世界将出现趋同的因素，但这些因素不应破坏参加反对希特勒德国战争国家业已形成的经济和社会结构。”

对方特别强调的思想是：

“政府和将在自由竞争国家执政的人，今后在解决经济问题方面应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因此，期待国家比现在，

特别是比战前更多地干预经济生活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但是，政府对国家经济生活的影响不仅不应与企业主的利益相矛盾，而且正好相反，应符合他们的利益。因为重要的是应努力克服国家在经济上的困难。”

凯恩斯没有使用“危机”一词，但毫无疑问，他对“困难”一词的理解首先指的是经济危机和动荡。

“您究竟怎样看待马克思早已作出的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不可避免的结论呢？”

凯恩斯发表了一种就当时来说甚为新颖的思想：

“同其他为数不多的不赞成马克思上述结论的经济学家不同，我承认马克思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有根据的。但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已上升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且私有者阶级已获得了丰富的经验，懂得了如何同经济生活中的困难，甚至动荡进行斗争。”

“那么，究竟怎样理解1929—1933年的那场危机呢？”我问道。

“它并未使我信服，”凯恩斯含含糊糊地答道，“但是，看来，类似的经济动荡不得不使人承认，我的理论结论需要通过实践来进一步加以论证。我认为，这样的动荡还会出现。”

“在马克思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中，”我说，“主要的是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马克思揭示了剩余价值的规律，指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内部机制及其灭亡的历史必然性。而现在您的学说已经被称为凯恩斯主义，请问，其中主要的东西是什么？”

凯恩斯想了想，满有把握地回答道：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谈论很长时间。但如果谈得简单点儿，在我关于国家调节经济的理论中，主要是要达到有效需求和充分就业。”

不，资本主义国家战后并没有取得凯恩斯所指望的东西，既没有达到“有效”需求，也没有实现“充分”就业。但是，他的一系列思想得到了实际体现。在西方国家，出现了许多他的追随者，形成了一些新凯恩斯主义学派。凯恩斯的一些原理在某种程度上被“修改”和“发展”了。他的继承者中有一部分人“向左”转了，另一部分人“向右”转了。

结果如何呢？凯恩斯主义或者新凯恩斯主义有没有帮助资本主义免遭其难呢？

一点也没有。在资本主义世界，这一点已被战后的经验所证明。不是什么有效需求，而是经常性的通货膨胀，防止经济危机的尝试徒劳无益。经济危机表现为生产下降、生产设备开工不足，以及货币信贷和外汇财政方面的不协调。至于“充分就业”，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千百万失业大军。

我想说几句，凯恩斯的为人给我留下了什么印象。当他在会议大厦走廊里走动时，如果观察他，就会觉得他在行走时目无旁人，陷入沉思。他仪表堂堂，与众不同，穿着高级英国毛料缝制的深色服装，看上去十分精神。英国贵族有时喜欢炫耀自己不修边幅，但在他身上决不会看到这种故意不修边幅的模样。是的，说来也怪，他就是不喜欢这种装模作样……

凯恩斯当然知道自己的身份。谈论事情，他喜欢谈大事。他不喜欢通常所说的世俗社会中的那种无聊闲扯。他的同

胞们就是这样说他的。

我同凯恩斯会见的时候，他的神态一点儿也不使人为他的健康担心，因为看上去他很健康。但他却在63岁时，也就是在战后不久的1946年，就过早地去世了。

凯恩斯是一位很有趣的人，很精明的谈话对手，才华横溢的学者。他当然是为他的阶级，为其先辈生活和成长条件下的那种民主服务的。这就是凯恩斯画像的轮廓。

用什么来取代严肃的艺术

每一个熟悉美国文化生活现象的人都不能不问：

“普通美国人最喜欢什么？”

“人们总应该注意在全世界被称之为文化、精神生活的那些东西吧？”

“他们总应该在工作之余得到休息，采取某种形式度过空闲时间吧？”

“他们总不能把一切精力、时间都消耗在看凶杀片、淫秽片和极其狂妄地、歇斯底里地宣扬美国生活方式的影片上吧？”

从来没有人准确地统计过，美国有多少黑窝子，那里不仅为来客提供活商品，而且还提供非动物性商品，只要把钱放在柜台上就行。这样的黑窝子可以用一些冠冕堂皇的牌子来掩饰，诸如“饭店”、“舞厅”、“游泳池”，甚至干脆叫“聚会处”。

那么，取代电影院的场所究竟有多少？

例如，一个美国人开着小汽车全家外出，突然看见一行

字：“无需出车就可以看电影。”而且真是这样：挂着一个大银幕，周围看不见人，停着的全是汽车，占地至少有一公顷。这是设在城外的某种“精神生活”的场所。

以前，美国人时兴到城外去野餐。现在，有人也还这样做。但是，许多美国人越来越习惯于在电视机旁和电影院里度过空闲时间。他们认为，野餐没有什么刺激性，因为野餐时看不到凶杀和其他暴力行为。而在家里或即使与亲朋好友聚赌，已引不起特别的兴趣。

人们越来越经常地在“花天酒地的”地方寻求刺激。新闻界的许多人士知道这些处所的存在，更不用说那些职责就是维护秩序的人了。但是，只要那里不发生打架、持械斗殴、抢劫和杀人，就不会触动这些地方。为了发财，他们各显神通，他们这是在“造钱”。发财的思想成为生活方式的准则之一。

我认为，象美国这样的大国，在真正的文化方面本来可以为世界做更多的事情。况且，在美国人民这个复杂的、多民族的融合体中，很大部分是欧洲、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移民，而这些地区在戏剧、音乐、绘画、民间创作方面有着悠久的传统。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国家的影响在美国的戏剧、艺术和音乐方面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但这仅仅是在某种程度上。美国人赤裸裸的兴趣，以美元和利润作为全部价值观的习惯，对全部社会生活来说是一股如此强大的压力，以致近年来精神文化在许多方面不仅没有得到发展，反而向后倒退了。

在美利坚合众国，集聚了不少文化珍品，它们是不同时

期从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运去的。然而，这些珍品的迁移常常是商业交易的结果，有时，一些历史文物至少是来路不明的。美国人自己对此一清二楚。

在大型博物馆里（它们在美国非常之少），经常展出的主要是欧洲艺术杰作。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华盛顿的国立美术馆和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就是这样的。

当我们苏联人在美国参观某些博物馆、其中包括上述两个博物馆时，他们一定会发现，参观者总是寥寥无几。我的亲身经历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在参观华盛顿的博物馆以及后来参观纽约的博物馆时，我看见参观的人稀稀拉拉，而且大部分还不是美国人。

当然，不能根据这一点就得出美国人与艺术无缘的结论。绝非如此。在这方面，他们不过是决定社会特性的诸多情况作用的产物。这是人们生活方式的一个方面。

不管我看过多少次美国电视，听过多少次广播，但一次也没看到，一次也没听到任何普及古典艺术的节目。在世界许多其他国家，现在的广播、电视都在介绍菲迪亚斯^①和普拉克西特列斯^②以来古典艺术的发展情况。

那些有可能对社会精神生活施加影响的人，几乎不利用广播、电视来培养美国人对严肃艺术、对珍惜世代代积存下来的全人类珍品的兴趣。然而，每周的，甚至可以说是每天的电视和广播节目都充斥着各种明显的糟粕，培植人们的

① 希腊雅典雕刻家，成名作是雅典卫城的三座雅典娜纪念像和奥林匹亚宙斯神庙的巨大宙斯坐像。——译者

② 公元前4世纪雅典雕刻家，希腊最有创造性的艺术家之一。名作现仅存大理石雕像《赫尔墨斯》。——译者

低级趣味，要人们无视真正文化的精神财富。迷恋暴力和凶杀的狂热笼罩着电视屏幕和广播节目。

遗憾的是，这股狂热之风已经刮到了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而且有越刮越烈之势。然而，在美国，简直到了猖獗的地步。难道刚杀过人的血淋淋的刀子能同艺术珍品在同一电视里播出吗？这样，就把真正的艺术从电视屏幕上、从广播室里撵走了。戏剧的命运也基本上是这样。在剧院里，陶冶人们情操的东西越来越少。

难道在美国没有人（包括掌权者）明白这种状况是不正常的吗？当然有，但他们无力同这股名为资本、利润的粗暴势力进行斗争。

资本是无情的铁筛子

50多年来，美国在艺术领域——绘画、雕塑、戏剧方面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现代派潮流。你随便走进一所博物馆，比如纽约五马路现代艺术博物馆，就有一些丑陋不堪的东西看着你。这就是那些受到报刊吹捧的画家的作品。诚然，可以看得出来，吹捧者丝毫不懂艺术。从这个博物馆出来，我很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1946年，有一个这样的画家决定在美国《生活》周刊上阐述他的创作意念。他告诉读者，当他开始创作一幅新的现代派绘画时，他的意识、理智是不工作的。他竟这样直截了当地宣称：“下意识在工作。”而最终会画成什么样子，画家自己也不知道。编辑部却把这篇“哲学”高论严肃认真、毫不保留地刊登了出来。

的确，美国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不是太喜欢发人深思的艺术。他们不愿把那种可以激发人们的高尚情操、促使人们思考各国人民的友谊与和平、人的智慧有无穷无尽力量的艺术介绍给观众。他们在绘画、雕塑、戏剧、舞台、电影等艺术领域中需要的是机器人，他会射击、砍杀、斗殴、从军舰上登上别国领土、从太空装置击败对手。一句话，搞暴力，准确地把炸弹投到别国的城市，以“普及”美国的生活方式，“保护人权和民主”。

当然，美国人民同其他任何国家的人民一样，有许多才华出众的人物，其中包括艺术和文学领域的这类人物。大自然完全没有把美国人民另眼相待。美国培育出了象欧内斯特·海明威、西奥多·德莱塞、杰克·伦敦、亨利·朗费罗，以及许多其他散文和诗作巨匠。人们都知道，查理·卓别麟的杰作，梅里·皮克福德、贝蒂·戴维斯和许多其他人参加演出的影片给美国的银幕，而且不仅仅是美国的银幕，增添了光彩。

在音乐艺术方面，也有一些得到外国承认的人物，如乔治·格什文。伟大的捷克作曲家安东尼·德沃夏克和乔治·格什文互相并不认识，然而前者却是后者的精神导师。在上个世纪，德沃夏克按照契约在纽约民族音乐学院当了3年院长。在此期间，他写了《新世界》这部出色的交响曲，并郑重其事地说：

“在黑人的音乐旋律中，我为美国新的民族音乐学派找到了可靠的基础。”

他还接着说，那些把黑人的音乐旋律作为自己作品基础的美国家作曲家，将成为美国民族音乐的奠基人。

格什文就成了这样的奠基人。他吸收了勃鲁斯¹和圣歌——黑人的民间音乐，南方种植园奴隶的曲调，并把这些旋律作为自己作品的基础。他自己因而一举成名，使全世界开始谈论美国独具风格的音乐。我是在格什文去世两年后到美国的，但清楚地记得他的歌剧《波吉与贝丝》广告上斗大的字体。这部作品成了美国的经典，在苏联上演也获得了成功。当我在莫斯科听这部歌剧时，心里感到很高兴。

但是，例外现象通常只能证实一般规律确实存在。而一般规律是严酷的。资本、利润是一把无情的铁筛子，一切与文化、艺术和国家精神生活有关的东西，都要经过、而且正在经过它过滤。在这里，只有能使垄断资本肯定得到收益的东西，才不会衰退，不会消亡。

这股势力并不给人贴什么标签：哪位文化人士值得赞扬，哪位却不值得赞扬。有许许多多的办法，可以把某人捧上宝座，也可以使某人永无出头之日。办法之一就是报刊和整个新闻媒介工具。在这方面，大部分舆论工具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完成统治阶级的订货。

常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了一些天才人物，在别的条件下，他们本可以为美国争光，而且不仅仅可以丰富他们本国的文化生活。但是，社会条件这个魔鬼，以及归根到底依附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社会生活，却直接或间接地摧残了天才人物。

著名的美国歌唱家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短暂的一生难道不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吗？整整20年，他一直是青年的偶像。

1 爵士音乐的一种，起源于美国黑人的劳动歌曲与宗教歌曲。20世纪初流行于美国。曲调以“忧郁音符”为其特点。——译者

他的演出风格显得比较轻松，但有时近乎于低级趣味。只不过近乎于低级趣味，但还没有越过这个界限。那些从他演出中得到好处的人，力图从这位有才华的歌唱家身上最大限度地榨取一切。普雷斯利竟长时期地抗拒那些生意人滥用他的才华，使美国感到震惊。

那些不断地把他推向庸俗道路的人取得了一项成功：创造了利润的人，却把身体搞垮了。他病得很厉害。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但没人关心他的健康，关心医治他的疾病。相反，一大堆合同压得这位歌唱家喘不过气来，要他无休止地进行各种各样的演出，为老板创造巨额利润。

早在普雷斯利去世之前，所有的人都知道他靠刺激性药物维持生命。但社会上的吸血鬼不顾一切，要趁热打铁！而且真的打铁了。在沉重的压榨之下，天才倒下了。在他44岁那年，歌唱家就去世了。

当然，即使在美国，也有些人非常清楚并谴责文化领域所形成的这种状况。但是，他们一时还无力与美元的无上威力和精神空虚相对抗。

看着美国社会文化领域里正在发生的这一切，我常常想起库退尔的名画《堕落时代的罗马秘密节》。我在卢浮宫见过这幅画，画的是一群狂饮的男男女女，半蹲半卧，呆滞无神的目光瞧着你。目光中仅有的一点是空虚。难道这不就是为黑暗势力服务，使人堕落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颓废没落的象征吗？

我谈了这些并不是想说，美国在文化、艺术、文学方面不存在现实主义和颓废主义之间、健康因素和道德败坏之间的斗争。斗争是有的，但斗争双方的力量暂时还悬殊很大。

不少美国文化界人士，以及具有健康思想的政治家，在同我的谈话中不止一次地强调：

“这一斗争将继续下去。”

他们有时甚至表示出希望：

“总有一天美国当局会通过法律，使美国社会及其文化摆脱痼疾。”

当然，只有那些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依据的活动家，才能对这些尖锐的问题作出真正有根据的答复。然而，这样的人（不包括兄弟的美国共产党的代表）我们所见不多。十分遗憾，从理智的立场出发批评美国现状的大多数人，本身就是接受美国教育的产物。因此，他们的结论和预测往往不是始终如一的。

平等与司法的真正价值

如果看一看美国高等学校学生的成份，难道能发现真正关心人民文化的迹象吗？他们是些什么样的学生呢？

他们基本上是靠剥削雇佣劳动致富人家的孩子。在那些毕业后能较有希望地得到与专业对口工作的学校里，情况尤为突出。这种院校的学费很高。

有供熟练工人、收入可观的职员和属于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们上学的学校。但学费对这些阶层的人来说也是一种沉重的负担。纽约有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正是属于这类高等学府。但是，该校的不少学生在餐馆干活，洗餐具。

教会或许能发现美国民主的弊病？不，它实质上什么也发现不了，确切地说，它不想去发现。教会里大部分神职

人员都回避失业、吸毒、卖淫、堕落等社会生活中的迫切问题。

在美国也曾能听到过牧师们的呼声。他们中间常有一些人谴责种族歧视。这是好现象。但是，他们引起了反动派的仇视。在这方面，自然而然想起1968年杀害洗礼教派牧师——一个在美国争取黑人权利斗争的领导人——马丁·路德·金事件。这是美国不可洗刷的耻辱。

美国大谈特谈“机会均等的社会民主”，但只有瞎子和聋子才识不破这些热情赞扬辞藻背后的那种赤裸裸的社会不公平。美国菲米斯¹的活动就是这种不公平的一种表现。

怎么，被民主催眠曲弄得晕晕乎乎的美国菲米斯睡大觉了吗？一点儿也没有。它用来镇压的利剑并未束之高阁。美国“清廉的司法女神”早就从掌权者那里领取薪俸了。

膀阔腰圆的“科帕”，即总在腰间别着一根橡皮棒的美国警察，成了美国城乡风光自然的一景。尽管如此，席卷美国的犯罪浪潮——暴力、抢劫、吸毒、强盗团伙的活动——还是没有减弱。

不仅美国公民，甚至外国的外交官，在美国城市的大街上，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总感到不放心。在联合国总部所在地——纽约，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官，以及这些国家的代表机构，多年来已成为各种犯罪活动攻击的对象。前几年，有人甚至从窗户里向这些外交官射击。

美国的警察机关、所有的秘密特务和情报人员，首先是用来对付那些呼吁捍卫自己的政治和公民权利、走上街头要求停止军备竞赛的政策、呼吁消灭失业、给无家可归的人提

¹ 菲米斯，古希腊神话中的司法女神，这里指的是司法。——译者

供栖身之地的人士。“美式民主”在这方面的作用发挥得多么出色。警察用来对付游行示威者的是枪击、棒打和催泪瓦斯。只要回顾一下镇压肯特大学学生为抗议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而举行的示威游行、血洗迈阿密黑人犹太区、1985年费城残酷屠杀黑人等事件就足够了。如果共产党员落入美国警察和法院之手，它们就更疯狂了。对安吉拉·戴维斯审判的丑剧就是最突出的一例。

“您知道德莱塞吗？”

这个问题对任何一个有文化修养的苏联人来说，都显得有些奇怪。可是，在华盛顿我遇到过这么一件事。我要说的这件事是第一件，以后还有其他几件事，这些事使我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普通美国人读书很少，有时对本国的作家都不甚了解，这对他们整个民族来说是多么可悲。

去美国之前，还在苏联的时候，我学了4年英语，已经能够阅读报刊、书籍，但自然还缺乏口语实践。因此，我1939年一到华盛顿，马上就请来老师上课，以提高用英语会话的技能。一位叫汤普森的小姐成了我的老师。她在美国受过语言学高等教育。一句话，这位当地的文科学士、英语（带美国音）和美国文学专家每周来给我上两次课。我们象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所做的那样，先选择某个题目，然后，就这个题目用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交换意见、谈谈看法。

有一次，她给我留了一个家庭作业：

“请您准备一下，下次谈一谈我本人专业的题目，也是我所喜欢的题目——‘美国文学’。”

我完成了作业，课上我就谈起了美国一些著名的作家。谈了亨利·朗费罗、爱伦·波、马克·吐温的生平，简要地回顾了他们的创作活动。然后我说：

“现在我谈一谈德莱塞。”

“谁？”老师反问道。

“西奥多·德莱塞。”

“他是什么人？”她惊奇了。

我开始以为是我对这个姓名的英语发音不准，就在一张纸上写出了这位作家姓名的拼音。我把这张纸条递给了汤普森小姐。她瞪大眼睛看了看写下来的几个字，茫然不知所措。她向我诚实地承认：

“您知道吗，我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位美国作家。”

这下子该轮到她惊奇了。一个美国文学专家、在这方面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况且她并不是生活在穷乡僻壤，而是生活在首都），竟然不知道与她同时代的美国最著名的一位作家，即《嘉丽妹妹》、《金融家》、《天才》、还有其他许多小说的作者。她对当时红极一时的这位作家竟然一无所闻。

我告诉她（她诧异地听着），这位作家住在加利福尼亚，他的书已被翻译成包括俄语在内的世界上许多种文字，还在莫斯科时我就努力攻读过他所写的英文版《美国的悲剧》。

当然，我非常想见一见德莱塞，同他本人聊一聊，告诉他，他和他的书在我国都很受欢迎。但工作很多，后来战争又打了起来。不知怎么的，加利福尼亚没能去成，总是有更紧迫的事，加利福尼亚之行就不得不往后一拖再拖了。到了

1945年，突然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西奥多·德莱塞逝世了。我还知道了一条重要的新闻：这位著名的进步作家在晚年、逝世前不久，就在1945年，以自己的榜样向本国进步人士，特别是探索中的青年人表明，谁是维护劳动人民利益的战士。西奥多·德莱塞加入了美国共产党。他善于在自己作品中揭示美国人心灵的浪漫、善感、贪婪、徬徨等侧面。

是的，从总体来看，美国人连本国作家的书都读得不多，更不用说世界文学的经典作品了。

一位美国外交官的痛苦自白

我记起在纽约与一位著名的美国外交官的一次谈话。他在国际政治问题上所持的立场是合理的，主张苏美之间保持良好关系。这次谈话是在战争结束后过了几年进行的。

我们谈了很长时间，最后他不知为什么想评价一下苏联和美国的生活条件。并且，我的交谈者使用了美国生活方式这个概念。他一开始使用这个概念时并不是为了辩论，而仅仅是因为他想不出用什么别的词来表达真正象样的生活这一概念。他并不想对苏联人的生活作出消极的评价，但按他的说法，显然要引出一个还是美国好的结论。

我当时问他：

“最近报上登了一条消息，说一个儿子杀死了他母亲和家里其他的人，你是否读过？”

他说：

“是的，我知道这件事。”

“报上还登过这样的消息，说纽约的中央公园里差不多

每天都有人随便被人用刀子捅死，你是否知道？而这些事却发生在您对其生活方式赞扬备至的国家里。”

他回答说：

“我知道。我对纽约警察当局还没能制止这些胡作非为感到十分气愤。”

我说：“还有这样一件事情，这是我亲眼见到的。在某条街与东河沿河街的拐角处，离联合国大厦不远，我亲眼看见一个人倒下了。一个女人在他身旁手忙脚乱，还站着一个个惊呆了的孩子。她想方设法要扶起那个人，哪怕是扶他坐起来，但她力不从心。行人们从他们身旁匆匆而过，根本未停步。使我最为吃惊的是，不远处站着的那个警察竟完全无动于衷。此情此景他都看见了，但不想朝他们的方向迈出哪怕是一步。‘为什么您不想帮帮他？要知道他刚刚才倒下。他身体可能不舒服。’我们的苏联同志问这个警察。那个警察悠闲地说：‘他们自己会有办法的。’”

一些严肃认真的专家想弄清楚，究竟为什么美国对犯罪行为如此宽容。他们承认，根源在于电视、电影和书刊。大家知道，在美国，影视公司摄制的每部片子一定要有几个凶杀镜头，这是习以为常的了。而且，不只是一般的凶杀，而且要杀得恐怖，淋漓尽致。

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了几百年。而社会主义仅用了70年就根本改变了国家的面貌。

要是历史真能够象人们在相互交往中所做的那样，对苏联的功绩表明自己的态度的话，那么，历史肯定也会向苏联人民鞠一个躬，对苏联人民为人类所做的一切伟大业绩表示感谢。

加里·库珀和玛丽莲·梦露

好莱坞。“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大厅。那里有一个对洛杉矶来说带有异国情调的法国名称：“巴黎咖啡馆”。桌上摆着丰盛的食品，美国电影界的名流济济一堂。导演和演员们与苏联代表团举行会见。我们坐在台上的“主席团”里。往下一看，我看见了許多很熟悉的面孔。我在美国电影里不止一次地看见过他们。

不可能把每个人都谈一遍，但我想特别提一下其中的两个人。

加里·库珀，著名演员，我还是在好莱坞这里第一次见到他。他个子很高，身材匀称，一副刚毅的脸庞，他演过很多电影，很有名。现在他看上去疲惫不堪。他已经快60岁了。我想，“疲于出名”，这样形容他很合适。

在看着他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想的。

确实，他的名字具有磁铁般的吸引力。他演的电影在美国总是非常成功，很“卖座”，而这一点对制片商和电影公司来说是主要的。

他演过许多惊险片、牛仔片、传奇片。30年代初，演出了以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小说《战地春梦》为题材的影片之后，他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在好莱坞所拍摄的影片中，他扮演过杰出的军官，也扮演过憨厚的平民、慍悍的牛仔。在根据海明威的小说改编的《战地钟声》中他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士兵的形象，使人记忆犹深。这一具有反战实质的影片在严峻的1943年上演非同凡响。战后16年以来，库珀一直被认

为是最著名的美国“影星”之一。

在众多的好莱坞著名电影界人士之中，我见到了这位著名演员，同他认识感到很高兴。但从这位演员当时的外表来看，见不到他在影片中通过人物的言谈举止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蓬勃的朝气和端庄的神态。

是的，我当时那种下意识感觉并非错觉。原来，这位伟大的演员当时已重病在身，过了不久他就去世了。

玛丽莲·梦露……她名扬海外。在新大陆本地，她是观众崇拜的对象，是“头等明星”。人们都说，她总是姗姗来迟。不过，那次在好莱坞与苏联代表团会见时，她却来得很早，以便占一个近一些的位子。她坐在桌子对面，离我们仅仅5米远。

正式的活动结束了。可以走了。我从几个小桌旁走过。突然，她对我说：

“葛罗米柯先生，您过得怎么样？”

她说得这样亲切，好象我们早就认识，虽然我这是第一次同她见面。我停了下来，多半是出于礼貌，回答说：

“您好。我很好。您最近成就如何？在电影中多次看到过您。”

她向我伸出了手，对我的问题好象说了些什么。但人群如流，就把我从一个大厅推进了另一个大厅。

那阵子，这位演员正红极一时，她笑容满面，踌躇满志。那些使她在世界上成名的影片早已成为过去的事了。

玛丽莲·梦露差不多在所有影片中都扮演主角。这些女主人公气质平平，但梦露演起来却魅力非凡。她成了美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观众崇拜的偶像。

但是，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那次会晤之后过了3年，一个消息传到了莫斯科：玛丽莲·梦露自杀了。

这样的事怎么会发生呢？许多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一个向来乐呵呵、充满生活情趣的人，突然间自杀了。要知道，她才不过36岁……

几十年过去了。到了80年代初，西方国家的各种报刊上开始刊登调查文章，用证据说明这位著名的美国电影演员根本不是自杀的，她是某种阴谋的牺牲品。她熟识许多美国出名的国务活动家，同他们谈过话，有时也涉及到政治内容。死前不久她还会见过约翰·肯尼迪和罗伯特·肯尼迪。

这个女人知道的东西很多，虽然在电影中她常常显得有点儿平庸，不过，这是角色使然。而在当时，1962年春天，发生了几件十分重要的军事政治事件：美国第一次爆炸了当量为100万吨的核装置，开始成批地发射“北极星”新式导弹。许多人认为玛丽莲·梦露是“赤色分子”，因为她当时也主张在美国维护人权。

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报刊越来越多地透露消息说，玛丽莲·梦露对苏联和苏联文化抱有好感。一些美国官员直截了当地宣称，这位杰出的演员几乎都快成共产党员了。当然，这与事实毫无共同之处，但玛丽莲·梦露对我国的友好态度没有逃脱美国有关集团的监视，他们从来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好莱坞。

只是到了80年代才弄清楚，对这位60年被认为是女性温柔象征的电影明星立了一份专门的秘密档案。美国当局承认，它拥有关于这位著名演员的一份“详尽”的卷宗。这份档案还是在1955年，当玛丽莲·梦露甚至还不到30岁的时候就开

始搜集的，因为她认识有左派观点的人，包括她未来的丈夫、剧作家阿瑟·米勒和他的朋友们。

据报道，这份档案中有对外政策问题以及军事问题的材料。1986年的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曾这样断言过。

这一家报纸还说，在美国特工部门眼里，玛丽莲·梦露成了“对美国安全的威胁”。因此，干脆把她给收拾掉了。

真相是否如此，将来可能会弄清楚。

美国真正的爱国者

在垄断集团统治、人权遭到践踏、警察监视盯梢的艰难条件下，美国共产党人进行着英勇、原则性的斗争。我一向敬佩美国这些真正的爱国者。

当然要特别谈一谈美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这些人清醒地估价国内和国际形势，以及本国的内外政策。

我清楚地记得同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尤金·丹尼斯的会晤。他是个刚毅、勇敢的人，早在1927年就加入了美国共产党。战前，在1938年，他被选入共产党全国委员会，自1946年至1959年为该委员会总书记。

反动派把丹尼斯关在监狱里好几年。他得了重病以后才把他释放出来。美国的菲米斯对他 是残酷无情的，因为他一向是为劳动人民的事业而斗争的坚强战士的典范。虽然重病在身，他仍深信他一生所捍卫的事业是正义的。

那时，1960年下半年，如同往常这个季节一样，纽约的秋天热得烤人。我们的交谈是在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住地进

行的，我们来参加联合国大会例会就住在这里。

丹尼斯准确地评述了国内外局势和美国的对外政策。那些年代非同一般，正在进行“冷战”，美国对越南的侵略也开始了，这一侵略发展成了“热”战、真正的战争。

我一边看着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一边想：“他是美国人民的英雄、争取美国人民自由的战士，应该为他塑一尊铜像，使他流芳百世。”

我们分手时都希望下一年再见面，但未能如愿以偿。疾病夺去了他的生命，尤金·丹尼斯逝世了。

格斯·霍尔成了尤金·丹尼斯当之无愧的继任者。他俩有许多共同之处。象丹尼斯一样，霍尔也是在1927年加入共产党的。这就是说，到了1987年，霍尔加入自己亲爱的党以后，已经走过了60年的光辉历程。也象丹尼斯一样，霍尔遭受过迫害、在监狱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

他从1944年起成为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委员，1949年起是全国委员会书记，而从1959年起任美国共产党总书记。作为一个智慧超群的人，作为一个爱国者和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他在美国共产党人中享有应有的威望。

我不止一次地会见过格斯·霍尔，并同他谈过话。在美国，当我去参加联合国大会例会的时候，以及在莫斯科，当他作为来宾出席我党代表大会的时候，我们都见过面，进行过友好的谈话。

为和平而斗争是格斯·霍尔的信念。他在1986年8月所做的声明是众所周知的。他指出，苏联果敢而坚定的行动（第四次延长暂停所有核爆炸）得到了美国各阶层人民的深刻理解，使他们产生了希望。

美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人指出：

“苏联领导在行动上如此明确地表现出来的对国际事务的新思维将日益深入人心，尽管美国某些集团进行抵制。因为未来属于新思维。这一新思维将使人类摆脱核毁灭的威胁。”

普通的美国人是什么样的？

有时随便地谈起美国，曾经与我共事和现在同我一起工作的同志经常问我：

“美国人是怎样的人呢？”

这个问题的产生并不是因为提出问题的那些人幼稚。绝非如此。

我自己也多次向自己提出类似的问题：

“我是否真正了解美国人？”

为了执行党和政府的委托，我在美国度过的时间，如果把历次任期都加起来，总共有8年多。这还不算为期一、两周的所谓的临时出差。

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的答复并说我很了解普通的美国人，那是在撒谎。但是，谈谈这个国家的许多人，或者说大多数人的某些共同特性、习俗和生活观还是可以的。可以谈的只能是这些。

甚至美国一些著名作家也指出，美国人千差万别，习俗也各不相同。诚然，艺术家的才能使他们可以突出地描绘出作品主人公最常见的性格特征和心灵特性。但是，对于某些东西，外国人甚至可能看得比那些有才华的美国作家本人更

清楚。

例如，我很敬佩伊·伊利夫、叶·彼得罗夫、米·斯图鲁阿、尼·卡列夫、鲍·斯特列利尼科夫、斯·孔德拉绍夫、瓦·佐林以及作家记者亨·博罗维克和其他苏联作家和记者，他们在作品中对美国人做了一针见血的评价。虽然这些书出版已经有些年头了，但作者在美国旅行时所看到的、所描述的许多现象，今天在美国生活中仍然继续存在。另一方面，这些有才华的文学家可能对许多东西当时没有注意到，而现在，在最近5—10年里，他们过去没有注意到的东西已成了当代美国的特征。

我国有一些深入地研究美国的科研中心。在这些单位中，我想首先指出苏联科学院的两个研究所。其中一个 是叶·马·普里马科夫院士领导的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另一个是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多年来，格·阿·阿尔巴托夫院士一直是该所所长。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 国外，人们都很熟悉他们的名字。这两位著名的、功勋卓著的学者的书，他们在报刊发表的文章和在电视发表的讲话是大家都熟知的。在自己的著作中，他们对美国人和整个美国所做的评价是多么中肯、多么深刻啊！

许多东西取决于是谁在观察美国和美国人的生活。一个记者描绘这种生活，并想以生动的形式向人们表达自己的印象和评价，这是一回事。

当一个仔细观察这个国家的人透过政治棱镜进行分析，从而得出对该国的印象，并力求从眼前发生的无数事件和事实中寻找出某些人群最显著的特征（这些特征可以概括为，甚至可以称之为民族特征），这又是另一回事。这种人的观

察面要窄些。但是，他有可能对某些东西给予更多的注意，并且在其他方面与别人相同的条件下有可能对一些现象（已成为这一幅员辽阔、情况复杂的国度的人民生活不可分割一部分的现象）作出有充分根据的评价。

在此，我首先想提请手头有这本书的读者注意些什么呢？

美国公众掌握信息的水平要比欧洲低。这是我确信无疑的。这里有许多原因。但统治阶级在手中控制着新闻媒介，向人民散布不客观的消息，特别是有关对外政策方面的报道，这个原因并非不重要。

当然，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还有在其他国家，也有这种现象。但在散布不真实的消息，特别是关于苏联和苏联人民生活的不真实的消息方面，美国一直是遥遥领先，首屈一指的。

再谈一谈美国人的另一个典型特征。美国流行这样一句话：

“您看上去象100万美元。”

当人们想讨某个人的欢心，说他气色很好时，就习惯讲上面那句话。在别的国家，甚至在资本主义国家，谁如果说“您看上去象100万美元”，谁就会成为被取笑的对象。人家至少会反问一句：

“您这是什么意思？”

但在美国一切都很清楚。美元的多寡——这好象是一个人的名片。美元是一个尺度，一个标准，以此来衡量一个公民在社会中的地位。

我见过不少美国人。他们谈到自己的熟人、亲戚、甚至亲属时，总要说说他们在生活中的成就。而一提成就，就讲

他或她积攒了一大笔已经可以“生财”的资金。

生意兴隆，这在美国总是作为一种赞扬的言词。

一般地说，没有人会提这样的问题：

“这笔钱究竟是怎样得来的？从哪里弄来的？”

苏联人不能理解，怎么可以“为了挣钱而挣钱”。同样，美国人也根本无法理解，资本（钱或企业、商店或银行）之所以能给有产者带来收入，只是因为其他人受到剥削。与此同时，失业、种族压迫和种族歧视到处盛行，几百万人无家可归，文盲比比皆是。

普通的美国人对所有这些现象都看得见。但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手段来使人们的视线模糊不清、歪曲他们对这些现象采取人们正常的态度。而国家机构，包括警察机构时刻准备镇压想要有效地维护人权的那些人。

当然，在美国也有一些人公开地、英勇地进行斗争，以争取全体公民不分种族和民族都一律平等。他们不崇拜万能的美元并准备继续斗争下去。

过去，自由战士试图在美国寻求避难所来摆脱欧洲国家君主的专横和压迫。林肯的名字在美国尚未完全黯然失色的时候发生过这样的事。

不，今天不是自由战士要在新大陆寻求避难所。寻求避难所的是那些想离美元先生更近一些、那些指望借助于美元来反对自由的人。

那么，从人性的观点来看，怎样评价美国城镇居民群众对苏联人的态度呢？应该说，美国人与其他国家人民，包括欧洲各国人民没有丝毫不同。他们谦恭有礼，想更多了解苏联。这是不足为奇的。他们对苏联的了解常常是肤浅的。但

是，这是那些不向美国人民真实地介绍苏联人民生活情况的人的过错。这一过错首先应归咎于那些官方集团，因为他们蓄意使人民迷惑不解，他们向本国人民隐瞒我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和苏联热爱和平的政策这一事实真相。

毫无疑问，美国没有遭受战火的洗劫，这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所以，许多美国人对争取和平的心情并不象遭受过世界性大屠杀灾难的国家那样迫切。而这些国家强烈要求进行这一斗争并为此采取各种行动。

应该说，在美国期间，不论是我本人和我的家庭成员，还是使馆的工作人员，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没有受到过侮辱，对我们从来都没有表现出不礼貌的行为。相反，当美国人知道他们是在同苏联人打交道时，我们总是受到殷勤的接待。

曾发生过一些悲惨的事件，不过那是吸毒者和武器不离手的强盗的牺牲品，而吸毒者和强盗是不管你是什么人的。

当然，在这里我们对美国的某些集团在敌视苏联的口号下有时组织的一些游行可以置之不理。因为第一，他们是一小撮人。第二，游行是由一伙疯狂保卫五角大楼军国主义纲领的人组织起来的。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伙人游行之后，个别人告诉苏联人说，他们因干“这种事”可以得到一定的报酬，钱是按小时算的，并希望对这些闹剧不要看得太重。

曾发生过这样一些事情。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前来美国的苏联演员也遇到过一些不能允许的粗暴举动。后来查明，这种事每次都是由地方当局及其下属策划的。

普通的美国人总是怀着很大的兴趣接待苏联人。不仅对官方人士是这样，而且对其他人员，比如社会团体的代表、演员、学者、旅游者也是这样。例如，在战争期间，无论在

城市、农村，还是在国际会议上，人们都是满腔热情地欢迎我们苏联人。苏联人民当时手拿武器反对共同的敌人，所以听众对以苏联人民的名义讲的每句话都报以热烈的掌声。

举一个例子。女神枪手、夏伯扬师的上士柳德米拉·帕夫利琴科曾在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中消灭了300多个法西斯刽子手，其中35个是德军特等射手。她的声望战时在整个前线曾轰动一时，她的功绩在后方也是为众人所知。正因为这样，她被授予苏联英雄的称号。上前线时，她是基辅大学历史系毕业班学生。她于1942年作为小型的大学生代表团成员来到美国。然而，所有美国报纸，好象没有发现别人，只报道她一个人。而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下就赢得了千百万人的心。她的勇敢和爱国主义精神，还有女性的魅力，使得美国人在几天之内都变成了她的崇拜者。成千上万的人，不论年轻的还是上了年纪的，都认为，同她握一下手，让她看自己一眼或她对他们表达的感情能报以温柔的微笑，俄罗斯女人的微笑，就是一种幸福。

在她对美国听众发表演讲之前，我们代表里的一个人出来向大家宣布：

“现在，柳德米拉·帕夫利琴科将要发表讲话。她保卫敖德萨两个半月。她作为狙击排的成员掩护最后一个团撤离敖德萨。然后，她又到了塞瓦斯托波尔。在那里她参加了8个月的保卫战。她多次受伤和被震伤。现在她就在这里，就在你们面前。”

所有这一切全美国一下都知道了。

柳德米拉·帕夫利琴科使美国青年倾倒。作为青年一代的代表，她被一些学院和大学争先恐后地邀请去做客。这一

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事实上，这是战争年代第一个到美国去的苏联青年、大学生代表团。

埃莉奥诺拉·罗斯福夫人为柳德米拉·帕夫利琴科举行了专门的招待会，罗斯福总统亲自同这位苏联姑娘进行了交谈。

除去美国外，柳德米拉·帕夫利琴科还访问了加拿大和英国，到处都是一片热烈的喝彩声。

看到这一切，我们使馆的同志们都很高兴。美国人民对苏联人民怀着友好的感情，我们对这一点从未怀疑过。诚然，美国有人想在两国人民之间制造隔阂，进行欺骗宣传，故意歪曲苏联的真相。在那些日子里，他们没能得逞，我们都为苏联人在美国大地上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而感到极大的欣慰。

当然，帕夫利琴科是在一个特殊的时候到美国去的。当时，正在同残酷无情的强敌进行殊死的斗争。难道在那些日子里美苏人民表现出来的善意和友谊还没有反映出他们相互之间的真正感情和思想吗？

我承认，我对自己提出的问题所做的回答是简短的，甚至是太简短了。尽管如此，也许还是会有人认为这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

——第十六章——

不用大礼帽和 燕尾服也能办外交

两个世界——两种政策 他们的观点在客观上是不道德的 军人特别直率 麦克纳马拉修正自己的评价 政治中的钟摆 外交是什么？ 没有什么含混不清的东西 一整套手腕 专横外交与欺骗外交的典型 真理的力量 格奥尔吉·瓦西里耶维奇·契切林 李维诺夫和世界上第一位女大使柯伦泰 谈谈莫洛托夫 共同的立场——各国人民的利益 在国际会议上的做法 不容置疑的准则 文化水平与知识渊博的意义 在驻在国 怎样记住这一切？ 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 交际和交际能力 粗活和“少爷”

在我的整个外交生涯中，只有一次被迫穿上了燕尾服，更确切地说，穿上了一种带着所谓“剪掉后襟”的短燕尾服。就是这样，我穿上这身衣服，手里还拿着高筒大礼帽（当时我未敢把它戴在头上），坐进了一辆宽敞的轿式马车。马车的后脚登上毕恭毕敬地站着两个身穿镶着金边侍从服装和头戴大礼帽的随从人员。

几匹马似乎也听从礼宾仪式的安排，缓慢而庄严地拉着车沿着伦敦的大街奔跑。人行道上站着一群爱看热闹的人。不要说旅游者，即使对英国人，这幅情景也是够引人入胜的了。

我也觉得这番景象相当独出心裁。在苏联早已没有贵族和沙皇，我作为一个苏联公民第一次穿上这身不同寻常的衣服去见英国女王。

这样，按照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宫廷仪式，我来到了白金汉宫递交苏联特命全权大使的国书。

当时我想，十月革命后第一个驻英国大使是马·马·李维诺夫。他曾宣布自己为派驻到英国工人阶级那里的使节，并广为宣扬这种说法。这引起了列宁强烈的不赞成的反应，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纠正了李维诺夫的说法。

我还想，英国的这种礼宾仪式同我在美国向罗斯福总统递交国书时所了解到的礼仪截然不同。当时告诉我，应穿深色的工作服，总统也穿同样的衣服。究其原因，那还是在战争时期。

外交礼宾上的这些旧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1986年，苏联大使谢·卡·罗曼诺夫斯基也是坐上古老的轿式马车，由几匹大马拉着，在美丽的中世纪摩尔式骑兵队的护送下，行进在马德里的大街上，去向西班牙国王递交国书。

是的，我们应该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共处，不干涉他们的习惯做法，不把自己的外交礼仪规范和做法强加给它们。何况存在着传统的礼宾规范，同时，每个国家还有自己的、与国际上公认的做法不尽相同的规范。如果这种规范并不贬低我国或外交官本人的尊严，为什么不可以接受呢？我们很

快接受这种规范，也就表明我们是尊重驻在国的风俗习惯的。当苏联外交官穿燕尾服或戴高筒大礼帽时，也只能这样理解他。

尽管如此，但说实在话，外交既不需要高筒大礼帽，也不需要燕尾服，每个与外交工作有关的人都知道这一点。

我同外国国务和政治活动家的会晤证实了这一点。

两个世界——两种政策

现在世界上存在着两种社会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的对外政策，首先是苏联的对外政策与帝国主义的方针是相对立的。帝国主义的核心是经济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这个核心的基本力量则是美国。

不管什么时候，同资本主义世界，首先是北约国家的领导人物见面时，只要讨论到实质性问题，立刻就会发现观点分歧，而且常常产生直接的矛盾。问题提得越大、越尖锐，矛盾也就越突出。

如果拿战后时期，更确切地说，是拿罗斯福逝世以后的时期为例，那么，所有的美国总统都不能，也不想掩盖自己在外交事务中的基本目标。这些目标，除了极个别的例外，都不符合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与友谊的利益。至于在许多美国总统中持独特态度的罗斯福本人，他在自己的政策中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追求那些他后来的继任者也力图达到的目标，然而他认为，建立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有一个典型现象引人注目。这个现象使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和所有坚决谴责战争、捍卫和平事业的人感到困惑不解。

这个现象就是美国总统、英国首相和联邦德国总理以及帝国主义阵营和倾向这一阵营国家的任何一个其他活动家都同意不能让战争发生。不仅如此，这种活动家还准备无休止地重复这些说法，甚至对着圣经发誓，他真是这样想的，没有别的想法。

但是，当这样的活动家在谈话中开始阐述本国在国际舞台上所采取的政策实质和具体步骤时，从他的说法和解释中总可以看出这样一点（虽然从字面上看不一定如此）：凡是损害社会主义的东西都是好的；凡是符合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合法要求的都是不好的，对那些即使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谴责帝国主义政策的国家也是如此。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或外交部门中担任官职的人当中，也有人在言谈中甚至行动上能够表现出客观性和独立性，但这种人为数不多。

在这里，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从个人品质看，同我谈话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这种人是误入歧途、迷失方向、受骗上当，还是真的信仰他为之捍卫的社会价值呢？

也许，他只不过是骗子。他的国家的统治阶级、思想家、政治家制造骗局，用来掩盖他们的政治主张及反对和平事业的行径的真正实质，也用来掩盖他们的国际关系哲学观的真正实质。而上面提到的这种骗子所说的东西，只不过是为了更加掩人耳目，难道不是这样吗？

这些问题是不简单的，它们也多次出现在我本人面前。

但是，只要对这些现象，包括对属于国际关系范畴的现象进行科学分析，回答这些问题是完全可能的。

那么，这些活动家究竟是些什么人呢？当然，他们当中不少是“演员”，换句话说，这种人懂得，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宣扬“威胁”来自苏联和社会主义，以此欺骗和吓唬社会舆论。但是，如果说，维护北约军国主义政策或默默纵容这种政策的人统统如此，那就未免太简单化了。

他们的观点在客观上是不道德的

同帝国主义国家外交政策有关的大多数活动家主观上都相信，他们是为社会利益这一正义事业服务的。这些政治家作为资产阶级本阶级的代表，千方百计地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社会和经济特权。他们认为，为此目的可以采用一切手段。谎言可以冒充真理。在国际事务中，暴力和专横被宣布为道德的最高标准。为实行国家恐怖主义政策可以进行辩护，说什么这符合美国及其盟国的切身利益。

这些人可以喋喋不休地论证这种政策和道德是如何合理，但当别人对国际生活中的某些现象作出有根据和客观的评价并提出论据时，这些人就装聋作哑了。这些人虽然不接受类似的评价，但当介绍到一些具体事实时，还能耐心听取，尽管这些事实把他们整个外交政策的概念驳得体无完肤。

但是，这里没有任何值得奇怪之处。因为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为了阻挠各国人民在这方面作出正确的结论，只好掩盖其政策的本质。

这种思维和活动方式是否可能有例外呢？在一定条件下，

这是可能的。一般来说，当有关国家的社会舆论能够确信，迫切需要在谈判桌旁，通过和平途径解决某些国际问题和国家之间冲突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例外情况。

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60年代和70年代才有可能达成一系列重大国际协议。

可是刚一进入80年代，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就奉行旨在打破世界上业已形成的军事战略平衡和争取军事优势的方针，并设法阻碍或破坏就限制军备竞赛的一些极其重要问题进行谈判。从种种迹象看，直至目前为止，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在其政策中还不打算采取建设性态度，以促进解决诸如宇宙空间非军事化、削减以至最终全面消除核武器等当代的迫切问题。

显而易见，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的帝国主义世界的活动家在加紧军备竞赛，从而增加了核浩劫的危险性，这些做法在客观上同人类的意愿背道而驰。从这方面的意义来说，他们的计划和观点是不道德的。

军人特别直率

在国际会议上和小范围会谈中，我曾多次有机会会见帝国主义国家的军方人士。大概因为职务关系，我会见的多半是美国军人。

对这些军方人士能说些什么呢？我所做的上述评价基本上也适用于他们。然而，同他们的文官同事们相比，军方人士通常更为直率。他们不喜欢详细分析某些国际事件的起因，甚至连与军备竞赛和裁军有关的事实也不愿认真进行分析，

尽管这些问题同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是直接相关的。

但是，近来一些高级军事活动家（主要是美国的）变得特别爱说话。他们的官衔越高，话也就越多，并且还是公开讲；不仅谈军事问题，而且也谈对外政策问题。谁也没有象罗斯福时期所做的那样，让军人们安分守己。原因是美国领导人在积极利用五角大楼的欲望为其推行军国主义方针所需的一笔又一笔亿万拨款进行辩护。

与此同时，不能忽略这样的事实，关于军事预算的决定通常是由立法机关作出的，而立法机关当今在确定一个国家对外方针政策方面所起的作用并非是无足轻重的。这些立法机关不仅能够间接地，而且也能够直接地影响军备竞赛的进程。既然它们通过的法律能影响这种进程，所以立法机关负有相当大的责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军方人士同样也竭尽全力施加影响，以便通过这类法律。美国军方人士干得格外卖力气。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今最广泛的社会各界人士，各国人民十分重视科学界对军备竞赛会带来危险后果作出的权威性意见。

世界上绝大多数学者，其中包括美国学者，已经得出一个明确无疑的结论：在当前情况下，核军备的扩张有增无已，宇宙军事化的冒险性计划又出笼问世，这样，人类必须作出生命攸关的抉择：要么继续走向灭亡的边缘，要么制止军备竞赛并开始进行裁军，直至实现全面和彻底裁军。

苏联学者早就发出有力而权威性的呼吁，号召所有科学家运用自己的影响来维护和平和保护地球上的生命。西方和东方的进步学者都支持这一呼声。这一呼声同天才的爱因斯

坦的声音是遥相呼应的，而爱因斯坦的声音曾广泛地传达到每一个有觉悟的人的耳边。他当时说过：

“随着原子弹的出现，世界便不再是原先那样了，人们应该为自己消除致命的威胁。”

苏联代表同外国科学家会晤时，事实上总是可以在宇宙空间非军事化、裁减核军备和裁军等方面取得相当程度的相互理解。我个人的经验也证实了这一点。我曾见到过一些多少有点名气的学者，其中包括资本主义世界的学者，没有一个人不赞成这一点。对上述问题进行各种形式的自由讨论时，一切正直的科学家在思想和感情上都是完全拥护和平政策的。

当然，也有这样一些学者，他们把自己同军国主义方针政策拴在一起并为其效劳。但是，他们举不出任何社会原因或其他理由来为自己辩解，说明他们不愿投身于世界各地所进行的反对威胁人类的可怕危险的斗争是正确的。

麦克纳马拉修正自己的评价

让我们来看看同帝国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有关的任何一个社会集团的人士，包括直接参与制定和执行政策的人士。在他们中间，向来总有这样一个阶层，由于种种原因，既不能把他们完全看作是拥护谋取军事优势、排斥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合法利益的人，也不能把他们完全看作是反对上述方针、赞成裁军和主张两大对立体系国家应当实行和平共处的人。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情况，那往往就很难找到一条杠杠，区分出谁是前者，谁是后者。

经常有这样的事，一位大资本企业的典型代表，军事工业集团的代理人同苏联或其他拥护和平的国家的代表会见时，他开始思索，如果军备竞赛不停止，如果这种竞赛发展到太空，那么，事态究竟还会发展到何种地步呢？这类活动家绝对不是个别的。他们的思索和踌躇反映了某种忧虑，甚至那些积极主张扩大军事武库的人中间时而也会流露出这种忧虑。

统治阶级中的一些著名代表人物过去公开而顽固地敌视社会主义与和平事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连这些人现在也朝着积极的方向修正自己的立场。在这方面，可以举出不少例子。

第一个例子。通过同本人交谈等方式，我很了解先后担任过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国防部长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1967年举行了一次会晤，苏联方面参加的有阿·尼·柯西金和我，而美国方面参加的有约翰逊、腊斯克和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当时，正是这位国防部长态度最强硬。他根本不愿听人谈美国应该停止侵略越南，不过，当时华盛顿的所有领导人都支持他并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穷兵黩武的立场。

可是，近几年来，随着世界局势的急剧恶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去的一些事件，包括越南战争的起因和性质都已真相大白，麦克纳马拉作为学者和政治家也出来谴责那个旨在不惜任何代价对苏联谋取军事优势并使国际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的方针。这位前部长也开始对美国的全部政策从整体上作出另外一种评价。这样，他现在的观点同他过去在美国政府里身居要职时所持的观点就不同了。

报界人士向麦克纳马拉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你以前维护这种政策，而现在却谴责它，这是怎么回事？”

他要回答这个问题可并不容易。但他做得还是不错。他坦率地承认说，根据他自己的切身经验他改变了自己的评价和观点。

麦克纳马拉声称：

“有些人不愿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我同他们不一样，我从这些错误中为自己吸取了教训，并相应地改变了自己对这些或另一些问题的看法。”

当然，这位前部长要对美帝国主义对越南人民所犯下的罪行承担很大部分责任。但是，他能有足够的勇气承认当时的行动是错误的，并批评里根政府的对外政策，这一点还是好的。

第二个例子。国务卿腊斯克对当年美国在印支各国人民面前犯下侵略罪行时期所推行的政策同样负有责任。我同他也曾有过多次会晤。在这些会晤中，他顽固地维护这种政策，其中包括对老挝和柬埔寨奉行的政策。

如今，腊斯克发表的言论比较清醒，并表示不同意政府在对外政策的某些问题上所持的极端观点。

在这里，我要指出的是，麦克纳马拉和腊斯克这两位活动家都是不同寻常的人物。倘若把自己的才能、政治经验和声望都拿来支持和平事业，他们就可以为美国人民作出不少有益的贡献。

应该说，哈罗德·布朗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他曾在卡特政府中担任国防部长。

美国军事实力日益得到加强，这十分合乎布朗和这位活

动家为之服务的那个集团的心意。布朗也出席了1979年在维也纳举行的苏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庄严签字仪式。但是，美国国会一直不批准这个条约，布朗在这方面是出了力气的。

可是，在后来布朗辞去部长职务后，他的观点发生了一些积极变化。例如，里根政府曾虚假地断言，苏联似乎在军事方面已超过美国，因此美国必须千方百计地扩充军备。特别是核军备，布朗却批评了这种观点。

政治中的钟摆

当形势要求一些政党对是否应继续军备竞赛问题作出“赞成”或“反对”的明确回答时，这些政党有时也会表现出犹豫不决。英国工党的立场就是例证。仅仅几年以前这个党执政时，同意在西欧，包括在英国本土部署美国新式核导弹。但是，保守党在大选获胜并建立了以玛格丽特·撒切尔为首政府以后，该党采取核“扩充”的公开方针以后，工党开始愈来愈认识到在欧洲限制核武器和彻底裁减这类军备的重要意义。

其次，众所周知，第一个请求华盛顿在西欧增加部署美国核导弹数量的人，就是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执政党掌权的领导人之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施密特。他毋须苦苦哀求就说服了美国领导人采取上述步骤，结果却使得欧洲和全世界政治气候骤然变冷。只是在后来，社会民主党及其领导人转到在野党地位后，他们才采取了较为负责任的立场，赞成停止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其他西欧国家领土上进一步

部署美国核武器，并主张寻求降低欧洲军事对抗水平的途径。

上述事实说明了什么呢？这些事实说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在自己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正在经历一个可以比作钟摆的过程。社会中的各种上层人物，包括那些对制定本国对外政策能够施加影响，或者甚至包括那些参与执行政策的人士，也摆脱不了这一过程。

这件事本身就使人有足够的理由来调动一切因素，以阐明苏联政策的正确性，以表明社会主义国家一贯坚定地为世界和平而斗争。爱好和平国家的潜力是巨大的。

由此可见，如果在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统治集团代表人物的交往中存在着可以取得积极成果的潜力的话，那么，对这些国家的其他社会阶层施加相应影响的可能性就更广泛了。

当然，谁也没有断定过，而且不可能断定，一个人对某个问题的疑惑什么时候才能发展为犹豫不决，犹豫不决什么时候才能转变成信念，而信念什么时候才能变为实际行动。但是，如果从广义的角度来看，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国际风云变幻无常，各种倾向正在进行争斗，但真理归根到底会占上风。此外，过去的惨剧，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人们学会了许多东西。

评价当今世界社会舆论占主导的倾向时，可以正确无误地说，这种倾向是赞成裁减并最终消灭核武器，实现宇宙空间非军事化。这种倾向是赞成裁军和可靠地保障国际安全。鉴于核冲突的后果远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所以防止这种冲突是整个人类朝夕思慕的愿望。

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存在的本身及其为和平与消除战争

威胁进行的积极斗争，共产党和工人党等兄弟党的活动，民族解放斗争的力量，群众性的民主运动，各国人民对和平生活的渴望，所有这一切都对世界局势产生强有力的影响，这也是和平与进步的潜在力量。资本主义国家，其中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统治集团不能对此漠然置之。这个因素始终是我们的同盟者，在各个级别的苏联代表和资本主义世界人士谈话时，它始终无形地伴随着他们。

外交是什么？

很多交谈者都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您对外交怎样看？外交是什么？”

在这些人当中，有的级别比较高，经验比较丰富，他们自己大概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虽然我相信，答案会是各不相同的。

外交官，尤其是那些刚刚从事外交工作的人，可能也想听到对此所做的说明。他们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常常会遇到一些微妙的情况，需要寻找和找到某种解决办法。他们真心实意想知道，外交官在各种不同场合应该如何表现。顺便说一下，这里说的不仅指外国的外交官，而且也指我们苏联的外交官。

我要说明一下，我并不认为，我说的一切就是最后的真理。

在不少的书籍、文章、词典的解释中已给“外交”一词下了定义。这些作者往往极其肯定地把外交官分为好、中、差三类。他们有时还提供某种类似数学课本中公式那样的东

西，让刚入门的学生熟读背诵，以便掌握这门学问的初步知识。

在这种情况下，有理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你知道不知道，就连最高级的厨师也不可能做出一模一样的两盘菜吗？”

这位厨师早先做的那盘菜同他后来做的菜总是不会完全一样的。在音乐、绘画、演讲以及涉及人类创作活动的各个领域，难道不都是这样的吗？

把外交官复杂而多方面的活动统统塞进一个类似数学公式的那种模式，即使这样做是出于好意，也只能解释为对下定义的某种荒诞的偏爱。这样做往往没有多少用处。

可以写一本很有趣的书，把一些聪明的外交官和一些不怎么聪明的外交官都介绍一番，有些人物可能纯属虚构，有些人物甚至也许是真人真事。这样，一些人物可以得到读者的赞赏，而另一些人物则受到读者的嘲笑。人们都喜欢阅读充满幽默的作品。

但是，所有这一切还不是科学。其实，对外交活动就象对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事物一样，也需进行科学的思索。只是应该弄清楚现象的因果关系、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我们现在谈的是外交活动，就应该研究外交和对外政策的辩证关系。

每个国家都为自己的外交规定目标和任务，而外交是一个国家为了在国际事务中实现其总方针而采取的各种措施以及形式、手段和方法的总和。对外政策占首要地位，而外交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外政策和外交是互不可分的。二者处于不可分割的统

一体中，组成一个整体。但这种关系并不象是把一种较小的容器放进一个较大的容器那样的关系，而是一种有机的、相互渗透的关系。

搞外交的人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对于某个事实，对于某次谈话和会议，说不准究竟是政策的成分居多呢，还是外交的成分居多。在这种场合下，可以说，首先这是一些对外政策的事件。这种说法恐怕比较正确。

有人会问，在这种情况下把外交官摆在什么地方？只要有执行对外政策的地方，他们，这些外交官就会出现。现在是这样，将来也会如此。不应该把外交官的职责仅仅看作是进行某些礼仪、礼节活动。礼仪、礼节活动只不过是外交的一个组成部分。既然如此，事情就容易弄明白了。

没有什么含混不清的东西

人们在交谈中，往往把外交的概念弄得极其含混不清。其实，在外交中并没有什么含混不清的东西。

从社会分为阶级的时候起，就没有，也不可能有超阶级的对外政策。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共存的当今世界中，对外政策同样具有阶级性。从外交的内容和针对性来看，这种阶级性也表现在外交上。

由于各国的对外政策是有阶级性的，一些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例如分属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华约和北约国家的活动就截然不同。一个国家集团执行和平和裁军的政策，另一个集团则执行准备战争和军备竞赛的政策，尽管这一方针同各国人民的愿望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北约国家的外交与其政策相一致，是完全服从于资产阶级中反动派的阶级利益的典型。资产阶级中的这一部分人把外交看成是维护他们在国际上的阵地、反对世界社会主义、反对各国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工具。

这并不是说，各国在执行其对外政策而同他国接触时，不可能有公认的规范和准则，特别是在外交领域。这些公认的规范和准则是有的，而且也应该有，因为这对相互都有利。而且，为了开好国际性会议，也需要有一个协商一致的、相互可以接受的交往规则。

在完成自己使命的同时，资产阶级外交广泛利用从大量丰富的习俗和传统、规范和方法中得到的经验和手段，而这些习俗、传统、规范、方法是各国人民在相互交往中、各国在对外活动中世代代形成和积累下来的。

弗·伊·列宁指出，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应该在政治的各个领域（包括外交）中，熟知其敌人采用的方法，而且绝不比后者差。当然，资产阶级外交中一些根深蒂固的欺骗手法、讹诈手段、强权政治等对社会主义外交实践来说是不能适用的，因为这涉及原则和道德问题。但是，懂得和考虑到这些方法是资产阶级的外交武器是完全必要的，这样就可以及时弄清和揭露与和平格格不入的计划和手腕，并给予有效的回击。

关于资产阶级国家对外政策的目标，官方宣传的是一套，而实际做的又是另一套，这两者之间的尖锐矛盾也正好鲜明地反映出这些国家外交所固有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但是，侵略性的方针和真理在国际生活中从来就没有调和的余地，在拿破仑时期是这样，在希特勒时期也是这样。就是在今天，真理也不是鼓吹军国主义政策的同盟者。

然而，帝国主义目前的对外政策和外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企求用虚伪的宣传来掩饰其真实意图，并把西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所采取的行动的真实用意隐藏起来。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西方国家的政策同社会主义国家爱好和平的政策，帝国主义的军国主义方针同各国人民向往和平的愿望之间有天渊之别。

一 整套手腕

资本主义大国有一整套对别国施加影响的手腕，其中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和宣传手腕。随着军事侵略集团和各种联盟的建立，施加影响的办法也就越来越多。

众所周知，华盛顿有时肆无忌惮地向自己的盟友施加压力，要它们毫无怨言地屈从于它的政策。施加压力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

突出的例子是，在欧洲部署美国中程核导弹的问题上，可以经常听到对比利时、荷兰和其他一些西欧国家连续不断的呵叱。

施加政治压力是常有的事。总统、总理和部长们出访各国，不管有没有得到邀请。他们有时大概还来不及打开行李，就只得赶路去进行一次新的出访了。为了在公众舆论面前把施加压力的政策伪装起来，在所有这些访问、会晤过程中，就发表大量声明、答记者问、报告，但在这里往往看不到介绍真实情况的消息，而虚假的东西却连篇累牍。越是高级的访问，有关访问的目的和意义的真实报道就越少，这已成为一种惯例。

北约集团各机构召开的会议，体现了蒙蔽公众舆论的政策，也体现了对那些不顺服的人或者只不过对华盛顿执行的军备竞赛方针的某些方面有所怀疑的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政策。

有许许多多呼吁书、信件不断从白宫、国务院飞往北约国家的首都，为的是再次催促盟国接受敌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又一项决议和又一次行动。

经济压力是一种惯用的老手法。帝国主义大国通过经济和贸易渠道向许多其他国家施加压力，这种情况在现代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屡见不鲜。当然，在这方面美国起着主导的作用。经常利用贷款、直接投资、所谓的无偿援助和各种馈赠来为大资本服务。迫使他国在经济上处于从属地位，在别国领土上建立越来越多的军事基地，这就是美国利用这些手腕所追求的主要目标。

政治和经济压力的手腕正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几十个国家不停地产生作用，只是在这些地区采用这种做法的形式更为粗暴。而且，除了政治、经济压力之外又加上了军事压力，直至使用武力。

帝国主义的基本理论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如果美国的“切身利益”受到损害、尤其是处境危险的话，美国就可以为所欲为。至于其利益是否受到损害，则只能由华盛顿自己来做判断。这种论调最赤裸裸地暴露出美国垄断资本的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特征。

专横外交与欺骗外交的典型

美国对黎巴嫩所采取的行动是这种专横政策的突出例

子。一个大国向一个阿拉伯小国诉诸武力。美国海军舰队的远程大炮不仅猛烈地轰击了黎巴嫩的城市，而且还猛烈地摧毁了一些人对美国及其“和平”的近东政策所抱有的一点点信念。

全世界都把这一行动称为国际海盗行径。说什么出现了来自黎巴嫩的某种威胁，威胁着美国战略盟友以色列这种虚幻的借口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正是以色列发动了对黎巴嫩的侵略并占领了它的部分领土。其实事情要简单得多：在黎巴嫩，一个较小的侵略者同强大的侵略者联合在一起了。

美国历史上这不光彩的一页，黎巴嫩人民不会忘记，全世界也不会忘记。人们同样也不会忘记1986年4月美国对黎巴嫩的侵略罪行。

在这方面，华盛顿通过外交部门所干的一切都是为上述政策服务的。这些不请自来的美国特使扮演着为侵略进行辩护的可耻角色，他们实际上并没有离开近东地区。这是专横外交、欺骗外交的一个例子。

美国对格林纳达的侵略和占领行为引起了全世界不可遏止的愤怒。格林纳达成为华盛顿推行国家恐怖主义政策的牺牲品。这个国家的独立受到美国士兵铁蹄的践踏，因而被一笔勾销。任何一个头脑健全的人，不论他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不管其意识形态如何，只要他哪怕还有一点良心和正义感，都不可能不谴责这一行径。

无论华盛顿采取什么外交行动，无论它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一些国家利用傀儡政权玩弄什么把戏，都洗刷不掉由于侵略格林纳达而使美国国旗沾上耻辱的污点。

几年来，美国对尼加拉瓜这个独立的国家一直示威性地

大搞阴谋诡计。它对个国家所采取的政治方针和外交行动一年比一年强硬。华盛顿甚至竟然宣布，消灭尼加拉瓜现存的社会制度是美国政策的一项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又抛出了美国“切身利益”的说法，抛出那些荒诞的论点，似乎苏联想在加勒比海地区赖着不走，从而形成对美国的直接威胁。戈培尔提出过这样一条法西斯宣传的信条：“谎言说的越多，使人相信的机会也就越多。”上述种种说法显然是戈培尔信条的翻版。大概有人已经忘记，纳粹宣传家（他们也是杀人犯），同整个罪恶的法西斯奸党早已腐烂消灭了。请问：

“难道还值得仿效他们歪曲真相、欺骗人民的哲学吗？”

对于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上述行径，美国的外交做了些什么呢？它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施加压力、进行欺骗、收买、造假情报、讹诈，在必要时还说些甜言蜜语，以期找到更多的同谋者和叛徒，从而积极配合华盛顿推行其政策。

有关国家不道德的政策也给它们自己的外交活动涂上了同样的色彩。假设这种国家的某一位外交官想显示正派，假设他想怀疑美国在尼加拉瓜、格林纳达、黎巴嫩、波斯湾地区或者在核武器问题上所采取的行动是否正确，那么，他恐怕没来得及收拾行装就会立即被打发回家，而且，他的仕途生涯也就完蛋了。

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几百年来一直在严格训练他们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外交部门的工作人员。他们把外交变为一种如同马基雅弗利^①所说的“用语言掩盖

^① 意大利政治思想家。他认为，为了国家的巩固可不择手段，抛弃道德和法律准则。——原编者

事实真相”的艺术，把外交官变成了为他们的狭隘利益申辩的维护者，为剥削制度及其军国主义和崇尚暴力的对外政策服务的工具。

统治集团把千百万巨资花在专横外交与欺骗外交上，因而几万名美国外交官和冒充外交官的其他部门工作人员，还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成千上万的外交代表目前就得卖力地干，其中有些人是出于畏惧心理和逢迎拍马，另外有一些人则出于信念。这里还应加上在世界各地乱窜的几十万名领取和不领取薪金的特工人员。他们信奉的只有一种宗教——大发横财、人剥削人，并且根据这种信念采取相应的行动。这样，我们就可以大体上想象到，帝国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之间在对外政策和外交方面进行的斗争规模有多大。这种斗争有时是无形的，但它延续不断并极其激烈地进行着。

美国的外交部门，如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部门一样，采取一切手段来设法迫使这个或那个国家听命就范，设法阻挠正在世界范围内日益赢得千百万人民之心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深入和广泛传播。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是列宁的对外政策和外交的基础，任何手段也遏制不住它们。十月革命后，帝国主义列强对新生俄国发动了进攻，但在这些思想面前失败了。

现代资产阶级也阻挡不住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它同样也阻挡不了社会主义对外政策日益增长的吸引力，因为社会主义的对外政策符合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真理的力量

苏联对外政策之所以具有威力，是因为我国拥有的真理

比美国所依靠的一切军事基地或军队更具有说服力。为了使我们的思想能吸引广大的人民群众，无需依靠炫耀武力和组织武装干涉。

可以想象，苏联在联合国历次大会上所提出的建议（在许多情况下，是同其他兄弟国家共同提出的）包含着多么巨大的力量。这些建议得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在进行表决时，美国往往陷入极其孤立的境地。况且这里所说的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都是一些与我国不同社会政治制度的国家。我们同他们相互接近并不是由于共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而是防止新的世界大战与维护世界人民之间的和平这一共同的切身利益。

当今，世界上积聚的核武库正对人类构成巨大威胁。鉴于国际局势的这一特点，社会主义国家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政策对其他国家就更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有些国家尽管在世界舞台上奉行着同我们截然对立的政策，但这些国家的人民却是我们爱好和平政策的潜在盟友。

许多国家支持冻结和禁止使用核武器、反对美国在西欧国家部署“潘兴”式导弹和巡航导弹、主张停止核试验的群众性社会运动难道不就反复证明了这一点吗？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运动和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政策，政治新思维才能取得胜利，而苏美签订消除中短程导弹条约就是这一胜利的体现。

社会主义的对外政策与外交在争取和平、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的斗争中起着多么巨大的作用。苏联外交拥有对世界局势施加有益影响的广泛可能性。苏联正在积极地利用这些可能性。

现在已经有了—些介绍苏联外交及其代表的著述，而近来这类文章更是大量涌现。所有这些著述大概可以分成两类。

第一类是资产阶级政治性文章及回忆录，它们对十月革命以来我国采取的外交行动及苏联社会主义外交界的某些代表作出评价。这些著述中大多数的观点是片面的，甚至是歪曲事实的。它们照例都是奉命之作，反映资产阶级集团代表人物的观点，只有一小部分是例外。

第二类是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著述。它们对我国的外交政策，其中包括对苏联外交官，作出了客观的评价。

需要指出的是，苏联外交界有许多在各个不同时期作出过贡献的人。他们曾为巩固年轻的苏维埃国家的国际地位、反对德国法西斯的侵略、为巩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领土政治现状而斗争，而在现阶段则为防止核灾难而斗争。对他们所作出的贡献应该给予应有的评价。

在讨论战争与和平问题时，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无数次地感受到，苏联代表提出的论据是多么有力量。然而，苏联外交官不只在意见分歧时是严肃认真的论敌，而且在谈到改善和发展国家之间友好关系时也同样是严肃认真的谈判对手。他们的经验、文化程度和气质各不相同，但都是党和人民的忠实代表。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他们都出色地担负着维护苏维埃国家对外政策的利益以及在国际上实现其崇高目标的任务，并一直在这一重要、光荣的岗位上辛勤工作。

当今这一代苏联外交官也同样在党和人民委托的责任重大的工作岗位上忘我地劳动。他们是列宁的和平外交的优良传统教育出来的一代。这是一代有高度文化修养、精通业务、对祖国极其忠诚的外交工作者。他们完全有能力积极参与解

决苏维埃国家对外政策所面临的复杂任务。

苏联外交官在履行人民交给他们的职责时，首先应当想到的是要怀着共产党员的满腔热情，为祖国造福，在争取和平、反对新的战争威胁的斗争中努力改进和磨练自己的政治手段和方法。

格奥尔吉·瓦西里耶维奇·契切林

我想着重介绍一下某些苏联外交家，因为他们当年在外交界都是些风云人物。

格奥尔吉·瓦西里耶维奇·契切林是苏联外交界的杰出人物。他经历了复杂的人生道路。契切林在沙皇时期曾任外交部职员，从1904年起开始参加革命运动，1917年底彻底站到布尔什维克一边。契切林因从事革命活动被英国当局关进监狱，1918年1月，苏维埃政府设法把他从英国监狱营救出来。

他原则性强、学识渊博，富有同情心，待人朴实。他的这些品质得到列宁的高度评价。在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的困难年代，列宁正是让他负责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的外交事务，这并不是偶然的。契切林没有辜负党的信任、列宁的信任，表现出是一位很有才干的外交家。

契切林可以说是列宁培养出来的真正的外交家，他同弗·伊·列宁一起工作过，一起讨论过有关问题，接受过列宁本人的指示。

我想介绍一下他非常繁忙紧张的外交活动中的一个片段。列宁被任命为参加1922年热那亚国际会议的苏联代表团团长。但是，革命领袖没能去意大利，因此，就让契切林担

任代表团的团长。契切林圆满地和卓有成效地完成了赋予他的使命。他智慧超群,知识渊博,同外国人打交道经验丰富,他出色地捍卫了年轻的苏维埃国家的利益。

1922年4月10日,契切林受列宁的委托,在热那亚会议上提出了主张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并进行经济合作的原则。这是苏维埃国家从颁布列宁的和平法令起就一直遵循的原则。而这一次,和平共处原则是在战后第一次召开的大型国际会议(我国和帝国主义列强同时都参加了这次会议)的讲坛上正式宣布的。

契切林在热那亚会议上说:

“俄国代表团坚持共产主义原则的观点,它认为,当今的历史时代已使旧的和新生的社会制度共处成为可能,因此,代表这两种所有制体系的国家之间进行经济合作对全面的经济复兴是绝对必要的。”

接着,契切林又强调指出:

“俄国政府认为,相互承认目前在各个不同的国家中所存在的各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和各种不同的政治及经济形式是非常重要的。”^①

苏联代表团不仅在热那亚会议上提出了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而且当时在同某一欧洲大国的实际中也运用了这一思想:会议期间,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德国在意大利一小城拉巴洛签订了条约。^②这一历史事件使这个小地方

^① 见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部热那亚会议资料(会议筹备、报告、委员会工作、外交上的往来公文等),莫斯科,1922年俄文版,第78页。

——原编者

^② 按条约规定,两国建立外交关系,通过放弃互相提出要求的方式解决所有的争议问题。——原编者

闻名于世。列宁把这个条约看成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相互关系整个体系的“唯一正确的出路”。

列宁当时就已经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这一原则同必须进行全面裁军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热那亚会议上，苏联代表团提出了关于全面削减军备的建议。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裁军建议。

谈到契切林的功绩时，不能不提到他在建立我国同邻国的友好关系方面所起的作用。在他任外交人民委员时，我国同土耳其、伊朗、阿富汗签订了条约。这位外交人民委员为这些条约的草拟和签署花了不少心血。

契切林不仅是作为一个卓越的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名垂史册，此外，他还致力于学术工作，经常发表政论性文章。他写了许多关于列宁的文章，热情地描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是如何领导苏维埃国家的对外政策的。

苏联外交官以及解释和普及苏联对外政策的宣传人员通过学习契切林的讲话、声明、书信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他不追求华丽的辞藻，对他来说主要的是思想、论据。表面上看似乎有点儿干巴巴的一篇发言稿，尽管用词不多，但却包含着明确的、而且表达得恰如其份的思想，包含着维护苏维埃国家爱好和平外交政策的雄辩论据。契切林的演说可以使读者在思想上得益非浅，在思考当今的国际局势及苏联坚定不移地奉行的和平共处政策时也可以得到启迪。

列宁逝世后，契切林继续担任了几年外交人民委员，他坚持列宁的对外政策原则及实行这些原则的方法。

契切林于1936年逝世。

李维诺夫和世界上第一位女大使柯伦泰

1930年，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真名为瓦拉赫·马克斯）接替契切林担任外交人民委员。

这一职务他一直担任到1939年莫洛托夫接替他为止，而李维诺夫于1941年12月被任命为驻美大使。

1942年6月，莫洛托夫在华盛顿访问期间，李维诺夫同莫洛托夫在汽车上的一次谈话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时我们三人乘车去阿巴拉契亚山，我在前面已经谈到过这一点。

他们谈的也是如何评价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和法国的政策。莫洛托夫抨击了英国与法国的政策，说实际上这两个国家怂恿希特勒发动对苏战争。换句话说，他发表的意见正是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当时所坚持并且不止一次地向全世界宣告的观点。

李维诺夫不同意对英法的政策做这种评价。

这一激烈的谈话实际上使他们回想起1939年李维诺夫被解除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职务的决定。

李维诺夫在谈话中为英法两国立场辩护的固执态度使我感到惊讶，因为早在希特勒进攻苏联、妄图把它置于死地之前，英法就拒绝同苏联一起对希特勒进行有力的还击。尽管李维诺夫由于采取错误的立场，特别是在如何评价英法两国政策上的错误，被解除了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在莫洛托夫面前，从而也就等于在斯大林面前继续有意强调自己的观点。

我们党、政府及全体苏联人民严厉谴责慕尼黑阴谋，这

一阴谋至今仍是国与国交往中背信弃义行为的象征，但当时，听李维诺夫那么一说，他连慕尼黑阴谋及其后果都觉察不出来，这岂不是咄咄怪事。

我不怀疑莫洛托夫回到莫斯科后向斯大林报告了车上辩论的情况。同样我也不怀疑，光凭这一件事，李维诺夫这位驻美大使的前途将会黯然失色了。

事情果真如此。

……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伦泰。只提到她的名字是远远不够的。她出生并受教育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革命浪潮激励她参加了俄国的政治生活。这位革命者的命运坎坷，但她仍毅然参加了为维护劳动人民利益的斗争。列宁也发现了她。因此，这一非凡的妇女便成了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的第一批成员，委托她负责社会问题的的工作。

但是，从1923年起至1952年为止的近30年的外交生涯使她更为出名。柯伦泰担任了许多责任重大的职务，其中包括苏联驻挪威、墨西哥大使、驻瑞典公使，后任大使。她能胜任所担负的工作并善于处理工作中所遇到的各种复杂问题。特别需要考虑到这样的一种实际情况：当时，并非所有国家都习惯于看到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个伟大的国家，另一个世界——社会主义的象征，但不管人们愿意与否，都得承认现实，正如承认在本国首都有一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使馆一样。后来，无论是王国，还是资产阶级共和国都已习惯于接受这个异乎寻常的概念。苏维埃国家的外交代表竟是一位妇女，而且还是列宁熟悉的活动家，这在某种程度上使人们对苏联使馆产生了特别的兴趣，缓和了人们对苏联使馆的态度，使柯伦泰得以同驻在国有影响的人士建立交往。

在谈判中，她能言善辩，可以用几种外语交谈，往往谈锋甚利，妙语惊人。

只是到了1949—1950年间，我才在莫斯科见到了她。那时她已经得病，害的是瘫疾病。她走动得靠轮椅。我们相互尊重，关系很好。对我这个比较年轻的人（那时我刚满40岁，难道不能这样说吗？）来说，她就是一部活生生的革命历史，与列宁有过交往，谈过话，有过书信来往的党的战士。仅这一点就能博得人们对她的尊敬。

当时，苏联外交部坐落在库兹涅茨大桥大街，与外国的交往还没有达到今天的规模，外交部的后勤供应同现在相比，那要简朴的多了。例如，甚至连大使们用车也保证不了。因此，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以老相识的身份直截了当地给当时任副外长的我打电话说：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我想到莫斯科近郊的外交部休养所去，能不能给我派辆车？”

“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看您说的，当然可以。派车到哪里去接您呢？我马上告诉司机。”

我总是尽可能帮助她。这种情况有过几次。

有一次，我们全家在她休养的另一疗养所内度假。在那里，同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进行了一次令我难忘的谈话。的确如此，当时她看上去已经十分虚弱，想当年她又是何等精力充沛，知识渊博，使得各国饱经世故的政治家和著名的国务活动家都为之惊叹不已。

我向她询问了有关墨西哥的情况。关于在墨西哥的工作情况，她只是简略地说了几句，看来，不仅是因为墨西哥同我国相隔万里，而且她那段工作也已是遥远的往事了。当她

谈到瑞典的情况时，话就多起来了，她毕竟在这个离我们不远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度过了外交生涯的最后15年。

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谈起瑞典时，略带几分幽默。

“您看，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她微笑着说，“在瑞典我曾一度被视为‘不受欢迎的人’，甚至不允许我在那儿居住。这件事发生在革命前，我党当时还处于地下状态，在一些欧洲国家的首都，人们就象怕火一样害怕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多年之后，苏联政府突然征求瑞典同意接收那个当年被瑞典人驱逐出斯德哥尔摩的柯伦泰赴瑞典出任公使。不知是他们没有记住我的姓名，还是没有搞清楚，把我当成了别的什么人物，要不就是他们完全清楚，只不过不愿为了我这个人而去搞坏同苏联的关系罢了。究竟如何，我就知道了。我想，很可能是后一种情况起了作用。总之，他们同意了，就这样我又来到了原来熟悉的斯德哥尔摩，并且不是作为普通人，而是作为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公使去的。当时驱逐我的是警察和地方暗探局的密探，现在接见我的却是国王本人、首相和外交部长，而且不是只见一次，而是见了多次。我在瑞典度过的岁月是我国最困难的时期，即整个战争时期。那时我得做很多工作，提醒地方当局，怎样才能真正保持中立，才能不受纳粹分子的挑拨，使得中立免遭破坏。而这种破坏中立的企图，甚至破坏中立的事件都发生过，而且还不止一次。在斯德哥尔摩时，我一刻都没有忘记，就在波罗的海的彼岸，我们的人正在前线流血牺牲……”

说到这里，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哭了。她坐在轮椅上，看上去已是一位上了年纪而身体虚弱的妇女了。我在她身旁，想安慰她几句。我刚才那么一问，却勾起她的这段

回忆，这消耗了她不少精力，又使她甚为悲伤。想到这里，我甚至感到有点儿后悔。

谈谈莫洛托夫

在苏联的对外政策和外交史上，维·米·莫洛托夫起了特殊的作用，恐怕没有人会对此提出异议。他曾任外交人民委员，后来从解除李维诺夫外交人民委员职务起到任命维辛斯基当外交部长以前，即从1939年至1949年期间，他出任苏联外交部长，然后，从1953年至1956年期间再次出任外交部长。与此同时，莫洛托夫于1930—1941年曾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而在1941—1957年间出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后称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斯大林时期，莫洛托夫实际上是党和国家的第二号人物。当然，苏联外交上的重大决策是由以斯大林为首的政治局确定的，而斯大林个人的意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在处理同其他国家关系中的具体问题时，许多事情取决于莫洛托夫。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大部分建议都出自于他和他所领导的外交部。战争时期也是如此，对当时的情况我是特别了解的，因为我国几乎所有重要的外交步骤都多少同美国这个盟国有关。

无论是战时还是战后，莫洛托夫都是斯大林在盟国会议上的左右手。他还代表苏联参加了当时举行的一系列外长会议。

应该公正地说，莫洛托夫对斯大林是有显著影响的。当然，我是从外交角度得出这一看法的。斯大林对他的态度不

稳定，这也确实如此。

为什么莫洛托夫有如此之高的地位呢？原因在于莫洛托夫是一位老革命家，他在国际舞台上维护苏维埃国家的利益。他是最先识破美英两国政策在具体目标上的利己主义的人物之一。这些目标就是：西方国家，首先是美国，要争夺统治世界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越是接近尾声，这一点也就暴露得越明显。莫洛托夫非常清楚，西方国家企图靠牺牲别国利益，首先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来建立它们的太平盛世。

美国、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都认为，莫洛托夫主张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强硬路线”。但在执行苏联政策时，他绝不会比党和党的中央委员会更强硬。

然而，客观上必须承认，维·米·莫洛托夫在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所起的作用到现在还没有彻底弄清楚。对此，还得要历史来做结论。

莫洛托夫才华横溢，酷爱工作，办事有板有眼，一丝不苟，连每天的日程也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有时他办事认真到了古怪的地步，过于拘泥细节。例如，为草拟一个文件而连续工作几小时之后，莫洛托夫会突然宣布：

“现在我到隔壁房间去休息30分钟。”说完就走了。正好30分钟之后，他又回来重新坐下来工作。说来也怪，他看上去比原来精神多了。

莫洛托夫有时也会忍不住大发脾气，对手下的人相当厉害。但大家一般都能理解，知道他这样做并非偶然，这种反常行为多少总有些原因，哪怕只是表面上的原因。

莫洛托夫还有一个毛病，当然只是在某种含义上才能这么说。在草拟文件时，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了表达某一思想，本来可以用点儿新词，换个新提法，但是，只要莫洛托夫觉得有点儿什么东西不怎么顺耳，而过去又没有用过，那他是不会同意的。我曾不止一次地遇到过这种情况。

这已经不是风格和文字表达方面提出严格要求的问题，而是有点儿不近常情了。在文学作品中，对一些杰出作家在遣词造句时的冥思苦想有所描写，有诗人的名言为证：“词海浩瀚，良语难觅。”古斯塔夫·福楼拜、列夫·托尔斯泰以及许多其他经典作家在写作时就是这样冥思苦想的。福楼拜真不愧是个修辞大师！托尔斯泰往往把打字员和排字工人折腾得够呛，就连已经一改再改的定稿也让他们重打、重排。可见莫洛托夫在这方面是有例可援的。

许多人，包括我本人都知道，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人。我不止一次亲自领教过这一点。

以上所说不过是给莫洛托夫的政治肖像再添上几笔。

莫洛托夫死于1986年11月8日，终年96岁。他去世时是一名苏共党员。

共同的立场——各国人民的利益

在十月革命后，我国第一代外交官同后一时期外交官的实际工作有很多共同之处。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们都在为劳动人民的利益、为社会主义的理想而奋斗，在外交上就是为各国人民的和平未来而奋斗。

目前苏联在处理国际舞台上的具体问题时所持的立场与

革命后最初年代所持的立场有所不同。现在存在着威胁全人类和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核武器，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为什么存在着上述差别。列宁曾预言，存在着出现新式武器的危险，并预见由此而产生的新形势。这种形势真的出现了。

然而，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立场。各国人民和所有国家（不论其社会制度如何）的最基本的切身利益在于，要制止新的战争。为此就必须结束军备竞赛，禁止核武器，防止太空军事化。遗憾的是，我们这些生活在社会主义世界的人同那些属于资本主义世界的人（当然指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之间至今还没有这样的共同立场。

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和平生活始终是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灵魂。这是苏维埃国家自人民政权取得胜利之日起，从社会主义旗帜飘扬在俄罗斯共和国上空之时起就一直为之奋斗的神圣目标。

截至1988年1月1日，苏联同世界上134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所有在驻外使馆及其他代表机构工作的苏联外交人员，每天都在宣传和贯彻苏维埃国家爱好和平的政策。

在国际会议上的做法

国际会议的工作是苏联外交官所面临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这项工作通常遇到许多困难。

下面我想着重讲讲苏联代表参加这类会议的一些特点。这些会议在整个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正在不断提高，这是因为独立的国家与日俱增，亟待解决的重要而尖锐的问题越来越多。在国际会议上，由于政治分歧的程度不同，辩论的激烈

程度也就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同北约国家的代表举行过许多重要的国际会议，但我不记得有哪一次可以称得上是“无论是从目标，还是从实现目标的手段来看，在政治上都达到了完全一致”的。

北约国家为了使其他国家支持西方的立场，不断对这些国家施加压力，进行讹诈。当然，还不断对各国代表团进行工作，其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歪曲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所提出的建议。

诚然，苏联及其盟国的代表应该向世界各国人民和国际舆论讲清本国建议的真相，说明这是和平的倡议，强调实施这些建议是客观的需要。这是他们应尽的国家义务和道德义务。这种工作是必不可少的。

在联合国大会上，我曾多次目睹辩论变得对北约和美国不利的情况。于是急电便从华盛顿飞向有关国家的首都。而且经常还不靠发急电，而是派出特使，让他们去向那些国家的首都施加点儿压力。当然，所有这一切从不声张，但事实是事实，纸是包不住火的。

当出现这种特使四出活动的情况时，外交官的责任就在于选择同社会各界打交道最有效的方式，把一方和另一方的建议实质向人们解释清楚。所有这一切都是极其重要的外交活动。

几乎在每届联合国大会和其他国际会议上，都能看到一种怪现象：为讨论某一尖锐问题或某一建议时，会议大厅里突然出现一个年轻人，他手里拿着一些文件，其实只不过装样子罢了。这个人走到某一国家代表团面前，停住脚步，装出一副慢条斯里的样子。有时还拍拍某一代表的肩膀，为了

引起他的注意，然后同他耳语几句，便走出大厅。

过两三分钟后又出现一个年轻人，没错，就是年轻人，免得别人怀疑他是个什么重要人物。这个人几乎是重演了刚才那个人的那一套，连动作手势都差不多。不过，他找的是另一个代表团。再看他时，这个年轻人已经把一条腿跪在地上，这并不是因为椅子矮，他个儿高，弯腰不方便，而是为了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他同他所找的人是在说悄悄话，表面上看是朋友之间的交谈。谁会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也许在商量晚上去哪个酒吧间消遣好。说了一阵子，微微一笑，然后就站起来，若无其事地走出大厅。

有时还没等他走开，从另一个门又走进来第三个人，这回可是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了，他故意穿得极为一般。这个人可能就要先后走到两个代表团面前重复上面所说的那老一套。

在某些会议上，竟有十几个这样的年轻人在大厅里来回走动并同一些代表团谈话。但是，可以发现一个规律：无论是他们要找的代表团，还是那些在联大会议厅里来回传递信息的“步行者”，每次都不一样。

目睹这种情景的人心里十分清楚，每当要解决某一问题时，如果华盛顿希望哪一个国家代表团在投票时站在美国一边，这些“步行者”总是去找这个国家的代表团。如果把“步行者”们在大厅里找过的各国代表团排列出一个表，那么其中会有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和欧洲国家的名字。

一些受到压力的代表团的代表们经常地，有时甚至在表决结束后立刻把这种事直接告诉苏联外交官，并时而对此表示愤慨。他们强调指出，他们代表团在投票时所以同美国保

持了一致，并不是因为认为美国的立场是正确的，而是因为得到了国内政府的指示，这一指示是在华盛顿采取外交行动以后作出的。

为了对某些国家的代表施加影响，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每天毫不掩饰地采取另一种方式工作，就是进行会外的会晤和会谈。美国代表团经常举行这类会晤会谈，因为在联合国总部干这种事，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不过是家常便饭。我还想指出，供联合国主要机构开会的主楼有许多各式各样的辅助厅，而各种走廊、备用房间更是不计其数，从来也没有人能说清楚它们的用途何在。

所有这一切都证明，在国际会议，特别是联合国的会议上所运用的工作方式，更确切地说是斗争方式，在任何书本里都找不到，而在那些把陈腐过时的外交手法奉若神明的人所写的书中，就更找不到了。现在时代不同了，外交斗争的技巧也就不一样了。

不容置疑的准则

各国的外交活动及其形式和手段历来都是由对外政策本身的目标所决定的。一个国家的外交部门在某一具体时刻不管履行的是什么职能，这种职能都是由该国在对外政策中所提出的任务来决定的。然而，这并不是说，不能谈论外交本身，不能谈论外交为达到既定目标所运用的特殊的手段和方法。

列宁说过，要象对待最为复杂的一种政治斗争那样来对待外交斗争。对于苏联外交官来说，这一指示是不容置疑的

准则。这里任何的一知半解，任何对时机和形势的具体条件的忽略都是完全不能容许的。

人们有时认为，一个外交官只要具备某种基本的文化知识，对人彬彬有礼，掌握一国外语就足够了。如能懂得几国外语那更好。这是一种误解。一个外交官只凭这点儿学问在现代外交工作中是不可能长期站得住脚的。

外交工作是一种艰巨而复杂的劳动，它要求从事外交工作的人运用自己一切知识和才干。

应该首先向外交人员讲一讲必须深刻理解本国政策的道理，对整个外交部门是这样，对某一外交机构也是如此。一个外交官要同别国代表谈某一问题时，对事情本身的来龙去脉应该了如指掌。这类谈判的进程和结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为维护各自立场时所阐述的思想和论据有多大的说服力。

当然，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的代表对所辩论问题毫无兴趣，而只是想让对方了解自己的观点，同时声明这一问题不容讨论。可是，这种情况并不经常发生；即使发生了，另一方则一定得令人信服地向社会舆论或其他国家阐明自己的立场。很自然，在这种情况下，谁站在和平的一边，谁就会觉得自己更理直气壮。

外交官们所进行的辩论和讨论在某种程度上与奥运会上的角逐相似，但也不尽相同：这里所进行的是智力竞赛。但愿运动员们能正确理解我的意思。当然，在体育运动中智力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体育毕竟还是以体力为主。而外交官的工作不是跳高，不是举杠铃，也不是打冰球。他的本领与运动员不同，他要维护应持的立场。

文化水平与知识渊博的意义

鉴于外交工作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各国从古代起就按惯例选派最训练有素的人去从事这项工作。

这里要谈的并不是那种按照社会等级特征和与达官显贵关系的密切程度等条件选派外交官，特别是任命大使的方法。俄罗斯过去也曾使用这种方法。即使是这样，挑选外交官时，在条件大体相同的情况下，谁的知识比较丰富，谁就会有更多机会被选中。

我想提请读者注意这样一种在某些资本主义大国的外交部门所特有的现象。在这些国家的外交实践中，任命的人选往往是根据狭隘的政治考虑来决定的。例如，一个新的国家元首上台时，便把那些在竞选中为他出过力的同党人士或曾经为这位总统候选人一度慷慨解囊的大商人派到关键的外交岗位上去。

这在某些国家里被看作是正常现象。如果有人因为美国总统把为他效过力的人任命为大使而向他提出指责的话，人们肯定会对这种指责表示不可理解。

道德服从于政治需要的准则在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外交活动中已经根深蒂固。你可以再次看到，这种活动归根结底渗透着阶级的利益。

一个外交官，不论他在涉外机构、在国内还是国外工作，只要他受过足够的教育，就会对自己的能力更加充满信心。不仅在与朋友和同事的交往中，而且在同外国人交往中，一个人的文化程度马上就会显露出来。

当然，任何一个外交部门都无法保证不出现不称职的人，尽管他们也许曾显示出有一定的发展前途。如果一个外交人员由于某种原因不再继续更新自己的知识，不再严格要求自己，而只是靠他以前在学校或刚开始从事外交工作时积累的那点儿老本来生活，那么，上述情况就肯定会发生。这种例外的情况进一步证明了这样一个准则：外交官应该符合外交工作向他提出的要求，他必须是一个有文化素养、博学多识的人。

理论上谁也无法否认这一点。而实际上总是这样吗？

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我要十分坚决地说：苏联外交人员，不论是从有关学校毕业后参加工作的，还是过去从事党的工作或其他工作的，其知识水平往往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官高出一头。我多次见过这种情况，因此确信无疑。

这首先表现在评价历史事件和当代事件时所表现出来的马列主义科学态度上。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校中，所有社会科学的研究计划实际上渗透了肤浅的、常常是反科学的态度，我们分析问题的态度则与之截然不同。

我们这样说绝不是想贬低西方国家的外交官本人。这些国家学校里讲授的人文科学是变态的，这并不是他们的过错。教学大纲和教学方法都不是由外交官来制定的。

在 驻 在 国

无论是什么级别的外交官——大使、参赞、一秘或者任何一个其他级别的外交人员，如果他被派往国外工作，就必须，而且是责无旁贷地必须十分熟悉驻在国的情况。

获得这类知识的第一步就是阅读有关该国的著作、文件和资料，听关于这个国家的讲座。但这仅仅是第一步。

熟悉情况的第二步从到达该国的第一天开始。研究这个国家就要连续不断地工作。要知道，使馆应对中央提出的问题高效率地提供准确的答案和资料，这是极其重要的。而这一点，使馆只有在它的工作人员非常熟悉驻在国、熟悉它的对外政策、经济形势、文化状况、法律和风俗习惯的情况下才能做到。

使馆必须始终牢记，国内正期望它提供能反映当地实际情况的有意义和有分量的情报。各国使馆的任务皆是如此，这并非是什么秘密。

完全可以说，苏联派驻国外的外交机构也研究它们所在的国家，并对这些国家的人民、主权、文化、风俗予以应有的尊重。

驻在国的历史是尤其应注意的领域。对于外交官来说，研究驻在国历史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必须知道该国已经发生过的事件。但是，这些知识对实践活动的意义，有时并不一定能得到应有的重视。

当然，并非所有的外交人员从一开始就精通驻在国历史的，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将来会在哪儿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哪怕知道一下该国过去历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也好。

那些事先，或许还在校园里就知道他们将研究哪些国家的工作人员会感到轻松些。他们面临的问题仅仅是深化这些知识。

每个受过教育的人，特别是受过人文方面教育的人，都

在一定程度上熟悉古希腊、古罗马的历史，略知埃及和法老王朝、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情况，大体上了解美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德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历史。

我们大家，特别是老一辈的人都谙知古希腊和古罗马历史上一些辉煌的“脍炙人口的”史实。教科书、历史和文学著作无不记载着各种事件（如布匿战争^①时期历次战役）的日期、那个时代重要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的姓名。任何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听说过象荷马、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这样的古希腊杰出的人物。诸如马其顿王亚历山大这样的人，或是罗马历史上的尤里·恺撒、^②小加图^③、奥古斯都^④、布鲁图^⑤等，他们都时有所闻。

这些知识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益的，甚至是必需的。对外交官来说，这是一种挺不错的自我介绍的名片。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要了解晚期，或者又叫做当代的历史，了解它的重要事件及人物。

苏联外交官必须精通本国历史。在必须掌握的最起码的知识中，应包括兄弟社会主义国家及其他欧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

在同西方国家代表的交谈中，我曾不止一次地谈到他们国家的某些历史事件。外国人士也曾不止一次地用他们浅薄的有关他们国家的历史事实来为难人，而我们对这些是很有

① 古罗马与迦太基争夺地中海西部统治权的战争。从公元前264年到公元前146年，先后共进行三次，以迦太基失败而告终。——译者

② 庞培（公元前106—前48），古罗马统帅。——译者

③ 古罗马共和派，反对恺撒，拥护庞培。——译者

④ 公元前27年到公元14年为罗马帝国皇帝。——译者

⑤ 古罗马政治家。——译者

研究的。

我也偶尔见到过一些身份较高的人，他们知道象乔治·贝克莱^①、大卫·休谟^②、亚当·斯密^③、大卫·李嘉图^④以及其他一些英国历史上的大学者。偶尔也同那些读过但丁、拜伦、席勒、黑格尔、康德著作的人交谈过。

令人高兴的是，今天所有的人都听说过马克思，虽然远不是所有的外国外交官都知道他的巨著——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本书的书名。至于阅读《资本论》，那在我接触的所有上层外国人士——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中，只有一人说过他曾试图阅读这本书。

熟悉驻在国生活中当前形势的变化，甚至是纯粹国内问题方面的变化，也应该是苏联外交官必须履行的一种职责。不然，当谈话越出事先商定话题的范围并转向内政方面时，他谈起来就会没有把握。而这种离题的情况是屡见不鲜的。这种离题谈话有时还会使驻在国代表透出一些很有意思的情况。这一点所以重要，还在于用一个意外的话题来丰富谈话内容，有助于在会谈过程中创造一种比较轻松的气氛，而这在外交活动中通常也有不小的作用。

怎样记住这一切？

一名外交官需要知道大量五花八门的事实、情况、事件，

① 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译者

② 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译者

③ 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学经济体系的建立者。——译者

④ 英国杰出的经济学家。——译者

这就非常自然地产生了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怎样记住这一切？”

要知道，在工作中会遇到众多的场合和情况，此时他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记忆。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事取决于一个人的能力。有的人记忆力可能强些，另一个人可能差些，而第三个人则可能糟糕透顶。那怎么办呢？

我碰到过不少人抱怨自己的记忆总是不好使。这有什么可说的呢？从来就不存在万能的记忆。根本找不出一个能把他看过的、听过的、读过的所有东西都记住的人。但是，如果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外交官，脑子里总认为自己的记忆力差，那对他来说就太糟糕了。

更为可取的，也是更明智的办法，不是抱怨自己的记忆力，而是锻炼它，发展它。记忆力必须不断地加以完善，只有这样，才能不仅保持，而且还能够加强它。对自己的能力应当更乐观些，更自信些。

对于外交官来说，具有重大意义的是能够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是有用和有益的。这就立即出现一个不同信念的人对事业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有些人是为了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友谊而工作，另一些人则是为加速军备竞赛而效劳。

那些为和平生活、为消除新的战争威胁而工作的人，不仅为本国服务，而且也为全人类服务。他们的信念是最符合道德的。与此相反，那些维护并推行黩武、制造各国人民之间敌对情绪、侵犯别国不可剥夺的权利和合法利益这样一种政策的人，是把自己的信念放在军国主义和侵略的秤盘上。这些信念是不道德的，是反道德的。

事实真相就是如此。一个反对和平的外交官的信念，即

使是无意识地反对，客观上讲就是犯罪。尽管这个或那个外交官主观上可能认为，他的活动是服务于美好的事业的，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真相。他是某种相应的教育，有时甚至是欺骗性宣传的牺牲品。

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官中，明知不符合劳动人民的利益还要有意去捍卫剥削阶级的狭隘利益的人难道还少吗？也有这样的人，对于他们来说，至高无上的是追求物质待遇和社会特权。

一个没有坚定信念的外交官如同一个商人。对于他来说，卖什么是无所谓的，只要能卖出去就行。在推行和平政策的国家中，这种工作人员是不适宜和不能从事外交工作的。在这样的国家里，其中包括苏联，需要有信念的工作人员，需要能贯彻执行这一崇高政策、积极努力和意志坚强的战士。

与外交工作有关的活动家也好，经验丰富的对外政策专家也好，有谁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没有遇见过那些在某个问题上轻率地改变自己观点，甚至信念的外交人员呢？

当然，如果能从实质上证明自己这样做是对的，那倒无可非议。这或许还是对事物进行更深刻认识的结果呢。

但不管怎么说，这种变化无常的“蹦跳行为”往往是轻率和懦弱的结果。而这些品质是同缺乏信念密切相关的。一个外交官如果不能奋起顽强捍卫正义的立场，没有自己的见解，而是附和每一个与己交谈的人，那通常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很糟糕的。人们会这么说他：

“你从此人那里听不到任何明确的东西。”

具有这种缺点的外交人员，如果他不能将其克服，不会给国家带来多少益处，有时还可能带来危害。

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

外交官的大部分工作是会谈，参加各种谈判和国际会议，直到象联合国大会这样的世界性会议。但是，不管在什么场合讨论国家关系问题——多边会议也好，小范围的会谈也好，每个参加者都会碰到这样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

“怎样辨别什么是今天该说的，什么是不该说的？”

如果他们有政府指示，那问题会很容易解决——就照指示办。

但如果，譬如说，某个具体国家政府指示其代表团或代表要在现场解决什么可以马上说，什么不能马上说，那该怎么办呢？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该国外交官就肩负着重大责任。假如在他们看来，面临的是这样一种情形：“赞成”和“反对”的利弊是同样的，那该怎么办呢？他们总不能采用抽签的办法吧。

这里，除了熟悉情况外，还需要有健全的思维。在这种其他条件均等的情况下，最好不要发言。为什么？因为如果发言不合时宜就可能会坏事，想收也收不回来了。相反，如果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表明需要发言，那还可以改变做法，作出相应的发言。

每个外交官，哪怕是低级别外交官都常会碰到类似的情况。参加国际会晤和会议的代表团也会遇到这种情况。经验表明，外交官最容易犯的错误还是在本应暂不露声色的情况下匆忙表态。

任何会见，不论是多边还是双边，象政治直觉这样一个

看不见的老“参谋”也在起作用。这种直觉是不能套上任何严格公式的。这种直觉的良友是职业素养和经验。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素质是神秘的，有点儿象艺术家或者从事任何一种其他创作活动的人们在工作中所具有的那种素质。初看起来，从事同一种创造性职业的人在一定意义上所干的是一回事：绘画、雕刻、写作，而结果却大不相同。有的人令人赞叹，有的人则让人“不敢恭维”，要不就令人作呕。

交际和交际能力

外交活动要求外交人员根据他们所担负的具体任务经常不断地同另一个国家或者若干国家的代表进行接触。他们的身份越高，就会更经常地应他国之约会见外国外交官，以履行本国政府的使命。

这对于外交人员，对于他们的选拔和培训工作有什么实际意义呢？意义就在于，在这个人的气质中必须具备交际能力。缺乏这一素质的人不可能胜任外交工作。

如果一个外交官把同外国代表的会见看作是一种自然灾害，那你就很难或者根本就不能适应外交工作，尽管他也许有能力完成象人们所说的不需要出门的任务。

客观上应该承认，常常有这样的现象，我不妨称之为“反常现象”，这就是交际能力超出了必需的、合理的限度。有些年轻的外交人员出于某种本能如此积极地开展交际活动，以致于几乎失去了意义。如果他们能够谈出些适合需要的内容，那倒还好。但如果他们只知道喝茶或者去参加那些对任

何人和任何事都毫无用处的会晤，那么人们对这类工作人员的评价多半不会好。

应当制止年轻工作人员的这种“狂热的”积极性。这是一项任务，它应从两方面来解决。一方面，外交官本人必须学会以自我批评的态度来看待自己的工作，找出其中的不足。这并不是什么微不足道的品质。另一方面，他的领导应当婉言劝导，或者说服教育，帮助他走上正确的道路。

从某些外交官的工作中可以看出，他们对纯礼宾性的工作往往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嗜好。在我们的驻外机构中，我常常见到一些人很愿意接二连三地光顾招待会、参加文化活动、列席隆重的典礼等。这一切当然也属于外交官的职责，何况这些喜爱礼宾活动的人甚至干得还不错。

可是，你却不敢交给这些人重大的政治任务，例如就某个重要的问题同另一个国家的代表举行会谈，因为很难保证他们能圆满地完成这项任务。幸好这样的情况不太多。如果一个外交官在他人的正确指导下克服了上述缺点，那么，他就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工作人员。

当然，不能说礼宾工作——无论是外交部、大使馆、领事馆还是国家其他机关的礼宾工作——不太重要。绝对不是。礼宾工作，如果理解得正确的话，具有很大意义。但同礼仪本身一样，这种工作也应当从属于政治任务。

同一种礼宾活动在形式上可能没有区别。但是，根据同有关国家的不同关系，这些活动参加者的级别和人数以及在会晤时相互谈话的方针都各不相同。最后，在举行礼宾活动的频繁程度和活动气氛方面，也可能有所不同。

礼宾工作通常是由受过这方面专门训练的人负责。只有

那些具有外交活动经验并在活动中表现良好的人才能做好重大的礼宾工作。在多数国家的外交机构通常都要考虑这种情况。

前面已经强调指出，渊博的知识对于一名外交官，对于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部门都会遇到这样的人，他们受过扎实的教育，知识丰富得令人羡慕，但他们在国际会议上，在礼宾活动中同其外交同行交往时的举止却可以说是“缺少教养”。

这种人有时甚至不顾女士们在场，会讲一个下流的笑话或者说一些在公共场合不适宜讲的粗话。他们从来不跟人打招呼，除非别人先问候他们。时间长了这种缺点通常是可以克服的。但也有人，尽管是个别人，就是改不了。这种人是不能胜任外交工作的。

还有一点。现在外交官们需要与之打交道的人的范围急剧扩大。其中不仅有国家的官方代表，而且还有众多的形形色色的实业界人士。勿需讳言，许多公司、垄断组织、特别是一些跨国公司有自己的观点，与驻在国政府的观点相比较，有时不是偏左就是偏右。所以他们也有自己的“外交”、自己的外交方式和方法。这些情况苏联的驻外代表应当予以考虑，并在自己的工作中加以注意。不过，这个问题是极其特殊的，需要具体论述，这里仅仅略提一笔，以便读者能够想象到今天的外交官还肩负着多么复杂的其他任务。

当前，任务不是越来越简单，而是更加复杂了，因为国际生活的问题本身已变得更加复杂、紧张和尖锐。首先，这是由于许多国际问题都与核武器有关。所以一切与外交事务有关的活动家必须考虑到这一严酷的现实。我们的方针是弗

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早在苏维埃政权初期提出的纲领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包括生活的各个领域，其中也包括与外交事务有关的领域。

粗活和“少爷”

只要外交存在一天，每个高级外交官都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怎样才能划出一道界线，分出哪些是我的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哪些是应当由下级干的所谓的粗活？”

这个问题远非无关紧要。勿庸讳言，有时，外交官，特别是年轻的外交官，认为粗活不是他们干的。可是，在对外政策和外交上，什么是粗活呢？

这就是收集和整理实际材料，将各种公文、国务活动家的声明和讲话、报刊文章等汇集成卷，挑选有用的照会、各种备忘录、信件、条约和协议文本，等等。总之，应把所有必须了解的资料事先进行整理，并要从中准确无误地挑选出会谈中和在准备各种文件、讲话、声明、条约、协议、协定时所要使用的那份材料。

从一大堆材料中挑选出为了某种目的、就某个问题所需要的东西，这决不是一项技术性工作。只有见识丰富的人才能完成它。有经验的外交人员是不会把这项责任重大的任务转托给技术工作人员去完成的，即使后者有能力提供一定的帮助。

遗憾的是，年轻的外交人员在他们的培训过程中，对收集和分析有关材料的工作并不总是感到那么津津有味。许多

人后来在实践工作中克服了这一缺点，当然还要有克服这一缺点的愿望和毅力。而那些不想改或者改不掉这一缺点的人，只能依然当他的“少爷”。如果他们在其他方面才能出众，那倒还好。而假如同这些“其他方面”有关的所有本事也都平平，那么这样的工作人员多半会跌入失败者的行列，他的职务升迁如果不是完全无望的话，也将会困难重重。

真正的外交人员要能够顺利地并且熟练地挑选、组织和分析有关外交行动所要使用的材料。有些外交官曾经在高校、科研中心或者在研究生学习阶段，特别是在准备学位论文时已经获得进行某种研究工作的技能，他们干这样的工作，就会轻松得多。

虽然这有些奇怪，但事实确实如此：那些科研工作经验不足或者根本就没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却最不愿意干准备性的粗活。而情况似乎应该恰恰相反。

现在讲几句外交官的夫人。就苏联外交官而言，他的夫人应当是他在各方面的助手，既同他志同道合，又能从事一定的社会活动。

伟大的卫国战争爆发后，利季娅·德米特里耶夫娜自发地做了不少工作，组织了各种各样的音乐会，为红军伤员募集救援基金。当然，工作得好坏另当别论。她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事，是因为得到我们朋友的帮助，是由于当时的气氛也对我们有利。

我们驻在其他国家的外交官的夫人也做了不少爱国主义工作。

有时有人认为，外交官在国外呆久了似乎就会逐渐习惯于那里的环境，因而对祖国的感情在某种程度上会渐趋淡化。

对此我不敢苟同。这种观点表明，持有这一看法的人，对国外的外交活动的概念还十分模糊。情况恰恰相反。如果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的、不友好的国家，那么，外交人员仅仅因为经常耳闻那些丝毫无助于促进苏联和驻在国关系发展的各种言论、议论就已经够受的了。使馆工作人员不仅是耳闻这种言论，而且还目睹不少同样性质的行动和事实。

在这种情况下，使馆应当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义不容辞地维护本国的利益，捍卫自己的祖国和苏联对外政策。这就需要韧性、毅力，需要考虑对策并巧妙地将其付诸实施。

此外，这种环境本身就对我们驻外机构的全体工作人员，首先是大使和高级外交人员造成不小的精神负担。

不难看出，每个国家的环境都有其独特之处。但这又增加了额外的困难。在任何一本外交教材里都找不到一条标准的答案，说明苏联外交人员在某个具体国家和在某个特定环境下应该采取什么行动。

设想一下这种情形：清晨，大使还没有来得及在办公室里开始工作，还没有来得及同自己的参赞和助手们见面，而广播里、电视上就已经播出了一条消息，说驻在国或是驻在国某些代表人物对苏联采取了某种不友好的行动。这种情况难道没有发生过吗？这是一个相当大的精神刺激。整个使馆，象人们所说的，就会绷紧了弦，就需要采取某种措施。

不，我可以明确声明这一点，在国外根本不可能习惯于环境，对祖国的感情也不会“淡化”。

我要坚决地强调，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人民服务——这是苏联外交官的天职。自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的整个历史

时期，苏联外交官都证明了自己对祖国是忠心耿耿的。

圆满完成自己的任务和以身殉职的外交官已列入一份很长的名单，这就是证据。他们的名字已被用金字镶嵌在大理石上。这块纪念碑就挂在位于莫斯科斯摩棱斯克广场的外交部大楼的前厅里。

只有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才能正确地评价某一个活动家，某一个事件。正是它才是可靠的指南针，使我们有可能从发生在国际舞台上的纷繁复杂的政治事件中找出重大事件，从我在国际生活转折关头有幸见到的众多人物中找出关键人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仅仅才过去40多年——这在历史的长河中并不算很长。但是，从战后开始的核时代向人类提出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问题：

“人类能否生存下去？”

争取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友谊的斗争，反对新的战争危险的斗争仍然是苏联政治和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外交总方针。为实现列宁的这一方针，我们的党，党中央委员会，苏共中央政治局正在做积极的、不懈的努力。

公理是否需要证明

列宁的天才思想 白宫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想的 有条件的保留实际上就是否定 不得不向参议员解释和平共处原则的生命力

政治并非数学。政治中遇到的公理需要经常提醒和重复。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某个人不理解，而是因为有些政治家不愿去理解某些与他们观点相悖的公理。

这些公理之一就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

列宁的天才思想

时代的列车载着一代又一代人滚滚向前，他们离开当年革命红旗在彼得堡上空飘扬的时代越远，列宁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天才思想就越清晰地呈现在人类面前。

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和平建设，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法西斯侵略者的彻底失败，战后经济恢复以及我国人民根据苏共二十七大的决议努力加速苏联社会的发展，解决生活中出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在国际政治领域竭尽全力消除核灾难的威胁这一时期——这一切使我们有可能根据历史的经验并展望即将来临的新世纪来评价列宁的这一思想。

现在，评价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都必须从它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维护和平的利益这一观点出发。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应该是以作出这种评价的主要标准。

苏联对外政策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关于它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弗·伊·列宁已经做了论述。在国家实践活动中，这一原则的意义在我们当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这是因为，核灾难的后果会比人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所面临的后果远为严重。

在我们时代，由于出现了弗·伊·列宁时代所没有的具有大规模杀伤力的可怕的新式武器，列宁的和平共处原则的意义就更重大了。在苏联及其盟国的政策中，反对核战争危险的斗争，争取裁军和销毁各种核武器的斗争已经同确立和平共处原则的斗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苏联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并在争取裁军和销毁核武器的斗争中遵循着列宁的这一原则。我们的朋友和盟国——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也实行同样的政策。

无论是哪一国，如果它确是一个始终爱好和平的国家，就不可能在争取销毁核武器、争取裁军斗争的同时，又不承认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反过来说，如果它只是口头上赞成这一原则，而实际上拒绝为争取裁军和销毁各种具有大规模杀伤力的武器而斗争，那么这个国家就同样不可能是始终爱好和平的。

苏维埃国家存在多久，它就为争取和平共处原则的胜利斗争多久。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阶段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当时的问题是要战胜破坏一切国际行为准则和道德准则的侵略者。

为使这一原则得到承认苏联进行了斗争，现在援引几段斗争事例并非没有意义。我想按照考古学家挖掘文物的顺序来介绍——先从表层开始。

白宫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想的

…… 1984年9月。白宫。扩大范围的会谈刚刚结束。苏联方面随我参加会谈的有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格·马·科尔尼延科、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安·费·多勃雷宁；美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是总统罗·里根、国务卿乔·舒尔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阿·哈特曼。突然，总统提出一个愿望：

“葛罗米柯先生，咱们能不能单独谈一谈，哪怕是谈一会儿。”

我说：“好吧。”

于是就交谈起来。这可称得上是一次“站着的谈话”。总统先开口。他说：

“我想非常坦率地指出，我渴望能找到改善美国和苏联关系的途径。对这个问题我颇费琢磨，但似乎毫无结果。我左思右想，不知原因究竟在哪里。”

里根稍停片刻，又接着说：

“据我看，障碍在于苏联和美国关系中积存的不信任感。”

于是，我决定回答总统提出的看法，我说：

“不信任感的确积存了不少。但是，美方毫无根据地将各种各样的阴险计划安在苏联头上，而苏联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这样的计划。今天，在刚才会谈时您又提到这些计划。

关于要用武力埋葬资本主义的说法列宁从未讲过，这是他人的杜撰。有人把它推销给您，总统本人，而您却不顾我们已多次辟谣，一遍又一遍地加以重复。”

里根听我讲，一言不发。看来他从未想到要为他所引用的弗·伊·列宁的这一说法找一个出处。这个出处压根儿就不存在。

我望着他，心想：“莫非总统真相信他所听到的关于苏联政策具有某种侵略性目的的神话？”

从他的脸上我也看不出他是怎么理解我的话的。后来，白宫方面对此没有做任何解释。

至于里根声称希望寻求改善同苏联关系的途径，我对总统说：

“苏联仍然真诚地希望缓和我们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我被授权宣布，这是苏联所有领导人的观点。”

“至于说苏联政策的长远目标和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其中包括同美国的关系，”我接着说，“我们遵循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无意对资本主义国家使用武力，以消灭它们的社会制度。那些指责我们有这种计划的人是对我们进行诬蔑。”

然后，我又强调指出：

“我们的哲学和政策的核心理念就是坚定地认为，由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世界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是朝着社会主义胜利的方向发展的。但是，这种胜利不是靠武器来夺取，它应是两种社会制度和平发展与和平竞赛的结果。”

我表示希望总统有机会思考一下我所讲的全部思想。

就这样，自我同里根在白宫会谈后，在以后的会谈中无论是他本人，还是美国当局的其他官方代表，都没有表示赞成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

众所周知，1985年在日内瓦，紧接着是1986年在雷克雅未克，在同苏共中央总书记米·谢·戈尔巴乔夫举行的成为两国关系重大标志的会谈中，总统也未表示美国对这一思想是否赞同。

美国历届政府的代表都大谈什么美国主张和平解决各种争端。在我方提出各国应当运用和平的政治手段来解决自己的争端、避免使用武力之后，譬如说舒尔茨就曾不止一次地用一些毫不相干的空话来敷衍了事。

不言而喻，这一切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反映了一种特定的政策。而现行政策则变成了这样一个理论：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华盛顿认为触及到了美国的切身利益，他们就有权使用一切手段直至动用武装力量来维护这些利益，甚至纯属有关国家内部的事务，也必须由华盛顿来解决。

还在尼克松执政的时候，美国在1972年就曾同意与苏联签订一个叫做《苏联和美国相互关系原则》的文件，该文件认为，在核时代，维持两国关系的原则除和平共处外，别无良策。可以想象，这是清醒的观点占了上风。

但事过不久，华盛顿就将文件弃置一旁，直到现在仍在推行与之相反的政策。美国的行为也违反了其他国际法律文件的条款，其中包括联合国宪章。宪章规定，必须采取和平方式，也只能采取和平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遗憾的是，美国的主要盟国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一直采取了同华盛顿相差无几的立场。

有条件的保留实际上就是否定

我常常回想起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同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亨利·洛奇的谈话。在美国高层政治家中，他是一个重要人物。他的出名起码是同他父亲^①享有的名声有关，其父1918年曾领导反对派在凡尔赛和约问题上反对威尔逊总统。所有西方大国都想把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和自己的胜利以签订和约的形式固定下来。老洛奇领导华盛顿的反对派破坏了美利坚合众国对条约的批准。这是威尔逊总统的一大失败。一般认为，这一失败缩短了他的寿命。顺便提一下，老洛奇早在1917年革命之前就访问过俄罗斯并漫游了西伯利亚。这是众所周知的事。

这位议员的儿子，也就是小洛奇，也同样顽固地为美国政界坚持最反动倾向的集团效劳。在他的身上总附有杜勒斯的阴影。

在同我的一次交谈中，洛奇问道：

“你们到底是怎样理解各国和平共处这一论断的？”

他还补充说：

“在美国，而且还可能有其他国家，人们不太清楚你们这个论断包含着什么意思。”

在向我提出这个问题之前，洛奇已在联合国发表了几十次讲话，在许多问题上，其中包括在讨论时不可避免地要涉

^① 根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领导反对派反对批准凡尔赛和约的是洛奇的祖父老亨利·洛奇（1805—1924），因此老洛奇和小洛奇应是祖孙关系，而非父子关系。

——译者

及到的和平共处的问题上反对我们的立场。

我不得不再次做一番必要的解释。强调了主要思想：

“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不管存在着什么样的分歧，都应通过和平的途径，换句话说，通过谈判加以解决。和平合作与和平竞赛——这就是所有国家都应遵循的政策。”

参加会见的苏联著名法学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谢·阿·戈伦斯基和谢·鲍·克雷洛夫教授也从法律角度阐述了这个问题。

洛奇非常认真地听完解释后，说：

“你们的思想很有意思。但想到这一切是一回事，而把它们当作一种学说加以承认并使之成为政策的基础，则又是另一回事。”

他的话令人失望，而且故意讲得含混不清。

洛奇在其作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的整个活动中，一直以杜勒斯强硬路线的支持者闻名。杜勒斯当初对和平共处连听都不愿听。

不妨再补充一点，无论是老洛奇还是小洛奇，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始终维护那些无助于使国际问题以有利于和平的方式解决的观点。他们一直享有这个名声。

杜鲁门总统任命美国著名外交家、参议员沃伦·奥斯汀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该参议员的威望和经验以及同白宫的接近增加了他的声望。他与美国其他一些活动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能够认真地同苏联代表谈论对外政策问题，特别是同联合国活动有关的问题。

我同奥斯汀交谈过不少次。这样的交谈通常能使一方比较全面地了解对方的立场，但却很少能使双方的立场相互接

近。

在交谈中也出现过两国如何对待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这样的问题。虽然奥斯汀对这个问题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但也不回避讨论。他问道：

“苏联究竟是怎样理解这一原则的？”

毫无疑问，我方向他做了相应的解释。

在一次交谈中，对方讲出这样一种思想：

“怎样才能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同西方民主国家的利益调和起来呢？”

就连杜勒斯也会羡慕这个问题的提法。

在回答他时，我提请他注意人所共知的，已经写进历史的事实：

“德国为一方，美国和英国为另一方，虽然是同一种社会制度，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却分属两条不同的战线。与此同时，美国和英国又成了苏联的盟国，尽管它们在社会制度上并不相同。”

“不久以前结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表明，”我接着说，“各国和平共处的思想具有多么强大的生命力。它表明，同样的资本主义制度远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和平的保障，而国家社会制度上的差异也不是影响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合作与共处的障碍。”

“难道不是这样吗？”我问。

奥斯汀想了想之后，说：

“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做例证，我似乎应当信服。”

但同时，他又补充说：

“在可预见的将来，我还看不出美国会有可能接受这一

原则，即你所坚持的这个原则。双方在这些或那些具体问题上，譬如与裁军和军备控制有关的问题上，换句话说，就是在实际政治问题上，寻求彼此立场逐渐接近的可能性——那是另一回事。”

至于美国对苏联奉行“强硬路线”的主要鼓吹者——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他根本就不愿意讨论各国和平共处这个题目。从他整个政治思维方式来看，他属于那种对这个题目不可能感兴趣的人。这是众所周知的。他不仅否定这个原则，而且也否定讨论这个原则的必要性。

联邦德国著名政治活动家汉斯—迪特里希·根舍的观点值得注意，我同他在各种场合会见过多次。

当根舍还在维利·勃兰特政府里当内务部长时，我就同他相识了。当他在赫尔穆特·施密特政府，后来又在赫尔穆特·科尔政府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后，我们会谈过不少次，讨论了苏联和联邦德国的关系，以及华沙条约组织国家同北约国家的关系问题。

应当说，同根舍能否取得意见一致，那是另外一回事。但在和他会谈之前，总还是需要检查一遍所准备的论据、理由和对他可能提出问题的回答。事先就预料到，他会带来特意准备的问题并会竭力粉饰联邦德国政府的立场。说话时，倘若留有余地对他有利，他就会留有余地。倘若采取相反的行动对他有利，他也不会放过机会。他宁愿使谈话保持不紧不慢的节奏。总之，他喜欢悠然地划着桨，潇洒地在宁静的湖上泛舟消闲。

无论是我本人还是苏联驻波恩的大使们同他进行的多次会谈都证实，对他来说，主要方针就是既要同华盛顿搞好关

系，也要尽可能不搞坏同莫斯科的关系，有可能的话，还要改善这种关系。

在交谈中，他不是立即，而是逐步地接近那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如果这种解决办法确有可能的话。他或许会提出一些中间方案来。这是合乎逻辑的。

那么，联邦德国和它的外交部长是如何对待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这个问题的呢？

根舍部长和联邦德国的其他代表从未拒绝谈论这个题目。他们通常总是重复与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毫无区别的说法：“力行容恕，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①接着就开始周而复始地讨论问题。大家知道，这种讨论是没完没了的。总的来说，根舍是一个不易对付的对手，但同他的会谈通常是求实的，一般来说是有积极成果的。我觉得，后来，特别是他同爱·阿·谢瓦尔德纳泽部长的会谈是内容丰富的、具有较高政治水平的会谈。

不得不向参议员解释

前面在谈到旧金山会议时，已经提到参议员范登堡在美国整个政治活动中、在其对外政策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位德高望重、很有影响的共和党代表不管和他谈论什么问题，总是站在右翼这一边。他一贯从强硬的立场出发来看待任何问题，并且习惯于到处寻找“莫斯科阴谋”。顺便提一下，杜勒斯和参议员范登堡两人相互心照不宣。他们是一对政治双胞胎。

^① 译文引自联合国宪章中文法定本。——译者

我同这位参议员也谈过关于各国和平共处原则这个题目。是这样谈起来的。这还是在1945年讨论建立一个国际组织——联合国的问题时。在一次交谈中，他问道：

“为什么苏联对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一致原则这么敏感？”

我回答这位参议员说：

“您就我们的政策编造了一个又一个谎言，单是您本人对苏联的这种态度就为我们提供了新的依据，使我们对安全理事会的表决程序给予高度重视。我们想排除这样一种情况，即安全理事会可能会因得到一份错误的、别有用心的情报而通过一些反对苏联的决议。苏联有理由坚决要求排除通过类似决议的可能性。当然，不仅是排除针对苏联的可能性，而且也排除针对安全理事会其他常任理事国的可能性。

后来才知道，范登堡将这次谈话内容向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做了汇报。

当时，在同范登堡以及其他美国代表的交谈中，出现了一个与和平共处原则问题有关的派生问题：

“为什么苏联在讨论直接涉及到它自身的问题时不信赖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国的客观态度？”

我不得不向参议员解释：

“这是根据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西方国家，即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将倾向于团结在一起，他们之间的团结一致在投票表决时就会表现为共同反对苏联。难道这不会导致局势激化，以致在安全理事会通过一些极端措施？要知道，筹备中的这个世界性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制止战争，保障和平。所有大国都应朝着这一目标去努力，尽管它们的社会制度互

不相同。

罗斯福及其政府的威望，主要的是苏联在反对和战胜法西斯主义的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导致雅尔塔会议就所谓“否决权”问题达成了一项协议，换句话说，通过了五大国一致的原则。

和平共处原则的生命力

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早在列宁的《和平法令》中就有阐述。如果说历史上发生过伟大事件，十月革命就是这类事件。十月革命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的原则提上了国际关系的议事日程。各国之间建立和平与和平的关系——这就是苏维埃共和国在《和平法令》中向其他国家发出的呼吁。

值得一提的还有热那亚会议^①这一页历史。

60多年前召开的热那亚会议是苏维埃国家获准参加的第一次国际会议，现在重温一下与之相关的一些事件是适宜的。列宁为参加大会的代表团规定的指导方针，就是必须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的事务关系。无产阶级的领袖是多么地高瞻远瞩！在当时世界上正发生着巨大的社会变化的情况下，他就为苏维埃国家同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确定了一个长时期的总方针。

列宁在他写的许多著作中曾不止一次地提及和平共处原则，并从多方面加以阐述和说明。有时，他使用“和平共存”

^① 1922年4月10日—5月19日在意大利热那亚召开的国际会议，讨论经济和财政问题，参加者有28个资本主义国家和苏维埃国家。——译者

这一说法，但意思是一样的，即在苏维埃国家和它周围的资本主义世界之间存在着建立和平关系的必要性和客观可能性。

1920年6月，在列宁在场的情况下，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讨论苏维埃俄罗斯对外政策时，契切林宣布：

“我们希望，我们能象自己所期望的那样不受他人阻挠地得到发展，在世界上建立我们新的、社会主义社会。无论是我们的制度，还是我们的政权，我们都不能靠刺刀来支撑。这是众所周知的，但尽管如此，仍有人挑唆越来越多的敌人来反对我们。我们的政策是和平的政策，而不是投降的政策。”

接着，他又说：

“我们的口号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同其他政府和平共处，不管它们是什么样的政府。”

1920年11月，列宁在审议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国内战争的总结时强调指出，苏维埃国家生活中的新阶段已经到来，在这个阶段中它将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密网”中生存下去。

他说：“我们给自己争得了……同……资本主义列强并存的权利。”¹

70年代，在苏美关系、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中，出现过缓和与互利合作的时期。在那些年代，和平共处原则事实上得到了愈来愈多的考虑。

在这一时期解决了一系列问题。在不同社会经济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中，政治接触得到了发展。各国之间签订了众

¹ 《列宁全集》，1986年中文版，第40卷第23页。——译者

所周知的条约和协定。前面已经提到的1972年苏联和美国相互关系原则的文件中关于和平共处的条款，实际上也写进了欧洲安全合作会议的最后文件中。

1985年11月，苏美两国在日内瓦宣布，任何时候都不应打核战争，核战争中不可能有胜利者。

然而，华盛顿实际推行的政策既违反了1972年文件，也违背了1985年的日内瓦协议。

人们会不止一次地看到，有人企图歪曲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这一论断的实质。往往有这种情况，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活动家交谈，对方明确表示，他的政府希望和平，关心的也只是和平。

可是，紧接着又发表如下内容的声明：

“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及其理论和学说的存在，这个事实本身就对我们国家乃至整个世界构成了威胁。”

类似的论据一直重复到今天。

如果对整个战后时期逐年进行分析，那就不难发现，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单独还是集体地，都极力回避在同另一个社会制度的国家发生分歧和冲突时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

当苏联建议，或者华沙条约组织参加国共同建议，签订一项在国家关系中不使用武力的协定时，北约组织参加国方面作出了实际上是否定的答复，或者干脆毫无反应。

那些拒绝接受我们建议的国家所提出的主要理由通常是说，联合国宪章要求各国努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一切争端和分歧，宪章的规定已经足够了。苏联当年也曾坚持要求通过宪章的这一条款，该条款显然是国际生活中的一个成就。但

在当前，这已经不够了。

现在，当存在着核武器和其他具有大规模杀伤力武器的情况下，承认并遵循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尤为重要。

从热那亚时代到我们今天，相隔时间很长。但是，两种社会制度和平共处的原则不但没有失去其意义，相反，它在国际生活中获得了更大的生命力，更重的分量。

——第十八章——

为熟悉的肖像再描几笔

与加加林一起在联合国大厅 肖洛霍夫在美国 鲍里斯·利瓦诺夫 多夫任科——导演兼哲学家
“亚历山德罗夫一家” 散步时的谈话 帕维尔·科林的生活片断 帕斯捷尔纳克说过的话

在我的人生道路上，除了国务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以外，我还会见过不少文化及科学领域的名流。有些国外文化界人士我已经写过了。现在，我想谈谈几位苏联人的情况。

自然，我不准备详细地描述他们的生平及创作活动。我要讲的，只不过是在大家熟悉的与我同时代的几个名人肖像上再描几笔而已。

与加加林一起在联合国大厅

在国外工作的外交官生涯中，常常会遇到一些意外情况，需要你立即找出对策。例如，当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后，我就遇到了这种情况。

那天，正在纽约举行一次例行的外交官招待会。突然，几个记者闹哄哄地闯了进来。他们逢人便问，而且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

“苏联代表在哪儿？葛罗米柯在哪儿？”

我很快就被记者团团围住了。他们频频地将闪光灯对准我，并且提出的都是同一个问题：

“葛罗米柯先生，您对你们的卫星上天有何看法？”

老实说，关于这件事尚未听到任何消息，因为当收音机广播这条消息时，我已经在招待会上了。但是，我当然不能露出一副措手不及的样子。不但如此，我还要努力从他们连珠炮似的高声提问中捕捉到一些信息。于是，我站在那一大群忙忙碌碌的记者中间穷于应付的时候得知，莫斯科刚才宣布了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消息。我极力表现得泰然自若，向记者谈了我对这件事的看法：

“我认为，这是苏联科学、技术以及全体人民的重大成果。”

记者们接二连三地向我提问：

“苏联为此准备了多久？”

“您是何时得知要发射这颗卫星的消息的？”

“卫星将飞行多久？”

问题一个接着一个。许多问题需要我马上回答。当然，记者们希望能了解到更多的情况，而我则装出一副样子，似乎有些事情我知道，只是暂且不便相告。突然，从某个记者那里冒出这样一个问题：

“苏联人什么时候飞往宇宙？”

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故意刁难人。我决定这么回答他：

“要飞的时候，就会马上宣布的。”

我没想到，四年后就飞成了。苏联人飞上了宇宙，他就是尤里·加加林。

后来，我同尤里·加加林的见面相识也是在纽约。那时，他名望极盛，是世界闻名的人物。莫斯科收到了来自天涯海角的邀请，邀请他对这个或那个国家进行访问。此时，季托夫、贝科夫斯基和捷列什科娃也都相继进行了宇宙飞行。

尤里·加加林和瓦莲京娜·捷列什科娃1963年10月从墨西哥回国时路过纽约并在那儿停留了两天。同他们一起的还有苏联英雄尼·彼·卡马宁^①将军。

我们在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处欢聚一堂，畅叙友情，谈到了尤里·加加林两年前进行的宇宙飞行以及来纽约前几个月刚建功勋的瓦莲京娜·捷列什科娃的宇宙之行。

那时，他们的名字刊登在美国报纸的头版上。

交谈时，我对我们光荣的宇航员们说：

“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将讨论禁止把载有核武器的物体射入轨道的问题。你们是否就在这次会议上做个发言，怎么样？”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这是不是有点儿不太合适，”尤里·加加林说道，“这毕竟是联合国大会呀。”

“没什么可怕的，”我反驳他说，“发言将是很短的。今晚你们各自都坐下来，把自己的思想理一理。我可以给你们出点儿主意。”

看得出，这个建议使我们的客人感到有些为难。而我还火上浇油似地说：

“你们一定得在纽约举行一个记者招待会。”

那天晚上，尤里·加加林和瓦莲京娜·捷列什科娃熬至

^① 尼·彼·卡马宁（1908—1982），苏空军上将，1966—1971年领导宇航员培训工作。——译者

深夜，精心准备自己的发言稿。总之，可以说，我们的宇航员卷进了“外交工作”。

翌日，我们参加了在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处住地为欢迎宇航员而举行的午宴。参加的人不多，只有我们的外交人员。加加林和捷列什科娃坐在我的旁边。看着我身旁的这个人，我明白了我们一位代表说过的话是言之有理的。在客人抵达前不久，他说过：

“加加林做环球旅行并不是独自一人，同他一起的还有那加加林的笑容。”

的确，那些把第一个人送上太空的人们眼力非凡。在创建功勋的那天，十分突出地显示了加加林性格坚强，勇敢无畏，处事果断，具有英雄气概，但他不仅仅是这样一个人，不，他不仅仅是一个英雄宇航员。那些挑选加加林的人似乎已经预见到，将来前往国外时，他将会是一个出色的外交家，是一个能非常出色地在外国代表我们国家的人。假如有人能发明一种测量勇敢的仪器，我想，加加林创建功勋的威力将极大地超出测量器上的刻度表。

同加加林见面之前，我从报刊上的报道中得知，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交谈者。通过同他交谈体会到果然如此。他可以同你交谈各种话题。但当话题转向宇宙时，大家都会仔细听他的了，因为他是第一个从那里看到地球的人。我知道，他在自己的宇航员同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也确实应该享有很高的威望。在我们交谈时，他讲到了他们，讲到了那些已经去过宇宙的人或者准备飞往宇宙的人，谈到了要进入宇航员的队伍是多么不容易，而加入这个队伍的人又要经过多么复杂的训练。我记得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们有许多优秀的、训练有素的专家，你们还会听到有关他们的消息。”

那次会见时，我们总共大约有15人。当时在席间讲话的人都强调了她的飞行以及所建功勋的意义，而他同瓦莲京娜·捷列什科娃一样，表现谦虚，有礼貌，很平静，并对组织这次会晤表示感谢。后来，当有人讲了一番热情洋溢的赞扬他的话时，他说道：

“这次飞行不是给我们的名字而是给国家的名字增添了光彩。”

这句话既表明加加林处事有分寸，同时又说明，加加林为人谦逊。

“你们瞧，他是我们的外交家。”卡马宁将军就此说道。

那天，应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邀请，瓦莲京娜·捷列什科娃和尤里·加加林参观了联合国总部。在他们到达之前，联合国大门前很早就聚集了许多报纸、广播、电视台的记者，联合国的工作人员以及一批旅游者。当尤里·加加林和瓦莲京娜·捷列什科娃出现时，迎接他们的是掌声、欢呼声以及镁光灯的闪光。

然后，我们同客人们一起在联合国副秘书长符·帕·苏斯洛夫的陪同下走进全体大会会议厅并在苏联代表团的席位上就座。

第十八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委内瑞拉代表卡洛斯·索萨·罗德里格斯宣布大会开幕时告知与会的代表们：

“今天，在我们这里出席会议的还有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中校和瓦莲京娜·捷列什科娃。”

此时，大厅里不仅坐满了代表，还有不少事先知道此消

息的新闻工作者。来宾席里坐了许多人。欢呼声骤然响起。

“现在，请苏联宇航员到大会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的席位这儿来。”索萨·罗德里格斯说道。

加加林和捷列什科娃登上讲坛，旁边坐着大会主席、联合国秘书长以及联合国的其他官员。全体起立，再次以暴风雨般的掌声欢迎这两位苏联英雄。随后，响起了呼喊声：

“让他们说几句话。”

“捷列什科娃，请你到讲台上去！”

“加加林，请你到讲台上去！”

他们只得服从了。瓦莲京娜·捷列什科娃第一个走上讲台。她在总统、总理、外交部长通常发言的位置上讲了话，讲到苏维埃国家把人送上宇宙是为了和平开发宇宙，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她的讲话虽只有几句，但言简意赅。

加加林的发言也同样简短，他再次受到热烈和友好的欢迎。

当天上午，联合国大会举行了全体会议，在会上讨论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问题。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尼·特·费德林在会上发言时强调，联合国中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不仅破坏了该组织的威信，损害它的正常活动，而且使这一国际论坛难以实现它所面临的任務。苏联代表声明说，苏联代表团一如既往，始终主张立即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权利。他号召所有国家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然后，苏联宇航员参观了联合国大厦。在第三十五层，他们受到了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人员、外交官以及秘书处的技术工作人员的热情欢迎。大家都争相同尤里·加加林和瓦莲

京娜·捷列什科娃握手，请他们签名。记者和摄影记者寸步不离地跟在他们后面。

联合国外空委员会主席阿卜杜勒·加尼（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走到宇航员们跟前，送给他们一本委员会的记事刊物作为纪念。这本刊物上记载了由宇航员操纵并已经发射出去的人造卫星和飞船，其中包括加加林和捷列什科娃乘坐过的飞船。

后来，苏联客人应邀参观了安理会会议大厅。此时有几批美国中小学生正在那儿参观。孩子们兴高采烈，欢呼鼓掌，以此来欢迎传奇式的人物——最先开发宇宙的苏联人。参观联合国大厦的速度很快，因为许多常驻联合国的报刊、广播及电视台的代表们已在等候我们的宇航员了。这些报道联合国工作的新闻工作者以友好的掌声迎接客人。然后，我们的宇航员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我不记得在美国有哪一次与新闻界的会见有那么多的报刊、广播和电视台的代表前来参加。大厅里挤得水泄不通。给人的印象是，出席的不仅是常驻联合国的新闻记者，而且总的来说也不止是新闻工作者。确实，我们宇航员来到纽约，对全美国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事件。

这里只想列举几个记者所提的问题和尤里·加加林对这些问题的答复。

“在研究宇宙空间方面，美苏合作是否有可能进行？”

“这种合作是可能的，实行这种合作的途径可以包括交流科学信息、建立国际通讯及宇宙飞船跟踪系统、向在他国领土上着陆的宇航员提供帮助和共同研究气象形势以及各种其他途径。”

“苏联海上舰船出现在世界大洋的某些地区是否意味着，最近将来发射新的宇宙飞船？”

“有关发射宇宙飞船的事不应当根据在世界各个地区游弋的海上舰船来判断，而应当根据塔斯社的消息来判断，一切有关发射的消息都会由塔斯社立即予以报道。”

“您对当前正在联合国讨论的禁止把载有核武器的飞行物体射入宇宙空间的决议持何种看法？”

“如果能就此达成协议的话，我将非常高兴。我相信，苏联所有的宇航员都会热烈支持这个协议。对我们宇航员来说，这个协议非常重要。禁止在太空进行核试验和禁止将载有核武器的物体射入轨道将消除辐射带来的危险，因此，也将解除对宇宙飞行造成的威胁。如果宇宙中出现核武器，那么人类的头顶上将悬挂起一把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的达摩克里斯剑^①。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对我们所有的人，对各国人民，对改善国际形势来说这是做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我们欢迎根据苏联倡议提交给联大讨论的这个建议。”

正好此时，在隔壁大厅里，联大第一委员会未经表决就一致通过了禁止将载有核武器的物体射入轨道的决议。

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新闻工作者们请瓦莲京娜·捷列什科娃谈谈她对古巴之行的印象。在来纽约前不久，她去过那儿。她讲道：

“飓风在古巴大地上猖獗了4个昼夜。这个国家这次遭受的自然灾害很严重，它所带来的后果自然给我留下了很深

^① 据古希腊传说，叙拉古国王迪奥尼修斯某日宴请他的宠臣达摩克里斯，请他坐在自己的宝座上。当欢宴正酣时，达摩克里斯突然看到自己头顶上悬挂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利剑，由一根马鬃系着，于是他马上明白了，所谓安宁都是稍纵即逝的。——译者

的印象。飓风吞噬了庄稼和成千上万所住房，夺去了不少人的生命。现在，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尽一切力量帮助灾民。我对古巴人民非常同情。”

参观了联合国总部之后，苏联宇航员们游览了纽约市容。晚上，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接见了他们。同宇航员谈话结束后，秘书长为他俩举行了招待会，出席招待会的有大会总务委员会的委员们。联合国外空委员会委员、苏联驻美大使阿·费·多勃雷宁。吴丹向加加林和捷列什科娃赠送了一本联合国为纪念宇宙开发而出版的邮票册。

联合国大会关于不把载有核武器的物体射入宇宙空间的决议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文件。当时，在英国外交大臣的参加下，在纽约和华盛顿举行了几个星期的苏美会谈，这个文件就是上述会谈的成果。

在这个决议中，联合国大会欢迎苏联和美国表示的不在空间部署任何载有核武器或其他类型的具有大规模杀伤力武器的物体的意向。在联合国政治委员会会议上，苏美两国的代表向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再次重申了这一意向，政治委员会把苏美两国的声明看作是庄严的宣言。

当时只有苏美两国进入宇宙并拥有将核武器射入宇宙轨道的潜力，因此，它们的声明实际上应该保障使宇宙空间不致成为核冲突基地。

联大这一决议的内容不限于此。它还包含了向所有国家发出庄严的号召，号召它们不要将任何载有核武器或其他类型的具有大规模杀伤力武器的物体射入环球轨道，不要在天体上设置这种武器或者以其他方式在宇宙空间部署这种武器。

那时认为，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漫长而又复杂的道路

上又向前迈出了一步。恰好就在接待苏联宇航英雄的那一天，联合国庄严宣告，宇宙空间应该只服务于和平目的。大概很难选出比这更好的日子了。

有人向客人们问道：“联合国为瓦莲京娜·捷列什科娃和尤里·加加林准备了一份很好的礼物。是不是这样？”

尤里·加加林答道：

“我们很愉快地接受这份礼物。”

在离开联合国总部时，尤里·加加林和瓦莲京娜·捷列什科娃发表了正式声明：

“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先生盛情邀请我们参观联合国，我们对此表示感谢。第十八届联合国大会代表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们甚为感动。我们是在平常的工作日来到联合国的，因而我们能看到100多个国家的代表为解决重大的国际问题付出了多少心血。我们祝愿联合国大会代表们和这一最大国际组织的全体工作人员在他们所从事的巩固和平、加强世界安全的光荣而艰巨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

残酷的事件使尤·阿·加加林离开了我们的队伍，这已经有20多年了。但他始终无形地跟我们在一起，仍然带着他那善良的目光和那独特的笑容。

为纪念尤里·加加林的功勋，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兴建了不少纪念碑。父辈们以他的一生作为榜样来教育自己的儿辈们。1961年4月12日是第一个人飞向太空的日子。这一天离我们越远，他的声望就越大，关于他的传说也就越多。

而我们，他的同时代人，感到骄傲的是，他活着的时候就认识了他……

这位英雄宇航员具有学者、外交家和忠诚于党和人民事

业并热爱祖国的共产党员最宝贵的品质。

肖洛霍夫在美国

在1959年9月那次难忘的美国之行期间，我实际上每天都与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肖洛霍夫接触。他是苏联代表团的成员，因此，应该参加代表团在美逗留期间的有关活动。

这位《静静的顿河》和《被开垦的处女地》的作者，早在风华正茂之年就被公认为是一位造诣颇深的作家，而当我们在美国逗留之时，他已闻名世界了。

他贪婪地观察着他所看到的一切，这是不言而喻的。

有一次，我发现他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一群出来迎接代表团的美国人，我问道：“有意思吗？”

“耐人寻味。”他答道。

我颇感兴趣地问道：“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这次旅行对您这位作家收集创作素材方面有帮助吗？”

“我想没有，”他说，“这对我的创作未必有什么用处，不可能增加些什么新东西。我所塑造的主人公的世界是顿河、故乡、我的村镇和城市。我在那儿土生土长，在那儿受的教育。我同那些地方永世相连。不过总的来讲，旅行还是有意思的。应该见见世面嘛。我还是第一次来美国呢。”

然后，他若有所思地补充说：“但是，我不打算写它。”

看来，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对许多事情都感兴趣，他观察事物的角度与众不同。

他说：“通过观察，我得出这么一个印象：大多数人对

周围发生的一切漠不关心。假如我现在跌倒在这条大街上，如果没人知道我是外国人的话，那么，谁也不会走上前来帮忙，问一声出了什么事。我要是横躺在人行道上，那谁也不会关心我出了什么事了：是心脏不好，或者有什么别的毛病。他们不仅不会叫医生，而且连警察都不会叫。怎么，不是这样吗？”

“您说得对，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完全正确，”我说道，“这样的场面您在纽约还会见到不少，而且还会遇到许多别的事。您瞧，美国有多少乞求恩赐的人啊。但他们不能明目张胆地站着伸手行乞。这是不行的。否则警察会将他们投进监狱。他们要装出一副‘干活’的样子：有的拉小提琴，有的背块招牌做广告，有的在一群看热闹的人面前装腔作势，有的则在马路上作画。每人都带着盒子或帽子：请行个好吧，给点儿钱吧，扔个硬币吧。”

肖洛霍夫说：“这个社会是富人的，并为富人服务的。它不可能符合工人们多少世纪以来努力追求的崇高而美好的理想。今天一个人不会向另一个人伸出援助之手，而明天另一个人也会冷酷无情。结果会怎样呢？”

这是肖洛霍夫在50年代末期说的话。那时，美国在联合国内还感到踌躇满志，一手操纵着用美元支撑起来的“表决机器”。而现在又如何呢？美国在表决时越来越陷入孤立。就连它的盟国有时也不理睬那一套，就更不用说其他国家了。

这难道不足以证明，蔑视他国人民利益的危险方针正引入政治死胡同吗？

当然，肖洛霍夫是观察当时的事实后说出这番话的。这

位人类灵魂大师的锐眼发现了本质的东西。

“不，这不是我们要走的道路，”肖洛霍夫在美国参观访问期间，遇到美国生活中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多次这样说。

在参观访问期间，也发生了一些可笑的事情。在参观依阿华州的拉塞尔·加斯特农场的时候就发生过这种事情。当时，主人把客人们邀请到玉米田里，想介绍一下玉米的栽培情况，可是，那里来了那么多新闻记者，使加斯特无法做他想做的事。主人十分生气，开始向这些新闻记者们投扔沉甸甸的玉米穗。

但是，这种热闹的场面丝毫没有使肖洛霍夫那天忧郁的心情有所好转。这位非常熟悉哥萨克村镇农民的风俗习惯的人，在美国这个僻静的角落里显然觉得很寂寞无聊。

“快到城里去吧，”他说，“我们在加斯特这位半富农、半地主的农场主这里有什么可看的啊。当然他为人并不坏。”

肖洛霍夫来这里的目的是首先是想了解美国的文化，而我们的日程安排中有关活动并不多。

在加斯特农场里，我们代表团收到的一份电报使我甚为感动，于是，我对肖洛霍夫谈了我对这封电报的看法。事情是这样的：加斯特与人合伙经营一家杂交玉米种子的大型公司。这个“加斯特与托马斯”公司本身又是美国最大的一家专门培育杂交玉米种子和种鸡、种猪的“先驱者”种籽繁育农场的一部分。这个公司的组织者是前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我曾到他经营的农场去做过客。

当加斯特拿出华莱士拍来的电报时，我的惊讶之情难以言表。在电报中，这位昔日的副总统欢迎我们代表团光临他

的故乡依阿华州并且祝愿两国代表团之间将要举行的谈判取得成功。

我给肖洛霍夫讲述了我几年前看见这位副总统农场主在纽约附近自己的农场里饲养雏鸡的情况。肖洛霍夫也对此感到惊讶，其反应几乎同我在华莱士农场时差不多。

“在哪儿，又怎样才能感受到美国文化的气息呢？”这个问题是肖洛霍夫在参观访问期间一直思考的问题。

有一次在谈话时，他说：

“在技术领域，这里确有成就，并且还相当大。正是那些搞技术并且占有它的人常常成为百万富翁。这样的老板一个个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这些人有成千上万之多。不是吗？而在文化领域，目前我看到的还尽是些消遣娱乐之作。那真正人道主义的、符合人民利益的文化到哪儿去了呢？难道这个文化就是在好莱坞给我们表演的‘康康舞’吗？怎么竟不感到羞愧……”

确实，我们代表团在访问好莱坞时，参观了“20世纪福克斯”电影制片厂，一群半裸的人装腔作势，好象在跳什么舞。我们不仅自己感到难为情，而且也为那些被迫为苏联代表团表演这个“节目”的人感到难堪。

在好莱坞，肖洛霍夫同美国导演查尔顿·赫斯顿进行了一次饶有趣味的谈话。看来，赫斯顿想讨好苏联作家，他说：

“您知道吗，我读过您作品中的一些片断。”

“我对此感激不尽，”肖洛霍夫带着善意的幽默说道，“等您导演的戏到我们那儿上演时，我也一定要看看其中的一些片断。”

在美国之行即将结束的那一天，他看了一会儿电视节目，

得出了一个毫不含糊的结论。他说：

“如果老呆在这儿看电视的话，那肯定会变成一个白痴！”

他对这次访问所做的总的结论是非常明确的。在回国途中，他对我说道：

“对您所从事的高级政治领域的情况我不了解。但如果谈到文化领域，那么，我们在美国人那里没什么可学的！”

我答道：“在高级政治领域，大概暂时也没什么好学的。”

在访问期间，肖洛霍夫表现十分谦虚。而美国人，甚至连美国的舆论工具也没有特别注意他。这些舆论专心致志地忙于报道那些他们觉得更为重要的人物和事件。很早以前，我就得出了一个十分明确的看法：大多数美国人，譬如说同欧洲人相比，很少看书，这便决定了他们对待作家，甚至是著名作家的态度。

电影、电视“明星”或者体坛“明星”，这才是能引起轰动，并相应地在电视荧屏或广播节目中应详细加以报道的题目。而作家却是“另一码事”，那并不是什么非报道不可的。

肖洛霍夫履行了诺言。据我所知，关于那次美国之行他只字未写。

鲍里斯·利瓦诺夫

我眼前浮现着独眼公爵波将金·塔夫里切斯基那魁伟的身影。这是莫斯科模范艺术剧院演员鲍里斯·尼古拉耶维

奇·利瓦诺夫在电影《海军上将乌沙科夫》中扮演的角色。

利瓦诺夫拍摄过30多部电影。不过，我仍然认为，这对他来说，并不算太多。实在可惜！当你欣赏他在电影中所扮演的角色时，你会觉得，他似乎生来就和银幕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把沙皇宫廷中恣意妄为的权臣那命令式的，但并不刺耳、略微低沉的声音模仿得惟妙惟肖。波将金有显赫的社会地位，一度曾是俄国专制君主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这些无论在历史科学中，还是在文学艺术中都得到充分的反映。利瓦诺夫将这一形象搬上了全苏联的银幕。

有一次，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对我说：

“我并不是立刻同意在电影中扮演波将金这个角色的。当人们提出建议后，我开始贪婪地翻阅那些有关波将金的书籍。我特别想知道他的外貌如何。我甚至还不得不在家里组织某种由波将金—利瓦诺夫参加的排练。而观看排练的观众只有一人，也就是那个利瓦诺夫，只不过站在镜子面前观赏。等我自信能成功地表演这一形象，才同意演这一角色。特别使我感到鼓舞的是，我的朋友和熟人都支持我。”

当然，很难想象利瓦诺夫—波将金同俄国女皇谈情说爱的场面。但是，导演显然不追求这些东西。这样做很好。

利瓦诺夫问我：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您喜欢我在《海军上将乌沙科夫》电影中扮演的波将金这一角色吗？”

同样的问题他也问过我们都认识的其他熟人。他对此很关心。

这个问题我是这么回答的：

“非常喜欢。在我心目中，当年活着的波将金就是这样的。如果说电影中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缺少破碎的酒瓶和决斗时搏斗的场面。但是，这部电影本来就不是讲骠骑兵习俗的，所以，这一‘缺陷’可以理解。”

我曾几次看过利瓦诺夫在莫斯科模范艺术剧院舞台上的表演。我坚信，有几个剧的全部重担都由他一个人“承担了”。

具体地说，我想用几句话来概括我对《罗蒙诺索夫》一剧的观感。这位既是学者、诗人，又是哲学家的巨人是最适合利瓦诺夫扮演的历史人物。他扮演了这一角色，并且演得非常出色！他还是这部戏剧的导演。

但是我觉得，同演员本领相比，他的导演水平明显逊色。戏剧里象实验室工作和一些莫明其妙的试验的场景太多，几乎喧宾夺主了。一些莫明其妙的机床在那里运转，只听见台上金属相击，叮当乱响。总之，舞台上占居主导地位的不是艺术的、创作的气氛，而是一种半生产性的气氛。观众总是提心吊胆，坐等不知什么东西马上会从机床中飞出来，可能是螺丝帽或螺丝钉之类的金属物。可以看出，导演的构思是非常巧妙的。但他没有充分考虑到，观众来剧院是希望在精神上轻松一下，是想陶冶自己的情操。如果能达到这个效果，观众是愿意友好地向男女演员鼓掌致谢的。

当然，剧场里坐无虚席。有掌声，也有鲜花，但总感到缺少一种戏剧所特有的吸引力。要知道，观众是骗不了的。

我总有一种明确的印象，利瓦诺夫知道，他在《罗蒙诺索夫》这出剧中的构思是有一定缺陷的。

这是可以觉察到的。就拿这样的例子来说吧。他不常谈

起《罗蒙诺索夫》这部话剧。另外，每当别人试图谈起这部话剧时，他从不接话题。

利瓦诺夫受过高等演员教育，但是在与他交谈时，并不感到他有职业上的片面性。他知识渊博，读过许多书，可以谈论科学和文化领域的各种问题。

我总觉得就其性格来说，利瓦诺夫最适合扮演具有豪放不羁、勇敢、叛逆精神、对警察暴政顽强不屈、以及反抗俄国社会在沙皇和女皇统治下的腐朽、苦闷生活这些特点的角色。其实，无论是波将金，还是罗蒙诺索夫，他们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都符合这位杰出演员的天然秉性。

他不仅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涅米罗维奇—丹钦柯，以及同莫斯科模范艺术剧院的同伴们——当代的表演大师卡恰洛夫、莫斯克温、列昂尼多夫、塔尔哈诺夫、格里博夫、塔拉索娃、安德罗夫斯卡娅——一起工作过，而且还同苏联电影泰斗们——弗谢沃诺德·普多夫金、亚历山大·多夫任科以及谢尔盖·爱森斯坦——一起工作过。同他们保持经常接触，无疑使这位天才戏剧和电影演员得益匪浅。

在私人交往中，利瓦诺夫同他的夫人叶夫根尼娅·卡济米罗夫娜待人都是真诚亲切的。每当回忆起我们在他们的社交圈子里（有时在利瓦诺夫家里，有时在我们家里）度过的一些愉快的夜晚，我和利季娅·德米特里耶夫娜都感到非常高兴。我们还记得，在利瓦诺夫家里聚会时，有时他们的儿子瓦西里也在场。他是一个严肃、庄重的小男孩，后来他也成了一名出色的戏剧和电影演员。

遗憾的是，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利瓦诺夫这位杰出的演员已经不在人世了。难怪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为他写下

了充满热情之言。他写道：“当我仿佛看到我国戏剧的命运、看到它有着空前美好的前景时，您是我常常想起的众多的人中的一个。”他的这些话是很有根据的。

多夫任科——导演兼哲学家

命运使我结识了一位才华出众的人，同他交谈令人感到愉快。他不仅是杰出的行家、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和电影艺术的专家，而且还是一位真正的大艺术哲学家。

这个人就是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多夫任科。我同他初次见面是在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利瓦诺夫家里。我们坐在舒适的沙发上，谈的话题好象是电影。但是，他总想离开这个话题，忽而谈艺术同生活的关系，忽而又谈他那不平凡的经历。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同您是同行。”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多夫任科眯着眼，狡黠地说道。

接着，为了消除我们的困惑和惊讶，他几乎一口气连下来说道：

“其实，我在年轻时干过一阵外交工作。当时吸收我参加这项工作的是老地下工作者、法国索邦¹大学毕业的法律学家、乌克兰外交人民委员德米特里·扎哈罗维奇·马努伊尔斯基。”

¹ 1257—1554年间巴黎拉丁区的一所神学院及其师生宿舍。从创办人路易九世的忏悔牧师索邦的姓氏而得名。1554—1792年间，指拉丁区的巴黎大学神学系。17世纪成为巴黎大学的别名。——译者

这回我可忍不住高兴地问道：

“怎么，您认识马努伊尔斯基？他是我国革命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是1906年爆发的喀琅施塔得和斯维亚堡^① 陆海军士兵起义的组织者之一。后来他参加了彼得格勒的十月武装起义，是彼得格勒革命委员会成员。在联合国成立时，我有幸同他在旧金山并肩工作过。他现在仍是乌克兰外交部长。”

“是的，确实是这样，”多夫任科证实道，“正是那个德米特里·扎哈罗维奇。在20年代初，他吸收我到乌克兰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那时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我在基辅任省人民教育厅书记兼省委艺术处处长。此外，我还是基辅舍甫琴柯剧院的委员。我后来离开基辅，来到了当时乌克兰首都哈尔科夫。”

我好奇地问道：

“您的外交生涯是从哪儿开始的？”

他答道：

“当时是不准人们悠闲地逛荡的，因而我立刻就被派到了波兰。于是，我在俄罗斯—乌克兰—波兰战俘交换遣送委员会里开始了我的外交生涯。一年后，我被调往柏林，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驻德国总领事馆的秘书。”

我又问道：

“您是怎样从外交工作转到艺术领域的呢？”

他答道：

“这里有一段不寻常的经历。事情是这样的：我自幼喜

^① 芬兰城市，现名芬兰林纳。1809—1917年属俄罗斯帝国，为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基地之一。——译者

欢学绘画。平时只要有空，我就画上两笔。后来，在柏林时，每天晚上下班以后我都是在“帮助艺术家”的画社里度过的。在那儿，在韦丁工人区，我在画架旁一画就是几小时。我的这种癖好不能不引起人们注意。于是，领事准给我一个长假，甚至还帮助我得到了乌克兰人民教育委员会的奖学金。规定每月给我40美元，于是我一心埋头于学习作画。我当时在著名的柏林表现主义者埃克尔教授开设的画社拜师学艺。虽然我还算是外交战线上的人，但是我明白，我未必能成为一名外交家。”

“后来又怎样了呢？”

“后来我回到了哈尔科夫，以便延长领取奖学金的期限和进入柏林美术学院。关于入学一事，我事先已与人谈妥了。但事与愿违。汉堡码头工人的革命起义^①使德国当局为煽动反苏运动找到了借口。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回到德国简直是异想天开。于是马努伊尔斯基打算将我派往喀布尔去。然而，我当时已经成了共和国报纸的漫画家，并且认为，这才是我的归宿。”

“那么，马努伊尔斯基是什么态度呢？”

多夫任科答道：

“他见我对外交工作既不爱好，又没才能，他嘴上虽然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但是，见我对外交事务三心二意，没有兴趣搞外交，也就放我走了。就这样，我由外交官改行当了艺术家。我的笔名是萨什卡，当地各界人士都知

^① 1923年10月23—25日，汉堡无产阶级举行的武装暴动。由于右派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破坏无产阶级的统一行动和当时居于德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布兰德勒—塔尔海默集团的严重错误，起义陷入孤立，未能继续下去。——译者

道我。我的作品经常刊登在报刊上。”

“您又是怎样涉足电影事业的呢？”我问道。

“很简单，在1926年时我突然认识到，应该在动态中，而不是在静态中，即应该在运动着的，而不是在静止不动的图画中试验自己的才能。在那些年代，有许多画家都从绘画创作中转到了电影界，例如，谢尔盖·尤特克维奇^①、列夫·库列绍夫^②、格里戈里·科津采夫^③。因此，这样做并非绝无仅有。我打点好行装，跟谁都没打招呼，买好车票就去了敖德萨。就这样，在敖德萨电影制片厂又出现了一位名叫多夫任科的导演。”

“您放弃了外交工作，从来就没有为此感到后悔吗？”

“只后悔过一次，”多夫任科说道，“那是在1926年，当我听说特奥多尔·涅捷^④，这位苏联外交信使被杀以后。我和他本人很熟，我们是在他给柏林送外交信件时相识的。他向我谈到自己同马雅可夫斯基之间的友谊。过了一段时间后，我读到了马雅可夫斯基写的诗《致涅捷同志——轮船与人》。后来，我也对此事表示了自己的态度。”

“什么方式？”

“我拍了一部片名为《外交信使包》的电影。就其体裁来说，这是一部政治侦探片，讲的是：在国外，一位身负重伤的外交信使从一辆飞速行驶的火车上跳下，爬到巡道工的岗亭前，指着装有给苏联政府的重要文件，请求将它送到指定地点，然后就死了。这个文件包经过许多工人——我国朋

①②③ 均为苏联著名电影导演。——译者

④ 特奥多尔·涅捷（1896—1926），苏联外交信使，为保卫外交函件在资产阶级统治的拉脱维亚被匪徒杀害。——译者

友的手，最后终于送到了目的地。”

当他回忆起拍摄该片的某个片断时，忽然变得兴奋起来。

“布尔什维克党员、外交信使在巡道工的岗亭里临死时的场面，我们是在敖德萨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棚里拍摄的。那天，土耳其外交部长要求来我厂参观。这样我们只得当着这位土耳其客人面拍摄外交信使牺牲的场面。他问道：‘那位快死的人是谁？’我答道：‘是布尔什维克。’部长称赞我说：‘导演清楚勇敢的人是怎样牺牲的。’正好，在这部影片里，我自己也扮演了将信使包藏在煤堆里的轮船司炉工的角色。您瞧，我就是用这种方式来缅怀我们亲爱的涅捷同志的。”

谈话快结束时，他压低嗓门说：“顺便告诉您，这是我在电影中所扮演的唯一角色。人们对《外交信使包》这部影片反应很好。”

在苏联的外交史上，的确有过这么一件事，即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同土耳其外交部长泰夫菲克·吕什蒂在敖德萨会晤。这次会晤是在1926年11月12—14日进行的。土耳其外交部长在苏联逗留的三天期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同他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谈。

后来，契切林回忆道：“我是怀着对会晤成果非常满意的心情离开敖德萨的。我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土耳其外交部长对我们在敖德萨的共同工作也是非常满意的。”

市民和市政府给予了客人们相当高的礼遇。甚至安排他们参观了敖德萨电影制片厂，观看拍摄新影片的过程。

土耳其客人是乘坐“雅乌兹”号巡洋舰抵达的。按海军的传统，苏联方面专门派出了“贫农”号驱逐舰来欢迎客人。

整个访问显示了两国间的友谊。

多夫任科有一个罕见的特点，甚至可以说是非凡的才能：他知人善任，善于建立一个由志同道合者组成的创作集体，他们都乐于持久不停和满怀激情地工作。他们甚至不象是在工作，而象是在娱乐，在玩成年人的大型电影游戏。在这个从表面上看来忙忙碌碌的大集体里，所有事情经常都要通过讨论、争论。难怪人们将他的摄制组称为“多夫任科议会”。

据说，他自己并不耻于向那些更懂行的人学习，例如，向灯光师、摄影师和演员学习。

有一次，我问他：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您是哪儿的人？”

“我是契尔尼哥夫人，在那儿的杰斯纳河畔有一个名叫威尼希的村子。我就出生在哥萨克农民彼得·谢苗诺维奇·多夫任科的家里。”

“那我们几乎是老乡了，”不知为什么，我由衷地高兴起来，“我是戈梅利人，第聂伯河和索日河从我们那儿流向契尔尼哥夫。”

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他善于将自己的观点融会贯通。他在表达自己的思想时，不同于一般的文化人士。那些文化人士为了使谈话对方五体投地，通常的做法就是用一些表面上耸人听闻的辞藻，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虽然这些词句本身是准确的，但只能表达某一种思想。而多夫任科却努力揭示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把这些现象加以概括。对于他来说，重要的不是人的行为的外部表现，而是其行为动机，也就是说，主要的是产生思想和行为的原因。

这种观点在他摄制的影片中也可感觉到。当我看《大地》

这部影片时，我觉得，影片要表现的是这样一种思想：“人们啊，请爱护我们的大地吧！”我认为，这就是该片的主要寓意。

在观看多夫任科拍摄的任何一部电影时，观众如果不是在看电影的同时，那么在看完电影后，就一定会渴望思索一下，这部影片的导演究竟想告诉人们什么。看过他影片的人对他的观点要么是赞成，要么是反对。

同他交谈时，我发现，他有一种思考问题的习惯，似乎是为了自己的需要，又似乎是在自言自语。他从不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人，而是努力为自己对某种情景所做的判断提供根据，进行解释，并使其更具有说服力。

不知为什么，我总把多夫任科与利瓦诺夫进行比较。这里的原因大概是，我常见他们在一起，而他俩代表了我们的艺术——戏剧和电影。他俩外表很不相象。多夫任科是中等个儿，外表整洁，神态端正，容易激动，而和他在一起的利瓦诺夫是大个儿，表面上看来，宁静安详，但内心蕴藏着随时都可迸发的激情。在艺术上，他们志同道合。利瓦诺夫对待自己的工作也是那样，深入和细微，也是那样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

在多夫任科交往的那些人中，他总是谈话的中心人物，尽管有时在场的还有比他年龄大的人。大家都想知道他对某些同艺术和我国文化发展有关的问题的看法或态度。难怪闻名遐迩的导演、苏联人民演员谢·阿·格拉西莫夫^①在多年之后对多夫任科的创作作出下面这样一个评价，他说：

“多夫任科的每部电影作品都是完全合乎当今时代要求的。”

^① 苏联电影工作者协会理事会书记，曾任苏中友协副主席。——译者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开始参加电影创作时，年龄比学院的毕业生大，他初次当电影导演时已经32岁了。在此之前，他当过老师，作过画，甚至象我已说过的，还当过外交官。我同他交谈时，他已是我国电影界知名的电影大师了。如果有人问我，在他身上我首先发现的是哪些品质，那么，我会不假思索地告诉他：

“非常通情达理和谦逊。”

多夫任科是一个喜欢交际、精力充沛的人。他总是声情并茂地讲述他自己导演的新影片的情况。今天，仍有充分根据地说，他是苏联电影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所拍摄的影片，如《兵工厂》、《大地》、《肖尔斯》，成了苏联电影宝库中的瑰宝。在我认识他的那些年代里，这些影片一直很受欢迎。

在我的记忆中，同多夫任科的朋友和妻子尤利娅·伊波利托夫娜·索恩采娃谈话也使人感到很愉快。她在《阿艾利塔》和《莫斯科农村工业的烟盒》这两部影片中扮演过角色，并一举成名。还在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在世时，她就帮助他搞摄制工作。在他死后，她将他的许多设想变成了现实，拍摄了《海之歌》、《火热年代的故事》、《迷人的杰斯纳河》等优秀影片。

以多夫任科命名的电影制片厂和苏联许多电影工作者至今仍保持着他的传统。

“亚历山德罗夫一家”

当住在别墅时，我们和亚历山德罗夫^①一家是邻居。

^① 苏联电影导演，苏联人民艺术家。苏联音乐喜剧片的创始人之一。——译者

第一句话刚落笔，连我自己都感到惊奇。既然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是独具一格的创作家，怎么能用“亚历山德罗夫一家”这一个词来称呼他们呢？

也许不行。

是不行的，因为他俩的名字是分别地载入苏联电影业史册的。

他——电影导演格里戈里·亚历山德罗夫，是许多优秀影片的创作者。

她——电影演员柳博芙·奥尔洛娃，是一位热情奔放、活泼开朗的歌手和舞蹈家。她每次在银幕上出现，都会使千百万观众感染上乐观情绪和蓬勃的朝气。

然而，用一个词来称呼他们还是可以的，因为他俩结成了一个出色的创作集体，共同创作了一些优秀的苏联电影，它们至今还能吸引广大观众，还在电视上播放，能扣人心弦，使观众和影片中的主人公情感交融，悲喜与共。总之，这些影片早已名列经典，成了我们的骄傲。《快乐的人们》、《大马戏团》、《伏尔加啊，伏尔加》、《光明之路》、《春天》等影片中的每一部都是电影艺术的新发现、新成就。电影界的行家至今还认为，正是这些影片奠定了苏联音乐喜剧片的基础，这并非偶然。

可以用一个词来称呼他们，还由于他们是夫妇，而且他们的关系是建立在心心相印、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

作为邻居，我们交往相当频繁。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和柳博芙·彼得罗夫娜经常来我们家，我和利季娅·德米特里耶夫娜也常是他们家的座上客。每逢有什么值得庆贺的事或什么纪念日，亚历山德罗夫家总是宾客盈门，这时候，

我们也去参加。有时，在他们的客厅里只有我们4人聚会。

柳博芙·彼得罗夫娜是一位殷勤好客的女主人，她既会待客，又擅长唱歌。她最能创造出一种无拘无束的气氛。不管来客多少——是20位，还是两位，对她来说，都无所谓，重要的是，客人已光临，这就意味着已经有了观众和听众。她容光焕发、喜气洋洋，喜欢开开玩笑，讲些滑稽故事。一句话，这个家里的女主人总是引人瞩目，一直处于客人注意的中心。她从不让客人感到无聊。她善于同每个人相处，使人对她产生最愉快的印象。这位女主人身材苗条，仪态端庄，动作优雅，她的在场是对客人们的最好款待。她穿着不太考究，但打扮得很有风度。总而言之，她不是靠浓妆艳抹，而是以自己的质朴无华和平易近人给人留下印象。这就是她的天性。

我一向欣赏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对她所持的敬重态度。

譬如，他说：“柳博芙·彼得罗夫娜，我们已经在壁炉旁坐了一会儿，谈了一会儿了，现在该喝茶了吧。您看怎么样？”

而她立即回答说：

“我一切都准备好了。”

关于他如何对待柳博芙·彼得罗夫娜，可以根据这样一件小事来作出判断。有一次，一位客人讲了一个故事，夸奖了某一位女人的长处。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表示：

“我想请求诸位在这幢房子里不要谈论别的女人。这儿只有一个女人，她就是柳博芙·彼得罗夫娜。”

当然，女主人本人对他的话做了一点修正：

“这只是对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而言。”

在这一对儿人身上，真是什么都平分秋色：无论是他那欢快的才智，还是她那奔放的热情。

是的，柳博芙·彼得罗夫娜善于在家里创造出一种愉快的节日气氛，哪怕是在令人沮丧的、寒冷的冬夜也是如此！

“名演员不好当吧？”有一次，我这样问她。

“可也很愉快。”她高兴地答道。

我听说，亚历山德罗夫是一位幽默大师，导演过许多出色的喜剧片，在电影制片厂里与自己的同事相处时总保持恰当的严肃态度，但精力充沛，办事认真，待人总是彬彬有礼。他在全苏国家电影学院执教，学生们对他的每一句话都很注意。

而我对他的了解，更多的是在家庭的环境里。这时他可以无拘无束，但他还是他，正如千百万观众在电影里所了解的那样，依然是个机敏风趣、慷慨奉献自己才华的人。他善于轻松愉快地自我打趣。

“我们拍摄了《战舰‘波将金’号》电影，”他说，“那时我是这部片子的两导演之一。结尾处有这样一个场面，暴动的水兵把军官们从舰上抛到水中。拍电影时已是秋天了，水很凉，扮演军官的演员们拒绝下水。于是，我说：‘把军官的服装给我穿上。’他们帮我穿好，将我抛到水中，然后再从另一地方往下抛，这样反复抛了几次，直至象脚本要求的那样，把所有军官都扔下水为止。这些镜头总算拍摄出来了。”

这难道还不能证明他非同凡响的气质和奔放不羁的工作热情吗？

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还对我讲述了第一部苏联音乐

喜剧片《快乐的人们》的创作过程，拍摄这部片子是多么费劲。

“那是1934年，”他说，“甚至连一些著名的作家和诗人都反对上映我们这部影片。”

“那么，是谁帮了忙？最后又是怎样搬上银幕的？”我对此很感兴趣。

“起初是高尔基，”亚历山德罗夫答道，“影片送到了他休养的地方哥尔克村^①。作家把村子里的居民和许多孩子们都叫来。在放映的过程中，全场观众不时哈哈大笑。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喜欢这部喜剧，他建议说：‘我们把它放给斯大林看看。’高尔基亲自去谈妥了这件事。”

“那后来呢？”

“后来嘛，斯大林邀请政治局委员们同他一起去看电影。他们来到了位于格涅兹德尼科夫斯基街的国家电影摄影工业管理局。那时党中央还没有自己的放映厅。这个管理局的局长鲍里斯·扎哈罗维奇·舒米亚茨基对我说：‘我只放两盘。而你就坐在隔壁的剪辑室里。如果他们想继续往下看，你就说还需要对影片做最后加工，不愿象现在这个样子就拿出来。懂吗？’其结果，好象是我们有意想抬高影片的要价。两盘片子放完了，斯大林说：‘把全部片子都放完。’人们对他说：‘导演想重新剪辑一下。’斯大林表示反对。舒米亚茨基答道：‘那好，现在就放。’他出来对我说：‘去接受裁判吧，他叫你。’我走进大厅，声明说：‘也许，这部片子还没有搞好。’但没人搭腔。他们要求：‘放吧。’我把片盒交给了放映员。当电影放完后，斯大林说：‘是一部非常

^① 苏联莫斯科州列宁区的村镇。——译者

快乐的影片。我好象度了一个月的假。把它放给所有的工人和庄员们看看是有好处的。’然后，他又出人意料地总结说：‘你们把片子从导演手中拿走，否则他会把它搞糟的。’”

影片上映了，先是轰动了全国，很快就风靡全世界。就在1934年举行的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苏联电影获得了优秀节目奖杯，这套节目是以影片《快乐的人们》开头的。

在30年代，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观看了这部电影，而不久前，我仍怀着同样的兴趣再次欣赏了此片。

查理·卓别麟看了影片《快乐的人们》后说道：“人们在愉快地、兴致勃勃地欢笑。这是个很大的胜利。这比用打枪放炮和发表演说来说论证事物有更大的宣传效果。”

6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行了一部《世界优秀喜剧》影片。其中选辑了各国喜剧片的片断，用一个片名把它们汇集起来了。从苏联电影中只选了一段情节：影片《快乐的人们》中音乐家们在殴斗的场景。

亚历山德罗夫创作了近30部影片，其中的每一部都在电影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您认为自己导演的哪一部片子最好？”有一次，我问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

“《伏尔加啊，伏尔加》。”他毫不犹豫地答道。

“而您呢？”我转向奥尔洛娃问，“您认为哪一个角色扮演得最成功？”

“《伏尔加啊，伏尔加》中斯特列尔卡的角色。”她也不假思索地做了回答。

瞧，这俩口子就是这样别具一格地和谐一致。

散步时的谈话

在莫斯科近郊的一个休养所里，我遇见了科尔涅伊·楚科夫斯基¹。我在那儿是例行度假。他也到那儿去休养。

每逢傍晚，我都习惯出去散散步。在休养所，因为有时间，连白天也去溜达。那时，我意外地发现楚科夫斯基也是一位喜欢散步的人。这一次，我们不知怎么地突然相识了，并开始一起散步。

他以颇有风趣和谈话引人入胜而闻名。他个子高高的，有一张漂亮的知识分子的面孔，衣着整洁而神态端正，一头蓬松的银发，走起路来从容不迫，毫无倦态。瞧着他，令人心里愉快。他与我并排走着，嘴里总是说个不停……从他那儿听到的许多事情，令人难以忘怀。科尔涅伊·伊万诺维奇的语言形象生动，通俗易懂，他善于把复杂的问题表达得简单明了。这一切使人觉得他是一位擅长于讲故事的人。

现在已有不止一代的小读者们在不断背诵他笔下的《饶舌的苍蝇》、《莫伊多迪尔》、《哎哟，疼啊》、《电话》、《蟑螂》等儿童读物中那些滑稽可笑、脍炙人口的段落。我的孩子，然后是我的孙子们都爱读他写的诗歌，可以说把书都读烂了。他那本再版多次的文学散文《从两岁到五岁》一书，已成了经典之作。

他这部分文学作品，大概是尽人皆知的。但他的另外一部分作品——不仅专家，而且许多读者也都熟悉。他是一位广义上的文学家，是个认真地研究过俄罗斯和苏联文学的人，

¹ 苏联俄罗斯作家、文艺学家。——译者

并有精辟的著述。他是高尔基的密友，勃洛克^①的好友，马雅可夫斯基、库普林^②的老相识，契诃夫的学生。许多文学家都把他视为文学界的同行。

但是，不仅仅是作家们很了解他。他与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③的关系密切，也常常与画家列宾会面。

所有这一切，我都是在同他一起沿着古老公园的林荫小道长时间散步时获悉的，他饶有兴味地讲述了我国许多名人的轶事。他们有的生活在上一世纪和本世纪之交，有的就生活在我们这一世纪。

科尔涅伊·伊万诺维奇说：“我真心地喜欢列宾，所以才这样经常地回忆起他来。长期的友谊把我和他联结在一起，甚至苏芬边界也不能把它隔断。列宾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住在芬兰。我曾多次去过闻名的佩纳特^④，不仅很了解伊利亚·叶菲莫维奇^⑤，而且同他的家庭以及所有亲友都很熟。”

科尔涅伊·伊万诺维奇善于通过讲述一个人的家庭及其个人生活来反映这个人的社会面目，他的事业对国家和人民的意义。

他讲道：“列宾拼命地工作，他毫无保留地将自己奉献给了心爱的事业。偶尔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形，他似乎想背离绘画中的现实主义路线，但每一次他都“回到原路”上来。于是，他立刻就会把那件“心血来潮”时动笔的作品放下，

① 俄国诗人（1880—1921）。——译者

② 俄国作家（1870—1938）。——译者

③ 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作家，评论家。——译者

④ 位于列宁格勒附近的列宾诺镇（旧称库奥卡拉镇）。列宾于1899—1930年居住此地。——译者

⑤ 列宾的名和父名。——译者

着手创作符合其主流的、现实主义方向的新画。因此，他一生都在坚持这个方向。”

对于任何一个从事创作的人来说，他在家庭中的关系，以及个人生活都是很重要的。部分地是由于这一原因，当然有时也有其他缘故，科尔涅伊·伊万诺维奇指出了伟大画家的第二个妻子在他生活中所起的消极作用。

“总的来说，她是一位有文化、有教养的女人，”他讲道，“但是，她是个狂热的信徒。而且善于把自己特殊的日常生活方式强加给伟大的画家。列宾的身体不是很健壮，他当然应该吃得好些。可她却要培养一种荒诞古怪的素食习惯，或者象他的熟人们开玩笑时所说的，强迫人吃青草。”

楚科夫斯基说：“有一次我动身去他那儿，一个当地的居民碰见我并对我说：‘您又要到那位吃草的画家那儿去吗？’”

“怎么，他真的就不能拒绝她规定的食谱吗？”我问道。

“看来，他没能做到。虽然许多熟人都说他这个狂热的妻子的新发明不会导致什么好结果。当他去世时，大家流露出对她有点儿责备的意思。她实在不能再继续留在以前她同列宾一起住过的地方，便去了瑞士，并死在那里。”

他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下，尔后接着说：

“应当说，我本人就充当过她所举办的筵席的牺牲品。参加过这种宴请的客人，饭后都愿去邻居家或者到附近小吃店再去补吃点儿东西。但我想提请您注意一个情况：这位喜好素食的狂热信徒是很有性格的人，并且在某些方面对列宾产生了相当有益的影响。但遗憾的是，人们对此了解甚少，更多的是责备她所搞的荒诞的试验。”

关于卢那察尔斯基，我从楚科夫斯基谈话中所了解的情况同从其他人那儿不止一次听到过的基本相同，那就是他擅长讲演。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科尔涅伊·伊万诺维奇对卢那察尔斯基充分肯定，备加推崇，对他作出了这样的评语：

“我十分钦佩人民委员善于就任何题目、在任何时间、面对任何听众发表演讲的才能。”

他讲道，为了专门听卢那察尔斯基的演说，他曾多次陪同过这位人民委员外出。而且卢那察尔斯基每次演讲时阐述问题的艺术都使所有在场的听众为之倾倒。

大家知道，1933年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被任命为驻西班牙全权代表。他肩负着自己的外交使命出发了，已经越过法国国境，但到达巴黎时他病倒了。根据医生的建议，他到法国南部一个供疗养的小城——芒通去了。他就在那里逝世了，到底也未能抵达马德里。

我同楚科夫斯基还谈过其他一些人。

科尔涅伊·伊万诺维奇在文学艺术方面知识渊博，对我国著名人士的作品了如指掌。他不只是讲述他们的情况，而且对有人听他的故事感到是一种享受，哪怕听众只有一个。

有一次散步时，他对我讲了一点儿他自己的情况。他仿佛是从旁边观察自己，因此带着某种坦率的幽默感讲述自己的事。

“我们共有兄弟俩，”他讲道，“哥俩都想念书。为此来到了敖德萨，希望能上中学，但我们未被录取。他们说，我们的水平差了点。但总不能回到自己的小城镇去吧，那样好象有点儿脸上无光。于是就决定：租间房子，找个工作，

准备来年再考。我们就这样做了。我们去码头当装卸工，挣到了钱，够维持生活的了。每天晚上坚持学习。就这样准备了一冬天。翌年，我们终于被录取了。上完各学科的课程后，我意识到，我的天赋是在语言方面。我开始在报社工作。就这样，开始了我的文学生涯。”

“您所走的路在某种程度上同高尔基的文学道路相似。”我说。

好象是回答我这一插话，他谈起了自己同高尔基交往的印象。

“我非常了解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科尔涅伊·伊万诺维奇活跃起来了，“他具有同为数众多的苏联作家，其中有刚开始创作的作家，保持各种接触，包括职业性接触的非凡才能。高尔基不喜欢别人对他说赞扬的话，尤其是当着他的面。谁要是贸然这样做了，一定会落入尴尬的境地，因为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不会放过机会给他以礼貌的，但却是寓意深刻的教训。”

从楚科夫斯基对高尔基的讲述中可以明白，他把高尔基当成自己崇拜的偶像。他似乎可以没完没了地谈论高尔基。同时我也发现，他在谈高尔基时和谈列宾不同，未提过这个人的身体状况。于是，我问道：

“关于高尔基的健康状况，您知道些什么？”

他说：

“高尔基早就身患重病。他患的是肺病。因此他经常离开莫斯科去外地，有时遵照医嘱去克里米亚，到福罗斯^①地区去。”

① 在苏联克里木州境内，位于黑海岸。——译者

楚科夫斯基早在革命前就认识高尔基，并一直推崇他。

他说：“这个人把自己的一切都无私地献给了文学事业。他有时会流露出喜爱之情，但只有当他谈论起孩子、杰出的人物和优秀的书籍时才会这样。”

他沉默了一会，我们沿着公园的小径走了几步。他又回忆起高尔基，兴致勃勃地接着讲：

“他对文学工作者给予的帮助可真大啊！他象园丁对待娇嫩的花朵那样精心地培育他们。记得在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生命的最后一年，当时他已重病缠身，还给我寄了一封长信。在信中，他给我提出了一些关于应怎样为小学生写书的极其宝贵的建议。我当时不知道他病得这样厉害，所以向他求教。而他却从自己本来就很有限的的时间里挤出了不少来给我复信。而且他自己还送给了我一些钱，以便我能有一两年的时间安心写书，在物质上不发生困难。这真是个好绝顶的好人！”

尔后，科尔涅伊·伊万诺维奇归纳了自己的看法，说：

“对于高尔基来说，写这样的信根本算不上什么例外。相反，这可以称做是惯例。不论哪一位文学工作者向他求援，都可以指望能从他那儿得到忠告和同情。这位苏联文学的元帅，就是这样一个平易近人和有信必复的人。”

他自己对突然想到的这个词也感到惊讶，然后又重复说：

“是的，元帅……在我们苏联文学界再没有高于他的人”了。”

我也喜欢这个形象的比喻。

当然，不能将文学家同军人类比，也不能将文学同军队相提并论。早就人所共知，一个国家的文学好就好在有许多

阅历不同、才华、风格各异的文学家，他们在一起工作，各显其能。然而，我们还是不时地说“文学工作者大军”、“作家大军”。

帕维尔·科林的生活片断

我对帕维尔·科林^①十分了解。我们之间交往甚密。关于他的功绩，可以讲出许多。他被授予造型艺术代表的最高荣誉称号“苏联人民艺术家”，并非偶然。他曾因修复德累斯顿绘画陈列馆^②的藏画而闻名。他出色的镶嵌艺术图案装饰着莫斯科的“共青团环形路”地铁站，而他的优秀画卷则陈列在特列季亚科夫国家美术馆^③里。

他很晚才开始自己画油画，但他所完成的每一件作品都是杰作。这些油画的特点是图案严谨、细腻，构思宏伟，形式完整，人物具有内在凝聚力。他也是一个出色的肖像画家。他所画的人物肖像，可以使人感到既有专注的意志，又有高尚的情操。

这位才华横溢的画家在苏联的绘画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他的绘画广为人知：一个个威武强壮、膀阔腰圆的俄罗斯勇士，深信自己的力量，安详而自豪地从画面上注视着人们。使人觉得这一个个勇士马上就要开口讲话，他们说：

“我们保卫了，并将继续保卫自己的国土，保卫祖国。全世界都应当知道这一点。”

他被认为是独树一帜、不可多得的画家。他出生在素负

① 苏联画家，人民艺术家，也是修复古画的专家。——译者

② 世界上最大的收藏绘画陈列馆之一，在民主德国德累斯顿。——译者

③ 俄罗斯和苏联艺术博物馆，在莫斯科。——译者

盛名的帕列赫^①，这对这位自学成才的画家的整个创作道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在那里，在那些帕列赫圣像画家中，他已经以自己的严肃态度而与众不同了，并且表现出继续学习绘画的强烈愿望。

帕列赫至今仍然是一个颇有名气的城镇。没有它的艺术，我国的文化就会贫乏得多。就是现在，帕列赫画家的名声也丝毫不比过去逊色，甚至要更大些。革命前，人们首先是为了买到奇异别致的圣像而去帕列赫。现在它那无与伦比的装饰画受到全世界的重视。每一个观赏帕列赫画师作品的人，都对他们在自己著名的画室中创作出的精湛美妙的风景画和风俗画交口称赞。

我与帕维尔·科林是在60年代初结识的。有一次，我们一起在莫斯科近郊休养。他对造型艺术中的各种流派有深刻的了解。他能整小时地用平稳的声音慢条斯理地讲述着各种不同流派画家的创作。他好象是从一个永不涸竭的源泉里汲取故事的题材。在交谈过程中，他不时地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

我根据记忆写下了他所讲述的故事中的一些片断，并想重温一下：

片断之一……革命前的莫斯科。1916年。帕维尔·科林即将在莫斯科绘画、雕塑及建筑学校毕业。他的老师中有著名画家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涅斯捷罗夫^②和康斯坦丁·阿列克谢耶维奇·科罗温^③。他这个勤勉的学生对两位

① 著名的俄罗斯民间艺术之城，以纸胎漆器彩绘著称。——译者

② 苏联油画家，俄罗斯联邦功勋艺术活动家。——译者

③ 俄国画家。现实主义外光画的杰出大师。——译者

导师都怀着真挚感情。而他们在生活中也确实教给了他不少东西。

涅斯捷罗夫教他爱好读书和文学。

科罗温使他以新的态度对待画家的创作。年轻的科林在学校时，正是从他那儿听到了这句铭记终生的话：

“您具有惊人的绘画才能。”

根据他的建议，科林向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著名绘画大师米开朗琪罗和列奥纳多·达·芬奇学画。他在尸体解剖间里度过了漫长的时间，悉心研究肌肉、骨骼，以及处于各种姿势和用透视法缩绘的整个人体。这种工作是令人不堪忍受的，然而后来，作为一个画家，他对人体了如指掌，无论是婴儿、漂亮的姑娘、成年男子，还是年迈的老人，用不着看模特他就能画出来。请您仔细地看看随便哪一幅科林的油画，画上的人物都是惟妙惟肖！

他对康斯坦丁·科罗温的创作评价很高。他们师徒俩在艺术上所走的道路不同，但他们的创作基础始终是现实主义。

革命后，过了一些时候，科罗温到国外去了，定居在巴黎，生活很贫困，靠偶尔挣到的钱勉强度日。科林为创作事务到法国出差时，在一个画展上看到了自己从前的老师——外光画大师的油画。

就在那次画展上，他也遇见了科罗温本人。科林抑制住难堪的感觉，走上去同他打招呼。他们攀谈起来。

不久，科林决定拜访住在巴黎远郊的科罗温。花了很长时间才抵达他的住所。他那套面积不大的公寓住房，一眼就看得出非常寒酸。

“您出了什么事？”科林问，“您现在为什么画得这么

少？”

科罗温答道：

“我自己也不清楚，要么是出了什么毛病，要么是法国对我不理解。”

要知道，在祖国，人们对他是多么赞赏啊！

简陋的住所，褴褛的衣衫，使科林大为惊讶，因为就在不太久前他还被认为是俄国最著名的画家之一。

“真为科罗温感到惋惜，”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对我说，“他曾是艺术界一位名声赫赫的人物。出走国外，脱离祖国，使他作为一个作家销声匿迹了。因为离开祖国，他自己受到了报应。每当遇见同乡时，他似乎总有一种怅惘气馁之感。

同科林一起去拜访科罗温的还有夏里亚宾^①的妻子。科林刚提到此事，我当即插了话。

“顺便想提一下，”我对他说，“我和利季娅·德米特里耶夫娜有一次在意大利的“雷克斯”号远洋轮船上碰见了她。是的，是的，不是在法国首都的某个沙龙里，而是在从欧洲到美洲的途中，在大西洋上。那时我动身去苏联驻华盛顿使馆工作。我们在轮船的电影厅里遇见了，并同她交谈了一会儿。那时我们注意到，她神情有点儿忧伤。毫不奇怪，此前不久，她的丈夫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夏里亚宾去世了……”

片断之二……1942年秋天。大概是卫国战争中最艰难的日子。斯大林格勒的战斗正在进行，敌人扑向巴库。在画家工作的画室里，没有生火，寒气逼人，窗户上的玻璃都被空

^① 俄罗斯男低音歌唱家，共和国人民艺术家。1922年起移居国外。——译者

袭时炸弹爆炸的气浪震掉了。

科林正在画《亚历山大·涅夫斯基》^① 这幅历史题材的油画。他花了很长时间来探索他所需要的形象。有一次，突然想到了什么。

他想起了自己的帕列赫，邻近村子里的一些庄稼汉常到那儿打季节工。那时，在他看来，他们一个个都是壮士，因为就是在干完重活之后，他们走起路来仍象雄赳赳的军人一样，挺拔整齐，身材高大，对自己的正义事业和胜利满怀信心。他们是民间传说中英雄人物的化身。在那严峻的时刻创作出的三连画《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就是这个样子的。

在那些日子里，画家几乎是夜以继日地工作。

1942年，在特列季亚科夫国家美术馆举办的“伟大卫国战争”全苏画展上就已展出了这幅画。每一个爱国者看见这幅画，心里都会为我们祖国的过去而感到骄傲……

片断之三……战后，在柏林城郊的巴伯尔斯贝格，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完成了他那幅著名的肖像画《朱可夫元帅》。

“我没有权利无所事事地长时间坐在这里。”元帅说道。他的时间总是不够用。

科林总共9次就完成了这幅肖像，其速度之快，对他自己来说也是不寻常的。当朱可夫初次看到还未从画架上取下的自己的肖像时，立即就喜欢上了这件作品。

科林说：“这是我唯一不愿与之分手的肖像。如果可以的话，我将把它留在自己的画室里。”

的确，朱可夫元帅的肖像是画家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但

^① 古罗斯诺夫哥罗德公及弗拉基米尔大公。——译者

这幅肖像是根据艺术事务委员会的订货而画的。通过这个委员会，科林结识了朱可夫，并得到帮助以实现波茨坦之行。

他不得不同肖像分手。自那时以来，这幅画一直是特列季亚科夫国家美术馆所陈列的这种风格绘画中最好的作品之一……

科林以及他的学生普拉斯科维亚·吉洪诺夫娜（10年之后，即从1926年起成了他的夫人）都酷爱绘画。他们在自己家里收藏了大量的艺术佳作。早在30年代初，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就开始了收集工作，而至60年代中，他们的家已成为真正的画廊了。

科林总是亲自向参观者展示他的藏画。这里有成为稀世之宝的中世纪罗斯时期的艺术作品，它们都出自很有才华和较高审美观的大师之手。

其实，这幢房子早就成了博物馆。后来，根据画家的意愿，在他死后，在这里开设了著名的特列季亚科夫国家美术馆的分馆。它的大门一直向科林的朋友们热情敞开着，而其朋友之多真是数不胜数。比如，我的密友鲍里斯·利瓦诺夫^①就自称是画家画室中的“常客”。

科林的家里不仅有出色的绘画，而且以稀有的藏书而闻名。莫斯科的旧书商了解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的嗜好，并专门为他收集珍贵的版本。

“情况是这样的，”他讲，“我收藏书籍的爱好比收藏绘画作品还要早。”

是啊，这幢房子里的绝妙的绘画与同样出色的书籍是互为补充的。

^① 苏联演员，苏联人民艺术家。——译者

我和利季娅·德米特里耶夫娜也在自己家里接待过科林夫妇。

有一次，我们在家庭会议上决定购买一幅不大的萨夫拉索夫^①的画，在莫斯科的信托商店里只是偶尔能看到这样的画。画面上绘有草木丛生的池塘——这是对大自然魅力的惊人揭示。萨夫拉索夫的浪漫主义使人为之折服。我们决定先请专家看看。人选自然就落到了好友帕维尔·科林的身上。

我们邀请他和普拉斯科维亚·吉洪诺夫娜到家里来。我们什么也没对他说，只是将画放在地板上。他刚走近通向客厅的敞开着门，看到了画，并没有走近前去，就立即以他特有的声调，平静地、一字一句地说：

“这是萨夫拉索夫呀。”

我们当时都赞叹不已。从那时起，萨夫拉索夫的画就在我家落户了，并每时每刻都使我们赏心悦目。

帕维尔·科林已不在人世，但他的绘画和那幢博物馆，都是这位伟大的画家和谦逊的人留给后世的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

帕斯捷尔纳克说过的话

我早在青少年时代，就对我国文学界杰出的天才代表帕斯捷尔纳克^②的作品发生了兴趣。他写的诗歌和散文，以及从英、德、法语翻译过来的译著（他精通这些语言）证明，

① 俄国巡回展览派画家。俄国现实主义风景画的奠基人之一。——译者

② 苏联俄罗斯作家，作品有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革命历史长诗《1905年》等。——译者

这是个才华超群的人。

只是在50年代初，我才有幸同帕斯捷尔纳克结识。我们有一些共同的朋友和熟人。

在他们中间，我和利季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对作家康斯坦丁·费定^①和鲍里斯·利瓦诺夫（关于他的情况我前面已讲过）怀有特别的好感。这些人无拘无束的谈话风度，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我们谈话的题目好象都是不知不觉、自然而然产生的。利瓦诺夫思路大起大落、难以捉摸，而谈起戏剧生活来又妙趣横生、一针见血，这些总是引起人们的兴趣。不论是在流利有力的讲述时，还是在简短明快的评论中，他从不使用轻佻的语言，更不要说庸俗的词句。

费定喜欢以他那矜持的纯理性的态度，从容不迫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在交谈中，不管涉及什么题目，他都是如此。同时，他既能象教授、作家、政治家那样，也能象个普通人那样讲话。在听众面前扮演这样的一些角色，对他来说不费吹灰之力，不仅如此，这一切看起来还十分自然。

在他们这个圈子中，我得以同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见面。

这事发生在1952年，我们在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利瓦诺夫家做客的时候。在那次无拘无束的谈话中，参加的人有：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电影导演亚历山大·多夫任科和他夫人尤利娅·索恩采娃、康斯坦丁·费定以及其他一些

^① 苏联俄罗斯作家，社会活动家（1959—1971），曾任苏联作协书记处第一书记。其三部曲《早年的欢乐》、《不平凡的夏天》和《篝火》中前两部曾获1949年苏联国家奖。——译者

我们文化界的人士。

气氛是轻松自如的。大家开着玩笑，讲述自己生活中的趣事，竞相斗智说俏皮话。但当有谁站起来举杯祝酒时，大家马上就安静下来，注意地听他说话。

瞧，帕斯捷尔纳克站起来了……

可以完全有根据地说，他在我国的文学上留下了自己深深的印迹。恐怕未必有谁会否认，这是个才华横溢的人物。甚至可以这样说：假如帕斯捷尔纳克其他什么事也没做，只给俄罗斯文学留下了自己的莎士比亚和歌德作品的天才译著，那么他的功绩就已经相当可观了。但要知道，他另外有些译著也是举世闻名的：从英语译过来的雪莱的作品，从德语译过来的席勒的作品，从法语译过来的魏尔伦^①的作品等。

仅仅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就是立下了丰功伟绩。这些译著为大家所公认。只需听听象米哈伊尔·肖洛霍夫、康斯坦丁·费定、亚历山大·考涅楚克^②这些杰出的语言大师的意见，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对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备加赞誉。

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反映出他有诗人的天赋，渊博的学识，广泛的兴趣。这一切本身就证明他对苏联文化有着重大影响。

作为文学家和翻译家，他名垂千古。但在生活中，他却是一位很谦逊的人，从不提及自己的才华和特长。

① 法国象征派诗人。他的抒情诗以描写复杂的内心世界见长，富于暗示的音乐性，代表作有《无言之歌》、《智慧集》等。——译者

② 苏联乌克兰剧作家，国务活动家，1933年因剧本《舰队的毁灭》而成名。发表过著名剧本《前线》、《在乌克兰的草原上》等。5次获苏联国家奖、列宁国际奖。

——译者

……就是那天晚上，他只发表了个简短的讲话，只字未提自己的功绩。可是，那时他为国家，为苏联文学已经做了不少事情。

帕斯捷尔纳克说：

“我想强调指出，我国的文学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已经取得巨大成就。”

他提到了许多苏联作家和诗人的名字。他认为，这些人是我们文学的骄傲。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帕斯捷尔纳克好象顺便地也提了一下翻译问题。他所表达的思想有一个倾向，即：

“苏联作家拥有巨大的可能性来显示自己的才华，并且同我国过去的创作相比，可毫不逊色地把一些有意思的作品奉献给人民。”

为此，他指出：

“每个作家，不管其才能大小，都应有自己的特色。任何想实行某种统一标准的企图都是行不通的。它只能束缚艺术家的灵感和情感，束缚其反映生活和揭示人的内心世界的的能力。”

那时有些作家常说受到某些条件的限制，但帕斯捷尔纳克讲话时对此却没有任何苟同的暗示。他没有一点儿不满的情绪。

我对多夫任科说：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我觉得，帕斯捷尔纳克的行为是高瞻远瞩人士的行为，他们在评价国家文化生活中的某些事件时，首先是从原则立场出发，而不是只通过‘我’个人的视角来观察。”

多夫任科回答说：

“我完全同意这种看法。”

那时，帕斯捷尔纳克为苏联作家，为我们的文学而举杯祝酒。

关于小说《日瓦戈医生》，我应当说一下自己的看法。这本书在国外出版后，我们国内对它进行了批判。这种情况的发生，不能说是正常的。批判本身看起来就似乎象是某种唯意志的行动，对作者进行命令主义的训斥，根本没有对这部小说进行认真的探讨，也没有详细了解读者们的意见。

不错，作品中的主人公就其思维方式和世界观来说，是一个不值得称道的人物。但是，他比起一直犹豫彷徨，长期不理解顿河哥萨克为什么能接受革命所创造的新生活环境的葛里高里·麦列霍夫这一思想形象来，难道有多大差别吗？在该书的结尾，我们有理由相信主人公会醒悟过来，相信他的未来，然而，作者对此并未向读者展开描述。

肖洛霍夫曾想把格里戈里从顿河哥萨克意识中过去的社会积垢的重负中解脱出来。他的主人公对新世界的认识虽然出现了转折的迹象，但他到底还是未能完全如愿。当然，俊俏风流、温柔多情和以女性方式挑逗的阿克西尼娅，在这方面也起了作用。

日瓦戈医生的命运却不一样。他没有一个可以信赖的、聪明的人来支持他进入另一个崭新的世界，并把这个世界在精神领域中出现的一切当作是自己的、内心追求的东西。帕斯捷尔纳克从本世纪初直至30年代，都在仔细观察研究自己主人公——象日瓦戈医生这样不明白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将要来临的复杂人物的人生道路。

我的看法是，《日瓦戈医生》并非是帕斯捷尔纳克的优秀之作。我不打算评价这部小说艺术上的长短，然而我认为它不是完美无瑕的。但企图把这位语言艺术大师逐出苏联作家的集体，对他采取革出教门的做法是毫无道理的。

我们也到帕斯捷尔纳克在莫斯科郊外佩列杰尔基诺的家里做过客。被邀的客人大体上就是到鲍里斯·利瓦诺夫家去的那些人。主人尽一切努力使客人们感到轻松自如。他本人及其妻子朴实无华，富有魅力，同时又善于同人们进行交谈，特别是谈论文学题目。

帕斯捷尔纳克对美国的生活很感兴趣，向我这个前驻美大使提了不少问题。他对我所讲的关于美国“文化生活”的某些情况，做了尖锐而生动的评论。无论是他，还是康斯坦丁·费定，对美国的文学艺术都很有研究。他俩都认为，在美国，即使很有天才的作家，也往往不得不讨好某些人，而这些人对文学创作价值观的理解是完全歪曲的，他们不愿使读者在理智上负荷过重，但又要最大限度地刺激读者的神经。当时，主人自己使用了一些特别精辟的说法。

帕斯捷尔纳克家的中心人物是他那位迷人的夫人。她想方设法创造一种舒适、惬意的休憩环境。对帕斯捷尔纳克家的拜访所以值得缅怀，还由于他为利季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写过一首小诗，我俩都为之十分感动。

对帕斯捷尔纳克的评价，不能脱离开当时在国内和世界上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和变化这一背景。不知何故，他在世时在某些文化界人士中享有这样的名声，说什么诗人远离具有社会意义的问题，说他标新立异，广大读者理解不了。可

是，马雅可夫斯基称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是“非常具有时代感的新诗”的典范之一。

难道能说这样的诗人远离社会问题吗？他早在20年代就写下了两首革命历史长诗——《1905年》和《施密特中尉》。诗人在前一首长诗中真诚地说，在1905年，他“在2月最初的这些日子里爱上了风暴”；而在后一首长诗中，他借施密特中尉之口道出了最明显不过的心声：

我知道，我依身而立的石柱，
是个分界碑，
是两个不同历史时代的分界碑，
我高兴自己的选择。

早在1934年，帕斯捷尔纳克就写道：“我成了自己时代和国家的一个分子，所以它的利益就是我的利益。”

同他的多次见面，使我更坚定了对这位诗人的看法，他是个爱国者，对这个人来说，自己国家的文学，他所热爱的人民和大自然——田野、森林、河流、盆地、山脉、天空，当然还有亲爱的首都莫斯科都是珍贵的。他讲起这个城市来，总是怀着一种艺术家的激动之情，以他特殊的方式领略它遥远的过去及现代的风貌。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

党高举列宁的火炬前进

本书已接近尾声，剩下的只是需要对个别章节或个别地方再通读一遍，以便重新思考一下，在描写有关事件时是否做到了准确无误。我也想起了这样一个问题：

“我是否已选出最有兴味的事实，是否把我遇见过的那些人的个性特点和他们的思维方式都表达出来了？”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有一些人在我的记忆中也留下了一定的印象，是否应当把他们至少也提上一笔？我是否错过了这样的机会？”

尽管一个人的脑海中还有大量可回忆的东西，他总得限定一个范围，那么，他大概也会象我一样，得出这样的结论：

“算了吧！”

某些人已经不在人世，他们的影子似乎正在我身后越肩张望，看我写些什么，并说：

“让我们看看，你把我们忘了，还是打算写几句好话以示怀念？”

唉，这些影子啊！它们又帮忙，又碍事。

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就拿文学艺术家来说吧。在作品内容限定的某段时间内，他能描绘的人物虽是多种多样：有喜，有悲；有沉，有浮；有生，有死，但这些人物的数量总是有限的。

我就这样沉思了一段时间。突然传来一个噩耗，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逝世了。我同他，如同和列·伊·勃列日涅夫一样，一起共事的时间相当长。尤·弗·安德罗波夫的逝世对国家和党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仿佛现在，我还看到他那矜持的微笑，听到他那微弱的，但却是平稳和镇定的声音。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在医院也是这个样子。即使在医院里，他也憧憬着未来，制定了明确的计划。我和领导层内我们共同的朋友前去探望他，在与他谈话时，总是想方设法使病人身上的那一点点乐观主义的火花不致熄灭……

当时，看到我们这位同志的情况，心情是沉重的。我们每次去医院探望他时，他都是卧床不起。的确，他有时也从床上起来，自己要茶水，但是他在房间里移动却已经很困难了。

他敏锐地观察着，每一个前来看望他的朋友对他的病情作出什么反应。可以看出，对任何慰问以及对他早日康复的祝愿，他都默不作声地听着。但只要同他谈起未来的共同工作，他便会活跃起来。特别是当这一话题不是由他提起时，这一点更为明显。很清楚：既然对未来有着共同的计划，既然朋友们谈起这些计划，那就意味着，他们对未来、对将来的事情、以及对他的身体状况是持乐观态度的。

1984年2月9日晚，我别墅的电话铃响了。我拿起了话筒。康·乌·契尔年科将令人悲痛的消息通知了我。

第二天，政治局委员都聚集在一起。米·谢·戈尔巴乔夫建议在安葬仪式上除了苏共中央总书记外，我也致悼词，这使我深受感动。

站在弗·伊·列宁墓上，我以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

对离我们而去的同志说：永别了！我的讲话是大家都知道的。在克里姆林宫墙下，我们全体领导成员与尤·弗·安德罗波夫的遗体诀别了。

我和康·乌·契尔年科相识已有20年了。有一件事也许是值得注意的。在他逝世前3天，他感觉不太好，于是就给我打了个电话：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我感觉不好……所以，我想，是不是我该自己提出辞职了？……想和你商量一下……”

他不作声了，等着我的回答。我的回答简短而肯定：

“这不是把事情看得太严重了吗？情况不是这样。据我所知，医生并没有如此悲观。”

“那就是说，别着急？……”

“对！不必着急，着急是没有根据的。”我回答道。

我觉得，他对我的反应还是相当满意的。

“好吧，我就照此来考虑……”我们电话上的交谈就这样结束了。

由于长期病魔缠身，这位活动家终于倒下了。

在克里姆林宫墙下，我们又和康·乌·契尔年科的遗体告别了……

3年的时间里，我国人民失去了列·伊·勃列日涅夫、尤·弗·安德罗波夫和康·乌·契尔年科这3位党和国务活动家。我们全体领导人都经历了一个神经相当紧张的时期。但是，全体领导人、党和与党在一起的全国人民都显示出能够保持精诚团结，共同度过这一时期。国家的生活和劳动照常。

当然，选举新的苏共中央总书记的任务立刻就提到日程

上来了。政治局应该首先对此表态。它表态了：全体一致推举米·谢·戈尔巴乔夫为候选人。必须将这一建议提交苏共中央全会讨论。于是，立即召开了中央全会。

在中央1985年三月全会上，我受政治局委托，提出了选举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建议并阐述了理由。我的讲话已见诸报刊，党和人民都知道，所以也就没有必要重复它的内容。全会一致通过了赞同这一建议的决议。

在我党历史上的重要转折时刻召开了苏共中央1985年四月全会。

如果仅就全会通过的加速苏联社会发展的战略提纲而言（我很愿意将它称为《四月提纲》，尽管在我党历史上有过列宁的《四月提纲》，但对此无需顾忌，两个提纲同时并存是完全可以的），这个提纲是党和人民的强大武器，它号召人民把苏联社会生产力和国家经济提高到新的历史水平，号召人民去解决我们面临的社会问题。这一提纲是由米·谢·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四月全会上准确阐述的，并在苏共中央二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创造性地加以提炼的。它实际上是一个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提纲。

马克思在科学上的最伟大功绩之一，就是揭示了剩余价值规律，并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实质。他证明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可以根据其价值进行买卖，剩余价值便由此产生。马克思指出，这就是人的劳动所特有的秘密。它使劳动有别于一般概念中其他形式的商品。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由资本家支配，他根据自己的需要——其中包括为获取新的利润——来使用它。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剩余产品归全社会所有，这一社会是物质资料的所有者和支配者。社会本身根据科学制订的计划来确定如何使用人民财富，同时注意保持适当的比例和先后次序。

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就能为完成越来越宏伟的计划提供可能性。然而，为了使可能成为现实，需要每一个在自己工作岗位上的人奉献出自己的一切，需要变革他们的观念和思维。这样，加速发展的进程能创造条件使这种高速度持续下去。

这样，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本身为我党在国内生活中所执行的方针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在快要结束的二十七大的一次会议上，我突然想起了列宁评价党的二大的一句名言：

“我们的大会是多好啊！”

他是在我党刚刚诞生时讲这番话的。而现在，我们的党已经成为具有强大的力量并团结了几乎2000万人的政党，那么，我们这个党的党员又该说些什么呢？我们可以大声宣布：

“对，今天我们是在二十七大思想的灿烂光辉照耀下工作。”

我们党的代表大会指出，必须对党的各级组织、苏维埃各级机构的各项活动，对整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对各项工作都进行坚决的改革，对人们的思维和观念也进行坚决的改革。

1987年1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成为我们国家生活中重大的历史起点。这次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对党和人民在各个领域的创造性活动进行改革的任务。

全会直截了当和十分坦率地指出，至今，在国家的发展

中，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所蕴藏的潜力尚未得到应有的发挥。全会讨论了《关于改革和党的干部政策》的问题。在干部政策中发现有严重缺点，使得国家的发展计划在70年代到80年代初遭到失败。

考虑到过去的教训、我们党和国家目前所处时期的特点以及今后的任务，全会从广泛的社会经济的角度讨论了改革和苏共的干部政策。

全会向党和国家指出，必须进一步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的领导工作进行革命的改革。我们必须做到切实加速整个社会的社会经济发展。

基于我国在国际舞台上所奉行的政策，全会还强调了必须保证国家的防务需要。培养干部的工作具有革命意义，这已成为首要问题。在苏联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干部的责任是重大的，而且还在越来越加重，这已十分明显。

苏共中央委员会号召全党保持自己队伍的列宁式的团结。与此同时，还提出了完善苏维埃民主，加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各民族之间的兄弟关系的任务。

在全会通过的所有决议中始终充满着这样一种信念，即苏共中央总书记米·谢·戈尔巴乔夫在全会的报告及其决议中提出的各项任务应该而且必将实现。

我们战略的深深刻意图就在于：要把科技革命的成果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结合起来，要发挥社会主义的全部潜力。

苏维埃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可以概括为：巩固地球上的和平。反对核灾难的斗争始终是我们外交战略的主要内容。

需要特别提一下1985年11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苏美首脑会晤。会晤中，苏联的政策得到了出色的体现。苏联方面在当

代全球性问题上阐述了自己的全面的新思维，同时又对这些问题，包括对重大和平问题表明了自己采取的清醒的立场。

米·谢·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1月15日发表的声明中，阐述了具有世界意义的纲领，它后来得到了苏共代表大会的赞同。纲领的实质内容就是要在本世纪末以前彻底销毁核武器及其他种类的具有大规模杀伤力的武器。在苏共代表大会上还提出一个关于裁军和建立全面国际安全体系措施的建议，这一建议同样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苏美首脑在雷克雅未克的会晤是一件极其重大的国际事件。在这次会晤中，苏方提出了明确而又令人信服的计划，目的在于将核武器和太空问题提到新的高度。双方已十分接近于达成一项历史性的协议，即保证实现销毁核武器及太空非军事化的协议。然而，遗憾的是，美国政府采取的立场使会晤未能最终达成协议。

1987年2月28日，苏联建议将中程导弹问题与一揽子核裁军问题脱钩，并单独就此问题签订协议。全世界正确评价了这一建议，认为它是在实现1986年初苏联提出的纲领的道路上采取的重大步骤。

在华盛顿首脑会晤时签署的苏美关于消除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是新思维的重大胜利。全人类公正地将其视为实际裁军的开端。同时也为日后最终销毁核武器——实现苏联纲领规定的目标——开辟了道路。而这意味着，笼罩在世界上空的战争威胁是可以消除的。

苏联十分重视加强与华沙条约成员国的联系。为巩固友好关系而进行的经常性工作，是建立在相互支持的基础上的。在华沙条约组织的范围内，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团结原则已

经成为实践，这还是前所未有的。

在提出国际问题时，苏联大胆果断、深谋远虑、逻辑严密、内容深邃。这一态度赢得了全体苏联人民和我们在国外所有朋友的欢迎。

我相信，岁月流逝，2000年必将到来。在基本方针中，2000年是总结我们宏伟纲领执行结果的分界线。苏联人将在那时回顾15年前的岁月。针对我们当前的时代，他们会有根据地宣称：

“党是多么英明地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潜力调动起来了。党的领导人在充分认识我们社会制度潜力的基础上，坚决实现了这条列宁主义的路线，他们做得完全正确！”

在本书将近结束之时，很自然，在我面前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

“我是否把我想说的话都在这本书里说了？”

这个问题不难回答：

“是的，我想说的都说了。”

但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我是否把可以说的都说了？”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谨慎些。

世界是奥秘无穷的，而人作为世界的一小部分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的内心世界也是奥秘无穷的。即使是一部篇幅很大的巨著，不管它是科学、文学、艺术、音乐或是其他形式的创作，难道能把这一切都表现出来吗？

人们能够把生活中许许多多事件、情节、事实的印象记入脑海，这是大自然赋予他们的一种能力。彼此非常亲近、非常熟悉的人们之间的交往本身就会产生极其丰富的思想和

情感。这样，人和人的智力就要受到这些因素的猛烈冲击。任何人都无法把他从那称之为“自然和社会”的不朽庙堂中得来的一切再现出来。甚至杰出的学者和文学家也只能把自己的知识、印象和认识中的很小部分表达出来和传授给别人。

至于说人的内心世界的贮藏室里收藏着从这座庙宇中得来的一切记忆和信息，那么，就连最有天赋的人也从不会觉得有必要把自己的贮藏室所收藏的一切都讲出来。

在我的这部著作中，如果我能在某种程度上给大家补充一点令人感兴趣的东西，那么，我就颇感欣慰了。令我聊以慰藉的是，我快要结束的这本书，会使一定范围的读者感兴趣的。

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共产党员，敬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说的强大威力，敬佩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我国人民所从事的伟大事业和所表现出来的伟大精神。

我引以自豪的是，我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肩并肩地共同工作。和全国人民一样，我钦佩以米·谢·戈尔巴乔夫为首的党中央在从事我们的事业时所表现出来的天才及智慧。我们的理想已在我们列宁的党的二十七大的决议中得到了十分明确的体现，我相信它具有坚不可摧的力量。我相信，苏联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建设的宏伟大厦终将建成。

展望我们伟大的祖国，我愿与大家一起分享我经常感受到的一种感觉——相信未来。我这种信念的依据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有优秀的人民，他们能完成最复杂的任务。

其次，我们有英明的党，它高瞻远瞩，与人民群众紧密相连。

最后，我们有这样的领导，它无论是在苏联社会发展的

新的转折阶段，还是在国际局势发展的新的时期，都能胜任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宏伟任务。

党和国家将同兄弟党和国家一道，为争取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继续进行不懈的斗争。这正是我们的主要事业，是我们生活的含义，我们子孙后代生活的含义。

……星星之火，可以形成燎原之势。

列宁给我们带来了星火，它点燃了伟大十月革命的火焰。今天，苏联共产党（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一直是一员）正高举着这一火炬，沿着列宁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

代 结 束 语

“结束语”是一个希腊词。其含义是指一部戏剧结束时所有活下来的人物都要向观众最后发表独白。此词的间接含义又可使人联想到“结局”或“结尾”这样的概念。

我却不想结束这本书，也不想结束我的生平经历。所以，我不愿把最后致读者的话称之为“结束语”，无论从直接含义，还是从间接含义上讲，我都希望能够继续把关于我生平的书写下去。

情况常常是这样的，当你回忆起某件初看起来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时，就动笔写了起来，后来写着写着又离题了。再一看，“小事”根本不小。正象从炉旁开始跳舞¹一样，“小事”逐渐引出了大事。按事物发展的逻辑把所有的事件串联起来之后，一段段时间内发生的往事便涌上了心头。

我承认，我喜欢写作。每当有空写作时，内心总感到有一种难以表达的激情。索性提起笔来（不知何故我习惯于用蓝铅笔写作），将一张白纸铺在眼前，记忆（其本身之谜远未揭开）就开始运转起来了。字母跃然在光洁的纸上，词、句应运而生，各种人物浮现在脑海里，其中许多人早已不在人世，但他们和我共同经历过的往事依然历历在目，他们的谈话声犹在耳边鸣响——我们毕竟曾有幸在某些方面一起共

¹ 谈谐的俗语，意思是从头做起。——译者

过事。

同时，我感受到了这种劳动带来的某种乐趣和魅力。我常常随手记下一点儿东西，但很不系统，只不过是一些杂记而已。这些供自己用的杂记多半是个人私事，没有什么公事，而现在，它却能帮我回忆起目睹的往事并把我认为能使我的同代人和子孙后代感兴趣的東西奉献给他们。对每个人来说，这类杂记通常都只是起推动和启发人们去进行某种思考的作用。

撰写回忆录并非易事。有时可能回忆起大量细节，但却忽略了主要的东西；或者你写了主要的东西，但你的写法使人觉得似乎在你动笔之前有谁已经写过许多遍。就这样冥思苦想，起身离开写字台，在屋里踱来踱去，而后又坐下来，写下一两句话……之后又将其撕掉。这时，我才开始理解作家乃至所有经常从事文学创作的人的劳动。这是一种多么不易的劳动啊！许多文学家说，有时一天写不到一两页纸，对这种说法根本无须大惊小怪。

正因为如此，“写回忆录”的工作进展速度之慢有时犹如乌龟爬行。这些杂记我似乎写了将近一辈子，可现在又得把这一切汇集在一起，需要重写或改写。

有些困难的出现是完全出乎意料的，即便一切进展似乎都很顺利时也会有这种情况。突然间你会感到，“乌龟”完全停止不动了。所以，我觉得，语言艺术最繁重，最能确切地反映人们的生活、人民的历史，而且常常几乎捉摸不到，离人既远且近。其他任何艺术都不能与之相比。

尊敬的读者，您大概在等待我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出生在基辅通往莫斯科的大路旁、在戈梅利市近郊的人怎么

成了本书的作者呢？这个作者怎么成为现在这样的人物呢？

是的，作者出生在一个小村庄，那里的农民在深冬季节已在走街串巷向周围邻居筹借一些粟黍或是一些荞麦，黑麦或燕麦了。在那个季节，什么东西都总是不够。村里人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所以开始相互借来借去，相互救济。在我们村里，家存越冬粮的也只不过两三户人家。邻近的村镇也不敢夸口说他们的情况比我们强。所以往往是，男人们冬天出去打短工，开春时再返回家园，回到孩子、妻子身边，照料家庭和自己的土地。地虽不多，可只要天气一转暖就得开始耕作。大家都在这里扎的根。所以要背井离乡去漂流四方，只图远走高飞，那是做不到的。也有这种情况，一个人因贫穷而出走，可贫穷又缠着他不放，似乎在说：

“不，我的朋友，请留步吧，我需要你！”

记得有一年冬天，我的叔父伊万到马里乌波尔一家工厂去了，在那里做了几个月工，可是什么专长也没学到手，没有成为一名熟练工人，没赚多少钱就又返回了家。看来无法留在那里。如果一个人的家在农村，他怎么能在外地呆下去呢？农村虽然不怎么好，可这里毕竟是祖祖辈辈共同生息的地方。

常常有人问我：“您是怎么上去的……？”在这个问题中往往还含有言外之意，似乎他们知道某些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东西。他们似乎在说：您嘛，从小就开始准备干一番大事业的。不，当然不是这样。儿时的事我倒是知道，可关于什么大事业我可一点儿概念都没有。

但总还是要对此作出解释。

当然，生活中常有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也准备承认这一

点，在我的经历中肯定也碰到过意外的事情。我曾偶然地迈进了一个学术机关，并同其他人一道开始研究经济问题，尔后又于1939年偶然被召到党中央委员会进行谈话，说可能要派我去出国工作。

这或许不能算是偶然的？如果我不具备一定的条件，那么，大概谁也不会召见我。要知道在这次召见之前，我已苦读多年并进行了一定的劳动锻炼。并且，我已养成一种习惯，在做这些事时总是要周密地考虑一下。所有这一切都是在非常不易的条件下做到的，唯一给我做参谋的人只是我自己。

在1917年夏天的某个时候，十月革命即将爆发之前，我曾有幸一生中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我们村过去的地主。他姓伊万诺夫斯基。我见他带着妻子和女儿在村里走：他本人穿着一双漆皮长靴，妻子和女儿身着漂亮的连衣裙，他们都是城里人打扮。那天阳光格外明媚，我们一群光着脚丫的小孩跟在他们的后面，大人们偷偷地躲在一旁，羞怯地望着他们，老爷们乘着一辆轻便四轮马车，那马车疾驶而去，不知奔向何方。

从此，地主一家就无影无踪了。他们再也没在老葛罗米柯村露面。或许他们已经穷困潦倒，还生活在我国某个地方，或许象许多与他们同命运的人一样出国去西方了。地主的100俄亩土地，早已被我们村的农民分了。而我还在想：“这些老爷到底上哪儿去了呢？”

对生活的思考或诸如此类的想法早在童年时代就开始了，其中有许多想法并不成熟，甚至可以说是杂乱无章的，但确实有过这些想法。

请你们设想一下这样一幅情景：一个九十岁的男孩坐在

那里，两眼望着窗户。父母都还在田里干活。的确，那时我也经常同父母一道去地里干活，但有时也把我留在家里照看比我年龄还小的孩子，而且还要做晚饭。把活都干完之后，就这样坐在窗前想：

“我也会逐渐长大，而且一定会长大成人。”

尔后又扪心自问道：

“长大成人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我又自己回答道：

“这就是说，要学会自己赚钱养家和养活自己。”

这就是经过沉思后得出的结论，它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学会工作，工作，还是工作……

在那个时候，我经常能弄到一些各种各样的书籍。这已经是革命之后的事了。最初村里出现了一些小册子，我同我的同龄人一道开始阅读这些东西，后来也有书了，我特别喜欢阅读那些描写革命者生平的书籍。

那时，可以说我们村的孩子们对城市工人具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好感。他们的组织性是何等的令人肃然起敬！因为主要是他们——工人，无产者实现了革命。假如不是他们采取有组织的行动，那么，人们可能既对付不了留着小胡子的哥萨克士兵，也对付不了那些区警察局局长们，那些人非常喜欢乘不知为什么在马颈圈上一定要挂些小铃铛的马车到各村巡视。

正是在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农村的孩子们开始相互谈论自己的理想，在脑子里产生了一些稀奇古怪的设想。有的说，准备到其他国家去发动人民搞革命，有的则设想出了同皇帝、国王、资本家和地主以及同任何压迫人民的人进行斗争的其

他办法。

岁月流逝。儿童成长为少年，少年又变成青年。其中最富有求知欲和最勤奋活跃的青年开始把自己的理想变成现实。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么想的：既然工人能够进行反对富人和剥削者的斗争，那么农民为什么不可以加入他们的行列，也成为工人呢？他们工人对此只会是表示欢迎的。有的孩子就这么干了。为了当工人，他们进了城。有的在城里找到了工作，有的则又返回了自己的老家。

我有一个好友名叫瓦夏，后来人们又叫他瓦西里·谢苗诺维奇，当然他也姓葛罗米柯。经过长时间的商量，我们约定了要尽量说服父母放我们走，并争取进一个什么小工厂或者大工厂。我们估计，如果往东或东南方向走，大概能找到这样的工厂。可这时村里还有传闻说，就在附近的一个小城镇里，不知是克林策，还是诺沃孜勃科夫（现都在布良斯基州）正在招工。谁也说不清楚，这家工厂到底在哪儿，是个什么样的厂子？

而我们这两个孩子并不挑拣，对我们来说，什么都一样。我们只是憧憬着能同更多的人生活在一起并一定要听到工厂的汽笛声催促我们去上工，正是这汽笛声激励着我们的心。说到就要做到！我们随身带上些面包干——不是面包，而正是面包干！还带了一些苹果和干奶酪。只要饿不倒就行。至于其他的嘛，就靠年龄了。那时，我刚满12岁，我的同伴比我大一岁，我们向城市的方向出发了。

我们沿着想好的路线走了大约10公里，坐下来稍事休息之后，又走了10公里。我们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地平线：那里是否冒出一个工厂的烟囱来。但不知何故，那烟囱一直没有

出现……

我们来到了诺沃孜勃科夫，只是来到这座城里，才看到了工厂。这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厂子，可我们却感到它是个庞然大物，是我们理想的化身。我们认为，最主要的是它有个烟囱，而汽笛从清晨起将会唤起我们。心激动得怦怦直跳。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它已近在咫尺！现在回忆起来真感到有些可笑：我们真是太天真幼稚了。竟不懂得工厂需要的是体魄健壮的成年人。但当时因为激动，心还是跳得很厉害。

我们露宿在一个商棚下面。既没冻僵，也没感冒——那时是夏天。清晨，汽笛响了，我们走进了工厂的入口处，看见一个岗警，现在叫门卫，工人们凭通行证从他身边通过进厂。他已注意到我们。

“你们到哪儿去，找母亲还是找父亲？”

“不，我们是来当雇工的。”

“当什么雇工？！首先是你们的年龄不适合。再说，我们已经雇了一些成年人，再没有空缺了。我们已不需要任何人了。”

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可他却象父亲那样开导我们，总是重复着同样的话，耐心地解释说：

“工人的编制已招满，工厂再也不需要工人了。”

我们当然大失所望。呆呆地站在那里，相互问道：“现在可怎么向亲人交待？”除了讲实话之外，什么别的招儿也没想出来。又只好按原路返回。

结果是，抱着某种希望来到了工厂，而又忧伤地离开了它。然而，年轻人毕竟是年轻人。在返回的路上，太阳火辣辣地当头照，我们找到了一个僻静的角落，在树荫下坐了下

来。我们开始商量……其他方案。其中的一个方案是：我们干吗不去砖厂，那里可能招工，而这种砖厂在世上可真不少。

……没过多久，瓦连京·克鲁奇宁的《砖》歌风靡全国，一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首歌的歌词：

我刚来到这里，
艰苦备尝，
一年时光已过去，
我爱上了这座砖厂，
我爱那排排红砖，
爱那欢快的轰响。

歌曲颂扬了一位热爱工厂的女工，尽管这种工厂的工作不适合妇女去做。我听过这首歌，一有人唱，我也随声附和。当我想起不久前我们两个头发蓬乱的小孩子是如何幻想能在一个砖厂里找到工作时，心里总是甚为激动。

然而，好象命中注定似的，一路上我们并没有碰到什么砖厂……

就这样，我们又返回了自己的村庄。我们的父母对发生的事也深表理解，于是我们又继续在家里干活，能干多少就干多少。

村里忽然又传说，比较有文化的青年男女都可以加入共青团，这样他们将有充分的机会受教育。只是眼下谁也说不清楚怎么个加入法。后来，乡里专门派了代表来才弄清楚，希望入团的人可以进行登记。这些代表们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在每个村镇建立共青团支部。

蓬勃的新生活开始了。

我们当然也加入了共青团。很快，我们就自己着手建立

共青团支部。在老葛罗米柯村和新葛罗米柯村都建立了共青团支部。我们甚至准备为几乎是在全世界建立这样的支部助上一臂之力。我们眼看着自己很快就成长起来了。

当时需要多读些书。年轻人把放在家里阁楼上或地下室、箱子里或柜子里的各种各样的书籍都拿出来了。在许多村里开办了农村文化馆。共青团员们经常定期举行会议，他们自己在会上做报告并互相勉励要坚定马克思主义和世界革命必胜的信心。

当时，还组织了一些3—5人参加的小组，它们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进行工作，努力协助建立共青团支部，组织政治学习小组和农村文化馆，同时也举行小型文艺晚会。

我们特别热衷于寻找更多的布琼尼式军帽。我记得，我的好友和我自己都积极地干过这件事。布琼尼红军骑兵战士戴用的很有吸引力的尖顶军帽，是当时每个青少年梦寐以求的奢望。甚至连姑娘们都认为那些戴着光荣的红军骑兵帽的小伙子比其他人都强。这使小伙子们的自尊心得到了满足。他们觉得，不戴布琼尼式的军帽，连革命也不成其为革命了。

尽管我想努力那样做，但是，我大概还没有回答下面这些问题：“您是怎么走上那条把您引上广阔前程的生活之路并给了您选择的机会？是什么激流把您这个当年的小伙子卷进了沸腾的社会生活？又是怎样把您引上了政治舞台？为什么开始参与重大的对外事务？而且还参加了同样重要的国内事务？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您没成为一个长期从事农业工作的人，或者为什么没成为一个象您兄弟和许多亲戚一样，后来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年代里战死在沙场上的人呢？”

要回答所有这些问题并非易事。

好吧，既然人们常说到我们大家是从儿童时代过来的，那就让我们再把话题拉回到我的儿童时代吧。

就这样，在村子里，我所面临的仍然还是那个老问题：“下一步怎么办？”这个问题要由一个年龄只有13岁的孩子来回答，这个年龄可不算太大。

我同瓦夏继续思索着今后生活中可能遇到的谜题。往哪儿走？究竟是否要走？或许，索性蹲在乡下干农活，长者让干什么活就干什么活？总之，也许不必跳出农业和打短工这个圈子，打短工已是我们这里的成年人每年都要干的活。

突然，我的朋友瓦夏听从了他一个亲戚的话离开了家乡，考入了诺沃孜勃科夫的一个土壤改良中等技术学校。当然，我很羡慕他，本想也走他的路，可是结果那里再也不招生了。

离开学还有很长的时间，瓦夏跑回了家，于是我们又一起决定，即便是在短期内，也要“成为无产者”。可怎么才能如愿以偿呢？我们想，最好的办法是要跑到附近一个“象样的”城市去。我明白了，我的伙伴对土壤改良的事儿不怎么感兴趣，不然他也就不会另找出路了。

我们动身去了戈梅利。当然是在征得父母的同意后才走的。任何一个拥有工业企业的城市对我们来说都有莫大的吸引力，更何况戈梅利了。如果径直走，它距我们家只不过才30公里。不用说，我们是徒步前往了。

我们来到了这座城市，可是到哪儿去呢？去找哪一个机关？提出什么要求？除了去职业介绍所之外，没想出任何其他好办法。当时，国内的失业现象尚未根除。对已登记的失业者来说还能找到一些活干，但多半是些临时性的工作。有人也向我们推荐这种工作。

市内正在兴建铁路部门的大楼。当时的基建工程还没有使用什么特殊的机械设备。我们的任务是往三楼和四楼抬木板，从早到晚都是干这种活，我们就靠干这种活生活。

但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一顿午饭。每天中午，我们被固定在一个专门的食堂里就餐。每顿饭只有一道菜——或是第一道菜，或是第二道菜。这毕竟是工人、无产者的一顿午饭！

这项工作我们干了大约3个月。我们有住宿的地方，似乎也可在那里休息。我们有了时间就抽空去看市容，了解一下城里的风俗习惯和与农村生活方式迥然不同的城市生活。我们读着机关、学校、企业和办事处的牌子，我们知道，谁也不会要我们到那里去工作的，干那里的工作得有一定的专业技能，而我们当时还不具备条件。

所以我们干了几个月后又返回了自己的家乡。口袋里也没有赚到多少钱。

亲人们竭力鼓励我们，但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家里的好帮手，应该想点儿什么出路。我的父母和瓦夏的父母不仅不阻止，甚至鼓励我们求学的愿望，这鼓舞了我们，使我们产生了一种美好的激情。学习能使我们有所前途，能使我们学到某种专业技能。

我的朋友最终还是到诺沃孜勃科夫去了。后来他得到毕业文凭，成了一名土壤改良专家并长期在这个部门工作。就这样，我和瓦夏便分道扬镳了。后来，我经常回忆起我的老朋友。

而我到列奇卡村去上学。该村是一个区中心，离我们村子不远。学校本该改为一所职业技术学校，教什么专业，我

和我的双亲还都不甚了解。

但不久，该校师生都迁到了戈梅利。在市郊，在不久前还是一所修道院的房子里，办起了一所新学校。我不得不在这前修道院的院宅里去熟悉城市生活和新师生的集体。

在那里，我感到我有继续求学的机会，这一点很令人欣慰。我想，这样一来，中学毕业之后还可以继续深造。学什么专业呢？也许学技术，但也可能学别的专业。我认为，学技术是最现实的，况且戈梅利有一家火柴厂，它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维苏威”火柴厂。该厂既需要技术员，也需要工程师。前面我已写过，当若干年之后，我参观真正的“维苏威”山麓挖掘的庞贝古迹时，又情不自禁地回想起了那个戈梅利的维苏威火柴厂了。

其实，正是这个少年阶段对选择我的人生道路起了关键作用，至少对当初几年来说是如此。

当时不清楚的只是：什么风会把这些学生卷起来并又把他们送向何方。他们被风卷了起来，并被风送到了四面八方。

是的，这些少年有一种向往城市的强烈愿望，尤其向往城市的社会生活。当然，这种愿望是由革命后国内的整个气氛所造成的。十月革命的火焰熏陶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的理想往往离不开列宁的名字，离不开人们对革命的著述和议论。伊里奇的小册子大量出版发行。新的共产主义的读物装满了图书馆和农村文化馆，至于学校里的藏书那就更不用说了。这一切对青年一代，而且不仅仅是对青年一代，都产生了莫大的影响。而这一切对许多人来说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当然，所有这一切也可使你得出另外一种结论。偶然因

素也许也起了作用。只要不去求学，而就在生产部门干下去，不管是农业，还是工业，那么，几年或数十年所走过的道路可能是另一个样子了。是的，这完全有可能……

如果有人问我，你对正走向生活的青年人有何忠告（我现在收到的信件中也有人提出这类问题），那么，对这个问题大概可以这样回答：最初要学会学习。在我们这个文化普及、信息灵通的时代，应该学会选择必要的信息，努力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有利于社会。

我一向喜欢读书，只要有空，我就阅读书籍。现在我的家里藏书近4500册。透露点儿秘密吧，利季娅·德米特里耶夫娜有时责备我说：

“又是书，家里都堆满了书，人都无处呆了。在英国曾有人说过羊把人吃了，而我们家中的书很快就会把人吃掉！”

但我总是有一个很充分的理由对付她，而且很有说服力：

“你是在哪个学院学习的？”

“莫斯科图书专业学院。”她答道，“那又怎么样？”

“那怎么能把书同羊相提并论呢？”

如果严肃地说，我应该指出，今天我们需要的是全面发展的、政治上有见识的、忠于党和人民事业的、牢固掌握最现代化的知识和最新科技成果的苏联人。

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造就的正是这样的人。

现在，我该搁笔了。回忆录已经描绘了我所走过的路。我在写回忆录时，也感到有些奇怪，时间把我同一些事件和一些人物结合在一起，而这些事件和人物似乎在相互争论

“我们之间谁更重要？”

看来，这个争论由来已久。人们生活在时间之中，伟大的历史事件也发生在时间之中。要把人们和事件分开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我的出发点。

当然，我写的是与自己有关的一些事情，或是写了一些只不过是自己所观察到的，但确有社会意义的事情。

回忆录中多半是国际性的，或是与之有关的题目。这是我的经验之谈，也就是我所经历的人生道路的纪实。

有的读者可能看完我的书后会发现，有些事件或人物我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轻描淡写，一带而过。大概还有另外一些读者认为，对某些事件和人物的叙述还可从简些。

可怎么办呢？大概没有，而且也永远不会有两位作者能把同一主题和各方面描述完全相同的作品奉献给读者去评论。

要对我所参与过的事件作出客观评价，并真实地描述命运使我结识的那些人或是我应该谈出自己看法的那些人的活动（因为他们与所发生的事情有关），这就是阿里阿德涅之线¹，我尽力抓住这条线不放。

换句话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始终是（其中也包括今天）我实践活动的准则。

这也适用于我的《永志不忘》。

1979—1988年于莫斯科

¹ 希腊神话中克里特国王弥诺斯之女。她给杀死弥诺陶罗斯的雅典英雄忒修斯一个线团，线头固定在迷宫入口处（“阿里阿德涅之线”），以此帮他走出迷宫。

——译者

封面
目录
正文